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美国对中国的反应



## 序 幕

### 蛮夷和进贡制度

在香港乘水翼船穿过通向广州的珠江口,1小时15分钟以后便在澳门登岸,迎面望到的就是中国大陆的丘陵,这些山都具有中国传统山水画所描绘的风格。在这里除了富丽堂皇的圣保罗大教堂和偶而见到一个葡萄牙巡警外,周围一切都使你不可避免地感觉到中国的巍然存在。你能在这块弹丸之地上存在全凭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恩惠。这一事实闯入你的意识比在香港,甚至新界所感觉到的更为突出。

澳门是北京政府的一个重要外汇来源。在这个到处是红旗和毛照片的地方,你可以悠闲地乘一辆三轮车去半岛东部逛观音庙(观音是广东人对佛教慈悲女神的称呼)。庙外有乞丐沿着雕花的大门一路跑着乞讨。庙里面和各地众多的庙宇一样,并没有什么特色。走进露天庭院,映入眼帘的是在这块殖民地上最不引人注目的景色之一,一排排五花八门的建筑向着地平线延伸,显然是中产阶级的住宅区。但是就在你面前的庭院里有座小亭子,亭子表面那种常见的橙红色已经剥落,附近有一张石桌,还有一块匾——它告诉你在1844年7月3日,清廷钦差大臣耆英和美国总统特使顾盛(C.Cushing)在这张石桌上签署了中美两国间第一个条约。

1844年,中国在鸦片战争中败于大不列颠之后,美国使中国同它达成一项“和平、亲善、通商”条约。仅仅靠谈判,中国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勉强承认了美国的重要性。若在5年前,这对清王朝来说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自从中国人和美国人有了接触,60年来中国政府的代表第一次允许美国代表以平等身份和他们一起协商。当然,中国仍然自信比美国蛮夷绝对地优越。

美国从英国获得独立后不久就开始向中国进发。当巴黎达成和平调停的消息差不多刚传到胜利者耳边的时候,“中国皇后号”就已经装备齐全被派遣到中国参与贸易开发。美国的对华贸易不再受霸主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阻挠。在东海岸的商业界预计可望获得巨额利润,在想象中浮现出一幅和中国通商发财致富的美景。在一度有利可图的与英属西印度的贸易被禁止以后,这确是可望补偿的一种。在此后的50年里,美国在中国的利益完全是商业性的。

在美国进入中国的最初年代里,为了遵循尽可能避免政治纠葛以扩充贸易的基本政策,政府的作用维持在最低限度。美国商人很大程度上要依靠本身的努力,虽然政府以优惠税则给予鼓励并允许商人自己推举一名领事,但不发薪俸。作为追求个人财富的商贾,他们凭自己的能力来到东方,自担风险,在中国当局所允许的自由范围内进行活动。那时在中美两国政府间没有接触,没有条约义务和外交代表机构,也没有外交关系。

中国人给西方商人造成的处境不能说是令人愉快的。中国人也许是世界上民族意识最强的,中国人认为他们的国土是宇宙的中心,即中央王国,并且把一切和他们不同的文化传统都视为劣贱的标记。除中国人以外,其他民族显然都属于蛮夷。欧美人和亚洲内地的部落民族的区别只在于前者从东部跨海而来,后者则来自北方的大草原。诸夷来到中国恳求文明的恩赐,中国人并不感到意外,只要这些外来者表现出适度的恭顺,他们就准备慷慨接待。

自古以来中国把和蛮夷藩邦的关系纳入一种进贡制度。从理论上讲,凡与中国发生联系的各民族都是进贡的臣属者。这种联系的程式已被高度礼仪

化，包括：招待进贡使者、皇帝赐见、朝贺使节磕头施礼，以及接受皇帝恩赐的礼品。最使西方人伤脑筋的是磕头，按宫廷典礼，磕头包括一连串的下跪、伏地拜倒和“磕响头”。一切听从命令进行，所以谁向谁致敬一清二楚。

当美国人出场时，进贡的臣属制度早已成为开展贸易的媒介。清廷为和来自海上的诸夷打交道，在臣属礼仪上作了某些变化。西方商人接受了臣属者身份，不得不处于屈从地位，中国政府对此感到满意，不再要求臣属使者进京。虽然中国朝廷一向因袭传统形式从隆重典礼中体现其威严，但到了18世纪，京城和地方上的官吏都从对外贸易的收益中得到了足够的好处。这当然不是说各国夷民能够在这个王国里自由行动了。他们不仅作为外国人受歧视，还由于是商人被看不起——按儒家等级制度，商贾是下贱的阶级，不论他们的生活如何富裕。

如果夷国商贾坚持要求推销他们的货物并买回中国高度文明的产品，他们就被限制在广州一个很小的区域里。在那里污染的可能性被限制、疾病受到隔离、中国人可保无虞。那里的官吏也无需为夷民操心，而是把外商交给中国商人去管理。

被各种限制所束缚，遇到纠纷无处求助也得不到本国政府的保护，美国商人像他们的欧洲同行一样就这么呆在中国。但是从他们获得的利润和这点烦恼相比，显然还是值得的。不过有时也发生不容忽视的事件，例如1821年臭名昭著的泰拉诺瓦事件(Terra—novaCase)。在这个事件中，美国船上的一名水手被捕，由于一桩可能与他无关的死亡事故，中国当局采取报复手段，把他判处死刑。据说一位中国妇女被从美国船上抛出来的破碎物品砸伤致死。当中国当局要求引渡美国船员泰拉诺瓦时，最初遭到外国商人拒绝，后来有人劝告说，拒绝引渡就意味着美国商人被逐出中国市场，于是美国商界在表示抗议后决定交出泰拉诺瓦。在没有美国人在场的情况下，泰拉诺瓦被秘密判决处以绞刑。判决执行后，美国政府没有提出抗议，而在广州的美国人由于表现十分恭顺得到了广州总督的赞许。这就是由中国人支配交往关系的当年，中美关系处于臣属制度下的状况。

广州所实行的经过变通的臣属制度是建立于清王朝的极盛时代，在欧洲实现现代化之前。美国在获得独立后1年之内便加入了臣属之列，当时正是美国国力最弱的时候。换言之，广州的做法是在中国的力量相对来说比西方各航海国家强大的条件下产生的。当时，中国有足够的权威来左右和西方各国的关系。在中国保持这种相对的强大地位的年代里，它一直以专横、轻蔑的态度对待西方人。后来当权力均势发生变化时，西方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同样施虐于华人。这是一件很遗憾的事，但却是可以理解的。

美国最早试图把和中国的关系置于缔结条约的基础上是在19世纪30年代，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任总统期间。杰克逊的追随者与其前任华盛顿(G. Washington)、杰弗逊(T. Jefferson)的追随者一样，都致力于扩充美国的贸易。杰克逊总统派罗伯茨(E. Roberts)出使东方寻找新的通商机会，总的目标是多签订一些条约。作为这项使命的一部分，罗伯茨去了广州，目的并非为了减除进贡制度对商人的凌辱。罗伯茨于1832年11月到达广州，但是未能和中国地方当局建立联系，只是接到一道要求他立即返航的命令。罗伯茨离开广州显然解除了一个顾虑——即他的来临会在美国人当中产生的担心。有些美国商人担心签定商约的意图有不够“恭顺”之嫌，以致会导致中国人的对抗，最后不仅不能扩大贸易反而有损现存的贸易关系。

在 19 世纪 30 年代，美国最早的一批传教士也来到了广州——他们都是些勇敢者，甘冒任何人在中国宣传基督教义会被判处绞刑的危险。初期传教士的成就并不大，但是它对美国在中国的利益具有新的，日益增长的重要性。美国除已涉足商业领域外，又进入了宗教领域，而后者基本上是出于一种人道主义的愿望——要在上帝的天国里为中国人找一席之地。

当教士们都乔装成商人以逃避中国人为他们安排的不愉快的下场时，真正的美国商人正面临着卖什么商品的难题。裘皮、檀香木甚至人参（是年迈的中国士绅们为恢复衰退的体力而孜孜以求的一种药材）的销售市场都有限，全部加起来其价值也不能和西方通常从中国进口的大宗货物相比。于是美国商人和英国商人一样，也逐渐地转卖鸦片，虽然有些美国商人确实从不接触毒品，也不宽恕这种毒品贸易。

在 19 世纪 30 年代即将结束的时候，鸦片贸易已成为中国政府的一个严重问题。显然有些中国官吏对吸毒在道德和肉体上造成的后果深为关切。另外，鸦片贸易兴起的真正原因是，毒品为西方提供了一种适销商品，其销售额超过了西方从中国进口货物的价值，这就给中国政府造成财政上的困难。总之中国在和西方的贸易中传统上都是顺差，可是，鸦片贸易却使中国的硬通货趋于枯竭。

中国人除了禁止鸦片进口外别无选择。对鸦片贸易负有主要责任的英国商人似乎也认识到这种有利可图的生意已不可能再继续下去，冲突迫在眉睫。由于和中国政府没有外交关系，也不可能说服中国官吏接受一个外交使团，这些商人缺乏通过调停解决争端的渠道。中国人则决心使用武力来结束从 1800 年就被禁止的鸦片贸易。鉴于这一形势，英国商人请求本国政府给予军事支持并获得成功。于是，中国和大不列颠发生冲突，两国陷入了“鸦片战争”。

历史学家从事后来看已经十分清楚，中国和西方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与其说鸦片是发生冲突的原因，不如说它只是为一场冲突提供了机会，这一点也是十分清楚的。只要中国高傲自大，对蛮夷之邦不屑一顾，不去认真研究他们，尤其是没有认识到英国已经强大到要求有平等的外交地位的有求必应的程度，多少年来中国和西方的“接触点”就可能变成了一触即发的火药桶。当西方各国由于工业化和民族主义的增长而更强大，更霸道的时候，中国国威的鼎盛时代已经过去。清朝也未能逃脱中国历史上王朝衰落的命运。

力量之所在已经转移，但中国的清廷官吏们尚未察觉。被中国当做野蛮人加以虐待的“洋鬼子”和“大鼻子”，已不甘心屈从于那种专横的做法。中国人如能顾及国家之间的平等外交关系，或可以避免“鸦片战争”以及随之而来的一个世纪的耻辱。

当 1839 年战争爆发时，中国的“夷务专家”即西方问题专家们至少解决了一个对洋人区别对待的问题。中国人弄明了美国人不是英国人，虽然他们的长相都一样；另外，还得知了英美两国历来有嫌，彼此不睦。在粗知美国革命和 1812 年独立战争的历史后，中国官吏得出结论：如采取传统的“以夷制夷”政策也许能奏效——号召忠诚恭顺的美国人奉上英国人的首级。中国人感到不顺心的是，在广州的美国社团不肯介入。当英国人无暇他顾时，美国人宁可抢他们在当地的生意，包括鸦片贸易在内。

英国战胜后签定南京条约，恢复了和平，标志着中国历史上新的一页——臣属制度的结束，条约制度的开始。不幸的是，这一新制度虽然从理论上

讲是在西方平等外交的概念上建立的，但事实证明它和旧的臣属制度一样不平等。在此后 100 年里是由“蛮夷”支配着中国和西方的关系。中国称霸全球的抱负在这个备受歧视的年代宣告结束——一度自豪的帝国沦为半殖民地。

## 致 谢

在本书稿付印之前，我不客气地交给几位朋友，请他们审阅。贺正（Tadashi Aruga）、多萝西·博格（Dorothy Borg）、加斯特·迈克尔（Gaster Michael）、斯塔尔·霍尔特（Stull Holt）和小詹姆斯·汤姆森（James C. Thomson Jr.）都向我提出无数建议，我很珍视这些建议，即使有时没有采纳。贾尼斯·科恩（Janice P. Cohen）作为妻子，罗伯特·迪万（Robert A. Divine）作为编辑都阅读了手稿。我的这些读者给我帮了大忙，假如我对自己的作品不是那么自负的话，他们可能会给我更多的帮助。

像每一个从事“美国—东亚关系”研究的人一样，我十分感谢多萝西·博格，我的许多观点都受益于她。我书中的剖析也借鉴了玛丽琳·扬（Marilyn Young）的著作。我的意思不是躲在这两位女士后面，掠人之美，只是说明如果没有她们的帮助，我的工作将增加多大的困难，而且不知道我会写出什么样的东西来。还有保罗·瓦格（Paul Varg）及几位这里不予署名的中国学者，他们的想法都促进了我的思考。

我不可能把几个国家的图书馆以及美国各地图书馆中为我的研究提供方便的工作人员都列出来，但是，确实再没有什么人比国家档案馆的帕特里卡·道林（Patrica Dowling）及其工作人员更善于合作，更服务周到了。为我提供经费的人就少一些了。我从美国学会理事会得到一笔补助金，从密执安州立大学得到年度津贴，从密执安州立大学“大学研究基金”以及亚洲研究中心得到的资助让我得以进行大部分旅行。亚洲研究中心的主任威廉·罗斯（W. T. Ross）对我经济上的困难处境经常给予特殊的关注。

最后，我要感谢许多朋友，包括我的同事和学生，他们并没有报我以虚伪的溢美之词，而是对我书中的引证及多年来得出的论断提出了质疑。他们太多了，在此不能一一列举，但是，他们都曾经是我的老师——我希望在本书出版以后，他们的人数会成倍的增加。

孔华润

## 第二版序

本书第一版受到评论家、参议员、政府官员和教师、学生们的慨然赞许，我自然感到十分高兴。甚至我的子女也对此书有好评。然而在1971年夏天书刚出版的时候，就显然有必要对它加以修订。亨利·基辛格前往北京，中美之间已准备建立一种崭新的、不那么敌视的两国关系。在理查德·尼克松开始他有历史意义的中国之行的前夕，参议员J·威廉·富布赖特召集了参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邀请我去给各位委员介绍中美关系的历史沿革。可是我的出版商对此却无动于衷，因为我的书写到1970年为止，而中美关系的突破发生在1971年。我答应在中美建交后尽快出一个修订本。原想只延搁一年，岂料水门事件，“四人帮”及罗纳德·里根竟给了我七年时间——在此期间我写了另两本书。

1979年1月30日，我和妻子去华盛顿参加为邓小平举行的招待会，我们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美国国旗并排飘扬在白宫。我知道时刻已到，建交在望。美国对中国作出的新反应要求出版《美国对中国的反应》一书的新版本，就是这个修订本。

我利用新获得的杜鲁门时期的大量档案资料重写了第六章的最后部分。原来的后记重写扩展为第七章。其中许多素材引自我为撰写关于迪安·腊斯克(DeanRush)的书所收集的研究资料。1971年以后的事态都包括在新写的尾声之中。

我感激J·R·安德森、J·费策尔、J·L·加迪斯、S·戈尔茨坦、W·海因里希斯、M·H·亨特、入江昭、W·拉费伯、S·I·利文、E·R·梅、R·梅塞、M·奥克森伯格、T·G·佩特森、M·J·舍温、R·斯蒂尔、N·B·塔克及A·S·惠廷。他们以自己的研究工作为我提供了有远见卓识的借鉴，还有在过去十年间我们参加过的许多令人鼓舞的会议和非正式讨论都对我有所帮助。而我们大家都受惠于多萝西·博格更是众所周知的。我认为这些朋友集体地对这本书的内容负责，虽然他们谁也没有看过这个修订本。

孔华润(W. I. Cohen)

## 第一版序

几年前，费正清写过一部题为《美国和中国》的书，我无意与之媲美。它始终是一部最好的介绍中国的权威性作品。我的注意力集中于美国对中国的反应，特别是那些谋求制订一项符合美国人民利益和理想的东亚政策的政治家的反应。正如我书中所写的，我日益感到有必要从广泛的国际背景上解释美国的对华政策。但是这本书写得并不满意，部分原因是所知有限，部分由于我想最大限度地避免在内容上和丛书的其他各卷重复。不过我强烈地希望读者去关注更宽广的世界舞台及出场的其他演员，我所描述的情节都是在这个舞台上发生的。

书中许多论点在我早先发表的一些文章中已经探讨过。某些论点如和我过去的相悖，则属于我最近提出的新论断。在用语方面，仍同过去差不多，这是由于在我没有切实找到更好的表达方式之前不想标新立异。

书中引用的中国资料除注明者外，均系本人所译。引证部分限于直接引用原话或原文。我将乐于和有兴趣的研究者共同探讨其他可用的资料来源。

孔华润 (W. I. Cohen)



## 《美国和世界》丛书编辑前言

从哥伦布西行探索通往古中国的捷径之日起，中国就作为一个庞然大物呈现在美国人的心目中。广州是美国获得独立后谋求开发的第一个海外市场。在 19 世纪，丝绸、茶叶和香料的魅力驱使着新英格兰人川流不息地跨过太平洋。但是我们对待中国的态度不久就产生了矛盾。一方面，传教士和商人认为美国的使命是改造中国古老的文明使之现代化，但是中国移民在美国却受到嘲笑和仇视，终于在 1882 年被驱逐。20 世纪 20 年代，美国对中国的态度继续徘徊在吸引和排斥两极之间。我们宣布采取门户开放政策，保持和发展在中国的贸易，但是并没有促其实施；我们提倡变革和现代化却对 20 年代在中国涌现的革命派蹙额疾首。虽然美国人不时对中国表现出一种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同情，却绝少见诸行动。30 年代日本侵略中国我们只给予道义上的支持。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把中国列为第三等参战国，仅给蒋介石以象征性的援助；在雅尔塔，罗斯福事先未征得蒋介石同意便毫不在乎地把“满洲”的铁路和港口控制权转让给了苏联。最终的对抗行动始于冷战年代，那时美国对中国共产党人的胜利作出的反应是：拒不承认毛的政权反而与溃败到台湾的、声名狼藉的国民党结盟。

科恩教授对中美关系的深刻剖析把握住了美国在中国遭到失败的本质。从国家利益的大范围看，相对来说中国对美国是无关紧要的。但又存在着建立在天真的种族主义之上的不切实际的向往，科恩看到了这两者之间的距离。他多次指出：美国作为一个以太平洋为中心的国家，在拉丁美洲和欧洲有更为紧迫的需要，遂把对华政策置于次要的从属地位。同样有意义的是，由于科恩教授熟知中国的文化、历史，所以他能够透视美国的对华政策，从而揭示出它在中国人面前显得多么拙劣和愚蠢。在这个新版本里，他引用了最近公布的一些国务院文件，更详尽地叙述了当时杜鲁门政府如何对中国共产党早先提出的建议置若罔闻。更重要的是，科恩教授追溯了 70 年代中美关系的重大变化——从 1971 年尼克松著名的中国之行到 1979 年卡特承认北京政权。当苏联新的侵略行径迫使中国和美国更为接近的时候，他对这种起伏不平，又不时有麻烦的两国关系所作的通盘审视，对匡正美国关于中国的种种不实际的想法至为必要。

此书为美国外交史丛书中的一部。这一系列著作分别回顾了美国对长期以来有重要联系的国家的外交关系。每部书的作者都通过强调外交政策的长期连续性，力图找出美国在国际关系中所具有的特点。希望通过逐个国家的探讨不仅能使读者对美国的外交史有更深入的了解，同时也认识到过去发生的事件及行为模式给美国的外交政策带来长期深远的影响。

罗伯特·迪万 (R.A.Divine) \*

\*罗伯特·迪万是《美国和世界》丛书编辑。本书为《美国和世界》丛书的一种——译者注。

## 中文版《美国对中国的反应》作者前言

近闻《美国对中国的反应》已译成中文，不胜欢欣。此书英文版曾使我交了许多中国朋友。冀望中文版发行以后我能结交更多的中国朋友。

书中争议最大的部分是 1947 年到 1950 年间杜鲁门政府对华政策的探讨，对中国读者来说尤其如此。若要更详细地了解我的观点，我对政府文件的看法，请参阅拙作《艾奇逊，他的顾问们，对华政策，1949—1950》，见多萝西·博格和瓦尔多·海因德里奇斯合编的论文集《1947—1950 年的中美关系——捉摸不定的岁月》（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纽约 1980 年版）。

《美国对中国的反应》主要用美国材料写成。实乃美国学者的一家之言，并非所有美国学者共同的想法，更绝非所有美国人的看法。此书曾受到左派和右派的批评。其最大不足在于引用的中国材料有限。中国学者用中国材料向我们阐明言之有据的中国观点，实在太重要了。我们研究中美关系的西方学者感到，中国学者 80 年代的贡献非常令人振奋。我们期待着互利互惠的长期合作。

孔华润

1986 年 4 月于密执安州东兰辛市

## 主编前言

美国历史学家研究中国近代史,在70年代以前一个时期是以哈佛大学费正清(John K. Fairbank)教授所创导的“冲击—反应论”(Impact—Response Paradigm)为主流,即:中国近代史是西方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与军事等对中国冲击的反应。70年代以后,美国史学界研究中国历史的思想倾向有所转变,开始强调从中国自身的历史发展与变化来研究中国历史。这就是费正清教授的学生科文(Paul A. Cohen)教授所提出的中国历史的“中国中心论”(Chinese Centered History of China)。我认为,在研究中国的对外关系史时,两者不能偏废。因为两国关系的历史,总是在相互影响中发展的。即使是根植于中国本身所发展的历史事物,也必然会向外辐射并承受外国对这种辐射所作出的反应;而西方冲击的影响也只有通过中国历史本身的发展才能显露出来。研究国际关系史总会碰到双边和多边的复杂矛盾,但是最主要的应该是当事国的双边关系这一对矛盾。因此研究两国关系史,必须要研究这一对矛盾的两个方面,而不是一个方面。即研究中美关系史不但要研究中国,而且要研究美国;不但要研究中国对美国的反应,而且要研究美国对中国的反应;不但要研究这些互为作用的反应,而且要研究这些反应通过各自国家内部因素而起的作用及其连锁反应。只有把一个事物的矛盾双方及其运动的全部过程研究清楚了,才能对这一事物有较深刻的理解。

遗憾的是,我国有些研究中美关系的学者,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其中包括“左”的干扰),而疏于研究矛盾的另一方(美国)以及这一时矛盾相互作用的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形成,是各种因素交织在一起的复杂过程。这些因素大体上包括:美国人的价值观念、美国的经济发展和军事扩张、国内势力集团的斗争、党派之间的权力角逐、政治家的野心及其素质、资本家追逐利润的权衡、东亚及世界范围的力量均势,等等,最后汇集成一个综合体,即:“美国的国家利益”。对于美国所执行的有些对华政策进行批判是必要的,但仅仅停留在批判则不够。更重要的是探索它的政策决策过程,以追溯影响这些决策过程的一些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人物的因素,弄清它为什么会作出某种特定的反应而不是其他。只有这样,才能把中美关系史研究好。

因此,我们想到翻译孔华润(Warren I. Cohen)教授的这一本《美国对中国的反应》。通过这本书,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美国历史学家眼中的美国对中国的反应,也即在不同阶段,美国对华主要政策形成的过程。孔华润教授是美国的知名历史学家,多年从事美国外交史,特别是中美关系史的研究。孔教授现任美国密州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曾任美国历史学家外交关系学会(SHAFR)会长,并多年主编《外交史》杂志。他的《美国对中国的反应》一书问世后,引起了美国学术界和外交界的重视,后又补充增订,印刷了第二版。这本中译本就是根据第二版翻译的。我们感谢孔教授给中译本写了前言。

毋庸讳言,虽然孔教授在本书中有很多好的见解,但翻译这本书,不意味着我们全部都同意他的观点。同样,我们也并不主张只介绍那些同我们观点完全一致的外国著作。我们若坚持学术上的“闭关自守”,那就失去了国际学术交流的意义,失去了切磋问题的机会,也就没有我们自己学术上的长进了。

汪熙

1987年10月于复旦校园

## 内容提要

本书论述了不同历史时期美国对华主要政策的形成过程。作者系美国著名历史学家，书中主要采用了美国方面的材料，广大中国读者可以从中了解到一个美国历史学家眼中的美国对中国的反应。

## 美国对中国的反应

## 第一章 条约制度的发展

### (一)

在进贡的臣属制度下，中国人对“洋鬼子”的鄙视是显而易见的。中国以仇视和轻蔑对待来到他们国土上的异邦人的态度是不应该的。但是更遗憾的也许是，在外国人来到之后把当地人民逼入了困境。从根本上说，这一趋势是“鸦片战争”后由西方强加于中国的新秩序造成的。条约制度并非由美国首创，可是美国当时并没有提出其他可供选择的倡议，而是迫不及待地要求享受在通商口岸已有可能实现的最惠国待遇。美国所作的特殊贡献是，在19世纪末美国本土的流氓无产阶级为了他们自己特殊的喜爱，看中了中国。

英国人在初期只想取得平等地位，并将中英关系置于西方世界所理解的那种合理、有秩序的基础之上。胜利者在南京条约中虽提出种种苛求，但是尚无过分严厉的条款。中国的政策迫使这场争端只能通过战场上的较量来解决。中国战败了并为此付出代价。英国胜利后着实提了几项要求，另辟五个通商口岸，订立广州的通商法则。大英帝国从印度取得的经验是：炮舰政策。由此向中国提出割让香港——作为英国在东亚地区从事军事和商业活动的基地。从长远来看，英国势力的存在将提醒满清：大不列颠既有意也有力坚持自己的要求——要求平等的地位。

1843年，英国和中国谈判签定了补充条约，改变了广州对待外国人的办法，并保证将给英国最惠国待遇。以往的关税是中国以专横多变的方式强加给西方出口贸易的，现在则把中国海关税则纳入条约，只有在签约国认可下才能进行修改。条约同时也涉及外国人的法律地位，引进了治外法权的概念，允许被指控犯罪的外侨由本国领事官员受理裁判。其根据来自受希腊、罗马影响的犹太——基督教的法律概念。这一切并未使中国人忧虑，他们只觉得必须以平等地位和跋扈的“蛮夷”打交道才是十足的侮辱。中国首先是一个文化统一体，而不是一个国家实体。中国官吏更关心涉及礼节、仪式方面的现实问题，而把主权等抽象概念留给西方。领事裁判权侵犯了中国的主权，而且这种做法并不存在于西方平等国家之间，可是它没有使处于19世纪中期的清廷感到不安。相反，治外法权竟也能被他们所接受，这与那种把外来的异邦人隔离起来的传统作法相合拍。英国在口头上侈谈平等，却向中国索取他自己永远不会给予中国或其他国家的特权——但这没有使中国人感到痛苦，因为他们从来不想向外国派遣外交使团，也很少关心那些背井离乡的海外侨民的命运。

相类似的还有协商关税。从表面看可以说是无害的，但是它造成了中国人尚未察觉的种种严重缺陷。首先，它不像其他商业协定那样各签约国保持关税自主。在这个条约里，签约的另一方没有作出相应的让步。当然，中国人认为西方需要中国的茶叶和大黄。因而想不出还需要英国提供什么优惠。由于很晚才开始研究西方，中国对工业化是产生实力的源泉一无所知。但是中国已被迫对这种实力予以重视。同时，中国也不了解西方是通过保护性关税保护了脆弱的工业。

另外，还有最惠国条款。这是英国和所有其他想和中国缔约的国家共同的要求。在其他方面，英国可能要为提出一些过分的要求（超出要求平等待遇的范围）承担责任，但是最惠国条款在平等国家的商约中并不少见。如缺少此类条款可能会使商约很快失去意义。不过毛病也同样在于英国对中国没有作任何让步。开始的一系列让步都是单方面的——既然中国处于弱者的地

位。每个和中国缔约的国家都获得适应他们特殊需要的特许权，而且还通过最惠国条款分享其他国家可能从中国榨取到的特权。由于中国相对地比和它打交道的国家较弱，所以接连不断地作出让步是不可逆转的。同样，列强中每个国家都取得了最惠国地位，便可以从其他国家的成功交涉中享受既得利益。尤其是美国把最惠国条款当做达到本国目的的手段，而让英国去承担大部分义务和担当建立条约制度的责任。

早在 1839 年 5 月，广州的美国商人就宁愿要求国会派专员来中国谈判订立商约和派军舰以迫使本地居民对美国人持友好态度。美国国会在听取熟悉中国国情人土的忠告后，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但美国海军准将卡尼（T. Kearny）奉命率东印度分舰队开到广州附近。卡尼发现美国商人在华处境并无危险，遂未介入英国和中国的战争。他很欣赏英国将从和平条约中获得的好处和达成的商业协定。于是卡尼也就奉命向中国地方官吏施加压力，要求中国给他的同胞以同样特权。中国人向他保证，“决不令美国商人致有偏枯也”，就是说不会让他们空着双手。

在整个战争过程中，中国官吏一直想利用美国，在考虑把咪夷（即美国）和“顽固不化”的嘍夷离间开的策略。一位有头脑的专家注意到美国人的表现比英国人好得多，他建议免征美国的进口税，并把英国人的生意让给美国人做。他设想如此“咪夷必感荷天恩，力与嘍夷对抗”。这项建议并未付诸实施。但是利用美国为中国卖力的想法并没有完全消失。卡尼的要求正适应中国治夷的总设想。当时在朝的军事和外交要员伊里布和耆英都倡议给美国最惠国待遇，否则恐怕引起不断的怨言和纠葛，会使朝廷为难。此外，英国很可能欢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来共同参与新的对华贸易，届时中国不仅难以制止其行动，而且分享利益的各国也会因此感谢英国，转而怀恨中国。最好能使人感到无偿的利益均沾是中国皇帝的恩宠。对远方来的异邦人一视同仁，这对皇帝来说不失为一条妙计。如果西方各国一心要来做生意，“制夷之道”务必绝对的公正。于是，1843 年道光皇帝宣宗谕旨：“见在嘍人已准通商，所有咪喇等国，自应准其一体通商，以示抚之意”。这就是“门户开放”之由来，或谓利益均沾，向通商各国提供均等机会。中国拟定这项政策目的在于使美国及“其他各国”感激中国之恩准，制造亲善气氛，以成为中国日后可以利用的有利因素。于是，美国未放一枪，也无需进行威胁，就把贸易扩张到中国的沿海地区。美国国旗尾随英国国旗插到了通商口岸，在那以后的年代里，美国一直作为一个落后的伙伴跟在英国的后面，但是到 1843 年便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英国在中国的特权是以条约的形式庄严地得到认可的，而美国在华利益则凭皇帝的恩准。即使美国商人愿安于现状，华盛顿却有人不同意。美国曾为了从大不列颠获得独立进行过一场战斗，高傲的美利坚共和国应该有自己的条约。

在对华贸易方面，由于商人中坚持提出两种对立意见使约翰·泰勒（J. Tyler）总统的政府未能作出明确的决定。和往常一样，在一个非重要问题的争论上，双方势均力敌，拖而不决。在中国的美国传教士伯驾医生（P. Parker）——和美国国务卿丹尼尔·韦伯斯特（D. Webster）有姻亲——回到华盛顿后曾敦促美国向中国派出外交使团。此后不久，韦伯斯特在共事的辉格党人的压力下退出泰勒总统的内阁。据说他很想得到圣詹姆斯法院的位置，遂决定组织一个大规模的代表团去中国，想藉此引诱他的老朋友爱德华·埃弗雷特（E. Everett）离开英国以腾出他所需要的位置。但是埃弗雷特



没有上钩，这个经费雄厚的代表团遂委托给顾盛率领。顾盛曾任辉格党议员，但其政治生涯早期即告结束。有才干的顾盛成为前往中国进行谈判的特使。当时，中国刚刚领教了西方强国的实力，了解到西方在坚持其国际关系概念的认真态度。

受命主持外交谈判的钦差大臣耆英从广州的美国领事处获知顾盛即将到来。他表示：美国如系要求英国获得的商业特权，中国完全的授与美国同样的优惠，因此美国没有必要遣使远涉太平洋，顾盛来中国不免浪费时间。耆英在考虑了美国派代表团来华以及英国要求补充条约中给以最惠国待遇之后得出推论：英国人期望由美国人提出要求进京的权利。在他和皇帝的往来文书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们谁也没有对顾盛的代表团给以特别的关注，但是决定不让他来北京。皇帝认为“咪夷”既然从未向朝廷进贡，要求进京不能同意。至于中美两国缔约倒是次要的。中国仍然不希望和美国确立条约关系，以防出现复杂情况，诸如美国可能提出高于英国的要求等等。

当顾盛到达澳门时，耆英不在任所。这位美国特使立即放风说，待他的船补充给养后便准备北上，直驶白河口。实际上，他是遵照指示以进京作为威胁手段迫使中国同意按照南京条约给美国同等的贸易机会。其实中国人已经决定给美国这些特权，的确使顾盛的使团和他的威胁都成为多此一举。但是，不顾在广州的美国商人如何不满，顾盛一直坚持。经过四个月的争吵，耆英又回到澳门。

只要耆英来参加谈判，条约就可能马上到手。中国人断定此事涉及西方各国的尊严问题，决定给美国人“面子”。他们断定顾盛此来“窥其意总欲夸耀咪夷，仿立条款，以示天朝相待之优。” 尽管中国已败在英国手下，中国官吏仍然可能向皇帝禀奏：英国、法国和美国都“尤视天朝相待之厚薄，以为国体之尊卑。” 但顾盛继续恫吓，声称要去北方，使条约签字拖延了一个月之久。在他同意呈递国书并在澳门签字以后，耆英马上给他签了约。

《望厦条约》是以条约签字地点望厦村（澳门郊区的一个小村庄，现属澳门市）命名的。《望厦条约》基本上是和英国签定的两个条约的浓缩本。处于19世纪中叶的中国人对出让这些特权仍然不介意，不认为有什么特别重要。由于缺乏国家观念，他们也不必从理论上为国家主权被剥夺而担忧。

顾盛的条约也和英国所缔结的条约一样都未能削弱中国人坚信不移的优越感，也没有动摇他们以平等对待西方人的决心。耆英对西方的一般评论，特别是对美国的评论，不仅令人发噱，也足以说明他和皇帝如何设想中国和外国之间的关系。在顾盛面前，耆英曾对泰勒总统给满清皇帝的信写得漂亮赞不绝口。但是从他就如何复信泰勒给皇帝的建议中可看出他实际上对美国的文化水平的估计和理解如何。他认为美国“僻处化外，孤陋寡闻”，此等民族显然不熟悉天朝制诏的体裁，如皇帝诏书“文义较深”，这些美国人恐怕不能通晓，因此皇帝颁给泰勒的诏书宜“文取质直，义贵明显。”

## （二）

当时正处于快速大帆船的时代，如果说中国认为美国在文化上略为逊色，那么在制造美丽的大帆船和建立舰队方面，美国的能力是其他各国无与伦比的。英国人和它的臣民继续控制着海外贸易，但是美国的竞争不断加强，尤其在运输行业。19世纪50年代初，在中国大约二百家西方企业中美国只占二十五家，但是中国对西方贸易的三分之一是由美国承运的，上海的贸易飞速发展，很快成为主要的通商口岸，它有足足一半的货物是由美国承运的。

当欧洲列强日益忙于处理导致克里米亚战争的争端时，美国对中国市场的期望获得实质性进展。

在取得自己的条约之后，美国政府很少付诸实施。1844年7月以后，美国得以进入中国的五个港口，根据条约中治外法权的条款，在这些港口的美国领事对被指控在中国犯罪的美国侨民有独立的裁判权。但是在泰勒以后的历届政府都没有筹措在中国建立领事机构的事。直到19世纪50年代中期，当美国全面改组领事机构时，政府才任命了几个有薪俸的正式领事官员，他们直接对国务院负责。在临时过渡期间，通商口岸的美国商人照常做生意，并从同行中推举出领事，偶而也从参与鸦片贸易的商行里推选出领事来。英国的领事官员有政府的力量为后盾，他们乐意也有可能对本国同胞的某些劣根性加以约束，为执行领事裁判权作出点公正不阿的姿态。美国领事假如本身没有受牵连则很少去过问美国人的劣行。由于没有由本国政府维持的监狱，即使想执法，实际上也是无能为力的。其后果是：美国水手的不轨行为臭名远扬——尤其是在上海。他们给各通商口岸所有的外国水手树立了一个坏榜样。几年之后，第一任美国公使曾写道，他认为：“如果美国一直拒绝或忽视采取任何惩治手段”，那么“强求的”治外法权“就像招募苦力和鸦片贸易一样……成为一种奇耻大辱”。美国国旗已成为“每一个英格兰、爱尔兰或是苏格兰流氓无赖”的保护伞。当然对其中的女流之辈也几乎无需隐讳。领事馆的报告说，在东方的每一个蓝眼睛的娼妓都自称是美国人。

美国驻华公使在缔约后的十年内没有从华盛顿得到过具体指示，这一事实进一步证明政府对在中国发生的事漠不关心。这些公使本身也是一伙最容易被遗忘的无足轻重的人，他们对中国毫无影响，中国人觉得他们“不可思议”。只有一个人是例外，即伯驾。他在1856年被任命为公使以前，曾接受几次临时的委任出使中国。那时，中国官吏对他的强烈反感是有原因的。他们把他和那些目中无人、难以对付的英国官员列为一丘之貉。这位前传教士（医生）在中国期间领会了英国人在和中国人打交道中得出的一套适用办法，就是：态度坚定是最重要的，凡有必要时就用武力。伯驾也提出一项计划。他设想美国在中国的作用比在华盛顿的大多数同事设想的更大。他建议美国也在这个地区建立一个立足点，和英国占有香港一样。为此他极力主张美国占领台湾。他还建议美国在这个地区建造供煤站以把美国的海军活动扩大到中国沿海。伯驾认为，有英国宏伟的范例在先，美国扮演一个小帝国主义的角色是没有前途的。如果政府依他的劝告和欧洲人结成联合阵线，那么中国将会对美国刮目相看，美国在华利益也将稳固地建立起来并得到保护。早些时候，美国的海军准将马修·佩里（Matthew Perry）也提出过同样的计划，甚至已开始执行，但是伯驾和佩里的主张都被国内的政治家们否定了，还批评他们企图建立帝国。美国政府对从远东获得领土不感兴趣，而且直到内战爆发前，美国一直恪守其宁可单独行动而不与任何大国正式合作的传统政策。

伯驾的挫折大部分是由以下事实造成的。耆英的继承人在处理夷务上所持立场就是西方人所谓的广州总督的立场（系指两广总督叶名琛——译者注）。他们一反过去对西方的怀柔政策。而耆英则从未因为蔑视西方的“愚昧无知”而无视西方实力的存在。因此，他提议对西方采取和解、妥协政策。由于耆英和皇帝的关系一直很密切，他为保障京都的安全反对任何潜在的尚武精神的主张得以贯彻。但是道光皇帝于1850年驾崩。1年之内，耆英和有

权势的宰相穆彰阿就双双失宠，穆彰阿是支持耆英的政策。咸丰皇帝文宗所制定的路线只能导致和西方发生新的冲突。他拒绝承认外交上的平等，拒绝尊重中国和西方列强所订条约中的某些条款，对解决中国和西方各国之间发生的问题采取不合作态度。至此绥靖的年代遂告结束。

鉴于西方相对地强大，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也没有理由相信对西方采取挑衅政策能获得成功。对中国来说很不幸。1850年在国际舞台上虚张声势恰好是最不吉利的时刻，在1850年，历史上最大的也最具有破坏性的战争——太平天国运动在中国南方爆发了。这是一场内乱，其规模足以使美国的内战逊色。太平天国运动持续了15年，涉及全国。其后果至少有二千万，甚至四千万人丧生，并使中央政府破产。在这场大灾难中，中国皇帝继续坚持和西方对抗的政策。这也许是最好的证据，证明中国把败在英国手下仅理解为一次偶然事件，并无长远意义。在过去的一千多年当中，野蛮民族曾多次使中国遭受挫折，但中国总是占优势。看不起西方，认为它不开化，所以无论是中国皇帝还是朝廷官员都不曾考虑到西方的实力会有可能来自精良的技术。

到1853年，当太平军占领了古都南京，把影响扩大到长江下游时，西方已明显地看到了太平天国运动的力量。使西欧人特别感兴趣的是，这些造反者似乎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基督教教派。造反领袖洪秀全确实跟一位美国传教士短期学习过。他断定自己是耶稣基督的兄弟。或许很遗憾的是，天主教传教士认为太平天国运动有点新教（即耶稣教）的色彩，可是又没有哪个新教教派在对待两性关系的实践上同洪秀全有共同之处，也没有人能接受他自奉为神的做法。洪秀全的老师罗孝全（E. I. Roberts）最终也不得不否认这个学生。

和北京政府之间的纠葛使大部分西方人寄希望于太平天国造反成功。可是美、英、法三国的负责官员终于明白洪秀全的胜利并不符合他们各自的国家利益。他们对太平天国运动的意识形态和政策实践了解越多，就越不喜欢它。另外，这场运动使贸易受到损害，而贸易正是西方进入中国的主要目的。有些商人为避开贸易上的困难，转而从事军火生意，使叛军得到充足的弹药供应，但是他们政府的代表却对这种军火贸易持不赞成的态度。1852至1854年任美国驻华公使的马沙利（H. Marshall）终于逐渐相信英国正致力于促使中国的政府垮台，以进一步实现其帝国野心。他认为美国政府必须支持中国皇帝，必须打败太平军，否则就要冒英、俄两国瓜分中国，把美国利益排斥在外的风险。虽然皮尔斯（Pierce）政府——它继续留用马沙利——无意采取任何行动，但是由于中国发生的事远非美国国务院注意的中心，遂使美国派驻中国的使节几乎可以放手地干——只要他们不请求合众国政府给予支持。

马沙利实在不必要担心，因为英国政府对把中国列入他们的版图不感兴趣。相反，英国外交部作出决定：英国在中国的商业利益并不值得在那里投入巨大的军事或政治力量。的确如此，当太平天国运动还在推进，席卷长江流域，造成一片混乱之际，英国政府担心在中国出现权力土崩瓦解的局面，那将要求英国付出昂贵的代价去建立新秩序。因此，大不列颠为保持英国人在中国有限的利益所能采取的代价最低的办法就是支持北京的清朝政权。看来是马沙利的多疑妨碍了英、美两国为实现他所寻求的目标进行更积极的合作。

从 1853 到 1854 年间，有两个情况把美国人和英国人弄到一起，第一，在决定以不支持叛乱为手段，使中国不拒绝履行 1842—1844 年诸条约以后，美、英两国想通过修订条约来杜绝中国人进一步玩弄诡计。为在 1854 年完成修订条约，要求美、英两国必须合作，用英美联合的复杂的诈骗术来对付中国人的顽固不化。中美条约中规定，12 年后可进行复审。条约订于 1844 年，对一个天真烂漫的人来说，它暗示中国人在 1856 年以前不会考虑修约。而英国在 1843 年签订的条约中有一条最惠国条款，利用这一条他们提出英国也有资格在 12 年后修订现有条约——南京条约是在 12 年前缔结的。美国当然也坚持这一点，美国既享有最惠国条款，如果英国能在 1854 年修约，美国也就有权要求在 1854 年修约。中国人自然会怀疑这是一种诡计，感到激愤。美国新任公使麦莲（R. McLane）遵照指示与其他西方列强合作，趁中国政府危难之际，随同英国来到天津附近的大沽口要求修订条约。中国尽管处于国内危机之中，却固守立场，态度坚定，不仅拒绝谈判而且忤慢了两位外交官。若非列强准备动用武力，修约事还会拖延下去。

第二个把美国和大不列颠联合在一起的情况是，叛军已逼近上海市，在外国租界引起焦虑和不安。当朝廷的权力从上海消失以后，美国公使和英国领事接管了海关的行政权。自从麦莲取代了马沙利之后，和英国当局的合作相对来说比以前容易。英美两国的代表逐渐建立起外国监督海关的制度。后来发展为大清海关总署，它是中国政府在 19 世纪最后 30、40 年甚至 20 世纪前半叶的最可靠的财政来源。

到了 19 世纪 50 年代中期，列强各国一致要求修约。中国已被内战分裂，清朝政府正为生存进行垂死挣扎，对英、美商人来说，这和他们不相干。由于发生叛乱和中国当局的有意阻挠，贸易已经受到影响。叶名琛在广州因为善于搪塞西方的要求并使中国巧妙地逃避条约义务成为朝廷一大宠臣。广州老百姓群起反抗洋人并非太平军主使，而是由叶策划的。所有和叶打过交道的西方人都得出一个结论：中国人只听枪炮的招呼。

由于美国政府公开申明，拒绝对中国采取战争性质的行动，美国外交人员在这种情况下就显得无所凭仗。既然不能诉诸武力，有些美国人（包括商人和官员）便学会了妥协与和解——这种技巧对一个二流强国很有用处。不过，在那些年代，美国还不具备必要的武装实力而忽视使用外交手段，遂选择追随英国的办法，借英国的实力达到自己的目标。狮子一吼，猎物到手；豺狼微笑，拾起骨头。

英国和美国的外交代表一起沿中国海岸寻求谈判解决修约问题的时机。他们的要求常遭拒绝，有时受到比对待其他国家更无礼的待遇。列强中的小国尚可容忍这种侮辱，而大英帝国遇到这种情况，其尊严则岌岌可危。1856 年，中国在广州附近镇压海盗时，拦截了一艘挂英国旗的船只，带走了几个据说是海盗的中国人。以前英国人在美国沿海强制征兵征船，此刻，他们却为英国国旗受辱而勃然大怒。随之发生了一场以叶名琛的高傲和英国领事的帝国主义态度为特点的较量。由于克里米亚战争已结束，英国毫不犹豫地以武力来对待这一争端。10 月，在英国炮轰了中国的要塞和广州城以后，叶名琛宣布进入战争状态。英国攻下了广州，然后又撤出。接着是广州的中国人起来放火焚烧市内所有外国人的财产。此时大不列颠尚未准备最后摊牌。

到 1857 年底，克里米亚战争后，英国的国库已得到恢复，印度的叛乱也已暂时平息，英国遂决定彻底解决和中国之间的问题。这一次，法国也表示

愿意参战，以报复法国神父被杀事件——一个法国神父违法在内地布道被判处死刑。英法联军攻克广州，并于 1858 年 1 月俘虏了制造摩擦的叶名琛。叶被押解到印度，死于流放。但是这个教训对清朝皇帝不起作用，皇帝不曾看到局势的严重性，只简单归咎于叶名琛的失策而铸成大错，对西方仍持傲慢态度。他确信，只待叛乱一平定，中国就有力量来结束西方的骚扰。

对美国 19 世纪 50 年代在要求中国修约方面所起的作用，有各种不同的说法，中国人之间的意见并不一致，但是，那些办理夷务最有经验的人都认为在列强之间绝少选择余地。一位主管上海口岸的官吏（系指上海道台麟桂——译者注）在研讨对英、法两国的政策时，建议不必对美国制定特别的政策，认为“其咪喇不过附于曩夷之末，藉彼之势”。另一官吏忠告说，对美国表示愿与清廷合作平定太平天国叛乱不必认真对待，因为美国的诺言并不可信。1855 年，两江总督曾禀奏皇帝，美国人公开援助过叛军。叶名琛一直怀疑英、美互相勾结，并认为伯驾是来华洋人中最诡计多端的捣乱分子之一。但是皇帝坚持其利用美国孤立英国的想法。他如此陶醉于这个想法，以至 1856 年 11 月由海军提督阿姆斯特朗（J. Armstrong）率领的美国舰队在广州附近珠江边上夷平了五个要塞时，皇帝竟不相信战报，还以为是英国人的宣传。

对美国在中国的作用无论怎样偏爱，阿姆斯特朗的行动很难使中国人认为美国人比其他随炮舰而来的西欧人更仁慈一些。自然，阿姆斯特朗的小小的战争并非无缘无故爆发的。中国的要塞无故向一艘过路驶往广州的美国船开火。合众国海军以连续四天炮轰要塞作为骄傲的回答，直到各要塞鸦雀无声，全被攻克，167 门大炮也被拆除。伯驾对这次行动很高兴，而且把叶名琛为时已晚的道歉作为中国人只对优势兵力有反应的一个证明。但是，皮尔斯总统和国务卿马西（Marcy）驳回伯驾的看法。他们对阿姆斯特朗采取的严酷报复行动感到遗憾。但中国人受到了炮轰却未收到遗憾的表示，他们觉得美国的行为或许很难和英帝国主义加以区别。

布坎南（Buchanan）政府任命列卫廉（W. Reed）取代伯驾。列卫廉是第一个有公使衔的美国驻华外交代表。国务卿卡斯（L. Cass）向列卫廉提出：美国对中国没有领土要求，也没有政治野心，但无论如何要坚持修订条约。指示他通报中国政府，美国认为英、法两国的要求是公正的，但是将不采取敌对行动。美国愿在中国和英法联盟之间进行斡旋，希望以有力的中立身份最大限度地满足本国利益而不愿充当英法联盟反对中国的小伙伴。

1858 年春，英国使者再坐船到白河。这次同行的还有法国、俄国和美国的外交官员以及英、法两国舰队。这四个国家都是为修订条约而来。虽然只有英国和法国有枪炮作后盾，但俄国人和美国人也毫不放松其修约的要求。正如叶名琛在他最后的奏折中所指控的：他们贪得无厌且狼狈为奸，酷似一群豺狼。但是皇帝继续对美国的感恩、忠诚和恭顺抱有幻想。当下他写道，要把美国和俄国分化出来，以孤立英法的势力。但是凡和西方外交人士接触的中国官吏都没有受皇帝的幻想的影响，他们立即看出，这四强是串通一气的，并且坚持认为美国和俄国不过是想坐收渔利，扮演掮客角色以达到修约目的，或者在中国受英法威胁作出让步时，提出最惠国要求。时过一月，中国并未退让，英法两国舰队遂发动进攻，击溃了中国的防线。此时，美国和俄国公使则坐山观虎斗，一俟障碍清除，四国公使重新聚集，一起前往天津参加谈判。在谈判过程中，中立国所提出的种种要求并不比战胜国少。在大

沽炮台被毁之后，年迈的耆英又被从废品堆中拣出派去参加中国和西方的谈判，但此刻他已老朽。盟军攻克广州时，查获一批档案，包括满清政府办理夷务的全部来往文书，其中有许多奏折出自耆英之手。他在奏折中对西方人及他们的作为极尽诋毁之能事，并叙及他控制西方人的种种办法。盟军援引这些文件当面嘲笑这位老人，使耆英受辱离开了天津，后来被他的冷酷无情的皇上处死。

此后，中国人在穷途末路中又寻求美国的调处，但此时的盟国不高兴来外交这一套了。天津条约并非协商谈判的结果，而是在列强的强制下签订的。中国被迫开放十一个新通商口岸；允许西方船只溯长江而上直达中国腹地；允许外国人去内地旅行；传教士可以在任何地区传教，发展教徒。中国的关税规定为值百抽五的低税率；鸦片贸易合法化，被正式作为药品列入纳税单。最后，中国被迫同意外国外交人员进驻北京。

在天津签订的条约解除了中国为保护自己免受外国剥削的一切防御手段。特别是，中国政府已失去对本国经济的控制。开放长江及内地通商口岸意味着外国货可以在广泛地区内集散，只需交纳薄税。确实，这种税率通常比中国国内产品所付的通行税还低。中国对西方思想也失去了进一步抵制的能力。外国人在中国可以通行无阻，为所欲为，有军队和炮舰为后盾，不受中国法律的约束。至此以条约征服中国的做法已接近完成。中国是在英、法两国的枪炮之下签署条约的，但是俄国和美国在为他们的同胞争得剥削权利方面也毫不落后。

但是，中国皇帝尚未投降。虽然他已准备接受这些辱国丧权的条约，但也决心要使北京不再受到威胁。在外国舰队启航后，他立即命令修复加固大沽要塞和天津的防御。1856年6月，当西方公使回来换约时，中国当局要求他们从白河口向北后撤数英里，中国代表团在那里迎候他们。英国人和法国人确信中国人是在施展新的诡计，毫不迟疑再给中国一次教训，遂向要塞开炮作为回答。中国边防军进行还击，取得了比以前好得多的战果。英国舰队司令在随后发生的一场战斗中负伤。

在战斗进行过程中，为美国公使护航的美国舰队司令达底拿（J. Tattnall）感到形势不妙，经公使批准加入了战斗。他用一条租用的汽船把行驶着的英国船只拖入战阵。出于关心英国舰队司令的安全，他登上英国的旗舰，并命令部下给英国军舰上的炮手做下手以示支援。据说，他当时宣称：“血浓于水”，于是美国人放弃了中立原则，华盛顿禁止采取敌对行动的命令也被置若罔闻。

英国人和法国人被挫败，中国皇帝和朝廷皆大欢喜。胜利的甜头如此令人兴奋，在皇帝的想像中，盟军永远不会再来了。他的几位顾问居然梦想废除天津条约。美国公使接受了前往另一换约地点的建议。英、法两国的武装撤离了这个地区，经布坎南任命来换约的美国公使华若翰（J. Ward）却愿意留下来作进一步的努力。经过几周的协商，他最后获准进京，并同意乘坐一辆臣属马车去北京，华若翰抵达京城后，清廷想把他此行的使命改为传统的称臣纳贡，但未能如愿。向皇帝磕头行礼，华若翰只肯略为屈膝。由于未能达成双方皆可接受的妥协，华若翰一路颠簸重返沿海口岸，在那里和中国人交换了条约文本。这一年，只有美国一家和中国修订了条约——虽然连沾满血腥的英国和法国也可以获得最惠国待遇的“权利”。

对文宗皇帝和尚未出生的两代中国人来说，起决定作用的不是1859年的

胜利，而是 1860 年的失败。1860 年英法联军卷土重来，击溃中国沿海和内河的防线，登陆向北京推进。皇帝放弃了以“咪夷”制“嘑夷”的希望，他也断定美国显而易见是和中国的敌人串通一气的。大不列颠和法国的军队开入北京城，他们进入豪华的圆明园抢劫并纵火，毁坏了中国许多世纪的文明所创造的无价珍宝。皇帝逃亡至热河后，仅在一年之内便一命呜呼，西方弄得他灵魂出窍。

作为 1859 年和 1860 年战事的结局，英、法两国又加重了中国的耻辱。天津增辟为通商口岸，英国割据了与香港隔海相对的、处于大陆一侧的九龙，法国增加了允许传教士在中国各地购买或租用土地建筑房屋的条款。在一旦完成修约后，西方便加紧支持北京政府镇压太平天国叛乱。西方取得了从清朝政权窄取到的许多特权之后，这个政权便体现了西方空前的既得利益。可这并不妨碍英国和美国的商人继续和太平军进行军火交易。但至少同样重要的是，早些时候，在保卫上海的战斗中组织的一支小小的雇佣军已加入李鸿章手下的官军。这支“常胜军”早期的两名指挥官都是美国人，后来其中一人叛逃到太平军。“常胜军”最后一个指挥官是英国军官戈登(C.G.Gordon)，通常人们称之为“华人”戈登。他帮助清政府肃清了长江流域的叛军。

镇压太平天国叛乱真正的英雄是中国官吏曾国藩。在清朝旗军和北京所指挥的各路防御都告失败之后，是曾国藩所组织的地方军中最强大的武装力量抵抗着太平军。1861 年，曾国藩在考察了国家遭受的破坏，回顾了中国蒙受的耻辱之后，检讨了诸夷国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尽管美国在中国不无劣迹，曾国藩却不清楚，他举出美国，说它的国民“头脑单纯”、“秉性诚实”；说美国一直是一个表现恭敬、顺从的国家。他认为美国一贯对中国忠诚，从未和英法两国结盟。由于有曾国藩这样一位在此后 10 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颇有影响的人物，改进中美关系的前景极好。但在这十年期间，中国的外交事务是由恭亲王主持。他曾经阐明良好的外交关系对中国的意义。他把曾国藩的意见和必须防止美国被俄国争取过去的想法都上奏给皇帝，并表示他同意曾国藩对美国的评价，另外提出了“其应如何羁縻使为我用之处？” 。在一个多世纪以后，中国官员在中美关系问题上又回到了那个主意。

当西方加紧对中国的剥削，而中国也在设法利用美国之际，传教士们为获得条约中关于传教的新条款而精神振奋。新条款使整个大清帝国对上帝的事业敞开了大门。多年后，曾协助列卫廉参加 1858 年谈判的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A.P.Martin)在回顾 1857 年到 1860 年的动乱和中国蒙受的耻辱时，觉得一切都令人感到满意。他评论道：“……一个观察家如果不了解是上帝的手在控制国家之间的争斗和政治家的过失，他一定是可悲地缺乏心灵的悟性” 。也许另一个时代的美国人会发现，他们自己和以前的中国人一样，也缺乏这种心灵的悟性。

### (三)

1861 年，中国有了相当于外交部的机构，其外交事务逐步接近于西方各国的外交部。同年，美国就有一位试图为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行动制定计划的国务卿。确实，一个新时代是从这里开始的。这里也是评价美国过去的政策的最适宜的地方。

虽然没有证据可以表明制定美国外交政策的人士是否曾经有意识地通过支持或反对美国人在东方的某些行动，而形成了对远东地区的总政策或者就是对中国的具体政策，但美国政府遵循着比较明确的外交行动模式，在当时

亦可视为一种政策立场。换言之，在未形成长远政策之前，美国对中国事态作出的临时反应，以及对美国商人、传教士、外交官和军人提出的种种要求所作出的临时反应一直是前后一致的。美国的利益只限于贸易和传教，美国领导人从未真正的对中国怀有领土野心。在 1861 年以前，美国政府从不赞成使用武力，宁愿通过外交和狡猾地利用最惠国条款来扩大本国侨民的利益和特权。有两次美国军舰对中国采取了敌对行动显然都不是受命于本国政府。对其中更明目张胆的一次事件负有责任的军官被告知，政府对他的行动感到恼火。

与伯驾或佩里提供的远东政策相比，政府所采取的路线是十分明智的。伯驾等人主张仿效大不列颠采取更具侵略性的政策。当时美国尚未实现工业化，它有广阔的未被占用的领土，它的国内市场尚待充分开发，足够为任何一个有资本的人提供广泛的投资机会。这个时代，权力的中心在欧洲，东方在世界权力均势中的地位无足轻重，而美国安全地处于大洋彼岸，当代技术尚不足以对其安全挑战。合众国还是强国中一个不发达的弱国，即使在东亚施展政治和军事权威的愿望，它也不具备这种能力。鉴于它在列强中所处的地位，它在中国和亚洲其他地区有限的利益，美国追随英国势力，和利用最惠国条款来扩充其权益，很难采取更好的做法。虽然有些历史学者把美国这种外交策略贴上“为虎作伥的外交”的标签，道德上与欧洲人的传统做法无优越可言，但是对美国来说，这却是一个最现实，也最令人满意的政策。这一外交政策的宗旨显然是在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中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好处，只要那些更强大的掠夺者能容忍美国的存在，“为虎作伥的外交”就能够起作用。

但是，不论美国的做法对合众国及其国民的利益如何适宜，都不能想像或假定：它也符合中国的最大利益、或中国人会对美国的行动感到高兴。总之，条约制度是以武力强加给中国的，中国人除了忍受之外如果别无选择余地，他们也不见得会赞美这种制度。美国人以相对的和平方式从“不平等条约”中获得了特殊利益，但是不能掩饰这一事实：他们所享有的种种特权并非中国人情愿让予的。美国只充当一个小伙伴，然而它是许多事件的参加者。通过这些事件使中国陷入一种只能屈从他人要求的境地——不只对一国屈服，而是对列强各国屈服，其中却没有一个国家对中国本身的需要承担责任。处于这种地位具备了一切不利的殖民地条件而丝毫享受不到它的好处。虽然某些中国官吏可能察觉美国人和西欧人之间的微妙差别，但是很难期望中国的老百姓能从各国洋人在中国的行径中看出有不同之处。

在“鸦片战争”时期，中国官吏曾经期望能得到美国的支持，即或不出于美国对中国的忠诚，也将出于美国对英国的传统敌视态度。结果他们失望了，在其后的年代里，中国各地方当局与皇帝的往来文书认为中国通常可以指望得到美国口头的同情，但是从未得到物质上的支持。后来，从事外交工作的清朝官吏逐渐怀疑美国参与了英国的阴谋。虽然学些“夷务专家”晓得美国不实行炮舰政策，不用炮舰强逼对方作出让步，但是他们还是忠告皇帝：美国经常“追随英国”——听任英国炮舰使中国受辱，在英国榨取到新的特权之后便来坐享其成。

虽然这些人对美国在中国的作用不存在幻想，但是美国仍然作为西方列强中侵略性最小的一个和中国有着重要的联系，并从中得到实惠。假如在和美国的交往中，可寄予希望之处较小，那末对美国的可怕之处也是较少的。



中国对西方的敌视逐渐形成了一个总的概念，由于美国在条约制度中分享特权，自然也难免遭到敌视。另一方面，当中国有需要把压迫中国的列强加以区别对待时，当中国需要帮助的时候，相对他说美国人还是比较友好和可以利用的。

#### 原书注释

伊里布奏折（1841年2月6日）引自 E. Swisher 主编：China's Management of the American Barbarians，耶鲁大学出版社，1953年版。第57—58页。

道光皇帝诏书（1843年11月15日）出处同，第137页。

程燾采奏折（1844年4月22日）出处同，第146页。

程燾采奏折（1844年4月9日）出处同，第142—143页。

耆英奏折（1844年12月14日）出处同，第177页。

W. B. Reed 致 L. Cass（1858年6月30日）美国国会第36届第一次会议，参院行政档案（NO.30，355）。

麟桂奏折（1851年3月15日）同注，第190—192页。恭亲王奏折（1861年1月24日）同注，第697页。

W. A. P. Martin 著 The Awakening of China，New York，Doubleday，Page & Company 出版公司，1910年版，第169页。

## 第二章 美国作为强国出现在东亚

### (一)

威廉·西沃德 (W. Seward) 1861 年接任国务卿。当时他手中已有不少难题，更不用说去考虑亚洲的新问题了。正当他等待林肯政府宣誓就职之际，南方各州相继脱离联邦，使西沃德和总统只能把维护美利坚合众国的存在作为贯穿全部政策始终的任务，而没有其他的选择。

西沃德是和美国第六届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 (J. Q. Adams) 同一类型的民族主义者。这种类型，不管它有什么长处，都蕴藏着某些使人不安的因素。他们都对美国的使命抱有幻想，视美国人为向全球传播民主福音的特选民族。有时他们都似乎对上帝的日程表感到不耐烦，急于想加速其进程。西沃德和亚当斯一样，也面向西方，当他发现当年亚当斯所渴望的大陆边界已经实现，便把视线转向太平洋彼岸的东亚。遗憾的是，他对不知领情（领受美国人给东亚带来的好处）的东方人，或其他任何人都不够耐心。中国人在这方面比日本强。他认为日本人是半开化的野蛮民族，只能用“炮舰加外来文化”的处方，使他们易于接受美国的教化。他对中国的文明尚怀有相当的敬意。到 1861 年，中国人已经先后多次领略过西方对落后国家是如何对待的。

西沃德就职后的主要任务是，尽可能为联邦寻求外国的支持和防止叛乱的南方从国外获得任何援助。为此目的，他决心排除一切可能导致列强各国对美国不满的因素，特别是英国和法国。比方说，假设美国在对待中国和日本事务上与欧洲列强站在一起，欧洲人就没有多少理由希望合众国解体，这比美国给欧洲列强的亚洲计划设置障碍好得多。事实证明，在中国事务上采取和英、法两国合作的政策，美国感到毫不困难。同时，在西沃德任期，这一政策也对中国人有一定的价值。

虽然在美国本土一般对欧洲人，特别是对英国人持相当明显的不信任态度，但在中国的美国侨民却和欧洲人有着很融洽的合作关系。最简单的解释也许就是达底拿所说的“血浓于水”——处于绝对少数地位的白种人背靠着大海共同生活在大陆边缘上的一小块领地上，而在这片广袤无垠的大陆上居住着几亿不友善的东方人。以西方人之间的差别和西方人与中国人的差别相比，看来前者是微不足道的。既然中国人不加区别地对外国人一概敌视，外国人还要划分国别就只能自讨苦吃。同样，既然美国人和欧洲人都享有最惠国待遇，一国愿望得到满足，其他各国都可指望从中得到好处。从这层意义上讲，“亲如一伙盗贼”或许是达底拿所引用“血浓于水”的恰当的代用词。

此外，1860 年条约得到修订，条约制度的主要支桩已经形成，满足列强中大多数国家的贪婪达一世纪之久。大家都同意对清朝采取扶持政策，担心再来一轮割让特权会导致北京政府的崩溃，已经建立的条约体制也将随之瓦解。西沃德就此派蒲安臣 (A. Burlingame) 出使中国，并指示他把与列强各国的合作当作美国正式的官方政策。在美国自身存亡尚不能确定之时，西沃德无意为他的国家在亚洲发挥更大，或者是更独立的作用去制定任何计划。

在 19 世纪 60 年代，列强各国在中国的合作对中国政府有利，因为清王朝的生存希望正与西方对于这个地区的利益的设想相吻合。但是，这种合作对中国也潜伏着危险，这种危险在各大国对日本的联合行动中已经显而易见了。1864 年，美国、英国、法国还有荷兰一起炮轰了日本最有势力的氏族长

州藩（Choshu）的京城，以表示他们对日本的公开排外情绪无比厌恶。在日本的外国炮舰和军队有时处于守势，有时则进攻。中国既无机会“以夷制夷”，就只好受西方摆布了。

中国不幸，1861年皇帝去世了。朝廷的权力真空渐被慈禧填补。慈禧在当皇妃时就妖魅而出众，在皇帝死后，她表现出相当高的政治手腕。慈禧最初以维护她在北京的权威为满足，外交事务交新设的总理衙门统管，由恭亲王负责主持。

新一代的夷务专家们所探求的第一个课题是了解“国际法”，西方经常指控他们违犯“国际法”，并因此受到了相当严厉的惩罚。为此，美国传教士丁韪良翻译了惠顿（Wheaton）关于国际法的著作。西方化的进程已经开始，西方外交人员来到北京则预示中国加入了国际大家庭。中国人开始自愿地摆脱某些传统的看法和做法。其中的一个步骤就是，在1867年派遣一个外交代表团，由退休美国公使（蒲安臣）率领访问了西方列强各国的首都。

许多年来，友好的西方人士如丁韪良和总税务司的赫德（R.Hart）都曾敦促中国向海外派遣代表。1865年12月，西沃德曾指出蒲安臣邀请中国派外交使节去华盛顿。但是中国传统的束缚并非轻而易举就能解除的。有些中国官吏仍固守中国天下第一的观念，坚持认为向外国派使节会降低身份。1866年，赫德成功地说服恭亲王派一位六十四岁的清朝官吏去欧洲作一次短暂的旅行，但是他提前回来了，据说是被欧洲人令人作呕的举止行动吓坏了。

中国政府得知蒲安臣要回美国时，便邀请他伴随两名中国官员出访西方各国首都。这是中国决心要向外部世界学习并且与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决策人建立联系的明显迹象。恭亲王很现实，他并不企图把条约制度推翻，他和同僚们只希望向西方领导人解释中国的立场和意图，以说服西方将迫使中国改变古老传统方式去顺应列强要求的步伐放慢。他们怀疑自己人没有足够的说服力，遂约请蒲安臣这样一个显然具有好心肠的夷民来助一臂之力。

使节所到之处，无论是在华盛顿、伦敦、巴黎还是柏林，蒲安臣都喧宾夺主。但除此之外，中国人没有其他理由对蒲安臣不满。在美国时，他越权和西沃德签定了一项条约，西沃德在条约中保证美国不干预中国内部事态的发展。不过条约中也包括几项使中国人不甚愉快的条款，中国人对此并无怨言。从克拉伦顿（Clarendon）和俾斯麦（Bismark）那里，蒲安臣都取得了缓和的保证。中国人在外交舞台上第一次出场获得惊人的成功，“主要西方国家承诺将在修订条约问题上采取克制的方针，当时中国政府期望得到的仅此而已”。

另一方面，西沃德虽感到向东方推进的结果并不尽如人意，但是在买下阿拉斯加和占领中途岛以后，他还是做到了把美国国旗推进到相当靠近东方的地带。他还希望和夏威夷建立更密切的关系，并开凿一条横贯地峡的运河。西沃德在世时虽未能如愿以偿，但是他的理想并没有泯灭。无论是好还是坏，他所梦想的使美国在东亚发挥更大的作用终于没有实现。

## （二）

西沃德和蒲安臣签定的条约中有一项条款很快就使美国感到十分为难。这一条款也许就是签定本条约的主要目的，它规定给中国移民入境的权利并可享受最惠国待遇。从西沃德的远东政策和国内政策的脉络来看，他似乎想利用一项条款达到三个目的，其中最明显的是，他把中国移民作为他把中国和列强各国平等对待的政策的一部分；其次，西沃德也许想鼓励中国苦力移

居美国，并使之合法化，以为加速开发西部地区提供廉价劳动力；最后一点是，这位因反对排外主义而失去 1860 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机会的人，想通过这一纸条约把他本人反对歧视移民的观点订为国法。只要中国人一旦经条约规定享有最惠国待遇，诸如已在加利福尼亚州出现的歧视性地方立法就违反了宪法。

但 1868 年在美国约有十万中国人。人数增长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宁可少来一些中国移民而不再增加人口。但有趣的是，内战以后的几年里，美国对逐年来美的几十万欧洲移民表示了巨大热情。确实，美国各州绝大多数都制定了鼓励移民的官方措施。但是，像往常一样，美国人更偏爱和他自己最相像的移民，而中国人则是最不像他们的异国人。于是当希望增加人口之风盛行，当大批劳动力从欧洲流入美国被认为对地理、工业和农业方面的迅速发展必不可少的当时，美国人的种族优越感却把中国人排斥在外。对中国移民和欧洲移民的看法是如此不同，即使由爱尔兰移民掀起一场反华运动也尽可不必顾虑会因此激起本地人排外的普遍反应。

在美国，鼓动驱逐中国移民和歧视已在美国的中国人的行为已使美国人没有多少资格来宣称美国文明比中国的文明更优越，那时流氓游民刚刚开始出现。在西部，特别在加利福尼亚，以暴力对待中国人极为普遍，单独的中国人常遭殴打、嘲笑，有时被无故杀害。无人能比布雷特·哈特（B.Harte）更能说明美国理想主义在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矛盾，他在王利（Wanlee）的著名讣告中写道：“死了，我尊敬的朋友们，死了。在公元 1869 年，被一群半成年的男童和基督教学校的孩子们用石头砸死在旧金山的大街上。”在 19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反华宣传更为激烈，诸如私刑、联合抵制和集体驱逐等都成为美国种族主义的见证。

要求排除中国移民的压力已强大到不容国会忽视的程度。于是在 1879 年通过一项议案，把来美国的中国移民人数限制在每条船上只能载乘十五人。由于这一议案违背了美国对蒲安臣条约所承担的义务，遭到总统海斯（Hayes）的否决，同时也受到西海岸的严重谴责。鉴于各方面的压力，而且下次否决很可能被推翻，所以美国想修改蒲安臣条约。1880 年，两个主要政党都在他们的政纲中反对进一步扩大中国移民，美国和中国签定了一个新条约。在此条约中，中国人同意美国对中国移民采取限制或暂停等的歧视做法，但以达到控制和调整为限度，而不是禁止中国移民。国会以暂停中国移民 20 年作为反应。美国总统认为这样做违反新条约的精神，再次予以否决。国会又提出只冻结十年的议案并包括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总统勉强签署了这项议案使之成为法律，但种族主义者并不满足。

只要种族主义者有选举权而中国人没有，黄种人就懂得没有“中国佬的机会”意味着什么。国会继续通过一些法律，甚至违反 1880 年的条约精神及其条款。有时会出现为了国内政治的迫切需要使总统不能行使否决权的情况，但种族主义者仍不满足。1885 年，28 名中国矿工在怀俄明州被残暴杀害，同时在整个西部地区还连续发生一些小规模的暴行。

在 19 世纪 50 年代，中国政府曾经对海外华侨的命运漠不关心，美国疯狂的排华行动使中国改变了态度。但是，中国为其国民受歧视所提出的抗议全然无效。美国国会按自己的旨意行事，而不顾中国被迫勉强接受修改条约会有何想法。由于美国日益频繁地单方面违反其条约义务，这一争端成为中美关系中的一个持续的刺激因素。这种局面如此令人不快，以至在 1892 至

1896 年间，美国和中国只是在名义上保持着外交关系。

美国人给予旅美华侨的待遇使中国得到一些有意义的教训。西方人来到中国也违背中国人的愿望，他们还偶而触犯中国的法律。当这些外国人被轻蔑地当作野蛮人对待时，西方列强单独地、或异口同声地要求给予平等待遇。他们用炮舰把西方文明“优越”这种价值观念强加给中国人。枪炮教训了中国人，使他们知道对违反条约义务是不能长期容忍的。中国劳工移居美国是进入一个传统上欢迎移民，渴望通过移民增加人口，发展生产的国家，并购买它的产品。大多数来美国的中国人都是被招募去的，并且在美国的迅速工业化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但在美国是由美国人控制着相互交往的方式，中国人受虐待，而中国政府无从保护侨民的利益。中国被迫接受外国人进入它的领土，美国的炮舰就在中国领海上巡逻保护其侨民的生命财产。中国没有炮舰派往美国，因而无法保护它在美国的侨民；无法迫使美国政府接受中国人移居美国；也无法要求美国履行其条约义务。中国人不会看不到这种对比和差异，当中国人民同心协力作为一个民族起来行动时，他们也不会忘记这一点。

### （三）

在中国也和美国一样，19 世纪最后的 30 年来的特征是致力于振兴被内战分裂的民族，建立一个现代化国家。对中国人来说，实现现代化的任务远比美国困难。当然，一个显而易见的困难是相对地缺乏自然资源。但是，更重要的事实是，中国的传统社会比美国古老得多，而且根也扎得更深。太平天国运动并没有像美国内战那样给社会带来重大变化。中国的新领导人物，恭亲王、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和其他类似的人，比上一代官吏要开明得多。但他们却仍然致力于维护旧的社会秩序，这个旧秩序是中国维新的主要障碍。认识到西方技术的优越性以后，这些人想使西方的技术洋为中用，以在不损害儒教传统——他们权力的源泉——的前提下加强中国的实力。他们想要西方的机器，但希望把西方思想的输入控制在最低限度。这个新领导层所面临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由于西方列强在中国出现而复杂化了，他们需要把维新解释为增强中国的实力以顶住帝国主义的壓力。不论美国在内战后复兴年代承受了多大的考验，但当时到底没有掠夺成性的列强在美国国土上来加重他们的困难。

由于需要外援，特别是资本和技术的援助，李鸿章——19 世纪 70 年代末到 90 年代中期中国主要的领导人物——希望和美国合作，尤其在发展中国铁路和采矿方面。李鸿章知道美国企业家不像他们的欧洲同行那样得到本国政府的密切关照。和美国商人或工程技术人员之间发生什么问题远不至于会把中国卷入和美国政府的冲突当中去。李鸿章也像曾国藩和以前的许多清朝官吏一样，认为美国是诸夷国之中贪心最小的，可以信赖的，也是最有用的国家。

美国政府对在中国的美国投资者不予重视，在李鸿章眼中可能是一个可贵之处。但那些一味追求特权的美国人觉得很满意。当美国商人想求得乐于相助的本国外交官的关照时，这些外交官接到华盛顿的指令，要求他们保持超脱。美国企业家既没有政府的资助，在商业冒险中又得不到外交上的支持，筹集必需的资金时遇到了困难。因此，19 世纪 70 和 80 年代，在美国国内似乎为安全有效的投资提供充分机会时，也很难说服那些有资本的人拿他们的财产来中国冒风险。李鸿章和美国人合作的希望落了空。

李鸿章的实业计划和自强运动存在着另一个严重障碍——朝廷中有一股强大势力反对外国投资帮助中国维新。这一集团本质上是保守的，他们对李鸿章的计划持怀疑态度。此外，慈禧太后和朝廷中其他有权的人物追求腐化享受，尽管这些享受多么令人开心，但消耗了宝贵的资金。原打算建立一支现代海军的经费被挪用建造了一座新宫苑，1894年当日本人进攻时便酿成灾难性的后果。通过贪婪的士绅阶级从农民身上压榨出来的钱财几乎没有上交到中央政府，而中央政府到手的那一点当中，真正用于开发中国贫瘠的资源款项，更是微乎其微。因此，在李鸿章本人连同他求援美国的计划一起辞世以后很久，中国维新的任务还是没有完成。

#### (四)

正当中国挣扎着应付西方的挑战并未取得什么成效时，日本人以惊人的速度作出了响应。在佩里访问日本和重新恢复与西方接触以后的短短几年当中，日本人已具备了以东亚强国自居的条件。垂死的大清帝国为日本帝国主义的磨盘提供了谷粉。台湾省和高丽属国都处于日本人的压力之下。但最初日本人只控制了琉球和小笠原群岛。直到1894年，亚洲大陆上爆发了重大危机。朝鲜受到第一下打击——朝鲜是各种各样的美国人玩弄强权政治的地方。

首先，关键问题在于朝鲜和中国的关系是什么性质：朝鲜是一个主权国家，还是由中国负责决定它的内外政策？西方国家一直没有弄明白这种臣属国的附庸关系。1876年以后，日本人强迫朝鲜签订一项通商条约时，其中阐明了它的独立性，于是上述附庸关系的不解之谜也就不存在了。在西方列强中，只有美国把朝鲜人当做独立自由的民族对待。但是在19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人就已企图重新强调他们对汉城的影响。

美国人承认朝鲜的独立说明美国恪守其主张民族自决的传统。中国人自然不能指望得到美国政府的支持。另一方面，在华盛顿尽管把民族自决的原则看得如此高尚美好，却没有一个处于负责地位的人准备挺身而出保证朝鲜的独立。但在东亚有几个美国人，曾经狂热地反对中国对朝鲜的企图，其中最著名的是一位传教士医生霍勒斯·艾伦(H. Allen)，为争取他的政府支持朝鲜独立，艾伦在十多年间卷入了和俄国人及日本人合谋的一系列阴谋活动，最后虽然没有成功，但是他被任命为美国驻朝鲜公使。

不管艾伦作用如何，朝鲜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取决于日本的决定。1894年，日本决定不再容忍中国进一步扩大在朝鲜的势力。中日两国都认为朝鲜对他们国家的安全至关重要，日益紧张的关系终于酿成一场战争。在六个月之内，日本人一下子摧毁了中国的舰队，并在朝鲜、满洲以至中国本土肆无忌惮地推进其军队，不仅令中国人大吃一惊，而且也震动了世界。至此中央王国的衰败、腐朽，已被中国人轻蔑地称之为“倭奴国”的日本人剥得赤裸裸地一无遮掩。胜利提高了日本的威望，更实在的是给它带来了台湾、澎湖列岛和在朝鲜的势力范围。对中国来说，战败则带来了耻辱和迫在眉睫的瓜分的危险。中国的文明看来是不行了，东亚地区充斥着自命来开化亚洲的文明人。

中日战争及其结局被华盛顿很容易地接受了。美国扮演了传统的不偏不倚的角色，不愿从中进行调解并企图和双方都保持亲善。对克利夫兰(Cleveland)总统的政府来说，这场战争对美国的利益不构成任何威胁。实际上，华盛顿和关心此事件的美国公众情感上是亲日的。美国在某种程度上

同情日本是由于美国开化了这个国家，从而对它怀有一种家长式的温情。此外，也由于两个交战国的国家是如此悬殊。同时，在美国也存在对中国人及其明显的懒散状态表示极大的蔑视感情。美国驻华公使向国务卿指出：日本只是对中国做了美国当年在日本做的事情——带去西方的文明。国务院中可能最受尊敬的中国问题权威柔克义（W. Rockhill）坚持这样的观点“好好痛打一顿对中国没有坏处……这是唯一对她有效的补药。”同样，报纸、杂志，以及商人和传教士所写的文章都反映出一种论点：中日战争是一场野蛮和文明之间的较量。日本的胜利使大家都有了希望，即中国也终于看到了进行改革的必要。在对中国进行改革和维新愿望中，也包含着对政府官员、商人和传教士的期望，期望通过改革和维新能使他们在中国的具体利益得到满足。美国人始终相信中国现代化对他们有利，这一观点无论怎样强调也不会过分。美国对中国蒙受耻辱的幸灾乐祸只是短暂的。1895年，仅只来自俄国、德国和法国的压力便阻碍了日本进一步侵犯中国的主权。欧洲帝国主义国家并非出于对中国的同情而进行干预，而是为了保护自己在东亚的利益，并借此取得索取报偿的地位。大家争先恐后地夺权在战争刚结束几个月后便开始了，到1898年发展得更为尖锐。法国、俄国和德国，最后还有英国都划分了势力范围并获得采矿和修筑铁路的特权。软弱的中国遭受新的不幸，也导致美国人对他们所关心的市场和在东亚的力量均势感到忧虑不安。

#### （五）

在太平洋彼岸，美国人民逐渐感觉到内战的创伤已恢复到足以使美国重新作为一个完整的国家起来行动了。他们再次以全部精力投入工作，迅速地推进工业化，到19世纪90年代便作为最先进的工业国出现在世界上。迅速的工业化带来许多政治上和经济上的问题以及社会问题，不同社会阶层对这些问题的反应也各不相同。一个经常被想到的主题是顾虑出现精神上的腐败和经济上的萧条。宗教领袖们，甚至像西奥多·罗斯福（T. Roosevelt）这样的政治人物也表示担心他的同胞在向功利主义转变，美国正在失去他的精神活力。商业界和其他政治领导人则怀着另一种比较世俗的顾虑，他们担心出现经济上的萧条。

19世纪90年代，迅速扩充的经济，加速增长的工业产量和传说的关闭美国边界相巧合——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F. J. Turner）在他的文章里回忆了这一事件的经过。开发国内市场的机会显然不是没有止境的，于是开始了对海外市场的探索。在1893年的大恐慌，这个国家从未经历过的最严重的萧条时期之后，接踵而来的是一种大难临头的感觉弥漫全国。为缓和经济危机，民主党人要求自由铸造银币，而商业界看到扩充海外市场将是一个补救方法。虽然寻求海外市场的大部分努力集中于拉丁美洲和欧洲，但是也一直期望能大量增加对中国的贸易。在19世纪90年代，对中国的贸易虽然只占美国整个贸易的极小部分，但还是在增长之中。商业界在为美国寻找出口市场上信心倍增，他们日益相信只要有均等的机会，高效率的生产和销售系统就能保证美国在国际贸易领域居于支配地位。但是对那些在中国投资的商人来说，中日战争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使他们毫无踌躇满志的余地。

#### （附表一）美国在华经济利益（1890—1904）

年代/美对华出口额（以百万美元计）/占美出口总额比例/美在华投资（以百万美元计）/占美海外投资总额比例

1890/3/0.3//

1891/9/1.0//  
1892/7/0.7//  
1893/4/0.5//  
1894/6/0.7//  
1895/4/0.5//  
1896/7/0.8//  
1897/12/1.1//  
1898/10/0.8//  
1899/14/1.1//  
1900/15/1.1//  
1901/10/0.7//  
1902/25/1.8/19.7/1.2  
1903/19/1.3  
1904/13/0.9

(注)本表及后文各附表中的数字均根据下列资料编制：“Historic Monthly Statistic of the United States”(1789—1945)、“Foreign Commerce and Navig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Foreign Investment in China”(C.F.REMER, New York: Macmillan Co.1933)附表中缺与贸易相应的投资统计资料。

格罗弗·克利夫兰(G.Cleveland)和威廉·麦金利(W.McKinley)两届政府对经济理论家、商人和投资者的种种顾虑作出了反应。政府愿努力扩大贸易,改善美国人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地位。但是美国在中国的利害尚不足以为政府在那里开展大量活动提供必要的根据。尽管如此,在克利夫兰政府的最后几个月任期内,美国驻华公使田贝(C.Denby)接到他盼望已久的指示,要他运用个人影响扩大美国的商业利益。几个月后,他获得机会要求中国人考虑美国企业家和投机商提出的建议,但是不久就受到麦金利政府的约束。虽有中日战争戏剧性事件和随之而来的列强对特权之争夺,美国人很少对东亚表现出巨大的兴趣,对政府在这个地区不积极感到不安的人就更少了。在这种情况下,希望对中国采取积极政策的商人们显然面临绝境。1898年1月,他们特意成立了一个团体,后被命名为“美国亚洲协会”,目的是发动公众舆论并借以影响政府,使大家看到在中国发生的事件已使美国的利益受到威胁。他们确信这种威胁的存在。但是到1898年冬天,美国人民及其政府更多地关注着家门口的严重局势——古巴的叛乱。

1898年2月15日,“缅因”号军舰在哈瓦那港口炸毁。此后不到十周,美国便和西班牙开战,一场解放古巴的圣战在进行中。在对西班牙的军事行动中,意外地于4月20日命令美国亚洲舰队司令乔治·杜威(G.Dewey)前往菲律宾摧毁驻守在那里的西班牙舰队。

杜威在完成了他的使命三个月后,西班牙准备接受在这场战争中它所完全预期到的失败,御前会议相信这比不体面的投降略胜一筹。菲律宾败于叛乱和美国的武器,这些岛屿的未来命运有赖麦金利总统作出痛苦的决定。几个月后,总统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冲动,美国获得了一块远方的殖民地,美洲出现了一个帝国。

美国的帝国主义根源是多方面的,只有傻子和空想家才会坚持认为决定拿下菲律宾只出于单一的理由。必须记住,美国商人迄今为止一直是反对攫



取殖民地的，他们确认只要有优越的生产和销售技术就能保证美国在商业上的垄断，现在有理由来改变他们的想法了。当时某些人为国内的萧条担忧，另一些人担心受到丁利税制（Dingley tariff）威胁的欧洲人会进行报复，还有人警告说，欧洲和日本帝国主义正在把美国关在对华贸易的大门之外。如今杜威在马尼拉取得的胜利为美国提供了在远东建立一个立足点的机会，为获得东方的财富与市场和其他列强展开竞争。正如理查德·利奥波德（R. Leopold）所写的：“对菲律宾的向往和对中国的关切起到互相支持的作用。”而敦促总统重视这一情况的大有人在。这并不是麦金利所听到的推动他前进的唯一呼声，也没有任何根据表明他特别认真地听取了这些意见。假如像大家公认的那样，商业界反对西班牙战争，加强了麦金利本人的迟疑，那么 1898 年秋天商业界不再反对帝国主义，遂使麦金利顺应公众的愿望作出决定变得容易多了。美国变成了亚洲地区的一个大国。

但是在菲律宾有一个立足点还不够，关心对中国的贸易的商人，仍感忧虑不安，他们要求政府采取更有力的行动。麦金利向国会保证在中国的各帝国主义列强并不歧视美国，但是这一保证并不能安慰那些要在中国寻求市场的人。此外，在取得菲律宾后，使得海军对在中国设立加煤站或基地发生了兴趣，并将公众的注意力吸引到东亚方向来，其程度甚至超出美国亚洲协会中的政论家和院外集团成员的希望。1899 年，各方面对国务院的压力越来越大，在这一年结束前，国务卿海约翰（J. Hay）决定采取行动。

#### （六）

到 1899 年，美国已成为世界上一大强国，这意味着它不仅是一个最大的工业国家，而且乐于仿照欧洲各国的方式在军事上运用其新生的实力，美国领导人欲与这些国家一比高低。它要在远近各地区占有殖民地，让太阳如在东太平洋和加勒比海一样，也照耀着在东亚招展的美国国旗。美国人民处于一种争强好胜的心态，他们虽然没有提出要求，但却准备接受一个更强有力的远东政策。

麦金利总统甚至在和西班牙交战中关注着中国的事态。他从列强各国获得了保证，无意在自己划定的利益范围内干扰美国的利益。无论是英国在 1898 年提议在中国采取联合行动还是美国亚洲协会的院外游说都未能推动美国政府采取行动。但是有另外一些思潮在美国流行，即中国在世界权力均势中的重要性的观点以及美国在远东均势中的重要性的观点。一般被认为是美国帝国主义的理论家的布鲁克斯·亚当斯（B. Adams）和艾尔弗雷德·马汉（A. Mahan）都强调东亚权力之争的重要性，这种观点经常从卡伯特·洛奇（Cobot Lodge）、西奥多·罗斯福的文章和讲话中反映出来。1899 年，在被认为具有亚当斯、马汉、洛奇和罗斯福思想的人当中，柔克义是为众人公认的中国问题专家。国务卿海·约翰在远东政策上就征询了柔克义的意见。

柔克义看出中国的解体会成为一场灾难。当时还很少有人认识到这一点。某些世界知名的政治家对大清帝国的瓦解即使不兴高采烈也持漠不关心态度。柔克义却认为一个有能力在其国境内维持秩序的独立自主的中国对亚洲力量的均势是十分必需的。因而，中国的崩溃将导致已经展开的帝国主义之间的倾轧尖锐化，甚至酿成一场世界大战。为避免灾难，他认为美国应该利用它在亚洲的新地位，以及日益增长的国际影响使中国能作为一个国家存在。假如需要的话，他愿意使美国公开宣布协助中国维护其领土完整的意图。

虽然柔克义对中国文化有很大兴趣和深厚的感情，但是他主张美国挺身

而出维护中国的主权绝非出于爱中国，或爱它的人民，而应说，他看出东亚的稳定性是扩充美国在那个地区的经济利益和完成它作为亚洲强国的使命所必需的条件，而且他认为一个能够生存下来的中国是稳定东亚的要素。但是无论是麦金利还是海·约翰都认为，现实的利益尚不足以使美国如此激烈地脱离它一向不积极的老传统，同时，他们也不认为美国人民已为迈出如此大胆的一步作好了准备。相反，柔克义的一位老朋友，偶然来华盛顿访友的贺壁理（A.Hippisley）倒使美国采取了更有克制的行动。

贺壁理是英国人，他刚从中国的海关离任度假回国。他向柔克义谈到列强在中国争夺特权、互相倾轧令人注目，他担心各自有其势力范围的列强各国会把海关排除在外，拒绝向中国政府纳税。柔克义知道海关征集的款子是北京政府唯一有保证的财政收入。他充分理解中国政府的有效性所面临的威胁。虽然这种危险不像破坏中国领土完整那么明显，但是税收上的损失将肯定地使中国逐渐失去控制地方各省的能力。任何政府没有钱都不能行使其职能。

贺壁理在华盛顿和回到伦敦后都曾和柔克义交换意见。他起草了一份意见书，其要点构成了海·约翰在他第一份著名的“门户开放”备忘录中所提出的政策。这份备忘录准备以照会形式通报在中国据有势力范围的列强各国。贺壁理的草案中要求各大国同意不排斥其他国家在其势力范围内从事贸易，并同意不干预海关征税。如果帝国主义列强默认上述要求，将保证各国货物在全中国一切地方享受平等待遇。这项协议对在中国没有势力范围的美国有明显的价值。势力范围的存在将不再威胁增长中的美国对华贸易。市场是可以得到的，它属于去寻找它的人。这使美国亚洲协会感到高兴并解除了对经济萧条的担心。假如清朝的海关被允许像以前一样行使其职权，中国政府就能获得维持其职能所必需的收入。同时还可以在外国势力范围内保留一个主权国家的形象。柔克义原希望有一个更强硬的声明来维护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过他明白，在当时他的上级不可能走得再远了。柔克义将此草案送交海·约翰，他接受下来，未作实质性修改便送交列强各国，请他们承诺文件中提出的各项建议。这份备忘录是美国政府探求制定新远东政策的最理想的解决方案。它可以满足所有对政府施加压力的人，包括像柔克义一样关心强权政治的人，追求扩大美国经济利益的人，也有浪漫的民族主义分子，他们忽于看到美国在国际事务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所有这一切都不必去冒卷入海外争端的风险，从而使民众放心。美国民众对国际纠纷的敏感是出名的。虽然“门户开放”备忘录符合美国的目标，但其他大国都觉得赞同这样的要求对自己没有多少好处，因为要求他们奉行在他们管辖区域内作自我牺牲的政策。对于给美国货币以平等待遇的诺言，美国人并没有作出回报。另一方面，美国也没有对势力范围的存在提出挑战，没有要求在各势力范围得到同等的投资机会。俄国人和日本人在铁路和矿藏上的投资，无论在战略上还是经济上都是极端重要的。所有这些强国虽然从美国的政策声明中所得有限，但也无所失。没有哪个国家会无缘无故地急于把自己束缚在一些日后他可能为了自身的利益加以破坏的原则上，但也没有哪个国家愿意无缘无故地冒犯美国，拒绝它的要求。因此大部分国家的答复既含糊其词也不彻底，因为每个国家都要保护自己那份最宝贵的权益。但在实际上，大家还是同意了海·约翰备忘录中提出的原则，其中，日本没有提出任何的保留。海·约翰的努力暂时获得成功，他和麦金利遂宣告美国在中国的利益已得到了保

护。

值得注意的是海约翰从来没有和中国政府商量过这件事，也没有探询过中国方面的需要。就美国政策对中国主权的支持来说，它对中国还是有价值的。不过这个备忘录是为美国利益服务的，它对中国的益处只是某种巧合，是实现美国目标的手段。然而，并不像经典经济学家在工资问题上所假设的那样，存在着利益的铁的规律。事实很清楚，1899年，中美两国的利益并不是互不相容的。海·约翰和柔克义都确信他们采取的步骤对保全大清帝国作出了有意义的贡献。

但是中国并不怎么感激美国。实际上，在“门户开放”备忘录从形成到发表这段时间里，中美关系十分紧张，因为美国排斥中国移民并将这种歧视做法扩大到它的新领土夏威夷和菲律宾。在1899年9月，正是把备忘录分送给各国的那个月份，中国驻美公使伍廷芳对美国提出了抗议：“美国政府全然无视在两国政府间应有的亲善关系”（译文）。在以后许多年里，柔克义和海·约翰原希望通过支持中国博得中国的好感；却由于美国种族主义分子的干扰只落得以怨报德的结果。

总而言之，海约翰在1899年送交列强的备忘录并不是特为中国采取的仗义行动，中国人也不这么看。备忘录是为了美国在中国和东亚的广泛利益，麦金利政府是这样认为的。一百多年以来，美国人为开拓贸易和传教而跨过太平洋。19世纪90年代，在中国从事这些活动的美国人认为他们的权益受到中国面临分裂的威胁。他们希望、乞求和要求美国政府比过去给予更积极的支持，要求美国人民给予前所未有的赞助。但是90年代的美国人态度冷淡、漠不关心。某些历史学者称之为“民族精神病”或“精神危机”。也有人把它归咎于达尔文社会主义或归咎于对欧洲的模仿，以此来解释美国的变化。但是，美国人民显然已准备让他们的政府在国际事务中表现出更大的魄力。1898年，他们曾经支持，实际上是迫使政府采取了拯救古巴的行动。就在这一年里，他们还表示要使美国成为一个帝国主义强国，通过占领菲律宾把美国的势力扩充到了东亚。

日本在中日战争中取得大胜，欧洲帝国主义则在绝望的中国争夺残存下来的尚可攫取的一切，东亚的均势遂遭破坏，美国就在此刻成为东亚的一个强国。在中国的美国人眼看他们的个人利益受到威胁，而美国的理论家们提出，这场刚开始的搏斗的结局将使美国民族的利益处于险境。柔克义等人认为保全中国并使它现代化就能全部满足大家的利益。鉴于美国既不能保证中国的领土完整，也不能使侵犯了中国主权的列强后退，于是麦金利政府选择了现实的做法：通过要求利益均沾，对美国货一视同仁来保护美国的物质利益，同时也对维持中国政府的尊严和有效性作了一定的努力。对这份备忘录的答复不够令人满意，但是对海·约翰和麦金利以及贺壁理、柔克义来说，他们期望从六张纸头得到的也只能是这些了。联系到1899年美国在东亚的利益和实力，海·约翰的倡议是稳妥可靠的，暂时也是成功的。

#### （七）

海约翰和他的同事曾经希望通过敦促各帝国主义国家缓和他们对中国压力，中国政府也许能够改善其管理并实行维新，以达到稳定力量均势和实现美国的目的。但是要把清王朝扶持起来已经为时过晚。王朝的威力早已像潮水一样开始衰落，而且西方物质和意识形态的侵入，使清廷挽堵狂澜的努力更为困难和复杂化了。王朝衰落的过程并非由西方首先推动，西方已无回

天之力能使这个过程逆转。

传教士属于西方思想在中国的主要传播者之一，因而成为 19 世纪 90 年代在中国发生骚乱的一个促成因素，义和团暴动是其中最轰动世界的表现，部分由于他们在思想意识上所起的作用，部分由于他们是最易受攻击的外国代表。传教士日益成为中国人反对外国入侵的仇视目标，而美国传教士经常是反教会活动中的受害者。

美国在中国的传教活动始于 19 世纪 30 年代，到 90 年代又注入了新的活力，这部分地反映了美国人担心出现精神萎靡。正如理论家们所言，海外市场可以解除经济萧条的危险，也力图通过海外的十字军远征把宗教热情保持在国内复兴的水平上。有位作家认为：基督教是一种不能“长久保持”的宗教，如果不通过海外布道使其更新，国内的基督教信仰就将陷于停滞，教会也将抵制不住物质的引诱。

不需要怀疑服务于中国基督教会的美国男女所固有的理想主义，他们舍弃舒适的家庭和熟悉的环境来这里，面对着不可知的危险，只是为了响应他们上帝的号召。或许他们面临的最大的危险就来自那些他们希望拯救的人——不友善的、和他们的教义相敌对的野蛮的异教徒。中国人并没有请传教士来中国。只要中国政府还有能力，它就一直禁止宣传基督教。经过多年，西方列强迫使中国接连作出让步，同意传教士在这个并不需要他们的地方传教。尽管传教士们是理想主义者，但是他们的活动是条约制度的组成部分。正由于有外国炮舰的保护，基督教会才能在中国存在，所以他们经常使中国想起在西方支配下所受的侮辱。

在中国的基督教传教士确信他们的信仰优越，中国人则认为他们自己的文化最优秀，两相对峙。以吸收教徒来衡量，传教士的成绩很小，但是基督教却冲击了中国的风俗习惯，加以地方上的无赖之徒时常受到教会的保护，激起许多中国人的怨恨，遂导致广泛蔓延的骚乱。其结果是，在传教士和中国的士绅阶级之间的对抗加剧了，传教士们开始认为，作为中国传统社会支柱的士绅阶级是妨碍他们成功的主要障碍。传教士们通过带有颠覆性的思想宣传在无意地进行着摧毁中国传统社会的活动，他们逐渐相信破坏旧秩序对完成基督教的使命是势所必然的。美国传教士正是由于希望受挫折的时刻即将过去，因而欢迎日本的胜利。

中日战争的后果并没有给基督教带来胜利，反倒在中国兴起更广泛的反基督教活动。虽然相对来说，美国教会和传教士遭受的损失和伤害比较轻，但是美国政府却作出了不寻常的强烈反应。1895 年，国务卿理查德·奥尔尼（Richard Olney）通知英国：美国的旨意就是按西半球的法律办事的，他写道：“要使中国政府及其内地人民毫不含糊地明白，美国在保护其侨民权益问题上说到做到的。”幸运的是，中国在这个问题上作了让步，于是美国驻华公使要把一座中国城镇夷为平地的念头未能实现。

但是中国反对基督教的暴乱还在继续，传教士要求保护和进行报复的压力和美国人民的好胜情绪汇合在一起，导致美国政府采取更有力的措施。就这样，美国传教士像商业界一样促成麦金利政府在这一背景下制定新的对华政策。正如教会曾经支持美国帝国主义扩大地盘，以传播基督教新教，传教士们也支持美国在中国采取新的主动行动以进一步满足他们在中国的权益。

在海·约翰备忘录发表后的几个月里，并没有出现导致中国政府和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改革。不错，这十年当中最有前途的改良运动已于 1898 年被粉

碎，当时美国正和西班牙作战。在儒家学者康有为领导下，一些知识分子和官员曾向皇帝提出一份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教育政策上进行全面改革的计划。但是即使有皇帝的支持也不足以抵挡某些人的反对，他们认为这种改革太激进了。这些人聚集在慈禧太后的周围，成功地制止了这场改良运动，皇帝被监禁，康有为的六位最亲密的支持者被判处死刑。1899年，美国提出倡议时，慈禧正坚定地控制着局势，现代化的前景暗淡。此外，慈禧和她的追随者赞成遍布在整个中国北方的排外运动。当义和团这个秘密社团带头领导这一运动，要把外国人逐出中国时，破坏教会财产时，杀害中国基督教徒的事件不断增加。

美国和几个欧洲国家一致要求中国政府制止反对传教士和暴徒的罪行，但未奏效。虽然，有时朝廷也屈服于压力把触犯西方的官吏撤换掉，但慈禧决心要采取主动。义和团在山东和山西取得成功给人们带来信心，认为从此可以把外国的影响从中国永远清除出去。中国已经忍无可忍了——所有洋人都该死，将会一劳永逸地结束帝国主义的控制和颠覆。除了据说义和团能施魔法外，慈禧还以现代武装配备了清朝军队。她召义和团进京，命令他们将外国人斩尽杀绝，包括整个外交使团。1900年6月，德国公使被一名中国士兵杀害，同时，清朝和列强宣战。霎时间，东交民巷变为一个设防筑垒的要塞，不停地遭到攻击并切断了和外界的联系。约有两个月，世界上大部分公众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西方以及日本军队的进程上，他们从沿海一路杀过来，试图进入北京救援一部分被义和团围困的男女老少。美国公使康格（E.H.Conger）呆在被包围的东交民巷，几个月前，他曾怂恿出动美国军舰，他坚决认为除了显示武力没有其他办法能使中国人动摇。在义和团这场浩劫中，数百名传教士和数千名中国教徒被拷打、屠杀，此后，许多传教士尽管有他们的宗教约束，也同意康格公使的结论。

同西班牙开战把美国士兵送到了东亚，而美帝国的责任和镇压菲律宾叛乱则要求这些士兵继续留在亚洲。鉴于美国外交人员、商人和传教士的生命在中国受到威胁，麦金利政府既有人力物力也有意志来保护其侨民及其利益。在最后打败义和团使东交民巷解围的军队中有几千美国人。但是，早在他们抵达北京之前，海·约翰又发了第二轮照会。

#### （八）

当中国和各国开战时，海约翰意识到，美国想使中国免于崩溃的希望已岌岌可危。各国自我克制的可能性顿时渺茫了。清廷为了保住王朝与一些秘密社团联合，孤注一掷地把一切不满情绪引导到排外运动中来以避免形成通常的反对满清王朝的运动。鉴于军事的需要，和亟需一支远征军来为北京的外国人解围，列强各国，特别是俄国似乎都需要找个借口以进一步侵占中国的主权。一旦外国军队踏上中国土地，再让他们回去也许就不那么容易了，这样也许就很难保护美国在中国的利益。

1900年7月，海约翰在征询柔克义、贺壁理和罗脱（E.Root）的意见后，又发了一份通报，在这个文件中，他表示对保全中国主权的重要性问题应给予关注——即保全中国“领土和行政管理权的统一”。更有意义的是，他指出中国处于“事实上的无政府状态”，当时实际上只是由地方当局掌权和执政。只要这些地方政权能在他们的管辖区内维持和平，就应承认他们代表中国人民。从这一根据出发，麦金利政府着手同控制着南方和中原各省的高级中国官吏李鸿章和张之洞建立联系，对他们想把战争限制在中国北部的企图

给予了强有力的外交支持。李鸿章、张之洞，及其他有势力的中国官吏镇压了义和团运动，保护了外国人及其财产。作为报答，美国成功地打消了列强要把抵抗义和团的军事行动扩大到中国其他地区的动议。中美合作的一个结果是，有可能不顾事实地坚持说：义和团的行动是自发的，它不仅与列强各国敌对也造中国政府的反。这样就能把战争的区域和强度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从而阻止中国被瓜分。美国所要扮演的正是柔克义为之设计的角色——远东权力均势的操纵者。

海约翰的照会里说，美国的政策乃是为了列强的利益。他既不要求他们承担义务、也没有进行威胁。虽然美国在东亚的利益要求向中国和菲律宾派遣必须的武装力量，但是美国在这个地区的利益也还没有达到值得动用相当规模的武力致使任何大国受威胁的程度。美国反对进一步肢解中国，它向参与国际讨伐救援北京的列强建议采取自我克制的策略。像在 1899 年一样，1900 年各大国也准备至少是暂时同意美国的策略，他们并非怕美国，或是崇拜美国提出的原则，而是海约翰提出的办法从根本上说是明智的。各大国可以等待一个更有利的时机进一步满足其帝国主义野心。

美国取得的实力地位部分由于它的部队参加了解救北京的联军。假如美国准备在亚洲大陆保持这种军事姿态，也许能对中国和列强的谈判结果施加相当的影响。如果美国部队从中国撤退，就会失去达成和平解决和保护、甚至扩大美国利益的机会。

在国内，麦金利政府感到选民对政府的要求模糊不清。那里对困在北京的美国人的安全表现出极大的关切，因此参加援兵得到一致赞同。与前十年的情绪一脉相承，在中国有利益的传教士和商人继续施加压力要求美国政府在解决问题上发挥更强有力的作用，同时也有持相反的意见的信号。反抗帝国主义的运动很强大，政府要考虑菲律宾方面的军事需要。在中国卷入任何比救援更激烈的敌对行动，其目的也不那么人道主义，可能在美国人民中激起后果不堪设想的消极反应。此外，国家为军事行动消耗的资源几乎可以肯定会达到不能容忍的地步。确实，军方已经急于从中国撤退以执行其在菲律宾的使命。总之，政府认识到公众对中国的关心是肤浅的，既不够广泛，也不够深刻，因此，不足以为政府决定参与亚洲大陆的强权政治提供所需的民意支持。海约翰和麦金利还明白，美国虽有必要关心东亚的权力均势，而且在那里有实际的经济利益和人道主义利益，但是这些都不值得以战争去获得。

在如何处理义和团的具体问题上，美国人的意见形成一种模式，后来得到重复。那些有经验的“中国通”包括传教士们都坚持要求采取坚定的政策，他们警告说，中国人会把宽容视为软弱。他们在和中国官吏接触当中时常发生摩擦，因而使他们不容易从感情上抱有幻想。他们并不爱中国，而是珍惜中国给他们提供的机会——改造这个“愚昧的”国家，完成基督教使命，或赚钱的机会。他们有明确的任务要完成，不愿迁就在美国国内出现的那种对中国人表示怜爱的同情心。不与中国事务牵涉的美国人报复心较小，更为小心谨慎避免卷入其他大国的帝国主义阴谋。不管是关心外交政策的普通公民、国会议员还是政府成员，他们都好像更支持根据美国的不干预原则所制定的政策，这些政策也符合一个新出现的概念，即美国是中国的保护人。人们对某一特定局势的细节越无知，就越容易按照老概念作出反应。

由于没有明确的民意倾向，麦金利政府选择不撤回军队的做法，北京解

围后，让美国部队不离开北京只脱离盟军的统率，他们曾在盟军的统率下由沿海杀进北京城。美国没有向东亚增派部队，还从中国撤走一部分军队。但是美军在东亚的存在证明美国继续对这个地区表示关切。由于海约翰仍希望有一个稳定的中国，美国在谈判中反对一切可能削弱中国的建议。一旦中国崩溃并被瓜分，美国就要面临一个不愉快的任务：在中国各地保护自己的权益，而它的对手则远比中国人难对付。此外，这场角逐的不可知的后果很可能就从毁灭中国所造成的真空中开始，这将比现存的不稳定均势具有更大的威胁性。

停战议定书经过一番争论后于1901年9月签字，争论的内容是战争赔偿的数额以及如何分配这笔从中国榨取的赔款。列强最后就一笔很大的数额达成一致意见，总金额相当于三亿多美元，美国约分得二千五百万美元。除去这笔巨大的财政负担外，中国还被迫给予它的侵略者在北京和沿海之间驻军的权利。这是保护在华北的外国人的一项新措施，同时也是中国的软弱的新标记。但是中国的边界保持原样，完整无损。

倘若美国阻止瓜分中国的努力失败，麦金利政府已作好准备要求从这个瓜上为美国人分得小小的一块。特别是华盛顿的海军人士曾经对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占一块中国领土建立加煤站。由于不相信有建立这种基地的必要，海约翰没有理会。直到义和团事件发生后，对他的压力也格外加强了。拒绝这种占有中国领土的要求容易使政府受到指责在保护海外侨民工作中缺乏警惕性——因为政府否定了海军为执行其使命所必需的加煤站。因此，1900年12月，海约翰表面上作了一些勉强的努力，提出占有福建省三沙湾的要求。但刚遇到挫折就退下阵来。幸而中国已向日本作过永不把福建领土割让给第三国的承诺，所以，此事并不伤美国的面子。假如没有更容易的方法来满足美国的利益，无论是海·约翰还是麦金利原则上都不反对向中国提出领土要求。在海·约翰1899年和1900年发表的备忘录中除提出要保全中国的主权外，并没有采取牺牲自身利益的克制政策。

#### （九）

麦金利于1901年被暗杀后，由西奥多·罗斯福继任总统，但远东政策仍由海·约翰掌握，直到1904年爆发日俄战争为止。在这几年中，本来就有限的远东利益几乎全部消失了。传统的对国内事务的专注，取代了90年代的对外扩张情绪。对海·约翰及其他仍参与中国事务的人来说，这些年并不令人满意。由于对华贸易锐减，美国的物质利益损失严重。这个地区的均势受到俄国冒险主义的威胁，美国和俄国的关系趋于紧张。但是对那些比较容易满足的人来说，有迹象表明中国政府终于认识到他过去的愚蠢，甚至连慈禧也准备认真地从事改革。

这几年里，中美关系实际上是一种以俄国为第三家的三角游戏，中国则力图操纵俄国和美国以实现他本身的利益。在义和团失败后，俄国要取得整个“满洲”实际控制权的意图已昭然若揭，而“满洲”是美国商人，特别是棉纺织品出口商的重要市场，向中国出口棉纺织品的百分之九十是销往“满洲”的。这些商人通过美国亚洲协会和商业报刊表示担心俄国占领“满洲”将使他们的市场处于现实的和潜在的危险之中。他们说得对。俄国毫不犹豫地排斥其他大国的侨民，要么就一点也不尊重中国维护它在东北各省的主权的要求。

俄美冲突植根于美国对中国市场的向往，以及对北方特别是“满洲”

的贸易前景的正当关切。如果在“满洲”没有这些经济利益，看来美国就不会持续不断地积极反对俄国侵占“满洲”。罗斯福起初不很关心，他认为俄国扩充到中国会对中国人有利。以他通常为帝国主义辩护的一贯态度，罗斯福争辩说，当一个“文明大国”以“实现野蛮主义为代价”而求得扩张时，会使全世界受益。他承认，如果多了解一些美国在贸易上的需要，他也许会改变想法。但他却写道：“正如土耳其斯坦曾由于俄国的入侵而受益，我想中国也将如此。”当然，罗斯福和其他人接受了这一观点，即东亚的权力均势对美国有战略上的利害关系，但显然还不是那种至关重要的利害关系。“满洲”发生的事件可能会直接影响到俄国人和日本人的安全，但在20世纪初很少会有美国人相信他们自己的安全濒临危险。

鉴于美国在“满洲”的利益有限，海·约翰和罗斯福只限于从俄国人那里得到给美国贸易以公平待遇的保证。但对日本人来说，俄国入侵这个地区给他们带来更加现实的威胁，其所引起的关切已达到要以兵戎相见的程度。早在1901年，日本人曾探听海约翰对采取日美联合行动的意见。但是，海约翰直率地回答，美国不准备单独或与其他国家联合以武力来实现在中国的目标。美国在东亚的军事力量只用于保护美国国民的生命和保卫属于美国的领土。

日本人决意要阻止俄国的推进，不久就和英国结成同盟。并于1902年以条约形式确立了英日合作关系。他们通力合作阻挠俄国侵占“满洲”，并使中国加强决心去抵制沙皇部下提出的种种要求。不久，海约翰便清楚地看到，当俄国正对来自英日两国更为危险的挑战感到忧虑时，可乘俄国之危加大美国的压力。在不结盟、不承担任何义务的情况下，美国与俄国的敌人勾结，企图利用他们的力量达到自己的目的。

作为保障美国在华利益的一项措施，海约翰于1902年开始谈判订立新的中美商约。在谈判过程中，俄国在“满洲”的行动使他感到有必要提出在东北各省开放两个新口岸。由于怕刺激俄国，中国表示犹豫。俄国在了解到这一情况后，便不遗余力地逼迫中国拒绝美国的要求，并以在“满洲”保留驻军和进一步使用武力相要挟。虽然俄国人可能考虑到开辟新口岸会危及在它控制“满洲”情况下俄国贸易所独具的优越竞争地位，但是他们主要关心的是战略上的利害关系。如果对美国开放新口岸，列强各国都将根据他们条约中的最惠国条款也提出增加口岸，在俄国人眼前出现了日本人成群结队涌进东北城市的幻景，这将给俄国驻军带来极大的安全问题。

夹在美国的要求及俄国的威胁双重压力之间，中国绝望地试图把局势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扭转。李鸿章已去世，19世纪伟大的清朝官吏中，只剩下一个张之洞。在前驻美公使伍廷芳的协助下，张之洞成功地使袁世凯认识到开放“满洲”口岸的价值。袁世凯是出现在中国北方的一个强有力的人物，对朝廷有很大的影响。他对张、伍两人的支持便足以使他们的计划得以试行。这些中国官吏对涉及到的贸易问题不感兴趣而是企图通过把其他大国，特别是美国、英国和日本拉进来与俄国抗衡，使中国在“满洲”的主权得以保全。中国人再次利用对一切外国人都平等对待的概念，目的在于使他们互相攻击。

中国同意开放新口岸以前，在华盛顿对俄国的愤怒日增。罗斯福私下发出一些好战的喊叫，宣称如能获得公众支持，他将武力解决问题。海·约翰对俄国公使威胁诱骗兼施，甚至警告说，如果俄国不停止干涉中美谈判的



行动，美国将派军队参加英国和日本的联盟。罗斯福说，美国无意阻挠俄国对“满洲”实行政治控制，但他坚持“我们所要求的只是我们正在增长的巨额贸易不被中断，并要求俄国信守庄严诺言……我们一直承认俄国对“满洲”的特殊地位。”

在 1903 年 7 月，罗斯福通知海·约翰说，他不反对让俄国人知道，他已完全被激怒而且不准备作出让步。在这个月晚些时候，他又写信提醒海·约翰说：“我希望在“满洲”我认为我们的人民所能容忍我干到哪一步，就要干到哪一步。即使我们确知法国和德国不会参加进来，对俄国采取‘极端’手段，我也在所不惜！”

直到俄国人了解到美国人并不坚持在通商口岸取得租界权，俄国和美国的紧张关系才有缓和。认为可以让美国获得新口岸而不必同时允许日本侵入他们认为是自己势力范围的地区，于是俄国人撤回了对拟议中的中美条约的异议。就此，中国人声明，只要俄国一撤出军队，就立刻开放新口岸，以利用美国人迫使俄国撤军。但美国人拒绝考虑这两者之间的联系，使中国的传统策略再次遭到失败。美国人坚持不管俄国人是否部署有军队都要马上开放新口岸，中国被迫让步。

虽然俄国继续在“满洲”制造麻烦，排斥美国的贸易，侵犯中国的主权，但是美国和俄国之间的危机已经度过了。海·约翰继续抗议俄国的政策，而日本政府则认定，采取行动的时机已经到来。日本人对俄国拒绝在新开放口岸设租界区感到恼怒，压俄国摊牌，俄国拒绝让步。沙皇政府对日本的力量和决心估计不足，对把欧洲结盟的办法移到亚洲事务上的效果作了错误的判断；或许是希望一场光荣的战争能够阻止革命。1904 年 2 月，日本人对俄国的拖延和搪塞已感到厌烦，突袭了停泊在旅顺口的俄国舰队。此举正合罗斯福和其他感到自己在中国的利益受到帝俄威胁的美国人的心愿。罗斯福写道，对他们所有的人来说，日本人“正在于对我们有利的事”。

#### （十）

到 19 世纪末，当美国已利用它巨大的能量并成为—个伟大的工业强国以后，某些美国领导人及美国人民中的许多人都希望看到美国作为—个世界强国来行动。在 1898 年，被西班牙在古巴的政策惹恼，美国打败了西班牙，解放了古巴。同时侵吞了几块西班牙的殖民地，其中最著名的是菲律宾群岛。就这样，美国成为亚洲地区的强国，现在它既已登场，发表—个声明阐述美国的政策是合宜的。但是，美国在远东的利益无论就一般而言或是在中国的实际来说，都没有什么新发展。海·约翰的声明被称为“门户开放”备忘录，它是美国卷入中国事务一百多年来自然积累的产物。通过这许多年，美国得出结论：它在中国的利益，包括经济的、文化的和战略上的利益都是在保全大清帝国存在的情况下得到最大满足。列强各国多数都持这种观点，至少在 1895 年以前如此。由外国控制的势力范围内中国的主权受到损害或将要受到损害时，美国便要求对所有国家的货物都—视同仁，以为这样会有利于美国的出口贸易。在 20 世纪最初几年里，当某一个大国决定在侵犯中国的主权的同时，排斥美国货时，美国就要表示反对。但无论是海·约翰，还是他任职时的任保—位总统，都对美国在中国，或总体来说在东亚的利益所能推进的程度不抱幻想。这些利益早已存在了，而且有可能发展得更大，但终归不属于那种关系重大的国家利益。这些利益值得给予外交上的支持，但不值得为之冒和—个大国交战的风险。

美国作为在亚洲的一个强国跨入 20 世纪。不论商人、传教士把他们在中国的活动看得多么重要，但美国国内有许多更重要的问题亟待解决，所以美国人民和政府都不可能把注意力长期集中在亚洲事务上，而一些狭隘思想较少的人显然认为欧洲问题更为重要。

#### 原书注释

Immanuel C. Y. Hsü 著 *China's Entrance Into the Family of Nations* , Cambridge 哈佛大学出版社, 1960 年版, 第 270 页。

Rockhill 致 A. H. Hiss (1894 年 10 月 30 日) 转引自 M. B. Young 著 *Rhetoric of Empire* , Cambridge 哈佛大学出版社 1968 年版, 第 22 页。

R. W. Leopold 著 *Growth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62 年版, 第 212 页。

伍廷芳致 J. Hay (1894 年 9 月 12 日), 美国国务院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 华盛顿 1901 年版, 第 214 页。以后引用此来源悉称“*Foreign Relations*”。

Olney 致美驻华公使 C. Denby (1895 年 9 月 19 日) 转引自 *Rhetoric of Empire*。第 81 页。

Roosevelt 致 G. F. Becker (1901 年 7 月 8 日), 引自 E. E. Morrison 等人所编 *Letters of Theodore Roosevelt* (八卷集), 哈佛大学出版社, 1951-1954, , 第 112 页。以后引用此来源悉称“*Letters*”。

Roosevelt 致 A. Shaw (1903 年 6 月 22 日) “*Letters*” (497—498)

Roosevelt 致 J. Hay (1903 年 7 月 29 日) “*Letters*” , 第 52 页。

### 第三章 在旭日的映照下

#### (一)

罗斯福看到日本可能在东亚成为美国利益的劲敌，而且是一个比俄国还难对付的敌手，因此，他对日本 1904 年的军事胜利怀有的喜悦心情也实在有限。他警告说，凡在这个地区有利益的列强都必须“分享利益，分担忧虑、具有双重负担”，而日本则只有“单独的利益、单独的忧虑和一重负担”。他感到日本取得胜利，将意味着有朝一日美日之间发生战争。但是，他相信只要对日本持尊重态度，日美冲突还是可以避免的。他欢呼日本对俄国在“满洲”的垄断展开了攻势。因为他知道，即使日本取胜，对美国利益的损害也不会比当前更甚。随着战争的发展，他表示希望俄国至少能作为亚洲的一个强国生存下来，以钳制日本，使日本把注意力集中在亚洲大陆上。如果俄国的力量能保持在足以从表面上维持“满洲”力量均势的程度，日本就不大可能觊觎菲律宾而很可能为列强在这个地区经商提供良好的机会。同时，日本获得一个不完全的胜利可使中国有较大希望保持它在“满洲”和华北的主权。在罗斯福的余生之年及其后多年内，如何与日本势力共处的问题一直使负责制定美国东亚政策的人感到苦恼。

尽管罗斯福一直忙于国内问题，但是他对国际政治的兴趣，使他密切注视着欧洲事务。只在在危机时刻他才关注亚洲问题。其中最严重的是由美国种族主义造成的日美关系中的危机。当罗斯福任总统时，中国并未成为日美关系中的一个严重的问题。确实这样，无论罗斯福的朋友亚当斯和马汉言论如何；也不管他本人早期的一些想法如何，罗斯福作为总统既认为美国在中国没有重大利益，就没有花费太多的时间去注意中国问题。

对中国不关心，不仅由于某些更紧急的事务压力比较大，也由于美国在中国的经济利益减少了。19 世纪 90 年代美国的棉纺织品曾在中国华北和“满洲”畅销一时，到 20 世纪的前十年，贸易锐减。这部分来自俄国的政治压力和接踵而来的日本政治压力，但更为重要的原因是美国对中国市场的兴趣减弱了。有些政治家经常想唤起人们对中国市场的期望，也有一些企业家、外交官和冒险家仍沉湎于昔日的美梦，但一般地说，美国出口贸易商无意保住或扩大他们的那份生意。美国投资者更喜欢从其他地方得到比较有把握的利润。虽然有些人写文章可能提出娓娓动听的理由证明中国是一个有潜力的财富来源，但在中国做生意的美国人知之更深。他们日益看到中国的老百姓没有购买力，而且在若干年内也不大可能出现有意义的购买力。他们也发现中国内地没有建成交通体系，缺乏运输条件。也许更有重要意义的是 90 年代的经济恐慌已经过去，此刻美国的经济体系重新恢复了信心。虽然从未放弃对海外市场的追求，但是，已不那么狂热了，而是更具理性地去物色那些异国特色不太突出的地方。至于那些还在中国继续开拓的商人，很可能是些最不听取领事官员劝告的人。他们向中国出口的是对中国人用处不大，甚至毫无用处的货物。他们包装也很差。美国人不像他们的竞争对手英国和日本商人，在中国设有代理人。他们也不提供信贷方便和推销机构。总之，对中国贸易的不关心和无能造成美国在中国市场上的份额减少了。

在俄国的扩张受到日本牵制的情况下，在义和团失败后的最近几年里，看不到中国有被瓜分的危险。罗斯福对东亚力量均势和它与美国安全的关系

保持关怀，就其关心的程度来看，中国已不再具有重要性。相反，罗斯福不难发现，英日联盟的存在，和后来日俄两国的和解，使力量均势转为对日本有利——和日本保持良好关系应该成为他的亚洲政策的中心。美国在中国的利益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际上都不值得去冒触犯日本的风险。由于加利福尼亚州对日本人的虐待造成日美关系紧张，其严重性已使罗斯福无法对亚洲大陆上的日本人再施压力。简单地说，如果不是中国人自己去刺激美国的感官唤起美国的注意，中国很可能被遗忘了。

## （二）

罗斯福对中国和中国人的藐视，是因为中国未能保卫自己，抵抗帝国主义。和他所佩服的日本人不同，中国人似乎在落后的社会状态仍自得其乐。他怀疑中国人能否“文明化”，建成一个现代化国家。他为中国人明显地缺乏爱国主义而震惊。罗斯福看不起中国人并非因为他们是东方人，而是由于他认为中国人永远不会焕发出民族精神，只知满足于过去的光荣。

罗斯福不知道中国正在发生变化。一方面清朝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重要的改革，特别是在教育领域，使逐步维新有了希望。另外，有许多事实表明，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正在增长，在通商口岸表现尤为突出。此时，对外国人统治中国的义愤，比义和团狂热的排外来得老练，以更成熟的形式表达出来。地方士绅、学生、新闻记者和商人开始关切中国主权在各个领域所受到的损害并要求废止列强从中国攫取的种种特权。他们对中国人在美国所受的非人待遇日益敏感，并对导致 1904 年永远驱逐中国移民的国会辩论及其实施感到愤怒。当他们眼看日本在“满洲”不断地打击俄国，便也感到自己大有希望。一个亚洲国家打败了欧洲的主要大国，不到半世纪以前，一个和中国一样落后的国家已经迅速现代化变成了强国。那么，中国的情况或许还不是无可救药的。

在中国广大民众中，具有这种民族觉醒的中国人还只是一小部分。但是，在 20 世纪的头十年里，他们已经形成一股被认为是组织的舆论力量。同时，他们已能够对地方的或中央的政府官员施加压力，并发起群众运动。1905 年，他们组织了一次联合抵制美国货的持续性民族主义运动，取得了第一次重大成功。

这次抵制美货行动的组织者们并不是真正反美的。他们想表明自己的认识——美国的移民政策只反映美国劳工的愿望，并不代表一般美国人。因此，他们希望能得到其他美国人的支持。此外，抵制美货的人们所关注的是比美国推行种族主义更重大的问题。种族主义固然可恨，只不过为他们提供一个发泄义愤的方便目标。他们要为捍卫中国的尊严而干一场。中国人民无法与日本人在旅顺口采取的行动相比，于是他们准备争取一次不太大的胜利。由于缺乏打击帝国主义所需的军事力量，他们便充分发挥自己本身的能量，利用有组织的舆论力量去反对一个看来以武力作出反应的可能性最小的国家。

这种抵制行动从未得到中国政府的支持，官方怕有可能导致外国干涉，再次遭受一番凌辱。但是，许多中国人，特别是伍廷芳和其他外交部人士都承认这一人民运动具有作为外交武器的价值。中国政府有道理地确信，美国不会进行报复。默许并且非正式地支持了抵制美货运动组织者的长期活动。否则的话，公众的愤慨常有转为反对清朝统治的危险。与此类似，一个要求废除美国铁路开发公司特许权的宣传运动也在高涨，对这一运动，中国政府作出正确的估计，认为顺应民众的要求不会导致严重的危险。

罗斯福对抵制美货运动的反应是，要求中国政府实行镇压，同时，也设法减少激起中国人仇美情绪的事端。他感到美国的威望已在中国面临危险，他不愿看到中国人以不敢施加于英国、日本和俄国人的办法来对付美国商人。至于在抵制美货运动及其他中国政府本身施加影响的经济问题上，就两国的直接关系而言，美国如动用武力是可以不受什么约束的。罗斯福早些时候不敢冒和俄国人冲突的危险，他对日本也很谨慎。但是反对中国，则有现成的炮舰政策。早在1905年反美骚动期间，亚洲舰队就停泊在上海附近，为美国公使的抗议提供强大的后盾。除去这一美国潜在报复的明证以外，罗斯福均采用常规的做法，柔克义在北京频繁提出抗议，要求惩办抵制运动的领袖，并警告中国政府要对美国人遭受的损失负责。虽然中国政府拒绝对抵制运动承担责任，并驳回对它进行镇压的要求，美国并没有动用现成的军事力量，也没有以武力相威胁。同样，罗斯福在国内的成就也不大。他既不能压制国会，也不能压制和加利福尼亚一样把歧视东方人合法化的各州政府。他个人对中国移民态度是明确的，也是可钦佩的。他接受驱逐中国劳工苦力是由于他没有力量加以阻止。同时，他尽一切努力使中国商人和留学生受到公正的待遇。驱逐中国人的法案是一种耻辱——它是对美国理想的嘲笑，但是它表达了美国民众的意愿而不是罗斯福个人的作用。无论在公开场合还是私下，他都争辩说，中国人的抱怨是正当的：“毫无疑问，发生抵制美货运动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美国政府和民众对这里的中国人的待遇上有缺点”。当西海岸的商人因遭受抵制美货的影响而诉苦时，他要求他们支持他的努力：“待人公道、以求公道”。在行政系统，他能够多发挥一些作用，他命令给各移民机关下达新的指示，警告他们：凡对中国人粗鲁失礼的，就立即解除其政府职务。

1905年秋天，抵制美货运动持续了五个月之后，它的生命力消失了。中国政府害怕反美宣传鼓动会导致暴力，又遭受美国抗议，终于命令镇压抵制运动。也许更重要的事实是，中国商人在抵制运动的高潮中曾作出最大的牺牲，而现在他们开始对这个运动失去兴趣。所以与其说是美国的内外政策，不如说中国本身的状况才能解释这种变化。

中国人削弱外国在华势力的另一个企图是想恢复铁路的建设和经营权，一般说，获得开发铁路特权的各公司都得到攫取施工和随后经营铁路的有效控制权的一些条款，以作为筹集筑路资金的部分代价。脱颖而出的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人知道，获得外国资本是必要的，但是他们急于摆脱外国人的控制或至少把它限制在最低限度。在张之洞指导下的废除华美合兴公司筑路权的行动始于1904年，在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期间达到了高潮。

1898年，华美合兴公司获得修筑粤汉铁路的筑路权。但在此后六年当中，该公司主要从事股票投机生意，竟把大部分股权出售给一个比利时辛迪加，直接违反了不准转让股权的合同规定，张之洞知道后，决心要取消此项合同。这条铁路万一能由美国人建成，对实现张之洞设想的交通网很有价值，此交通网是他的维新计划的组成部分。若落入政治背景不明的欧洲人之手，可能使中国的主权又面临新的危险。鉴于地方士绅从经济上着眼一直反对敷设铁路的特许权，张之洞便轻而易举地在湖南省掀起要求废止此项筑路权的运动。

1905年1月，摩根（J.P.Morgan）及其同事又从比利时辛迪加手中买回那部分股权，消除了张之洞原有的顾虑。但此时反对美国筑路权的行动已与

反对美国移民政策的抵制美货运动汇合。对任何想维护美国在华利益的人来说，1905年是极不顺利的一年。张之洞此刻又企图把美国人掌握的股权赎回。一个支持此项动议的巨大群众运动以武汉为中心展开，人民除以金钱支持外，还有声援的信件、传单、标语和示威游行。

像抵制美货运动一样，经证实，中国政府对这个运动也作出了响应，中国人起初和一家私人公司签订了筑路合同，现在又直接和摩根谈判，要赎回筑路权。摩根确信这宗交易能使他本人和股东们获得可观的利润，遂同意出手。但在成交前，罗斯福得知此事进行了干预。虽然罗斯福向摩根保证，他关心的“只是愿看到美国的商业利益在东方获得发展”，但是他的顾虑是，美国很可能因此丧失尊严而产生广泛的影响。他确信中国人“鄙视软弱胜于珍惜正义”——他或许还可补充一句：相信所有的国家都会作出同样反应。罗斯福力劝摩根坚守筑路权不放，并承诺美国政府将做他的后盾。罗斯福令柔克义在北京向中国当局提出抗议。但是到8月底，摩根和罗斯福协商后，同意撤销此项筑路权。摩根坚持说，他不能因拒绝中国的提议而不顾股东们的利益。罗斯福只好勉强同意。

在这一年结束前，有几个美国传教士在中国被杀害，虽然抵制美货运动已声势大减，运动的领导人也已停止暴力行动，但对美国人的的人身攻击有增无减。罗斯福怕再次出现义和团暴乱，命令加强亚洲舰队，并令国防部制定可能对中国采取军事行动的计划。幸运的是尚无必要向中国派遣远征军。12月份，在总统每年一度向议会提出的国情咨文中，罗斯福把和中国发生纠葛归咎于美国民众。他坚持认为：“这个国家对待中国人民极不公正，严重侵犯其权利”。他提醒美国人说，他们曾坚决要求中国人公正地对待他们。他警告说：“我们如待人不公正就不能得到公正的待遇”。在直接谈到抵制运动时，他认为是美国严酷的移民政策激起中国人的愤恨。

1905年以后罗斯福政府在亚洲最为关注的是，避免和日本发生战争。关于和中国的较小摩擦几乎已被遗忘。但是，罗斯福并没有忘记中国人那种令人吃惊的精神面貌。在1907年他以自己最富特色的表达方式来赞许中国的民族主义精神，当时伍廷芳被任命为中国驻美公使。伍廷芳以前曾赴美就华侨在美国本土及其新帝国——太平洋领地的处境和美国国务院交换意见，他坚决而无情地压倒他的谈判对手。伍廷芳是一个讲话声音粗重的民族主义者，他曾积极投入1905年的反美运动。1907年国务卿罗脱曾问罗斯福，美国能否接受这种人出任驻美使节。罗斯福回答说：“我强烈地感到，我们不应该反对伍廷芳。他是一个令人不愉快的中国佬，他一旦得手一定让我们全不得好死，就是不死日子也不会好过……（但是）我并不反对任何一个中国佬对我们侮辱中国人时常想到要复仇”。

还有一些迹象表明，罗斯福已看出中国人在为维新作出努力。他对此寄予同情并给以帮助。1907年，他请求国会授权退还部分庚子赔款，以帮助培训中国人民使之适应新的局面。在罗斯福离开白宫前几个月，他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中国的觉醒”，文章赞扬了中国新的民族精神。他号召美国人注意中国的种种变化——对西方教育待新的态度，交通实行现代化，工业和贸易都在增长。他也许过分热情地描绘出一个从古代迷信枷锁中解放出来的新中国。推动“现实而明智的爱国主义精神在全中国发展”的动力终于出现了。

在罗斯福的文章发表后数日，一位杰出的维新派唐绍仪和罗斯福会见，

他们讨论了由美国协助发展“满洲”的计划。罗斯福也向唐表示，美国希望能够对中国的维新有所帮助。他从稳定亚洲和世界力量均势的需要，阐明美国希望有一个强大的中国。只要中国仍处于软弱地位，东亚就会成为一个角逐的场所——这种斗争将比出现一个强大的中国给局势带来更大的危险。但是，唐绍仪并不满足于只得到口头上的支持，他曾希望美国支持中国在“满洲”抵抗日本帝国主义。这种支持并未实现，1908年，中国的全部希望都在现实的权势面前落空了。罗斯福钦佩在中国出现的新的民族精神，但是他不准备为了中国的民族愿望去向日本挑战。1910年，他写道：鉴于中国的软弱，美国和中国结盟将一无所获，只会增加额外负担。他相信一个强大的中国是符合世界利益的，但在他的时代不存在这种局面，他宁愿不要这个包袱，以免滥用美国的力量。尽管罗斯福对美国的使命夸夸其谈，他并不幻想去实现一种在美国统治下的和平；他也没有那种救世主式的冲动，甚至拿美国的安全和利益去为中国冒险。当唐绍仪在华盛顿等待时，罗脱和日本大使高平小五郎交换了备忘录。这正象征着罗斯福政府对东亚的基本态度。

### （三）

几个世纪以来，中国曾成功地运用了以夷制夷的策略，但是到19世纪，虽遭到一连串的失败仍未动摇他们的信心，也未能使他们把这个策略重新审度一下。在20世纪初，他们本来可以有极少的选择余地，但是事实表明，就连这一点选择他们也没有去尝试。中国人没有根据指望日本人控制下的“满洲”会比在俄国控制下对他们更有利，在日俄于1907年达成和解前，中国在外交上没有任何动作，只是希望从日俄两国的旧嫌中得到好处。当这个迫切的希望幻灭后，中国在德国的怂恿甚至推动下，又回到早先想利用美国在“满洲”为中国出力的念头上来。英国人成功地运用孤立德国的策略，使德国人日益感到担心，便推出在东亚成立一个德-美-中协约国的宏大计划。但是，把中国的软弱和德国的野心结合在一起，对罗斯福并无吸引力。由加利福尼亚的反日鼓动造成连续几个月的日美关系紧张，使罗斯福决意不让东亚的问题再加剧这一危机。实际上，如果需要的话，他将乐于牺牲美国在中国微不足道的利益以安抚日本。不论是否有德国的合作，他都不愿卷入“满洲”事务，那样做只能解释为代表中国在这个地区进行干预，而“满洲”对日本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中国人在努力过程中，并非没有美国朋友。上海的美国人担心日本和俄国有潜在力量的活动会挖他们的墙脚，损害他们在中国和“满洲”的利益。1907年，美国国防部长塔夫脱（W.H.Taft）访问上海，他感到美国有必要对日本人威胁到在华美侨的经济利益采取反对立场。在“满洲”，美国驻奉天总领事司戴德（W.Strairht）与中国官吏密谋利用美国资本来反对日本。在国务院，助理国务卿威尔逊（H.Wilson）同意司戴德对日本的敌视态度，另外一些人则对日本在“满洲”侵犯中国主权以及有关日本在“满洲”给本国侨民的货物以优待等的情况报告关切。

但是，罗斯福并不认为美国人在“满洲”和中国本土总共那点利益能与国家根本利益相比。日本在东亚的利益是至关重要的，而美国则不是。只要能确实证明哪里在排斥美国货，美国政府就继续对触犯它的国家提出抗议，不论是日本，还是其他国家。鉴于贸易本身的重要性有限，所以，这种抗议永远不会达到促成危机的程度。关于在“满洲”开发铁路问题，罗斯福的看法和司戴德等人不同，他认为美国如屈服于中国的诱惑，必将侵犯日本的利

益——一项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根本利益。对美国来说，它在这个地区的利益有限，它的实力也有限，加以它在西太平洋易受攻击，如按塔夫脱、司戴德的主张采取行动不啻为走向灾难的不必要的一步。

当德国人、中国人和司戴德进行策划之际，罗斯福和罗脱正准备结束日美危机，这是美国东亚政策的主要目标。当唐绍仪在侧厅等候时，罗脱和日本大使交换照会，说明美国的亚洲政策是寻求对日友好，并坚持美国在中国及“满洲”经商应享受平等待遇。此外美国从未提出其他要求。日本帝国主义进入“满洲”，中国主权受到侵犯，美国只表示遗憾，正如对其他大国的侵犯也表示遗憾一样。但不论美国多么尊重中国的领土完整和国家行政权的神圣，它从来不愿用自己的武装去干预各国对中国的压迫。1908年罗脱-高平协议也没有就这些问题提出新的政策。

#### （四）

1909年，塔夫脱出任美国总统。作为罗斯福亲自选定的继承人，日本人和多数美国人都认为他将遵循罗斯福为他制定的路线。但在宣誓就职后几个月内，便已十分清楚，塔夫脱决意独立自主地走自己的路。塔夫脱的亚洲政策一反过去的做法，他积极地把美国的经济利益推进到空前绝后的程度。这是塔夫脱政策的一部分。他的政策是，大力扩充美国在全世界的贸易和投资。和过去罗斯福政府的政策相对照，塔夫脱政策在亚洲更令人瞩目，尤其是他乐于面对日本的势力，坚决推进美国的利益。

美国对华、对日政策的新方针基本上是塔夫脱制定的。塔夫脱曾任菲律宾总督，并在任国防部长期间访问过亚洲。他担心日本在东亚的意图，但是并没有同时对日本的军事力量感到害怕。因此，他认为罗斯福姑息日本，情愿把美国在华利益置于次要地位以换取日本的好感是一个方向性的错误。他的看法正与司戴德和亨廷顿、威尔逊的看法巧合。司戴德已出任远东司司长，威尔逊被提升为第一助理国务卿。

美国历届总统也和各国领导人一样，经常关注于如何发展本国的经济，通常搞扩大贸易。塔夫脱个人相信在中国本土和“满洲”扩充市场存在着潜力。和他的国务卿诺克斯（P. Knox），以及司戴德、威尔逊等人意见一致，他也认为，美国在东亚的政治目的是取得以主权国家中国为基础的稳定的力量均势，而这一目的可以利用经济手段，通过“金元外交”来实现。他们都相信，在追求美国本身的利益时，也帮助了中国。塔夫脱认为，美中两国的利益是一致的。

塔夫脱政府东亚政策的中心是，承认美国对华贸易的成就大小取决于在中国的投资多少。塔夫脱和他的顾问们相信，只要能使美国资本挤进中国市场，就能打破日本人的控制，同时为扩充美国贸易提供方便。早些时候，罗脱曾一度企图把投资机会均等包括在“门户开放”的概念之内，但是列强各国一般的理解是，“门户开放”只包含贸易。不管如何理解，塔夫脱政府强调美国要恪守其“传统的”“历史性”的政策，坚持说“门户开放”将确保美国在全中国有均等投资机会，不必考虑势力范围。虽然美国金融界总的说来对在中国投资并不热心，他们宁愿在其他地区获得更有利机会，但是塔夫脱还是很快地得到银行界的支持。

1909年初，由于爆发了反袁世凯的政变，中国内部政治形势发生变化。袁世凯及其亲信唐绍仪已不可能继续从事在“满洲”争取美国支持的活动，但是，北京政府继续设法利用美国，可能也包括英国，以求共同抵抗日本及



俄国。中国外交部的领导人一致赞成“美国在“满洲”的积极干预”。如果中国独立自主，那么时机已经成熟，正好采取塔夫脱政府所期待的那种外交攻势。使美中双方都感到遗憾的是，中国自主的程度甚微。

1909年夏，美国人开始大力向中国的投资市场渗透。最初塔夫脱想从清朝政府为修建粤汉铁路而发行债券中为美国银行家争取到份额，但未能成功。后来，塔夫脱以个人名义致电醇亲王，敦促他同意给美国资本家同等的一份债券，并说明他“个人极力关心把美国资本用于中国的发展，使之造福于中国”。但是这位在他侄儿褫祿时期出任中国摄政王的亲王不敢得罪已从他手中勒索到筑路权的欧洲列强。醇亲王虽和他的顾问们一样热衷于取得美国的援助，但是，他们不能答应美国的要求，直到美国得到了英、法和德国银行团的默许。这些银行团都有本国政府为后盾。塔夫脱政府对北京施加压力是找错了对象，以致在欧洲人勉强同意接受美国银行团前，差不多耗费了一年时间。这件事只能在中国造成一个新的危机来废除此项协议。

1909年6月，司戴德从国务院离职，出任作为美国政策工具的银行团的代表。他先到伦敦，与欧洲银行界会晤，提出美国的要求，然后又去奉天，这是他早期和唐绍仪进行交易的地方。他在奉天找到唐绍仪的继任锡良，此人是一个保守派，但是同样对美国资助开发铁路感兴趣。正当唐绍仪和中国维新派希望利用司戴德和美国铁路大王哈里曼（E.H.Harriman）对抗日本及俄国在“满洲”的势力时，锡良筹划了一个方案，由美国银行团出资修筑一条从锦州到瑗瑋横贯“满洲”的铁路。中国人认为，英国如也能加入此计划，他的处境会更好一些。中国由于已不可能在“满洲”重申其主权，又担心日本和俄国兼并富饶的东三省，遂想使其他大国也在这个地区得到，一些好处。以便于利用他们的实力阻止某些软弱的中国单独难以阻止的事态发生。十月份，中国官吏在“满洲”和司戴德签署一项协定，由美国银行团出资兴建锦绥铁路。

对醇亲王和在北京的其他执政者来说，这个新的协定也带来了熟知的窘境。此项协定所要达到的目的是令人满意的，但将激怒日本和俄国。美国如不愿抵制来自这方面的压力，中国势必难以行动。尽管在“满洲”的官吏一再敦促早日批准此协定，北京政府还是要等美闰政府的答复。

塔夫脱政府没有力锦理铁路协定向北京、东京和圣彼得堡施加外交上的压力，倒是对“满洲”展开一个更广泛的攻势，提出一项诺克斯“中立化”计划。诺克斯建议把“满洲”时铁路全部中立化或国际化。塔夫脱显然相信俄国人可能乐于让其他国家来承担他们在中东铁路上的某些亏损。他希望得到英、法和德国的支持，以此来孤立日本。假如此计划能实现，假如日本被迫放弃对南满铁路的控制，它对南满的控制也就随之告终，于是在“满洲”，中国主权受到的威胁会大为减少。美国资本流入这一地区将增加贸易的机会，从而提高商人和投资者的利润。此外，还将使帝国主义遭受沉重打击，使中国人民得到最大的帮助，这是一个伟大的梦想，但是他像许多美梦一样，在旭日升起的时候消失了。日本在“满洲”的地位太强了，它在世界权力均势中的地位太牢固了，同时，它抵御美国的制胜策略的决心也是坚持不懈的。与其说把俄国和日本离间开，不如说诺克斯的外交反而把它们拉到一起了，它们以明显相似的措词拒绝了诺克斯计划。诺克斯曾希望从英国得到支持也未实现。英国珍视它和日本的同盟远胜于关心从“满洲”中立化可能获得的好处或塔夫脱政府的好意。同样，法国人站在它们的盟友俄国一边，而德国

为担心在欧洲受包围已够伤脑筋，它不准备为中国的主权或美国的投资机会向世界挑战，特别是在它们前些年遭到失败以后，诺克斯曾建议以锦瑗铁路代替铁路中立化计划，但是，锦瑗铁路也未成为现实。

#### 附表二美国在中国的经济利益（1905—1919）

（a）1905年及1906年的统计数字明显反映了美国在日俄战争期间的收获。

塔夫脱的外交攻势不仅使在中国有利益的列强不安，也使西奥多·罗斯福不安。罗斯福向他的儿子悲叹“可怜的塔夫脱”的无能，说塔夫脱不了解一项成功的对日政策应包含哪些内容。到12月份，他写信并拜访了塔夫脱，警告他说，日本可能成为美国安全的严重威胁，包括美国在太平洋的领地在内。他提醒塔夫脱，日本在亚洲大陆的利益是生死攸关的，而美国在那里的利益，特别是在“满洲”“实在不重要，而且美国人民也不会甘心为它冒导致冲突的最低限度的风险”。他认为政府关于美中两国利益一致的臆断简直是发了疯，他还争辩说，在“满洲”向日本挑战需要巨大的军事力量，相当于把英国海军和德国陆军结合在一起的实力。

罗斯福把辩论推进一步，为国务卿诺克斯的道义感所不能接受。罗斯福认为，当一个强大的国家有意不顾“门户开放”政策而宁愿用武力达到其目的时，“门户开放”政策就毫无用处。只要其他国家愿意让美国人在中国寻求有限的利益，要求机会均等的备忘录就已经满足了这种需要。当前，日本如拒绝美国人以传统机会，靠口头争辩毫无意义，但是美国除辩论一场外，并不具备和日本进行更严厉的较量的实力。鉴于它涉及重要利害关系，罗斯福坚持认为，强行推行这种政策是错误的，最好是放弃对机会均等的兴趣和要求。

诺克斯在起草给塔夫脱的复信中问道：“日本人为什么要比当前拥有‘满洲’的中国更需要‘满洲’？”对诺克斯、塔夫脱和司戴德，或许还有各地的好心人来说，中国有权控制它的领土与资源。塔夫脱政府认为，中国的愿望值得美国给以支持。从这一设想出发，塔夫脱认为，应支持中国的民族愿望，美国反对日本，不仅符合美国理想，也符合美国人民的利益。塔夫脱被罗斯福触怒，不仅因为罗斯福甘心容忍日本帝国主义，还由于他甘心放弃“我们对中国的历史性政策”。于是，诺克斯为美国在华有限的利益，以及东亚力量均势在理论上的重要性，增加一项与美国人切身有关的新内容，即：保留“我们对中国的历史性政策”。反对的意见认为，这种政策已经过时，当时制定这项政策所要达到的目标本来就无足轻重，但诺克斯对这些意见听不进去，对他来说，继续保留这项政策只能是为保留而保留。在放弃“门户开放”政策和继续为之战斗之间，诺克斯及其拥护者继续探索其他可供选择的方案。

有一个可能性塔夫脱政府并未认真考虑，即与日本合作以让日本逐步放弃帝国主义立场，达到改善美国人的投资机会和使中国实现维新的目的。但是，日本的实力以及欧洲对日本实力的承认使美国没有其他选择。假如美国人希望增加他们在中国的经济利益，假如他们希望帮助中国维新并阻止日本对中国的掠夺，就只有通过与日本合作的途径。同时美国要参与对中国的经济开发只有挤入国际银行团，与欧洲帝国主义国家合作才有可能。但是，从1911年5月开始的这种合作不可能是针对日本的。大约在国际银行团接纳美国一年以后，日本和俄国也被吸收进来。不论美国人想以何种方式改善日本

帝国主义（也包含欧洲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影响，都只能通过和各帝国主义国家并肩合作才能实现。但是，这样做有危险，使美国不但不能改造帝国主义各国，而是更有效地加入了掠夺者的同盟。对为从外国控制下解放中国而斗争的中国人来说，列强各国似乎已经形成了一个联合阵线。在 1911 年和 1912 年，当中国人民奋起挣脱清王朝和外国的双重统治时，他们发现塔夫脱政府迟迟不肯承认新生的共和国，直到国际银行团的伙伴准备行动时美国才予承认。那时，美国对其他列强的攻势已告结束。

尽管塔夫脱政府的东亚外交政策更富进取性，但是如果认为塔夫脱及其助手比前几届政府把美国在华利益看得更重要，将是一种误解。美国政策的新方针不是基于对美国在华利益的重要性有新的估计，而是基于未能认识美国的实力是有限度的——在于未能认识到在国家的海外需要中应区别轻重缓急。塔夫脱要求行使美国在华“权利”，并非因为这些“权利”本身很重要，而是因为美国拥有这些权利。同样，诺克斯坚持要求列强尊重中国的主权，也不是由于这样做对美国有什么价值，而是因为中国有此权利。塔夫脱政府过分相信美元和想像中的道义优越地位相结合所能产生的威力，因此，不能很快认识到，当另一大国为追求本身生死攸关的利益（不论正确还是错误）而无视美国理论上的权利和并不重要的利益时，必须谨慎地迈步。对权力的现实性是通过经验来认识的，罗斯福未能把这种认识灌输给他的继承人。很不幸，也不能把这些教训传给塔夫脱以后的民主党人。一种能得到多数美国人认可的，和日本势力共处的方案尚有待实现。

#### （五）

给罗斯福留下深刻印象的中国的觉醒在 1905 年以后加快继续发展。在中国崛起的新势力同时从几个渠道并进，每股势力都为实现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在其边界内行使主权而努力。清王朝为大势所趋，坚决地朝制宪政府迈进，作为维持其天命的唯一希望。但是朝廷动作太慢，连康有为等人也难以满意。康有为是个流亡的儒家改良主义者，他的追求仅限于成立一个君主立宪政府。不过康有为及其追随者已不在斗争的前列。在孙中山领导下，掀起一个革命运动，坚决驱逐清廷，建立共和政府，并实行土地改革。这些动乱势力和“恢复主权”运动汇合在一起进一步削弱了摇摇欲坠的清朝政权。

孙中山和他的友人进行了一系列旨在发动革命的努力，但是都失败了，包括 1911 年 4 月轰动一时的广州起义的失败。约在同时，国际银行团各国，包括美国在内，压中国政府接受修筑粤汉铁路的贷款，使“恢复主权”运动受到意外的挫折。由于民族主义的和财政的原因，作为中国关心铁路财政的中心四川省发生广泛的动乱。在 10 月份，四川的绥靖工作正在进行中，武昌爆发了武装起义。这次起义从中国的南方扩散开来，仅几个月内，清朝的一代统治便告结束。

在革命初期，朝廷召回袁世凯，命他统离效忠于清朝的部队。度过差不多 3 年不甘心的引退之后，袁世凯利用新时机重整旗鼓建立和巩固自己的势力。他利用由他创建的、现代化的北洋军打败了武汉周围的反动势力，然后停火，让叛军去摧毁中国南方的清朝驻军。在中国北方建立了自己的首脑地位之后，袁世凯派唐绍仪去南方和伍廷芳代表的起义领袖谈判。迅速达成建立共和政府的协议；要求清朝皇帝退位；孙中山急速由美国回国，被选为中国的临时大总统。

虽然革命已明显取得胜利，它公认的领袖已当选总统，但事实上真正的

权力还在袁世凯手中。没有袁的支持，中华民国的前途是暗淡的。孙中山充分认识到政权的现实状况，在清朝正式退位后3天便辞去了总统职务，让袁世凯即位。唐绍仪出任总理，几位孙中山的主要拥护者同意入阁，虽然最重要的国防部和内政部均由袁的两个亲信把持。另一个不祥之兆是，袁世凯没有履行协议把政府迁往距革命领导力量的中心较近的南京。在袁世凯就职后几周内，就出现第一次宪法危机，袁和他长期共事的朋友唐绍仪，在处理财政问题上发生了冲突。袁不顾总理所作的努力，随意和国际银行团达成互相抵触的安排。由于袁继续推翻总理及其内阁作出的各项决定，内阁于1912年6月总辞职。中国建立民主政府的最初试验面临着失败。

1912年秋天，当袁世凯继续和国际银行团进行谈判时，孙中山的革命党改组为一个议会政党——国民党。虽然孙仍然是名义上的党的领袖，他对议会政治不感兴趣，他接受袁世凯任命负责开发铁路的工作。国民党的实际领导人是宋教仁，他领导该党在1912年到1913年的国民选举中取得压倒优势的胜利。袁世凯不能容忍宋教仁的领导和国民党的显著实力，1913年3月，袁世凯策划将宋教仁暗杀。也在同年3月，伍德罗·威尔逊（W. Wilson）就任美国总统。

#### （六）

在威尔逊任总统的第一年，他在掌握美国对华政策上不像罗斯福那么注重强权政治，也比塔夫脱较少考虑到华尔街。他从教会方面了解到中国正向现代化迈进，他决定向中国提供美国无私的援助。他了解欧洲和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扮演的角色，如果他不能改造那些帝国主义的话，他可以便美国同他们的政策划清界限。

威尔逊政府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由美国参加六国银行团的成员提出来的：新政府是否愿让美国银行团继续参加六国银行团？如果政府愿意并保证给予支持的话，美国银行家准备继续其业务。否则在其他地方正出现更有价值的投资机会。在对这个问题作决定时，威尔逊既不和国务院的官员商量，也不征求国际银行团其他成员国的意见。威尔逊和他的国务卿布赖恩（W. J. Bryan）不信任崇尚黷武政治的罗斯福政府和金元外交的塔夫脱政府留下来的官僚。威尔逊等对帝国主义者持敌视态度，不愿接受那些仍专心致志于旧世界的旧政策的人提出的建议。他们认为，向一个更好的世界前进，是不能靠帝国主义和贪婪的才智的。他们甚至认为天真或无知都能提供更好的希望——于是威尔逊和布赖恩使他们的政策罩上了天真和无知的外衣，甚至也没有和中国人商量就这样起步前进了。

布赖恩无需任何人指点便知道，卷入垄断活动的银行家们会使中国受损害。布赖恩以毕生精力抨击“利润”，他是懂得这些的。威尔逊内阁的其他成员认为面对中国的新路线，需要制定新政策。他们反对给中国的援助要以向列强各国的金融家承担义务为条件。商业部长表示担心美国退出国际银行团可能危及对华贸易，但是，别人似乎都不关心经济问题；威尔逊内阁中也无人考虑，美国退出会在美国和国际银行团其他成员国的关系上，以及美国在东亚的地位上造成什么影响。据说威尔逊“确信我们不能要求银行家托拉斯集团贷款，我们必须以其他更好的办法帮助中国”（11）。威尔逊事先不通知列强各国，甚至也不通知国务院的有关官员就通知新闻界，美国政府已不再支持参加国际银行团的美国银行团。

威尔逊后来解释说，他感到：“帮助中国的愿望如此强烈，所以我宁可

为援助这个国家犯方针上的错误。”“如果继续留在国际银行团，美国除在中国扩充势力外，别无所获，而且会丧失海·约翰国务卿在义和团暴乱后提出‘门户开放’政策时美国所保持的值得自豪的地位。”（12）虽然威尔逊把海约翰1900年当时的目的解释错了，他自己的政府却因清除了和华尔街的联系而显示出他的利他主义倾向。现在美国立足于更高的道德基础上，可以责备帝国主义分子了。至于在中国，新的秩序即将建立。

助理国务卿亨廷顿·威尔逊在愤怒的抗议中辞职，他既反对伍德罗·威尔逊总统退出国际银行团的决定，也不同意威尔逊以满不在乎的骑士风度做出和发表这一决定的做法。日本政府以类似理由提出抗议，但是威尔逊总统并不怀疑他的路线在根本上是明智的，也是正义的。威尔逊得到袁世凯的赞许。但是，袁世凯如指望威尔逊的决定会给他带来比较慷慨的美国贷款，在他有生之年是等不到了。另一方面，他若以美国承认他的政权为满足的话，不久即将实现。

在作出关于国际银行团的决定后一星期，威尔逊通知内阁，他已决定承认中华民国。有人建议美国应像塔夫脱政府时期一样，和列强各国一致行动，但威尔逊愿领先在单边基础上承认中华民国。他把美国意图通知各国使节，向他们提供一个和美国合作的机会，但是却拒绝受各国政府决定的约束。威尔逊的内阁为他崇高的道德宗旨而振奋，但是列强各国尤其是日本不以为然。日本政府试图使威尔逊注意到以下事实：中华民国正处于内战的边缘，袁世凯篡夺政权，孙中山及国民党正对袁世凯自命为总统展开声讨并准备进行战斗。此刻承认中国政府“实际上等于做了有利于袁先生的事”（13）当内阁讨论此建议时，有人提出“一个杰出的中国佬”宋教仁，刚被暗杀，而袁大总统与此案有牵连。但是威尔逊对这些不同的意见并未认真考虑。新共和国的议会将召开第一次会议。威尔逊以承认共和国作为对中国这一实验的良好祝愿，这与威尔逊因反对墨西哥的胡尔塔（Huerta）政权而对它采取“观望等待”的策略是十分明显的对照。一个月后，中国爆发了内战，国民党由于无法以议会手段制约袁世凯被迫走上战场。

尽管威尔逊对中国采取友好亲善的政策，但中国在现代化的进程上成效不大。问题不在于美国的政策，虽然有些美国人夸大其作用，但是它对中国的发展方向不可能有很大的影响。问题出自中国内部的动乱，虽然发生了革命，但中国传统的社会并没有剧烈的改变。共和国的创立未能激起中国群众的民族主义观念。更糟的是，大部分有领导才能的人更热衷于满足个人的政治野心，而不是领导中国人进入新时代。袁世凯首先蔑视议会，然后宣布国民党非法，并把它排斥在议会之外。1914年1月，袁索性解散议会，在其后的两年里，他主要为复辟当皇帝准备条件。袁世凯从国际银行团（当时美国银行团已退出）获得一笔贷款，得以粉碎1913年国民党领导的一次叛乱，但是他却无法压制在他自己军队中萌发的政治欲望。袁世凯的副官们利用一切机会扩大自己的权力作为协助他镇压反对帝制的在野党的代价。1915年到1916年的冬天，在袁世凯就要成为洪宪皇帝的前几个月，各省的军人相继宣告独立，孙中山加强了讨袁的宣传鼓动工作，袁世凯的部下逼他放弃做皇帝的美梦并交出大部分权力。6月份袁世凯逝世，最后一个有名无实的全国政府也和他一起告终。军阀时代开始了。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地方主义再次获得胜利。

中国所以不能更迅速地成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因

素，中国除需要有开明进步的领导外，还需要有资本，而资本必须来自海外。威尔逊决定不支持美国参加国际银行团之后，欧洲各国都随即于1914年卷入战争，只剩下日本作为中国取得经济援助的主要来源。而日本人和美国人不同，他们不相信一个强大的现代中国符合他们的利益。日本人每一次向中国投入资本都着眼于扩大和加强它在亚洲大陆上的帝国地位。尽管可以对银行团中的华尔街金融家不抱好感，但是他们参与国际银行团尤其在1914年以后，可能会对日本人远富于掠夺性的企图起到限制作用。作为威尔逊反对帝国主义撤出了美国银行团本出于善意，却留下一个最危险的帝国主义不受约束地控制着中国极为需要的经济援助，造成对中国的损害。在这一点上，日本人很快就用行动让威尔逊明白。威尔逊从现实经验中获得了教训，倒也值得称道。

#### (七)

当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后，日本人根据英日联盟的协定，迅速地蚕食了德国在东亚的权益，包括山东的德国特权在内。日本在山东扩充自己的势力，它对山东的控制程度事实上超过了德国人以前所干的。中国人不反对德国人离开，但是，他们不会对中国北方出现了更多的日本军队而高兴。但日本对所得的权益并不满足。几个月后，在1915年1月，日本驻华公使向袁世凯提出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二十一条共分成五号。日本要求中国确认它在山东取得的利益。和在“满洲”侵犯中国主权的既成事实，并使之合法化。它还要求在“满洲”和华中获得新的特权。另外，要中国承诺，不允许任何大国占领或租借中国沿海的港口、海湾或岛屿。在二十一条第五号中，日本人要求，任何外国资本进入福建必须事先征求日本的意见，它还要求获得额外筑路权，要求中国至少一半军火必须从日本购买。更危及中国主权的条款是，要求中国接受日本“顾问”参与中国的政治、军事和经济事务，并共同负责全国各主要地区的公安警务工作。日本人很清楚地看到，欧洲的大战使它在亚洲有隙可乘，所以它要求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一时机。

在日本人的压力下，中国势孤力单，它不可能指望得到欧洲列强的支援，再次转向美国，希望利用美国牵制日本。在日本人占有德国人在山东的特权之前，中国曾试图让美国从德国人手中取得胶州的租界权，以归还中国。当日本人制定二十一条时，曾警告中国要保守秘密，但中国再次把必要的情况泄露给同情中国的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P. Reinsch)。在这件事了结前，中国也许是第一次(但绝非最后一次)得到愿为中国效劳的美国传教士的帮助。美国传教士致电华盛顿，请求美国政府出席中日两国的谈判以为中国人主持公道。拍发电报及随后由美联社以新闻报道形式予以发表的一切费用由中国政府承担。

美国对中国的困境最初作出的反应可能会使罗斯福高兴。当芮恩施转达了中国请求在山东问题上给予援助的信息后，当时任国务院顾问的兰辛(R. Lansing)要求向中国人保证“美国人的友谊是真诚的”，美国将尽力而为，通过和平方式帮助中国。“但是”，他接着说：“国务院意识到如果为了中国的领土完整而使美国在国际上陷入窘境，那将是极端唐·吉珂德式的蠢行(14)”。不久以后，兰辛建议作一个罗斯福式的交易，美国将默认日本帝国主义在山东和“满洲”的存在，交换条件是，日本停止抱怨美国的土地使用权立法，并以“满洲”代替美国作为适合日本移民的目的地。在兰辛看来，美国在华利益只限于商业上的，只要日本保证给美国货物平等待遇，

就满足了“门户开放”政策的要求。但是，国务院其他官员对美国在东亚的利益提出更广泛的概念。

有些人相信，中国一旦现代化，关于中国市场的神话就将变为现实。远东司司长威廉斯（E.E.Williams）就是其中的一个。他争辩说，尽管美国在日本现有的商业利益比在中国的商业利益大，但是，要制定一项有远见的政策，必须以这一假设为基础——一个强大独立的美国最符合美国的利益。他要求美国敦促日本缓和对中国压力，同时，扩大美国的援助，以帮助中国建立一个内部秩序井然，对外有能力保卫自己免遭威胁的现代国家。他像柔克义一样，坚持认为一个强大的中国是美国的强大屏障。威廉斯坚持自己的看法，认为一个富于进取性的新中国的亚洲政策可以使美国的理想和中国人民的利益都得到满足。1915年，与其说是兰辛，不如说是威廉斯提出的方针最合威尔逊的心意。

当芮恩施把日本人的要求报告给美国政府时，威尔逊正忙于处理由欧战引起的种种问题，特别是德国的潜水艇技术造成的问题。由于美国在亚洲的利益并不重要，所以亚洲事件不能和他所专注的大西洋战争中的重大问题竞争。芮恩施与其说是美国驻华公使，不如说他的行动更像是中国的律师，在他的一再催促下，布赖恩颁布了威尔逊政府最初的政策声明。虽然布赖恩重申美国对中国的领土完整和贸易利益均沾的原则表示关切，但是，他似乎承认了日本对山东、“满洲”和蒙古所提要求的合法性，他声称是地理上的邻近造成日本和那些地区的“特殊关系”。中国人希望美国能进一步阻止日本，但布赖恩表示美国无意在中日关于二十一条的谈判中采取立场。

无论是中国人还是芮恩施都没有放弃由美国进行干预的希望，芮恩施向国务院反映，日本人正在把美国的漠不关心态度作为大棒压中国人屈服。他们认为，美国已抛弃了中国，芮恩施的一些电报和对日本提出二十一条性质的分析，特别是涉及第五号的情报，迫使威尔逊亲自掌握美国的外交。在四月中旬，威尔逊通知布赖恩，他希望“在情况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采取积极主动，以显示我们是中国主权的维护者”（15）。威尔逊表面上没有明指布赖恩已向日本作出的让步，但他警告说，美国不打算放弃它在中国的任何权益，也不要求中国人接受别人侵犯它的主权。

美国外交政策的前后矛盾使日本人感到混淆不清，不过他们知道，现在日本正面临美国的反对。此外，当举世得知二十一条第五号的内容以后，连日本的盟友，大不列颠也提出了抗议。但日本人了解，欧洲仍不可能积极地出来反对，而美国人在中国的利益有限。当日本加紧对中国的控制时，美国除表示不悦外，不大可能有更大的动作。二十一条的第五号暂时搁置。但日本向中国发出最后通牒，以武力要挟中国马上接受二十一条的其他条款。中国人外援无望，便于收到通牒的第二天作出让步。布赖恩就此发表声明说，美国将不承认任何侵犯美国条约利益、中国主权、并损害“门户开放”政策的协定。这个声明对中国毫无帮助，只起到刺激日本人的作用。它是美国是“中国主权的维护者”的神话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个神话以越来越执拗的势头发展着。

在中日就二十一条进行谈判期间及其后，美国政府又开始采取另外一种做法，后来成为威尔逊在中国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一个工具。威尔逊虽已拒绝支持美国银行团参加国际银行团，认为它参与垄断活动不利于中国，但他表示愿支持美国投资者的愿望，相信他们的活动能对中国的发展产生更良好

的作用。威尔逊仍不愿让美国在中国人一旦拖欠贷款时充当收款人的角色。但是，可能投资的人将得到保证，政府将支持他们的权益，不让任何国家企图垄断对中国的贷款。最初，威尔逊只不过是关心如何扩大美国的经济利益，他像前任和后来的历届总统一样，欣然承担这一职责。他逐渐想利用经济手段即美国金融家的投资作为牵制日本帝国主义的方法。到 1916 年，有两家美国银行在芮恩施和威尔逊的支持下贷款给中国。威尔逊清楚地看到，在世界大战期间，只有日本和美国有能力为中国的发展提供必需的财政援助。在没有美国与之竞争的情况下，日本实际上已经不受任何牵制地树立了控制中国财政的霸权。日本人可以支配贷款的条件，勒索一个又一个特权，不断地蚕食中国的主权。

当美国介入欧洲大战后，芮恩施要中国人和美国协同对德国作战，从而可以直接得到美国政府的援助。由于不能充分调动私人投资者的兴趣，他要求政府给中国必要的贷款。但威尔逊并不准备让政府充当他认为本应由私人投资者扮演的角色。不过芮恩施还是使他认识到以经济手段保全中国的独立是必要的。威尔逊放下架子找到参加过国际银行团的美国银行家，要求他们帮助，并答应他们的条件，准备公开宣布，在政府倡议下，将建立新的国际银行团，并发放新的贷款。他进一步同意，如果中国拖欠贷款不还，美国政府将帮助银行家们讨债。不论在旁观者看来是好还是坏，这就是“金元外交”——用美国资本为美国在东亚的外交目的服务。

芮恩施并不喜欢建立新的国际银行团，担心会破日本人把持，但威尔逊认为别无他法。鉴于日本人已取得一定程度的霸权，在表面上与日本人合作对美国参与中国的发展是必要的，同时，美国的参与被视为保全中国主权不可缺少的因素。日本人只有在合作经营的格局内才同意美国资本流入中国，按芮恩施的理解，因日本人意欲操纵。日本人希望把美国人拖进他们为中国人设计的体系，而威尔逊则想把日本人拖进他为中国人设计的体系。在凡尔赛，威尔逊作进一步努力想使列强各国附和对他对中国前途的看法，这个看法是建立在列强间合作，和列强与中国间保持互利的伙伴关系的基础上的。

威尔逊的努力与芮恩施在北京的活动相结合，美国对二十一条表示不满后所发动的明显经济攻势，以及介入欧战确保美国在和平会议上取得一席之地，这些都引起了日本政府的忧虑。1917 年夏，由石井菊次郎率领的日本代表团前往美国去摸底，想要知道威尔逊的目的，以及美国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接受日本的观点，即日本在中国有权处于特殊地位。石井和国务卿兰辛的会谈说明在他们之间很少有共同意见。不过，两位外交官交换了备忘录，在含糊其辞的外交辞令中，掩盖着两国间的分歧。在备忘录中，兰辛承认由于日本的地理位置，允许它在中国有“特殊利益”，但是在和石井会谈中，他明确地否认“特殊”一词包含有“超乎一切”的意思。在另外一份直到 30 年代才公开的秘密议定书里，日本和美国一起保证不利用大战之机在中国谋求有损于友好国家现有权益的特权。对威尔逊来说，此协议是同时代表中国和美国利益的一大成就，但是，它并没有使中国人安心。相反，日本人通过一次成功的瓦解中国人士气的努力，使许多中国领导人相信兰辛-石井协定事实上是美国默认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存在的证据——承认日本的“特殊利益”就意味着允许日本在中国具有“超乎一切的利益”。

关于北京这种失望情绪，芮恩施于 1919 年 3 月通报说：“在中国高级官员中出现了一种看穿美国虚伪态度的强烈倾向”。但是他注意到在人民群



众中，对一切美国事物都满怀热情，对美国赢得战争中的功绩有评价极高的倾向，而且，对威尔逊发表支持国家自主权的声明感到鼓舞。同时，也有一种意见，认为美国的行动与其冠冕堂皇的辞令不尽相符。芮恩施认为：中国人并不相信，美国会认为中国的重要性值得“以武力强制实行”“门户开放”政策。中国官吏得出结论：“美国的许诺多于兑现”。于是，芮恩施及其中国朋友对威尔逊凡尔赛的行动翘首以待。

在巴黎和会上，由于威尔逊想使中国摆脱主权上的束缚，美中两国的代表团在会上密切合作。虽然中国梦寐以求的是彻底抹去其半殖民地地位的一切标记，但是他们特别关心收回德国以前在山东的势力范围的主权。中国正是为了这些目的才与各战胜国结盟，于是提出要求恢复中国对山东的全部主权作为最起码的要求。但是日本已和它的欧洲盟友签订了秘密条约，他们有义务支持日本获得已被它占有的德国特权。另外，中国在1915年接受了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在该条约中议定，处理德国权益应遵从德日双方的协定。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希望以及威尔逊代表中国所进行的努力双双落空。当日本以宁肯退出巴黎和会也不让步相要挟时，威尔逊接受了日本的立场。

威尔逊决定在山东问题上向日本让步，成为他在巴黎所作的决定中最受谴责的一个。不仅是中国人，甚至美国代表团中的部分重要成员，包括兰辛国务卿在内都感到愤慨。在中国，学生们处于持续的激愤之中，由此开始了被称为“五四运动”的活动。在美国，反对山东决定使一些有影响的自由主义者站到洛奇（H.C.Lodge）一边反对凡尔赛和约。但是，对威尔逊来说，他没有其他的选择。国际联盟似乎是向提供世界生活在和平环境中，取得有秩序的进步的唯—希望。假如没有日本或其他列强参加，这个联盟只不过是一个残缺的组织。假如条约中含有不公正成分（威尔逊认为是这样），联盟会加以修正。特别对中国来说，未来的唯—希望是把自己的问题国际化，以免和日本或其他掠夺成性的大国直接遭遇。在国际联盟的范围内，中国和列强的冲突可以通过和平、公正的方式得到解决。按威尔逊的想法，中国的利益以及美国在东亚的权益都需要日本参加到这一新的国际组织中来，以使日本脱离帝国主义，加入可为人接受的和平竞争。这样对中国和其他列强都有利。所以威尔逊在较小的问题上作出让步以免日本退出巴黎和会。美国后来未能加入国际联盟，推迟了威尔逊为之努力的大国在中国的合作，但1922年在华盛顿会议上签订了九国公约，成为向威尔逊的目标迈进的重要步骤。

#### （八）

要求针对在东亚崛起的日本霸权调整美国政策的前三位美国总统都对中国的民族主义者的愿望持同情态度，但他们对美国如何在东亚发挥作用观点并不一致。罗斯福最敏锐地考虑到美国的实力是有限的，同时，他对美国在华利益（现在的，和将来的）的重要性作了最低的估计。加上他当时面临的美国排斥日侨的争端，他的有限实力和有限利益观念导致对日本采取姑息政策。罗斯福虽然并未放弃美国在华的经济利益，但他绝不支持中国抵制日本。

塔夫脱政府推出更富进取性的东亚政策，希望扩大美国在华经济利益，特别是在“满洲”的利益。他认定中美两国利益是一致的。塔夫脱相信，中国也倾向于同意，扩大美国在“满洲”的权益将有利于中国。但是，塔夫脱和诺克斯很快发现，日本人已十分牢固地盘踞在“满洲”，而且得到自第一次大战前夕发展起来的结盟组织的有力保护。这一切证明，美国只有与日本合作才能扩大它的权益。于是，在塔夫脱任期的最后几个月，由他的政府发

起的美国投资集团加入了六国银行团，成为日本的伙伴。

伍德罗·威尔逊的民主党政府反对美国加入国际银行团，也反对美国和在华的帝国主义者合作。在全力为美国利益服务方面，威尔逊并不比他的前任差。但是，他认为美国人民还有一个更大的使命，就是帮助中国人民实现独立和现代化的愿望。威尔逊逐渐认识到光有“正义”是不能取胜的，而美国有限的权益及实力使美国不能单枪匹马地支持中国抵制日本。他寻求建立一个国际组织，既能为中国，也能为全世界效力，这是美国单独做不到的。威尔逊在东亚的失败不过是更大的悲剧——美国未能参加国际联盟的一部分。

#### 原书注释

Roosevelt 致 S.Rice (1904 年 3 月 19 日) “Letters” , (260)

Roosevelt 致 T.C.Friedlander (1905 年 11 月 23 日) “Letters” , (90—91)。

Roosevelt 致 J.P.Morgan (1905 年 7 月 18 日) “Letters” , (12781279)。

T.Roosevelt , State Papers as Governor and President (1899—1909) , 纽约 1925 年版, 第 376—377 页。

Roosevelt 致 E.Root (1907 年 9 月 26 日) “Letters” , 第 809 页。

引自 The Awakening of China , Outlook , XC (1908) , 第 665—667 页。

Robert Irick 著 The Chinchow-Aigun Railroad and the Knox Neutralization Plan in Ching Diplomacy , Harvard Paper on China , X 第 89 页。

“Foreign Relations” , 1909 年第 178 页。

Roosevelt 致 Taft (1910 年 12 月 22 日) “Letters” 第 190 页。

引自 Henry F.Pringle 著 Life and Times of William Howard Taft (二卷集) , Hamden , Archon Books , 1964 (再版) , 第 685—686 页。

(11) 引 E.David Cronon 编 Cabinet Diaries of Josephus Daniels , 1913—1921 , Lincoln , Nebraska 大学出版社, 1963 版, 第 8 页。

(12) 同前书, 第 17 页。

(13) “Foreign Relations” , 1913 , 第 109 页。

(14) “Foreign Relations” 1914 Supplement 第 189—190 页。

(15) Wilson 致 Bryan (1915 年 4 月 14 日) , 引自 Arthur Link 著 Wilson . Princeton , Princeton 大学出版社 1960 , , (294)。

(16) “Foreign Relations” 1919 , (282)。

## 第四章 对中国民族主义的反应

### (一)

在袁世凯的势力崩溃以后的最初几年里，军界人物连续占据着中国的主要舞台。他们为窃取中国的最高权力，各自在寻求必要的联盟。当一部分军阀争夺对北京政府的控制权时，另一部分人则为控制在广州的反对派政府和孙中山展开争夺。同时，在南北军阀之间为夺取全中国的控制权，时常发生战争。日本人则乘混乱之机巩固了他们的地位，加强了对已被承认的北京政府的掌握。

早在1917年1月，芮恩施就报告说，在中国，反对政府屈从于日本的不满情绪正在增长。他提醒兰辛，中国很可能再次爆发革命，并可能出现一个旨在摆脱反动的清朝官吏和保皇派，各方面参加的新中国运动。1918年的偶发事件验证了芮恩施的预言，当时以归国留学生为先导，学生们开始组织起来反对日本对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这一学生运动力图发动公众舆论来反对日本的控制。中国知识分子目睹中国因内乱和分裂而不能动员起来全力抵抗外来压迫，日益感到焦虑。不满和失望情绪在增长，在各大学尤为突出。此时，山东问题具有重大的象征意义。恢复山东主权被视为对政府抗日决心的一个考验，它也考验着中国有无决心抵挡大有淹没全国之势的帝国主义浪潮。当威尔逊和其他战胜国的领导人在巴黎开会决定新世界的模式之际，中国人烦躁不安地等待着。

1919年4月间，北京一直谣传日本人对中国参加巴黎和会的代表进行了干扰。很快，许多抗日团体组织起来，并计划举行示威游行以动员全国，此时传来了巴黎和会已决定把山东交给日本的消息。从北京五月四日的示威游行开始，全中国成千上万的学生走上街头，采取了暴力行动反对政府中有亲日嫌疑的人员，并有效地发起抵制日货运动。当运动激烈地展开后，芮恩施报告说：“人民的激愤有如一场风暴席卷全国，自从外国和中国有交往以来，这是前所未有的。”他形容“公众舆论已发动起来，活跃而有明确目标”，是“中国政治生活中的新发展”。在把中国的“一盘散沙”凝聚成强大的民族力量的过程中，中国学生已成为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芮恩施辞了职，参加了中国人民的抗议。此时在湖南，年轻的毛泽东在他有记载的第一次对美国的批评中，对威尔逊的失败进行了抨击。

在中国的外国人社会，面对这一有效的群众运动，面对广泛的爱国主义及公众的觉悟程度，不禁目瞪口呆。许多美国人，包括商人、海军军官和访华的哲学家杜威（Dewey）对中国的觉醒都表现出很大的热情。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次表现出彻底改造中国文明的愿望。他们开始认识到，中国要现代化，就必须摧毁传统的社会。他们所要求的社会和文化的变革正与美国长期以来的想法一致，只有通过“文明化”、西方化和现代化方能实现这些变革。这次政治上的排外活动以抵制日货为中心，因而加强了美国人的一种设想，认为中国的民族主义总是针对日本和欧洲帝国主义的，永远不会针对美国。美国人没有意识到美国在中国的卷入是帝国主义体系的一部分，还认为中国人对美国的看法和美国人自己的看法一样，即“美国是中国主权的维护者”，所以对中国的民族主义表现感到高兴。另外，学生们正致力于结束在袁世凯死后使中国陷入混乱的内江，以恢复法律和秩序，美国人认为这两者对中国

的进步是不可缺少的。如果这个由学生发起的运动得以成功，全世界就可望看到一个统一的现代化的中国，它有能力和自己的领土和主权完整，而且对美国友好。总之，美国人期望中国强大独立，以实现美国商人、传教士和外交人士的夙愿。因此，美国人对“五四运动”满怀热情。

虽然许多美国人对中国的民族主义深表同情，但是对中国的关心本身还是微小的。1919年到1920年间，当中国学生最活跃的时候，大多数美国人正回过头来关注着战前遗留的国内问题。那些关心海外事务的人则陷入批准凡尔赛条约而进行的斗争。在美国政府内部，在参议院中的论战，为保全国际联盟所进行的不顾一切的努力，耗费了伍德罗·威尔逊的日趋衰退的全部精力，在国际关系方面，再没有其他问题能与威尔逊失败的悲剧相比。但是必须记住，即使是在山东问题上的妥协（它造成威尔逊的失败），也只是作为违背民族自决原则被提出来，而不认为是对中国的出卖。于是，中国第一次成为美国政治中的一个重要争论问题——并非出于对中国的关心，而是单纯为了捍卫一个抽象的原则。

新的哈定（Harding）政府很快解决了美国批准凡尔赛条约的问题，并加入了国际联盟，但是它也面临人民的要求——要求美国跨开大步领导世界走向持久的和平。哈丁及其有才干的国务卿休斯（Hughes）也不能摆脱在紧张的日美关系中所蕴藏的危险，这是威尔逊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所留下的遗产。哈丁政府面对国内要求削减军备的强大压力，而日本海军的建设看来又要求美国制定巨大的造船计划为美国的安全提供保证，休斯领会到，解除他的困境的唯一办法就是和日本达成一项协议，结束这场刚开始的海军竞赛。休斯也相当敏锐地看到，军事竞赛不是孤立的，它和许多问题都有关系，特别是英日联盟问题。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问题以及东亚力量均势等问题。因此，他接受英国建议召开一个由美国作为发起人的会议。与会国将包括所有在西太平洋地区有利益的国家，也包括中国，但苏联除外。于是1921年和1922年间召开了华盛顿会议。这次会议并非出于响应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而是响应美国的要求——不必进行耗资巨大的军备竞赛而在国联之外获得安全保证。

## （二）

1921年间，内战继续在中国大部分地区进行。孙中山此刻时来运转，在民族主义的新高涨中，他再次计划以武力统一中国。7月份，中国共产党在苏联代表的帮助下正式成立。苏联人也和孙中山及南北两方面的潜在势力举行过会谈。当国民党与共产党正进行私下会晤，各系军阀互相厮杀之际，世界其他地方则试图通过北京政权和中国联系。北洋政府受到方兴未艾的民族主义风暴的冲击也致力于摆脱所谓“不平等条约”的枷锁——条约制度造成的对中国主权的侵犯。于是在1921年底，当中国被邀请参加华盛顿会议，各个派系都认为这是扭转凡尔赛败局的一个机会。

中国人民对这项邀请的最初反应非常热心和乐观。从报界的反映可以看出，中国人对摆脱外国在华势力范围和治外法权，以及关税不自主的状况突然间萌发出希望。关注此事的公众认为，这次会议将在世人面前指控日本帝国主义，日本将处于守势。但在会议前夕，有头脑的中国人被一种悲观情绪所笼罩，他们意识到，国家的分裂、混乱和国库的匮乏将迫使中国代表处于软弱的谈判地位。孙中山的广州政权拒绝参加联合代表团，当他要求单独派代表参加会议被拒绝后，便声明对会议作出的决定将不予承认。华盛顿会议

结果如何难以预测，令人忧心忡忡，所以一些非政治性组织也派出观察员列席会议。但会议的预兆不佳。

就美国看来，华盛顿会议\*是一个巨大的成功。英日同盟解除了，代之以美、法、英、日四国互不侵犯公约，但是各缔约国所承担的义务只不过是遇到困难时，彼此进行磋商。远使美国人民更满意的是五国条约（除原来的四国外，再加上意大利）。条约对缔约国各自的海军规模规定了限制，从而控制了军备竞赛。

通过四国公约和五国条约实现了列强各国之间的均势，于是会议便转向中国问题——关于大国在西太平洋的竞争，以及中国人的愿望。此刻美国国内的情绪对中国有利，同时，美中两国代表团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在会议开幕前夕，哈丁派往中国的公使舒尔曼（J.G.Schurman）致电休斯，热情地报道了自从他 1899 年访华以后在中国出现的爱国主义觉悟，并声称，中国人应享有关税自主，而且应撤销外国设在中国的邮政局。舒尔曼对中国达到政治上统一的前景感到悲观，并预测暴力行动还将激化。尽管如此，他还是劝列强各国耐心地旁观，“唯有中国人能解决中国的问题，他们将以中国方式来解决它。”

在华盛顿与会的美国人、英国人和日本人所关心的既不是中国的发展，也不是对中国的保护，而是主要关心如何在这个国家进行稳定的竞争。中国，正如土耳其一样，被视为在列强中引起摩擦和冲突的潜在根源。中国的软弱对冒险主义者具有诱惑性。大不列颠首先提出一项建议，旨在使其他各国接受它的公平解决问题的概念。罗脱代表美国发表原则声明，他把“门户开放”的含义扩大解释为除保持各国经济上的机会均等外，还包括保持中国的领土完整，企图以此绑住英国和日本的手脚。日本代表在得知英美两国讨论的内容后，争取会议认可他们在“满洲”和内蒙的“特殊利益”。

美国人坚持贸易和投资机会均等并不使日本人烦恼。他们自信有能力成功地和美国或其他对日本在中国的经济地位提出挑战的国家竞争。而美国坚持要保持中国的领土完整却使他们一直感到不安。但是，罗脱在和日本代表私下谈话时，曾向他们保证，他提出的各项原则将不影响日本已据有的权益，遂使日本人断定，会议拟议中的条约不会牺牲他们的“特殊权益”。英国人则大方地顺从这个明显的日美协定。

最后，在九国公约中，各缔约国同意不干涉中国的内政，让中国人解决自己国内的问题，以他们自己确定的速度和方式来统一全国，实现现代化。这就是美国“门户开放”政策的“国际化”，缔约国各方同意“尊重中国的主权、独立以及领土和行政权的完整”。于是，朝着威尔逊提出的，与日本在东亚共处的解决方案迈出了有希望的一步。假如也把苏联包括在内的话，所有在这个地区有重要利益的国家就都承担了在中国和平竞争而不损害中国权益的义务。

但是，九国公约并没有满足来到华盛顿的中国代表团的希望。假如会议达成的协议（其中并未规定有关实施的条款）能得到尊重，就不会再发生进一步侵犯中国主权的事情。在过去的 80 年里，中国被迫放弃了它主权范围内的大部分权益，这些都未得到恢复和补偿。中国要求自定海关税率，对此，列强只同意将进口税率增加百分之五，其他留待以后再议。关于废除治外法权问题，各国也只表示可以成立一个委员会进行研究。关于从中国领土上撤出外国军队问题，未作任何安排。

尽管休斯不愿由于对日本在“满洲”的地位表示异议而危及太平洋协定，但是，美国确曾帮助中国使英国和日本答应撤出租界地，包括日本在山东的重要租界地。在支持中国反对外国势力范围上，美国本身在中国没有势力范围，所以在理想和切身利益两者之间不存在矛盾。对美国分享的一些帝国主义特权，它就采取比较暧昧的态度。到目前为止，美国还不准备让中国人恢复关税自主；美国在治外法权上的顽固立场也不亚于其他列强。休斯和他的主要顾问马克谟(J.V.A.MacMurray)愿意等中国人治理好他们自己的内部事务后再要求美国人放弃在条约制度下所享受的特权地位。

任何地方的中国人都对这次谈判及其结果感到失望。孙中山在美国的耳目马湘(Masoo 译音)谴责中国代表提出的建议是“陈词滥调和空洞无物的概念”。在谈判过程中，中国代表团的秘书长为抗议代表团其他成员不肯按照他认为合宜的态度考虑中国问题而辞职。代表团中几位身份较低的成员也随之退出。中国的主要代表决定和日本就山东问题举行双边谈判导致国内爆发了抗议游行，美国的华侨也采取了抗议行动。在上海，有二万人示威表示他们对华盛顿事态的发展感到愤怒不满。从中国看来，华盛顿会议服务于帝国主义的目的，为中国做的事则微乎其微。这一观念在莫斯科得到强调，孙中山的国民党及中国共产党的代表都在这里参加一个由共产国际发起的“远东劳工代表大会”。

莫斯科大会总的目的是，在任何有关太平洋地区的协定中维护苏联的权益，并提醒各列强，在东亚也有苏联的利益。大会明确号召反对华盛顿会议，并宣称当征服者们在华盛顿分赃时，本大会要为亚洲被掠夺的人民大众代言。意味深长的是，除对帝国主义进行教条主义的攻击外，有三个人发言(其中包括第三国际的负责人)批评了孙中山的国民党，据说它是亲美的。在托洛茨基称美国为国际帝国主义的堡垒之后，这一指控确实是严重的。但是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反对日本和英国极其明显的侵略行动远比分散精力去开展一场反美运动来得重要。但是，苏联已经警告，它不接受在没有苏联参加的情况下达成的任何协定。在华盛顿会议以后的几年里，越来越多的中国民族主义者放弃了寻求美国支持的希望，而转向了莫斯科。

### (三)

1920年3月，五四运动的激情仍处于高潮，中国收到一份文件，苏联声明放弃沙皇俄国从中国勒索的全部特权。这文件就是“加拉罕宣言”。在宣言中，苏维埃政府大约宣布它准备把中东铁路及森林、矿产等全部特权无偿地归还中国。这一宣言在中国引起巨大反响，中国知识分子不管其政治倾向如何，倾向于认为已看到了新时期的曙光——苏联对帝国主义的猛烈攻击在他们眼前展现出一个新世界。令人遗憾的是，宣言中的主要内容不再是苏联政策的一部分。这份宣言发表于1919年7月，在苏联尚未在内战中得势之前，到了1920年，看来这些共产主义者并不比他们的沙皇前辈更宽宏大量。但是，苏联否认宣言中文副本的真实性(特别是关于中东铁路部分)，中国未事宣扬，鲜为人知，所以实际上没有缓和它对公众的刺激。不过，俄国人还是自动作了一些让步，远比其他列强所做的多。

从1920年到1922年，苏联代理人和中国知识界、政界的主要人物建立起联系。最重要的是，这种情况的发展导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并和孙中山密切了关系。1922年夏，陈炯明的叛变迫使孙中山逃到上海，由于缺乏军事力量的支持，他一度在中国政治中失去影响。在孙到上海后，苏联使节越飞

(Adolf Joffe) 抵达北京，他和孙中山通了几次信后便去上海与孙会谈。

早些时候，孙中山一直面向日本和西方，特别是向美国寻求指导和帮助，但收获极小。在 1911 年革命后的年代里，孙中山在美国政府的心目中身份大落。芮恩施、兰辛和威尔逊对孙中山的才智和他的主义都持怀疑态度。来自中国的报告说明，甚至孙自己的同志也为他的行为、谋划和自高自大而感到难堪。美国公使舒尔曼尽管对中国的民族主义深表同情，起初对孙中山的广州政府印象很好，在他 1922 年的报告中，也提到有头脑的中外人士已不再支持孙中山。舒尔曼个人认为孙“不可能成为一个可靠的政治家”。他估计孙的影响在消失。几个星期后，孙中山被赶出广州，证明舒尔曼的评价是正确的。在华盛顿的人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重视孙中山，因为他反抗已被各国承认的北洋政府，被自己的支持者逐出广州，又被怀疑搞了些非原则的活动。此后，孙中山就转向俄国人寻求他急需的支持。

1923 年 1 月，当孙中山和越飞在上海进行协商时，宣布了按苏联共产党的总路线改组国民党，为国共合作及联合苏联打下了基础。在一份概括了协议内容的联合声明中，孙中山和越飞表明，苏联将给国民党援助，同时接受孙的论断：中国的国情不适合发展共产主义。不久以后，孙中山时运好转，得以重返广州，忠实于他的部队已重新取得对广州的控制。

作为孙中山和俄国人合作的一个项目，1923 年 8 月，一个由蒋介石率领的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共产国际则派鲍罗廷 (M. Borodin) 到广州。当时列宁已病危，蒋介石花了三个月在莫斯科与其他苏联领导人会谈并考察苏联红军的体制。蒋介石回国后出任新创办的黄埔军校校长，这是一所培养国民党军官的学校。鲍罗廷在广州担任孙中山的顾问，并帮助孙把国民党办得更接近苏联共产党的模式。此外，鲍罗廷还创办了一所政治干部学校，为孙中山的追随者提供急需的教育和发动群众。1924 年，苏联通过与北洋政府达成一项协议，放弃某些“不平等条约”赋予的特权，以此讨好中国的民族主义者。

不顾以上形势的发展，以及国共两党为准备新的革命建立群众基础成绩斐然；不顾北伐的准备工作正在明显地进行着——从广州北上以武力统一中国，这是孙中山的伟大理想，美国及其他华盛顿会议签字国仍然反应迟钝地对条约制度的特权——被痛恨的帝国主义的象征——死抱住不放。而且，美国显然没有认识到，孙中山的行动和军阀是有区别的。1923 年秋，孙中山要求分享关税余额，美国军舰和其他列强的舰队联合示威，以挫败孙中山的意图。确实，中国共产党指控美国策划了这次示威。

舒尔曼认识到孙中山的新实力，并提醒柯立芝 (Coolidge) 总统，孙中山可能成为“一个值得重视的力量”，但是他低估了孙和苏联的联系，没有认真看待他的未经证实的布尔什维克倾向。舒尔曼仍然对孙中山持极端的批判态度。他认为孙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而且冷酷无情，他形容孙中山是“前国务卿布赖恩和炽热的纽约东区（贫民区）社会主义者的混合物”。如果说舒尔曼对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前景持怀疑态度，有一位专门研究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外交官却不这么看。驻广州的副领事休斯顿 (J. Huston) 给即将接替舒尔曼职务的马克谟写信说，俄国已改变了对远东的策略，他们不再兜售马克思主义改造工业社会的万灵药，而代之以在中国推行排外主义。他们着手于比较易行的工作，启发“中国普通的民族主义者认识到中国一切苦难都是吸血的帝国主义国家造成的”。美国仍然拒绝对中国提出的修改条约作任何让步。

从 1922 年到 1925 年，舒尔曼在北京，马克谟在华盛顿，主要掌握着美国的对华政策。只要中国还是美国不太重视的地区，只要中国的事态尚不足以把美国的注意力从国内事务和不太远的海外问题上吸引过来，例如墨西哥问题，一位公使和一位助理国务卿便可决定政策。舒尔曼在中国多年，因此，他的看法与马克谟长期来持有的观点比较接近，即对中国让步（特别是废除治外法权），必须等中国恢复秩序后再说。舒尔曼虽然“绝对地反对”外国干预，他却要美国坚持在中国的条约权利。他知道中国越来越不甘心承认这些“权利”，但是他不曾想到这样一种局面：中国拒绝履行其条约义务将迫使美国在进行干预和放弃在中国的权利两者之间作出选择。在 1924 年，他只是提请列强各国履行他们自己的诺言，召集一个委员会来研究关税问题。

1925 年 5 月，当马克谟准备动身去中国时，他对中国的立场更是缺少同情。他声称；除去中国，其他各国都遵守华盛顿条约的原则，但是谁也没有预料到这一协定可能被中国人损害的程度。马克谟认为中国新爆发的民族主义运动是受苏联煽动的。他形容中国人已变得“非常自作主张，却不太清楚其主张的意义。”

1925 年初，孙中山就去世了。在继承人问题尚未确定前，5 月 30 日，在日本人控制的一家纺织厂里发生反抗日本人的罢工，这一偶发事件导致五卅运动——反帝、排外情绪的大爆发，这一自发行动由上海扩散到全国的城市，最后甚至波及到农村。事件发生后不久，马克谟来到中国，正如他早些时候谈到的，民族主义的狂热正在这个国家里燃烧。他仍然反对向中国让步，在中国做到履行其条约义务之前，不能考虑修改条约问题。他提醒华盛顿说，如果作出让步将“鼓励不负责任的精神，近来，甚至连最清醒的中国人也受各种布尔什维克和幼稚的民族主义的影响传染上不负责任的态度。” 美国政府正式拒绝单方面放弃美国人享有的任何特权，但表示愿参加一个国际会议来讨论这些问题。

在中国共产党人，或其他民族主义者看来，美国的态度显然是在耍阴谋。共产党人断定，美国人知道他们在中国的利益相对说来是有限的，而日本和英国不大可能附和美国的建议。中国指控美国人用伪善的手法“欺骗中国民众，并在中国推行其垄断商业资本的贪欲”（译文）。如果美国人真正同情中国的要求，他们本可效仿苏联的做法，但是美国还不愿做到这一步。

鉴于中国对美国的重要性有限，美国人在中国的利益也很有限；所以美国政府在华盛顿会议之后的几年里没有做到给中国民族主义者以积极的支持。即使能在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情况下做到这一点，美国也没有去做，何况不干涉中国内政是办不到的。很明显，美国对孙中山以及对中国的民族主义要求作出的反应是不适当的。尽管多年观察证明，德国人在世界大战后被剥夺了条约特权，在没有特权的情况下却照样在中国发挥作用，但美国还是拒绝让步。从根本上说，美国政府中的负责官员，特别是马克谟不能领会中国人对象征着镣铐的不平等条约的强烈憎恨，也不了解其重要意义。美国想在同一个理性和法律的框子里处理具有高度感情色彩的争端。可是理性和法律只反映平等国家的关系特点，这些国家在传统上享受平等待遇和国内的安定。美国政府却坚持要求中国遵守条约义务。美国不仅认识到中国需要现代化，还要促进这个过程，但是它要求中国有良好秩序，似乎不知道中国社会的陈年积垢不用剑是刮不掉的。无益地死扣法律条文，顽固地强调秩序，两者结合形成了美国的政策。



但是，在 1926 年的北伐开始后，美国遇到新的、严重的挑战。事实上所有的中国人都要求修改条约。国共合作警告美国，必要时中国准备单方面废除这些条约，美国让步吗？如果不让步，美国准备采取什么行动来阻止中国单方面废除它的条约义务？

#### （四）

事实上，在北伐开始以前，在五卅运动以后几周后，美国已基本决定同意中国关税自主，并拟就放弃治外法权问题进行协商。虽然马克谟坚持认为，修改条约会使中国变得更不可理喻，但在华盛顿他的上级都愿放弃美国人在“不平等条约”下享有的特权，态度十分坚决。甚至连英国和日本政府的反对（它们的驻华使节同意马克谟的意见）也没有使华盛顿踌躇。

美国对修改条约态度的变化和五卅运动有关，是对这一暴力行动作出的反应。五卅运动迫使新上台的国务卿凯洛格（F. Kellogg）去考虑中国的问题，在上海的美国工商界要求政府派炮舰，马克谟则主张采取坚决态度。但是凯洛格却关心美国人民及议会的反应。在 20 世纪 20 年代初期，美国的公众舆论就不再容忍炮舰外交，这一点也越来越明显。确实如此，根据辛丑议定书，美国军队继续留在中国已受到舆论的谴责。美国人民日益反对帝国主义，对以武力反对不发达国家也日益敏感，不论是在拉丁美洲还是在亚洲。由于对世界大战的后果大失所望，这种情绪的增长大大促进了各种反对以武力解决国际问题的运动。到 1925 年，国内的压力将迫使凯洛格签署一项公约宣布战争为非法，这已经十分清楚了。另外，越来越多的美国人相信，美国介入世界大战是为少数特权者的自私目的效劳的。在这一背景下，美国政府不得不对在中国以武力保护美国人的特权表示犹豫。

除公众舆论对美国政策的影响外，凯洛格决定在修改条约问题上对中国让步还受到他的主要中国事务顾问约翰逊（T. Johnson）的影响。约翰逊的观点与马克谟迥然不同，他认为在中国抛弃阻挠其进步的腐朽文化之前，伴随革命而来的暴力和混乱是必要的。尽管中国的民族主义有苏联的影响。这一事实有时使凯洛格神经过敏，他还是接受了约翰逊提出的基本前提。与此相类似，当他观察到中国正在奋力地从事现代化时，便直觉地认识到老牌帝国主义享受特权的理论基础已经不存在了，美国及其他列强必须准备尽快地恢复中国的主权完整。在此过程中，凯洛格和约翰逊决心要使美国保持他们心目中的，中国头号朋友的形象。

如果说公众反对在中国使用武力使凯洛格和约翰逊的政策成为必然的话，他们两人的直觉和对中国的设想则把一桩必然发生的事变成了崇高的善行。关于苏联帝国主义，他们断言，中国民族主义者的成功将成为抵御苏联威胁的最好办法。他们相信共产主义对中国是一个非常格格不入的概念，和中国的现实相去太远，以至难望在中国实现。他们就以这种脆弱的信念来驳斥马克谟对布尔什维克的恐惧，这样一来，在华盛顿的美国人可以接受一种常见的说法，即认为中国革命是以美国革命为范本的，很好的模仿者。中国为取得决定国家前途的自由而提出的要求是完全值得嘉许的，而这一要求已在华盛顿会议上得到许诺。如果美国带头恢复中国的主权，在中国的朋友中居领先地位，并为中国人民的独立自主充当辩护人，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就会报答美国的友谊。总之，对中国要求修改条约作出让步，废除条约制度，与其不满不如接受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混乱，这样一种权宜之计不仅符合美国的理想，也符合美国的利益。

美国人的看法，事实上是与和平解决一切问题不仅必要而且可能的观点结合在一起的，据此，美国政府得准备放弃在中国的帝国主义特权。明显的方针是，要把这种让步做得尽可能得体，不顾马克谟的抗议，也不去管那些构成条约基础的法律上的问题。一旦决定让步，其他的问题也就不难解决了。但是美国将向谁让步呢？从 1925 年 10 月到 1928 年底，中国再次被内战分裂，有时其混乱程度，比袁世凯垮台后使这个不幸的国家遭受祸患的任何一次动乱更为激烈。1926 年，国共合作当局，虽然借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来发动群众，事实上却反对修改任何条约。理由很简单，条约修改以后，将使控制着北洋政府的军阀们增加财政收入，提高威信，从而帮助了自己的敌人。另一方面，在华盛顿会议上允诺的附加税未付诸实施，国民党的政敌则指责为立场不公。因此，在国民党至少在名义上实现对中国的控制以前，是对以上问题的考虑支配着美国的政策，而不是美国对中国民族主义者的愿望持敌对态度。

#### （五）

从 1925 年夏到 1926 年夏，国民党新成立的中国国民政府为巩固它在南方的地位而进行战斗。军事上的胜利加上外交活动使国民党政府在广东、广西两省建立起一个安全的根据地。同样，在北方，战争加政治谋略导致各系军阀的重新组合，张作霖、吴佩孚和孙传芳崛起成为中国最主要的军事力量。张作霖控制着中国北方，以其“满洲”的据点及日本人的支持为后盾；孙传芳占据长江流域东部五省，吴佩孚则盘踞在西部，北上的路线被以五比一比率超过国民党兵力的部队封锁住。

民族主义运动不仅在军事上面临占压倒优势的敌人力量悬殊，还面临内部分歧。孙中山去世后便展开对继承权的争夺。国民党内部的根本分裂是由孙中山联俄，联共的政策造成的。由胡汉民领导的右派国民党人害怕苏联的影响，一心想结束这种联盟，并将共产党人逐出国民党。汪精卫领导的左派则要在党内继续保持苏联的政治方向。在最初组成的均势政府瓦解后，以汪精卫、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左派成功地排挤了右派，于 1926 年 1 月把右派领袖开除出党。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左派联合似乎已控制住局势。

突然间，蒋介石于 3 月份在广州发难。蒋介石断言共产党阴谋控制军队，解除了共产党在所有军事领导岗位上的职务，并逮捕了许多共产党人。国民政府首脑汪精卫事先没有得到警告，他把蒋介石的阴谋理解为自己最好退场的信号。蒋介石有力地控制了国民党军队。当鲍罗廷回到广州时，他已势孤力单，只能和蒋介石进行协商。尽管中国共产党内部强烈要求起来反抗，这一立场得到托洛茨基的支持，但第三国际作出决定，认为分裂的时机尚未成熟，代之以派鲍罗廷和蒋介石谈判。鲍得到第三国际的指示对开始北代表示赞许，苏联继续给以援助，并以限制共产党的宣传鼓动换取蒋介石同意遏制国民党右派。七月份，蒋介石的地位已经稳固，便发动了北伐战争。

当蒋介石的部队奋战统一中国之际，列强各国在一旁观望很少干预。事实上，英国已于 12 月份表示愿意修改不平等条约；凯洛格有意在恢复中国主权的国家中重新取得领导地位，一个月后也作出同样表示，以和英国并驾齐驱。在 1926 至 1927 年秋冬之际，国民军先击溃吴佩孚的部队，接着把孙传芳部队逐出长江流域。三月，共产党领导的上海起义减轻了蒋介石攻占上海的任务。几天后，国民军占领南京。

虽然占领上海时未发生严重事件，但国民党士兵进入南京后却袭击了外

国人及外国产业，包括美、英、日的领事馆在内。有几个外国人被国民党部队杀害，其中有金陵大学的美籍副校长。抢劫外国财产，威胁外国人生命安全的行动一直没有停止，直至美、英两国的军舰向攻击者开炮。这对凯洛格和约翰逊为支持中国民族主义者所作的努力确实是一次考验。

尽管有人断言，南京的暴力行动是旨在使蒋介石为难的奸细干的，尽管国民党内部重大的权力斗争于四月份表面化以后，这种说法更加可信了，但列强各国认为应由国民党负责任。内容相同的照会纷纷递交给国民党政府，要求惩办暴乱的肇事者，要求蒋介石作书面道歉，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并负责赔偿在生命财产上遭受的损失。英国准备提出时限，要求在指定期限内满足全部要求并威胁要采取制裁手段，英国这一意图被美国和日本否决了。

蒋介石在接到各国照会的当天，下令逮捕和屠杀了几百个共产党人和上海的工人领袖。于是，在国民党和列强之间关系紧张之际，蒋介石进行了一系列关键性的政治和军事阴谋，最终得以挫败斯大林，在共产党除掉他以前先把共产党人排挤出去。但在这段时间里，列强各国为解决南京事件不断施加压力，给蒋介石造成严重的进退两难的困境。如果反应太强硬有可能激起外国的干涉，而过于和解又可能遭致向帝国主义屈服的指责，从而削弱蒋在内部斗争中的地位。这两者互相牵制，最稳妥的办法是采取拖延的策略。

在列强各国中，日本人对国民党内部不稳的意义最了解，试图与蒋介石以及他在南京成立的反对派政府达成谅解。美国人感到困惑，心中无数。马克谟提醒其上级不要支持蒋介石，他藐视这个人。他怀疑所谈到的分裂是俄国人策动用以欺骗列强各国的，并强调即使在国民党内部真发生了冲突也毫无意义，因为蒋介石和比他更激进的反对派同样残忍、排外、不可信赖。但是凯洛格和约翰逊从中国的其他消息来源得到建议，倾向于希望中国出现一个温和的派别，以使南京问题得到解决。国民党左派控制的武汉国民党政府似乎不肯合作，而马克谟和北方军阀合作的想法是未必可能的。总之，没有显而易见的选择余地。1927年5月，马克谟接到指示，要他和蒋介石的外交部长举行谈判，但是达成协议的时机尚未成熟。国民党内部冲突的发展给外交活动罩上一层阴影。

1927年暮春，由于武汉政府的部分领导人对中国共产党人及苏联的企图感到担心，在政府内部也出现了争吵。一方面是共产党的组织者和苏联顾问之间出现了矛盾，另一方面是，和左派非共产党军事领袖们的矛盾。最后，于7月份，武汉国民党对他们的共产党盟友进行突击，于是白色恐怖席卷全中国。凡是南京或武汉政府控制的国民党军队所到之处，共产党人和“激进分子”就被追捕和屠杀。和几位国民党左派的主要领导人一样，在中国的苏联顾问包括鲍罗廷在内都逃出这个国家。其余共产党人差不多都进入山区，最后在江西重新集结。党的中央委员会仍隐蔽在上海的公共租界，重整了领导班子，这些替罪羊开始探究斯大林的错误。

即使在清洗之后，宗派主义继续妨碍国民党的统一，8月份，蒋介石认为暂时引退是有利的，9月份，他的主要竞争者汪精卫也效仿他的做法。到11月，汪精卫、宋子文以前国民党右派领袖胡汉民在广州成立另一个“政府”。事实证明国民党的政治领导是无效的，它不能把个人的野心服从于党国的利益。第三国际选择此时命令在广州发动起义——注定要失败的广州公社。在一片混乱中，蒋介石又回到第一线，在1928年1月重新控制国民党的

革命。

虽然日本人已选定蒋介石为可与之合作的对象，美国人仍被中国的政局搞得迷惑而沮丧，这是可以理解的。他们甚至对排除了苏联影响也不感到快慰。按某些美国外交官的看法，它提供了民族运动中仅有的一点团结。马克谟甚至纳尔逊·约翰逊都看不出有多少理由为蒋介石的复出而庆幸。不论在中国，还是在华盛顿，美国观察家们预测，军事统治可能在中国卷土重来，而蒋介石也许就是最大的军阀。从意识形态上，他们看不出具有深远意义的指导思想，也没有任何征兆说明国民党领导人会实现作为国家现代化先决条件的各项改革，而实现现代化是他们的承诺。尽管如此，美国仍致力于解除不平等条约的计划。

蒋介石政权对获得日本的支持有一定的信心，进而寻求美国的谅解，以利用美国与英国抗衡。在3月间，国民党准备着手解决南京问题，在马克谟对美国海军参加炮击南京不情愿地表示歉意的情况下，还是接受了美国的条件。但是，美国对蒋介石仍未予以承认，他们要等待北伐的结果，重新开始的北伐是指向张作霖及北京军阀政府的。

五月份，国民党军队忽然与日本武装在山东发生冲突。具有劣根性的军国主义正在日本崛起。几天之内，日本陆军就成功地使日本政治家们处心积虑地建筑起来的中日亲善大厦毁于一旦。因为他们最初认为蒋介石是一个温和的民族主义者，而且是亚洲潜在的反共堡垒。当日本政府企图逼张作霖撤退到“满洲”，把长城以南的全部地区让与国民党以挽回局势时，日本陆军暗杀了张作霖，以制造混乱，使军方有口实推行其实际上控制整个“满洲”的计划。随之，也在东京引起一场混乱，加以日本政府各部门都不期望中国人在“满洲”行使主权，遂排除了中日达成谅解的可能性。在中国历史上美国再次被看成是帝国主义中最宽厚的一个，至少是，因为它没有采取敌对行动。

对国民党的团结，对国民政府实际上而不是名义上拥有的权力，虽然凯洛格和约翰逊不抱多少幻想，但还是把北伐的胜利结束理解为国民党已建立起事实上的中国政府的证明。因此，凯洛格指示马克谟与中国政府协商新的关税条约。1928年7月，中美两国在条约上签字，新条约承认中国关税自主，并互相保证给对方以最惠国待遇。正式承认蒋介石政府，签订关税条约成功地完成了凯洛格要使他的国家成为中国主要朋友的努力。

不论美国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以及它对中国的民族主义反应迟缓有多大缺陷，在1928年美国人有理由对他们政府的政策表示满意，这是十分清楚的。苏联是对中国干预最多的国家，它援助国民党，支持中国共产党，指导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但是它得到的报偿是，苏联的势力几乎被全部赶出中国。日本人的干涉也没有在南京得到朋友。1928年，只是凭借上帝的仁慈和凯洛格、约翰逊两人可靠的直觉，使美国的政策促进了与国民党中国的和解，美国人再次可以把自己视为“中国主权的维护者”。

#### （六）

1928年10月10日“双十节”，中国革命十七周年时，蒋介石及其拥护者宣布，中国国民政府在国民党的“监护”下成立。忠实于曾经使党的重建受到启迪的苏联模式，国民党实际上建立了一个一党专政的政府。在12月，继承了他父亲的武装力量的张学良和蒋介石达成协议，在“满洲”升起国民党政府的旗帜。对把建立秩序视为进步的先决条件的美国人来说，又一个乐

观的时刻来到了。甚至马克谟也暂时放弃扮演“报忧者”的角色，承认在中国领导人中明智而爱国的“没有希望的少数派”“迟早”会获得成功。

然而，蒋介石的政府确实面临非常艰巨的任务，在许多方面把它比作神话里赫拉克里斯清洗马厩是再恰当不过了。在外交事务上，中国和它的两个近邻，苏联和日本关系紧张，中国主权的恢复缓慢，到1930年才重新获得关税自主，收回了一部分欧洲国家的租界地。关于治外法权问题，虽然在沈阳事件期间进行过重要的协商，由于英国、日本和美国都不肯让步，中国人没有取得什么成就。

内政方面，蒋介石面临的问题更为严重。1928年，中国政府事实上破产了。它缺乏足够的财源，列强仍控制着关税，影响了增加国家收入的潜力，而大量经济、社会和政治以及军事的困难妨碍国内的税收，中国贷款率不高，政府激进的民族主义立场不大可能吸引外国的资本。这个政权的经济问题由于政治形势的影响而恶化。这实际上近似马克谟比较悲观时的预计。中国政府是一党专政的政府，所有将军都参加了国民党，他们主要是为了追求权势。同样，各方面的政治首脑在过去的十年争权夺利，如今继续在党内策划各种阴谋诡计。唯恐蒋介石一旦在制服其党内的顽劣分子上得手而不可一世，毛泽东和朱德领导的共产党武装正在江西发动农民进行游击战争的准备。

当日本人1931年对中国发动进攻时，国民党政府的“马厩”还远未清扫干净，但蒋政权在解决其内政问题上还是取得了相当的进步，美国的友谊在其中起了作用。中美关系的改善为和美国私人银行洽商贷款提供了方便。从美国及国际联盟派来技术顾问和教会派来从事非传教活动的人士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美国公司承担了开发中国交通运输事业的重任，通过建立交通运输网，中央政府可望行使对全中国的实际控制。蒋介石的决心得其连襟孔祥熙、内兄宋子文的得力经营，实现了重要的财政改革，使政府获得维持其行政开支的财源。另外，关税自主带来国家收入的增加。中国政府的信用逐渐提高，可以获得更多的资金。自然还存在许多弱点，在一个由地主和将领们联合统治的国家里还是可以想见的。孙中山允诺的土地改革已被置之脑后，中国的广大农民继续遭受苦难。政府及半独立的军队侵吞过多的物资及税款。但是从外表上看，中国建立了秩序，也在进行改革，因而是有希望的。

蒋介石策划的许多政治阴谋证明他以机智挫败斯大林并非出于侥幸。国民党将领的叛乱，以及不满的国民党政党家们建立的想取代中国政府的政权都被他镇压下去，蒋介石及其部队通过讨伐、谈判及妥协击败了所有的对手。蒋介石自始至终确信中国最大的威胁来自中国共产党，在与党内同志争斗的间歇，特别是在1930年，共产党袭击长沙之后，他便把注意力集中于消灭“赤党”的威胁。尽管出师不利，1931年9月，反共的“剿匪”运动似乎接近成功。

美国对中国发生的政治事件最初表示厌恶，继而表示出谨慎的乐观。1930年约翰逊前往中国接替马克谟，但是当他亲自体验了中国的混乱情况之后，就很难再保持他对中国的同情态度。他判断蒋介石及其小集团毫无理想可言，全凭优势的财政和武装来凌驾于他人之上，不论到何处，他都没有发现一个中国领导人愿为农民办些事，只想压迫剥削他们。他拿不准是否要重视中国共产党，有时他曾把共产党形容为侠盗罗宾汉，罗宾汉在农民中间的影响曾给政府带来危机，有时他又把共产党说成是躲在红旗后的强盗。1930年8月，他提议终止关于治外法权的谈判，理由是，当时南京似乎没有控制全

国的能力。然而在 1931 年 3 月，他又断言蒋介石政权是“中国人自 1911 年以来所拥有的最强有力的组织机构”。他猜想：“只需五年的和平时期和适当的农业收获，该政府的生存机会还是不小的”。但是在中国所谓的和平日子几乎没有超出五个月。

#### （七）

在废除治外法权的外交谈判中断以后，中国在国际关系问题上的焦点再次转移到“满洲”。1929 年春天，蒋介石不顾内部矛盾重重，决定着手把帝国主义从富饶的东三省挤走，俄国和日本为争夺这一地区曾于 1904 年至 1905 年打过仗，日本为在“满洲”建立起“特殊地位”，一直在那里惨淡经营。

中国显然认为选择苏联给以打击可以不受任何惩罚，于是中国人开始骚扰苏联侨民及外交官。7 月份中国夺取了中东铁路的控制权。苏联要求停止骚扰，恢复以前的状况，都被中国拒绝了。在 3 个月无成效的谈判之后，苏联部队发起攻击，最后逼迫中国作了让步。美国国务卿史汀生（H. Stimson）想诉诸凯洛格-白立安公约（Kellogg-Briand Pact），在这个条约中，中国和苏联都曾否定以战争作为民族政策的工具，但是此举徒劳无益。史汀生自讨没趣，他收到苏联辛辣的回答，其中提到：美国既不承认苏联政府，却认为自己有权利对它提出忠告，实在令人惊讶不已。

中国人被刺痛，但是民族主义精神是不会轻易被征服的。蒋介石接着转向日本，企图以更微妙的办法动摇日本对“满洲”的控制。从一开始，美国外交官员就确信，日本人对他们长期积累的“条约特权”是不容任何侵犯的。虽然也有例外，这些美国人一般都愿对日本继续保持对“满洲”的控制给予默认。副国务卿卡斯尔（W. Castle）的观点和西奥多·罗斯福相似，决意不去触动亚洲大陆上的日本。甚至约翰逊，虽然对日本国内强烈的情绪估计不足，也于 1931 年 3 月写道：“满洲”已日益变得中国化了，但是如果它注定要成为日本的一部分，我看不出我们有什么必要牵连进去”。

驻扎在“满洲”的日本关东军眼看这个地区变得“日益中国化”，他们对日本政府为保卫其采邑所作的努力感到失望。在 9 月 18 日夜晩，日本陆军对中国民族主义的崛起作出他们自己的反应。为制造中国人在“满洲”进行挑衅的借口，关东军在日本人占据和经营的南满铁路制造一起爆炸事件，事后数千日军按照严密布置的计划在几小时内占领了沈阳，并开始征服整个“满洲”。日本军国主义时代已经到来。

#### 原书注释

Reinsch 致 Lansing 美国国务院文件，DecimalFile893.00/3235，National Archives（此后引用此来源时，在文件编号后标以 NA）。

Foreign Relations，1921，I，第 315—320 页。

Foreign Relations，1922，I，第 707 页。

Schurman 致 Coolidge，1924 年 4 月 8 日，Jacob，Gould Schurman Papers，Collection of Reginal History，Cornell University。

Huston 致 MacMurray，1925 年 4 月 30 日，J.V.A. MacMurray Papers，Princeton University。

在华盛顿外交学院的演讲稿，1925 年 5 月，MacMurray Papers。

MacMurray 致 Kellogg 引自 Dorothy Borg 著 American Policy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1925—1928，纽约 1947 年版，第 63 页。

《告五卅运动中为民族奋斗的民众》，1925 年 7 月 10 日，《中国问

题指南》I，第 65 页，中华民国司法部，调查局档案。

Johnson 致 William Castle，1931 年 3 月 25 日，Papers of Nelson T. Johnson，国会图书馆文件，此信件副本曾送远东司司长 Stanley Hornbeck，档案编号 893.00/11642，NA。

出处同前。

译注\*华盛顿会议共签订九个条约，其中主要的有九国公约、四国公约及五国海军条约：

(1) 九国公约，规定中国“门户开放”，各国在华工商业“机会均等”。

(2) 美英日法四国公约，规定缔约国共同保卫各自在太平洋上的权利和利益。

(3) 美英日法意五国海军条约，规定五国的主力舰、巡洋舰吨位比例为美国、英国五、日本三、法国、意大利一点七五。

## 第五章 在和日本冲突中，中国成为一个抽象的概念

### (一)

当关东军在“满洲”开始军事行动时，中国的国民党政府所面临的内部动乱已足以使它有限的力量难以支撑。国民党内部存在的宗派主义导致又一个分裂分子的政权在广州成立。江西对政府的威胁更为严重。由于下属将领的失策，使蒋不得不亲自督战清剿以毛泽东、朱德为首的共产党武装。接到日本人进攻的报告后，蒋介石仍决定集中力量扫共，他确信共产党是一个毒瘤，必须先把它除掉，中国才能生存下来以御外侮。他命令“满洲”的中国军队不要抵抗，显然想以此防范日本人找借口把战火扩大到沈阳以外的地区。另外，为把冲突限制在局部地区，除本身的努力外，蒋介石还向国联、英国和美国发出呼吁，指望动员国际力量对日本施加压力，制止其侵略行动。宋子文对一位美国外交官说：“把兵力集中于北部，会使南方成为混乱和共产主义的牺牲品。”因此，不可这样做。

对中国来说，不幸的是，1931年秋天，西方世界已由于大萧条承受了痛苦的重担，此刻争取西方援助实在不是时机。在美国，为寻求避免经济萧条的对策已占用了包括国务卿史汀生(H. Stimson)在内的胡佛(H. Hoover)政府的全部精力。绝大多数美国人只关心一项外交政策：向昔日的欧洲盟国收回战争贷款。当时对世界事务眼界更广的几乎只有美国的和平运动一家。1931年9月，美国和平运动正集中力量为计划于1932年2月召开的世界裁军大会作准备。

美国除专注于国内的紧迫问题外，还出于其他的考虑，不能对蒋介石的呼吁给予满意的回答。日本对“满洲”的控制由来已久，美国即使不喜欢日本和中国的这些省份有特殊关系，但也逐渐地习以为常了。美国的主要外交人士，包括约翰逊等人显然是同情中国的，但是他们也认为最好不要在东亚干涉日本。甚至远东司司长霍恩贝克(K. Hornbeck)，一个长期来号称亲华反日的人，也准备接受日本占领“满洲”的事实。这些人从根本上承认日本在“满洲”有重大利益。而美国在这个地区并没有重大利益。他们像罗斯福一样，对中国有强烈的同情，同时，又不愿向日本势力挑战，尤其是在“满洲”。

在华盛顿及其他一些国家的首都还抱着一线希望，或许是一种痴心妄想，就是希望日本政府能恢复控制并对陆军加以限制。20世纪30年代，在整个十年当中，有些美国人争辩说，如果美国威胁日本，日本的温和派就会受到伤害，在1931年，由于美国在“满洲”的利益有限以及其他方面的压力，史汀生欣然决定等待观望一个时期。遗憾的是，日本温和派的全盛时代已经过去。

与日本政府所作保证相反，关东军从9月到10月在“满洲”继续推进。中国要求美国援引它倡议的凯洛格-白里安公约进行干预。此公约使几乎所有国家都承诺不以战争作为国家政策的工具。在1929年的中苏危机期间，史汀生曾想借助此公约未获成功，颇感为难，所以这次他退缩不前，希望能通过直接的谈判或者利用国联盟约所提供的方法来停止这场冲突。胡佛政府无意承担世界的领导责任，特别是胡佛本人，他怕国联理事会会把这个难题推在美国肩上。但是，当日本军队继续向前推进时，史汀生允许美国驻日内瓦



总领事参加国联理事会的讨论，这是美国官员第一次参加这种会议。在几个欧洲国家要求中国和日本勿忘他们对凯洛格公约承担的义务以后，美国也发出同样的信息。美国的幽默作家罗杰斯（W.Rogers）表示担心，在日本对华派遣军的兵源枯竭之前，恐怕世界各国的信笺都要被这种无用的文书消耗完了。

附表三美国在中国的经济利益（1920—1931）年代/美国对华出口（以百万美元计算）/占美国出口总额比例/美国对华投资（以百万美元计算）/占美国海外投资总额比例

年代	美国对华出口（百万美元）	占美国出口总额比例	美国对华投资（百万美元）	占美国海外投资总额比例
1920	146	1.8	108	2.4
1921	108	2.4	100	2.6
1922	100	2.6	109	2.6
1923	109	2.6	109	2.6
1924	109	2.4	94	1.9
1925	94	1.9	110	2.3
1926	110	2.3	83	1.7
1927	83	1.7	138	2.7
1928	138	2.7	124	2.4
1929	124	2.4	90	2.3
1930	90	2.3	98	4.0
1931	98	4.0	196	8.1

鉴于日本军队在完全征服“满洲”之前显然无意停止战争，中国陷入绝望之中。蒋介石使冲突局部化的希望未能实现，同时，由于他只反共不抗日，在爱国学生中引起不满。在10月份，他不得不辞去总统职务。此时，在全中国谣传美日达成秘密协定，美国同意日本放手侵略“满洲”。中国共产党人坚持认为美国支持日本侵略是有意在日本及苏联之间挑起战争。在美国的和平运动中也有人怀疑美日两国政府在进行交易。美国的和平组织——特别是国际妇女争取和平与自由同盟的执书记多萝西·德策尔（Dorothy Detzer）——纷纷要求美国“采取行动”制止日本的侵略。

实际上，在“满洲”危机期间，美国遇到罗斯福1910年向诺克斯提出的使他进退两难的问题。美国人可以放弃利益均沾和对中国主权的关切，或者也可以准备和强大的日本交战。在国务院内基本的看法是一致的——美国在华利益，尤以在“满洲”的利益是不重要的，没有理由去打仗。从国防部长赫利（Patrick Hurley）得到的情况是，军队没有作战的准备，即使有使用武力的意愿，美国陆、海军的实力也不够。而总统不仅坚决反对诉诸武力，也反对采取经济制裁，惟恐日本会对武力回敬。鉴于这种错综复杂的情况及有关的态度，决定对日本采取姑息态度看来是十分明白了。

但是，从一个重要方面看，自从罗斯福按英国哲学家霍布斯的说法看待世界以来，这个世界已经有了变化。现在有了国际组织，有了一个多边的协议，许诺中国人独立自主决定自己的前途，而且在各国间有一个差不多世界性的不以战争作为国家政策工具的公约——一项和平解决争端及承担不使用武力解决问题条约义务的办法。美国曾拒绝加入国际联盟，但是却促使达成1922年的和平协议和1928年签署的凯洛格和平公约。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参加了和平公约，形成一个国际社会，虽然这个条约还不够完善，实施的办法也很繁琐，但是它唤起人们的希望——和平与公正将成为世界的主流。当日本以它在“满洲”的行动违背了公约，对和平体系造成威胁时，许多有思想的美国人察觉这不仅是对世界和平的威胁，而且危及美国的利益。

要求美国政府采取行动的最强烈的压力来自和平运动，来自国际联盟的支持者以及来自拥护裁军和战争非法化的人士。不论在运动中还存在什么分歧，大家都认识到了事件的危险性，都在寻求战争以外的手段来制止日本的侵略行动。史汀生和胡佛决定与国联进行讨论，为这些人提供了少许希望。

霍恩贝克和约翰逊也对日本侵略的意义提出相同的基本看法，史汀生同意他们的观点。霍恩贝克不是从日本对中国的威胁，或从美国在远东的具体利益来考虑这个问题，而是把它看做是对世界和平的威胁。他和史汀生争辩

说，日本破坏了凯洛格公约，所以“美国提出的任何抗议都应该是与国际和平运动的合作，而不应作为美国传统远东政策的一部分。”约翰逊对“满洲”的前途并不关心，他担心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假如日本置国际联盟及凯洛格公约于不顾而破坏和平体系的话。就政府内外的美国人对“满洲”危机的关心来说，他们所关心的并非中国，而是世界和平。当他们争论说美国的利益面临危险时，并非指经济利益，他们认为不值得为经济利益去冒触犯日本人的风险。他们也没有提及美国传统意义上的战略利益——美国所关心的东亚权力均势。日本早已控制了“满洲”，它当前采取的做法不会对均势有多大影响。但是事情已到了这种程度，日本采取的军事侵略手段违背了它本身的条约义务，嘲弄了国际联盟，威胁到一些美国人为使美国免于战争而寄予厚望的和平体系。

对胡佛来说，这种间接的威胁不能和他所面临的国内具体问题相比。国会没有意思把日本的行动视为对任何美国利益的威胁，特别是参议院，强烈反对美国采取对抗日本的立场。当国联成员国似乎放弃它们的责任时，甚至连史汀生也没有思想准备让美国来担当东亚的重要角色。

但是，即使美国不愿打仗，政府也不能同意转而采取姑息政策。几年前，罗斯福曾设想建立一种超道德的世界秩序，这种秩序就是，把对实力的考虑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但是，在1931年，对美国政策的基本设想是，还存在一种新的世界秩序，在这种秩序下，可以通过道德制裁和呼吁世界公众舆论来保持和平。史汀生和胡佛还有另一种选择，就是道义外交——不承认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结果，必要时对日本进行谴责。1932年1月，史汀生照会中国和日本双方，美国将不承认对它的条约权利的损害，包括关于中国的主权，独立或领土及行政完整；美国也不承认以违反凯洛格和平公约义务的方法获致的任何局势。这一声明，后来被称为胡佛-史汀生不承认主义，这个主义是以1915年布赖恩的未成功的政策为基础的，当时日本提出了二十一条。但是布赖恩的失败是在战后创立和平机构之前，而史汀生则具有呼吁日本遵守其条约义务的有利条件，而且也没有其他更合适的选择。

和过去一样，不承认政策于1932年遭到了失败。日本的陆军不是那么容易制止的。而就在那个月底，日本海军也为了争先而袭击了上海。这个城市具有全国最大的外国租界，也是美侨最集中的地方。日本飞机轰炸中国部队及平民，停泊在港口的日本舰只似乎向中国据点发射了数不尽的炮弹。上海周围的中国部队和他们在“满洲”战役中的伙伴们不同，他们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以至日本海军陆战队要求增援。

如果说有些外国人曾经同情日本在“满洲”的事业，并准备接受日本人声称中国挑衅和有特殊利益的说法。却很少有人宽恕日本人对上海的袭击。1932年的世界对大屠杀尚非麻木不仁，对一个城市狂轰滥炸，震动并激怒了公众舆论。在美国，沈阳事件并未触动不关心亚洲事务的普通美国人，而轰炸上海却激起强烈的反日情绪，不仅引发了美国人对中国的传统同情心，和平运动的领袖们试图组织全国性的抵制日本货的行动。

作为日本袭击上海的结果，胡佛授权史汀生筹划对日本进行更为认真的恫吓：曾派军舰去上海，并增加美国海军陆战队。美国向日本政府提出正式抗议，至于和平组织要求对日本进行经济制裁，其可能性也未被排除。但是，日本人看出美国是虚张声势，对史汀生所作姿态毫不畏惧，依然我行我素。史汀生从国联只求得微不足道的支持，在那里英国和法国在国联内居于支配

地位。英法两国政府的态度实质上是亲日的，同时，它们对现存和平体系的关系也是不力的。而在美国，反日情绪尚未达到足以获得公众支持对日采取强烈行动的程度。确实很少有美国人认为美国在华利益，包括现在及将来的利益都值得为之战斗，愿意以战争保持和平体系的美国人就更少了。甚至在和平运动内部，由于抗议、谴责显然无济于事，反对日本的倾向也减弱了。

作为最后绝望的一着，史汀生决定抗议日本的行动违反 1922 年签定的九国公约。没有多少理由相信日本会对这种压力作出更大的反应，因为日本政府已经明确表示，它认为中国的情况已和华盛顿会议时期大不相同了。史汀生希望得到英国的支持，但是他的希望又一次落空了。史汀生终于认识到再次提出单方面抗议是不明智的，遂以致参院外委会主席威廉·博拉(w. Borah)公开信方式来表明美国的立场。这封信包括一项呼吁，要求世界拒绝承认一切违反凯洛格和平公约及九国公约的行动，这是仿照史汀生 1 月份提出的办法。他还重申美国忠于九国公约的原则，以及中国有权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以独自的方式实行现代化的观念。最后，史汀生表示，违反哪一个华盛顿条约都将破坏整个条约组织，随之也就解除了美国对华盛顿条约所承担的义务。简而言之，日本违反九国公约将导致美国的舰队规模不再受条约的限制，并在它的太平洋领地设防。

史汀生信件的效力如何，不能断言。日本人确实最后停止了在上海地区的敌对行动，这是在史汀生信件发表前就已决定了。国联大会通过一项决议采纳了不承认政策，但是，关东军在“满洲”搞了一个“独立”运动。在 1932 年 3 月，傀儡政权“满洲国”宣告成立。5 月份，国联要派一个调查委员会前往“满洲”，调查这一系列于前一年 9 月已经开始的事件，但日本军队已经达到了目的。几个月后，当国联召开大会正式通过调查委员会的报告时，日本退出了国联。自威尔逊开始的，把中国问题国际化的努力由始到终兜了一圈。

几个月来，制止日本侵略的努力均告失败，中国的希望由上升而破灭。在史汀生给博拉写信以前，约翰逊自中国发电提醒美国政府说，中国人已对美国抵制日本的决心失去了信任。他担心中国如有进一步的根据认为日本对上海的行动计划曾得到美国默许，便有可能爆发与义和团暴动类似的排外行动。但在 5 月，约翰逊论及他和蒋介石、孔祥熙的会谈时说，后者特别醉心于在日美之间爆发战争的想法。他还补充说，这种美日交战的想法“把美国塑造造成中国的保护人及救星，正在许多具有官方身份的中国人当中流行。”

到 12 月份，中国主要的独立报纸《大公报》的编辑对美国进行干预的前景发表了比较合理的见解。他认为从 1899 年到 1922 年，美国对华关系中所表达出的种种理想，充满了对中国的诺言，但是这些理想毫无价值，因为美国人并不想使这些诺言“有效地实施”。他理解“满洲”地处边远不容易争取美国的关注，但是，他警告说，低估日本控制“满洲”的重要性是危险的——在没有美国支持的情况下，有导致在中国出现共产主义的危险。他和一位美国外交官交谈时说：“中国人民感谢史汀生先生多次发表声明，但那只不过是一些辞令、辞令、辞令！如果没有武力作后盾，只能是一堆空话。目前没有武装支持，因为美国及国联已经明确表示，他们无论如何不以武力去支持他们的理想，尽管他们自己强调这些理想都是公正的，是值得追求的。”

史汀生的关注已超出中国的范围，假如各国都可以肆意违反条约义务，

只要适合自己的目的便诉诸武力和侵略，世界和平则令人忧虑。史汀生在采取行动时，已较少考虑到中国，更多的是为了世界和平体系。他和胡佛执行的路线与其说亲华，不如说反日，因为日本违反了神圣的国联协议、九国公约及凯洛格和平公约，它极可能使人们为建立新的、有道德的世界秩序所作的努力化为乌有。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变成了一个抽象的概念——在对两次大战之间的和平体系的考验中，中国成为受害者。和平体系在考验中失败了，世界失去了和平体系——而中国失去了“满洲”。

## （二）

1932年11月，美国人民选举了新总统，弗兰克林·罗斯福（F.D.Roosevelt），同时，日内瓦流传谣言说美国对东亚危机的政策可能逆转。1933年1月初，史汀生去见当选新总统，向他汇报情况并企图在备受攻击的胡佛政府最后几周的任期内使政策协调一致。虽然罗斯福的主要顾问都密切关注着国内的严重局势，急欲避免卷入任何海外争端，他仍然同意了史汀生的东亚政策——大概是由于有传统的同情中国人民的思想基础。几天以后，为平息谣言，史汀生请求罗斯福授权照会英国，说明美国的政策没有变化，而且将来也不准备改变。据史汀生关于这次谈话的备忘录记载，罗斯福没有反对他的意见，声称：“既然这是我应该做的事，就去做吧。”

罗斯福不顾自己在1933年1月所表示的意愿，后来他执行的路线和史汀生根本不同，等于又回到了他的亲戚西奥多·罗斯福实行的对日姑息政策。国内的严重困难成堆，加上两次大战之间的和平体系的瓦解所带来的绝望意识，使他只能这么做，没有其他选择的余地。可怕的经济萧条给美国人民的理想及利益造成的威胁，这是亚洲的任何人都无法想像的。甚至在和平运动内部，对世界和平的关切也普遍局限于关心不使美国卷入战争，这就要求对日本即使反对也保持缄默。在政府内外，一种狭义的国家利益的概念占上风，各种利益都是以可计量的标准来对待的，要求诸如商业、投资等看得见的物质利益，偶而也包括传教的权益。一切关于中美两国利益上相辅相成的想法此刻都消失了。

在国务院内部，即使是过去最同情中国的人也对中国政府丧失了信心，并断言在中国政府领导下实现现代化是不大可能的。还有人认为由日本人统治中国对美国最有利——同时也对中国有利！当日本人渐渐越过长城渗入中国本土时，霍恩贝克认为，中日争端的解决可能对美国的利益有害，最好是让日本在一个美国没有重大利益的地区，陷入一场非决定性的斗争。他反对采取可能触犯日本的措施，霍恩贝克认为可以允许“我们远东政策的原则及和平理想”蒙受“进一步小损害”，而以此作为姑息政策的代价并不算高。约翰逊在中国发表意见说，日本人的非法行为对美国没有直接影响。不仅无损于美国，而且“由日本企业开发这一地区，对美国厂商可能意味着更多的销售机会，可以向这个显示出巨大能量的地区出售它所需的机器和其他工业品。”海军上将温赖特（Wain-right）从长江执行任务回来向军事情报部门及国务院的代表汇报说，他认为中国人处于“绝望的痛苦”之中，因此，由日本人统治或许对中国人会有所裨益。尽管海军领导人希望能为海军建造军舰的计划找到理论根据，但30年代初在亚洲舰队服过役的将军们都反对美国替中国人打仗，并就此向政府提出警告，同时，他们对美国在华经济利益的潜力表示怀疑。

在决策过程中，从各个来源集中的意见都支持助理国务卿菲利普斯

(w.Phillips)所说的“我们的不干涉政策。”菲律普斯请来他十分尊敬的马克谟，由后者草拟了一份一百零五页的备忘录，为采取坐视政策提供了出色的理论解释。一位以日本为活动基地的新闻记者，弗莱谢尔(w.Fleisher)顺便来访，他建议采取“一个慎重的政策，不要搞不痛不痒的小刺激。换言之，把史汀生的政策颠倒过来。事实上，这正是我们现在追求的政策”。甚至华尔街杰出的金融家，深深卷入国际事务的拉蒙特(T.Lamont 曾是集体安全的鼓吹者，也是赈济中国灾区工作的领导人)，也认为30年代中期美国政策只能如此，他对约翰逊说，他看见中国处于日本控制之下，深表遗憾，“但是，如果她(中国)缺乏保护自己免受侵略及剥削的能力，她就指望其他国家来替他做这件事”。他说不定倒是很好地总结了罗斯福政府的态度：“当然美国不想找麻烦，以堂·吉珂德式的妄想将日本人的军”。

关于中国政府前途的悲观的报告如雪片飞来，使华盛顿的态度更坚定了。驻在美国的中国人对蒋介石一意抓权，旨在独裁，对其同僚在思想和社会倾向上的保守感到不安。中国大敌当前，面对日本侵略仍不团结，使他们十分震惊。有些人则对国民党内的反美情绪表示愤怒，这些人认为，中国人对美国在中国所起的有益作用不领情。国民党政府很少受到国务院的注意，后者只是在1935年批准过一个美国商务使团。再就是，约翰逊曾作证说蒋介石及其夫人“和大多数中国人不同”，他们举止庄重很像“信奉新教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假如在国民党内外的中国领袖人物坚决认为蒋介石关心个人权力胜于关心中国人民，坚决指出蒋介石根本不抗日，提醒外界不要给蒋介石政府贷款，就很难期望美国赞助或承担中国的事业。1934年4月，罗斯福政府的态度面临第一次考验，日本政府宣布，鉴于日本在东亚的“特殊责任”，它反对外国向中国提供技术、财政或军事上的援助。美国政府考虑对日本的声明置之不理，但英国决定要求日本对它的新政策及它和九国公约的关系予以澄清，遂迫使美国表态提出自己的看法。美国的声明只是表面上捍卫美国的权益，并不掩饰美国决心不向日本挑战的实质。此声明首先以备忘录形式递交日本，向美国公众公布后，紧接着国务卿赫尔(C.Hull)就向新闻界发出呼吁，要求记者们不要写可能刺激日本的捧场文章。

更重要的是，赫尔要求制定政策进一步排除和日本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国务院远东司根据国务卿的要求提出了建议。远东司的官员们比华尔街更关心美国在华经济利益的发展，尽管如此，他们反对政府进一步给中国财政援助，表示可以通过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的援华银行团向中国提供贷款——也就是说，在给中国贷款上与日本人合作。他们要求采取措施不鼓励美国人给中国政府当军事顾问，并坚决要求严格控制向中国出口武器和军用品。援助中国的一切新项目都必须加以掩护，以免刺激日本。中国一直要求平等相待，现在就让它“自己站稳脚跟”吧！不论美国会采取什么行动来推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不论单独行动还是与其他国家合作，都将遵循“实用的”路线，作一个“好邻居”，既不受日本的支配，也不因想援助中国而伤害日本。

大约在国务院决定把避免和日本冲突作为美国对华政策标准的同时，国会通过立法进一步表明美国并不关心中国的命运。几个月来，由内华达州参议员毕德门(K.Pittman)领导的白银院外集团向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提高白银价格。在国会内外有人考虑到提价可能会损害中国的一宗重要的采购白银计划，并决定就此问题进行调查。但是，白银院外集团的实力太强大，也太迫不及待。1934年6月，国会通过了采购白银法案。正如某些人所担心的，

它给中国带来灾难性的影响。由于白银在国外比国内值钱，中国的银元在流通中消失了，开始向东外流越过了太平洋。在中国造成的后果是，通货紧缩和信贷紧缩——急转直下的经济衰退。

在中国的美国商人以及中国政府纷纷向华盛顿提出警告，断言中国经济结构的崩溃迫在眉睫。正当日本的军事侵略削弱了南京对北方各省的控制时，美国的白银政策破坏了中国的通货，削弱了中国政府的统辖能力。对美国人来说，日本军国主义反华十分明显，理应受到谴责，而他们的政府所采取的行动则迥然不同。对中国人来说，美国与日本在动机及做法上的区别是无关重要的。说到底，这好像是在两个刽子手之间任选其一。中国政府请求美国给予帮助，同时，国务院报告说，在南京反美情绪正在高涨。针对美国的中立和冷淡，中日和解的谣言持续地在中国流传。

国务院对中国这种情绪反应最大最快，请总统终止采购白银的计划，或至少以减缓行动来安抚中国。赫尔及霍恩贝克虽然不愿引起日本的对抗，但也不想让美国推行一个实质上反华的方案。但是白银问题还涉及才政部，其部长摩根索（H.Morgenthau），持很不同的看法。摩根索同情中国的困境，但是他和财政部的官员都认为与其停止采购白银，不如给中国政府提供用于货币改革的财政援助。摩根索虽然不愿和白银院外集团竞争，但是愿支持一项援华方案，此方案几乎可以肯定会激怒日本人。国务院不想冒这种风险，建议采取另一个必然会触动白银院外集团的方针。这个集团的发言人，参议员毕德门是参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较低级别上的协调未能使两者立场一致，于是双方都恳求总统公断。

当罗斯福和两位持不调和观点的部下打交道时，他喜欢把他们关在一间屋子里，到彼此达成一致意见为止，如果这一着，或其他类似办法都不成功，罗斯福本人将在两种意见之间摇摆，直到问题自动解决，或者是其中一位部下以计谋胜过了对方。在这一例争论中，罗斯福要求提出一项既不触犯日本也不得罪白银集团的政策。很不幸，唯一看来能符合这些准则的政策就是中国人反对的现行政策。于是，尽管总统经常对中国表示同情，他宣布这个问题是“中国自己的事，并非我们的事；他们如果愿意，尽可制止白银外流，而我们不能只因为中国人不能保护自己就改变我们的政策”。

1935年底，中国人被迫放弃银本位，由孔祥熙发起的，惊人成功的币制改革经受住了美国的冷眼旁观。作为此项计划的一部分，中国政府把白银国有化，然后劝说美国购买大宗白银以帮助稳定新的币制。此后，美国白银政策的起伏涨落对中国不再具有那种压倒一切的重要意义，而中国人可望避免为美国的国内政治付出代价。

1935年和1936年两年期间，日本人继续侵犯中国，而美国基本上仍保持着姑息日本的政策。约翰逊报告说，中国人对美国的不满情绪正在增长，他的反应的大部分是对中国的抱怨表示激忿。他和霍恩贝克经常感到有必要提醒中国人，美国的政策被认为是首先为美国服务的。对中国人提出的建议，凡是他们认为有利用美国之嫌的，便迅速表示反对；凡有机会他们就告诉蒋介石及其同事，美国已经为中国充分尽了自己的力量。霍恩贝克赞成约翰逊对蒋介石的抱怨所作的回答，他只补充说在对华关系中，“我们幸运地处于这种地位，即我们的利益和中国的利益通常是并行不悖的；至少是互不冲突。

（11）

1938年7月，当中国的战局激化，并已发展成为一场大战时，美国的态

度并未改变。霍恩贝克和孔祥熙及中国驻美大使的谈话实质上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声明，美国一直赞成一个“强大而统一的中国”，不过美国制定的政策不只限于援助中国，还应有更多的作为。他声称美国有权按它自己理解的国家利益行事——而中国人有时似乎认为这种权利是他们独有的。

在此后的几周里，蒋介石对美国扮演的角色感到极为恼火，特别是，他认为美国没有与英国合作一起支持中国。虽然蒋介石向罗斯福提出此事，但除了那一点同情以外，他一无所获。而且罗斯福的同情，甚至还不及纳尔逊、约翰逊。他曾写道：“中国人对我大谈美国有责任帮助中国保持独立和完整时，再没有什么比这个更使我马上对我的中国朋友们不耐烦了”（12）。如果说1937年夏天是美国关心中国的最低点，那么当时已在中国、欧洲和美国发展着的新情况，将导致中国成功地利用美国人来反对日本。

## （二）

自从日本袭击“满洲”以来，中国爱国者便要求停止内战，群策群力抵御外侮。中国共产党人在距离日本人几千里外的安全山区根据地，响应民众的爱国热情，于1932年对日本宣战。在几年当中，他们一直号召人民“坚定地反对国民党的卖国投降政策，抛弃对国际联盟及美国的一切幻想”（13）。在1935年7月，当毛的部队北撤进行有历史意义的长征时，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号召建立世界范围的联合阵线，不是反抗国民党等的国内反动势力，而是反抗外国侵略——反抗日本，反抗纳粹主义重新武装德国的威胁。在这一年底，中国共产党号召成立包括一切抗日力量的统一战线。实际上，他们要求中国政府停止反共运动，大力救亡以便和其他许多中国人一起投身爱国事业。

共产党的呼吁不仅获得学生和知识分子的同情，也在受命消灭赤党的政府部队中得到反响。共产党的宣传特别对张学良的东北军产生了效果。这支部队渴望把日本人赶出他们的家乡，却被派往中国的西北和共产党打仗。1936年间，美国官员得到的报告说，张学良的部队和毛的部队友好相处，还报道张学良已接受共产党的基本前提：不能默认日本人的侵略而搞中国人打中国人。斯诺（E. Snow）这个有勇气的青年记者曾穿越官方封锁线到达共产党陕甘宁边区，证实了上述传闻。最后，1936年12月，蒋介石飞住西安张学良的司令部，亲自核查这些谣言，并重整围剿共产党的运动。

12月12日，中国及全世界被突如其来的蒋介石在西安被捕的消息所震动。蒋被军队将领拘留，要求他立即停止内战，立即一致抗日。尽管在西安有要求处死蒋介石的情绪，尽管南方方面不顾蒋介石身在西安，要把西安夷为平地，但是另外一些意见占了上风。在莫斯科及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蒋介石免于死。苏联想加强中国，使之成为抵御日本的屏障，而斯大林认为在1936年，除了蒋介石，中国再没有别人可以统一中国。在蒋介石获释后的谈判过程中，他同意和共产党和解，加入统一战线共同抗日。

1937年元旦，《大公报》预告一个新时代的来临：“从今中国只有统一战线，而无内战”（14）。全中国爆发出巨大的爱国热情，备受攻击的蒋介石变成民族团结的象征。在中国的美国人也为这一片欢腾而备受鼓舞，外交官和传教士们也开始以比较赞许的口吻谈起蒋介石，有时甚至把他看作救世主。一本据说是蒋介石在被囚禁时读过的圣经也拿出来展览，如果上帝注定中国走另一条道路，这本圣经无疑会成为一件伟大的基督教文物。连美国政府对实现团结的能力也不那末悲观了。美国外交人员并不是看不到国民

党政府依旧存在的各种弊端，他们也许倒是刚出现的一线希望过分热情了。1937年7月，当中国展开全面抗战时，至少霍恩贝克更倾向于觉得要制止日本侵略。

美国人对亚洲战争最初的反应，反映了深刻的中立主义及和平主义情绪，由于世界未能阻止日本人入侵“满洲”，令人大失所望，中立主义、和平主义情绪笼罩全美国。美国政府，特别是赫尔屈从于和平运动内部的压力。政府的船只承运的一批轰炸机在开往中国途中受阻。罗斯福对政府将在多大程度上保护在中国的侨民犹豫不决，自然希望他们都回国使问题简化。在德策尔(D. Detzer) (国际妇女争取和平与自由联盟) 和利比(F. Libby) (制止战争全国理事会) 领导下，和平主义者发起一个要求从战区撤回美国侨民的运动。在30年代，许多美国人，或许大部分美国人都认为美国错误地为少数人的利益而介入了世界大战，他们决心不再重蹈覆辙。

假使罗斯福现在的行动与其是为姑息日本，不如是想安抚美国公众，这对激愤的中国人来说并没有什么两样。但是如果美国政府被中国提出的要求惹恼了，那么日本对美国的政策明显地表示满意更使美国政府处境尴尬，美国驻日本大使格鲁(J. Grew) 曾笨拙地强调对日友好政策。约翰逊在南京再次警告说，反美情绪继续在中国人当中发展，甚至认为在中国的美国人已处于危险之中。但是罗斯福想出一个步子不大又无痛苦的办法，也使中国人得到一些满足。他利用日本决定不宣战这一点而使美国不受中立法约束。中立法是从世界大战的“教训”中产生的，它制止向交战国出售武器、弹药和扩大贷款，也不允许用美国船只和交战国做生意。此项法律的意图在于使美国超脱于战争之外，避免介入与交战国有关的事务。据认为，在1917年，美国曾因此被卷入战争。罗斯福的不执行中立主义，从理论上说，是支援了中国人。中国在没有戒备的情况下遭到日本的袭击，和侵略者不一样，中国需要从国外购买战争物资。实际上，这种明显的偏爱并没有给中国人提供什么，只不过是一种道义上的支持。在1939年以前中国没有得到过贷款，从美国运往中国的战争物资也微不足道。在这个问题上，罗斯福神经紧张地顶住了和平运动。经受住他们的攻击——攻击他对中国的偏爱，再次证明，美国人是乐于帮助中国的——如果说他们袖手不介入也算是帮助中国的话。

但是，日本的进攻接着欧洲和平希望的暗淡，迫使罗斯福及全世界的好心人不得不重新考虑他们自己国家的和平与安全所面临的危险。美国在“满洲”，然后在华北，在埃塞俄比亚；现在又在中国统治以外地区的利益，也许并不值得冒战争的风险。鉴于暴力行动向海外扩展，条约义务已遭破坏，人们对30年代中期的民族主义感到不安，又提出了实行国际合作及集体安全的必要性。戴维斯(N. Davis) 曾任外交官，是赫尔的密友及顾问。像他这样的人会欣然地承认“我们在远东的利益不值得冒战争风险”。并接着说：“但保持集体行动，或打败像日本这样的侵略者则可成为值得我们为之发动战争的原则”(15)。戴维斯的一番话使那些以狭隘观点看待国家利益的人感到震惊。罗斯福在和这些人谈过话后，自己探索着答案，在1937年10月5日，他发表了著名的“隔离”演说，暗示面临“世界无视法纪的传染病”，把那些传染病患者检疫隔离，可以保全世界大家庭。虽然这位总统实际上并没有任何方案，而且当被问及他建立“隔离”的想法所涉及的各种问题时，他越来越含糊不清，但是集体安全的鼓吹者们却因有他这篇演说而士气大振，同时，以和平手段制止日本侵略的可能性也使绥靖主义者感到兴奋。



11月，由英国倡议在布鲁塞尔召开会议讨论日本的侵略行动给九国公约其他签字国带来的影响，由于罗斯福从他自己演说的暗示上退却了，会议毫无结果。但是，率领美国代表团的戴维斯指出，美国首先考虑的并非中国，但是，“我们不把这个问题仅看成是一个远东问题，而把它当做一个世界问题，世界上代表法律秩序的力量都直接关心如何制止侵略和无视法律的行为”（16）。但是此刻美国公众和国会的舆论不利于从世界大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的人们，而罗斯福，不论他本人的信念如何，却保持沉默。经过1938年直到1939年，日本人奋力推进，轰炸和平居民，残害来不及逃亡的群众，而美国仍不参战。美国人的财产受到蹂躏，一艘美国军舰被炸沉，美国的商业遭损害，美国公民被杀害——但是世界大战的“教训”仍处于支配地位。美国不会为了少数投资者的利益，为少数商人和在战区出生入死的愚蠢的传教士们再次陷入一场战争。

美国人民不情愿去为中国人战斗，但是他们也不愿在同情谁的问题上表示犹豫。对那些想帮助中国的人（姑且不论其动机如何）来说，根本问题是要想出一个既能利用亲华情绪又不至于引起战争恐惧的办法。“美国不参与日本侵略委员会”在很大程度上完成了此项任务。这个组织是由曾在中国当过传教士的美国人发起的。一个由基督教家庭领导的、重新点燃起在中国成功希望的运动，使许多美国的教会都站在蒋介石一边。在中国时，有些美国传教士成为蒋介石反共运动中的基督教骨干，回国后更多人形成一个替蒋介石游说的强有力的院个集团——不仅是从1937年到1941年，反对日本，后来当美国想从中国再度爆发的内战脱身时，他们也起了作用。

在急于设法惩罚侵略者的集体安全鼓吹者们和中国政府的同谋下，这些中国的朋友帮助动员美国舆论，集中要求停止对日本输出一切战争物资，虽然在美国很少有人支持采取正面行动援助中国，但是美国人对被指控为日本侵略战争的同伙和日本战争机器的供给者感到十分不安。1939年春，一项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被询问的绝大多数美国人都赞成在战争物资上对日本实行禁运，因此，对日本实行制裁的政治条件已经具备——如果美国政府愿意对日本实行制裁的话。

约在同时，欧洲的形势更加恶化，罗斯福想修改中立法，以便于支持英国。由参议员毕德门对中立法提出修正案，把“现购自运”\*的概念延伸到武器和军火，将允许任何有货币和运输能力的国家从美国购买它所需要的任何物资，这样就相对地减弱了对亚洲战争的关注。英国从中得到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可以想见，如事先有人警告希特勒，英国有能力通过“现购自运”接受外援的话，他也许会重新考虑是否要发动战争。如果将“现购自运”法案应用在亚洲战争上，显然对中国没有什么好处。中国既无钱也不具备把物资从美国运回来的手段。日本控制着西太平洋，至少控制着每一个可能进入中国的港口。中国人对这件事大为震怒，孔祥熙发电，在一份声明中明确阐述了他的政府对此问题的看法。中国政府了解美国的行动是为了“美国的最大利益和帮助欧洲的民主事业”，但是不安地注意到在这项法案中对侵略者和受害者不加区别，“因此，必将使中国在日本的侵略下处于不利的地位”（17）。

虽然国务院修订中立法计划对中国毫无裨益，也未终止对日本出售战争物资，霍恩贝克和“不参与日本侵略委员会”的成员一起推动参议员毕德门建议通过一项单独的决议案，规定总统有权限制美国 and 任何违反九国公约

的国家进行贸易。鉴于罗斯福及赫尔都不愿为制定公开排斥侵略者的立法而奋斗，这一排斥日本的办法可作为“现购自运”法案为英、法两国所提供的援助的补充——这是让中国满意的起码东西。

还有其他对日本进行经济制裁的议案被提交到国会，但是尽管各对华友好组织及集体安全的倡导人极力进行游说，仍然徒劳无功，罗斯福和赫尔高兴地看到美国的和平主义情绪已趋于缓和，使政府有较大的行动自由，便反对进行经济制裁，以在对日关系上显然保持最大的灵活性。1937年7月，在华盛顿展开的一场大规模的游说活动以失败告终。有一位说客，把失败原因归咎于“似乎每个人都更关心中立法案和欧洲，而不关心对日本实行禁运。”（18）

美国政府感觉到，要求对日本采取行动的壓力在加强，便出其不意地照会日本，提出希望中止两国间现行的商业与航运条约。由于这个条约经常被列举为实行经济制裁的障碍，所以已经不能再把它作为对日贸易的借口了。但是政府对如何进行经济制裁心中无数。担心在欧洲形势恶化之际对日本采取严厉手段会导致危机，赫尔遂选择最安全的做法，就条约问题照会日本，以此鼓励中国并使政府摆脱由亲华游说集团制造的压力。几个月来国务院确实在考虑中止条约问题，因为国内的棉纺工业不断对政府施加压力，并且威胁到一项赫尔最得意的互惠贸易协定计划。1940年1月当此项条约期满后，赫尔对要求实行经济制裁的活动继续加以阻挠。只要欧洲还在打仗，对日本采取经济制裁的风险太大了。

附表四美国对中国及日本的出口（1932—1940）

年代/出口价值（以百万美元计）/占美国出口总额比例中国/日本/中国/日本

1932/56/135/3.5/8.4

1933/52/143/3.1/8.5

1934/69/210/3.2/9.9

1935/38/203/1.7/8.9

1936/47/204/1.9/8.3

1937/50/289/1.5/8.6

1938/35/240/1.3/7.8

1939/56/232/1.8/7.3

1940/78/227/1.9/5.6

中国政府内部，对罗斯福政府的怨恨在增长，虽然中国人明白，一个共和党的政府更不可能在1940年给中国提供援助。美国的对华友好人士开始反对政府的政策，他们多半不能理解罗斯福对欧洲和亚洲战争二者之间的相对重要性是如何估价的。但是，主129张对日本实行经济制裁的一派，有不少人更多关心集体安全而不是关心中国。随着战争在欧洲爆发，这些人把精力转移到了他们认为更需要的事业上去：支持大不列颠。直到1940年夏，当日本对英国及法国在东南亚的地位作出挑衅的姿态并重新开始向纳粹德国调情时，美国才采取有效的行动来阻止日本的战争努力。甚至此刻罗斯福还听人劝告没有阻止向日本出售废铁及石油，事实上，在此后的一年里出售给日本的石油制品数额剧增。

当美国支持英国的决心已十分明显，同时罗斯福政府除战争以外的全面援助政策也已形成后，中国的朋友中最机警的人士如“不参与日本侵略委员

会”主席格林（R. Greene），意识到如果指望美国能给中国以援助，必须把中国和英国的战争联系起来。虽然格林在面向欧洲的主要集体安全组织“支援盟国保卫美国委员会”（又称白色委员会）中也十分活跃，但是格林却无法使他的同事们接受他的想法，把中国当作盟国中的一员。在整个美国，不论人们支持或反对罗斯福对英国的援助政策，他们都全神贯注于欧洲，并不关心亚洲。国务院中大多数人怀疑亚洲战争造成的后果是否值得美国去冒制裁日本的风险。美国人民中有一部分人如“白色委员会”及“首先是美国”组织的成员虽然为此积极地试图影响美国的政策，但还是把亚洲战争不当回事，相对而言，是由不太重要的人民为了不太重要的争端而进行的一场不太重要的战争。在美国人民中不乏同情中国的人，只是当“真实世界”遭到希特勒主义的危害时，他们怀疑亚洲的实际意义。格林要想在进一步制裁日本或援助中国方面获得支持就必须设法证明欧洲和亚洲战争之间的关系，使关心英国存亡的人们认识到日本同样威胁着英国；并使他们了解中国也正在为美国的安全战斗。格林并没有成功，可是1940年9月27日，日本和德国、意大利签订了三国同盟条约，反而使格林有可能完成他的使命。

尽管美国人对中国怀有巨大同情，但无论是中国人还是他们在美国的朋友都没能做到使美国人认识中日战争的后果和他们本身的利益有关系，而日本决定和纳粹德国结盟却有效地做到了这一点。对“支援盟国保卫美国委员会”的领导人来说，三国同盟已使两场战争合而为一，“现在似乎可以说中国明白无误的是一个盟国，”（19）值得委员会给予支持。霍恩贝克也强调说，援助盟国适用于各条战线，因此也可以像援助英国一样给中国以援助，并建议委员会向所有抵抗轴心国的国家提供援助，同时，在经济或其他方面限制对轴心国的援助。全国委员会的会长艾克尔伯格（C. Eichelberger）写道：“英国和中国在太平洋，以及英国在大西洋，现在构成了我们的第一道防线”（20）。此后日本就只有看着美国增加对华援助，而更为重要的是，日本在不撤军的情况下谈判和平解决已不可能了。美国作出的反应使中国成为新的轴心同盟的主要受惠者。

在几年当中，美国对中国的唯一援助是由财政部购买中国的白银，当时中国币制已放弃银本位。但这些购买也是有条件的，必须绝对无损于美国。摩根索只考虑美国的利益，对通过购买白银为中国提供偿还他国贷款不感兴趣。1939年2月，美国向中国提供二千五百万美元桐油贷款，并限定购买美国的农产品及工业品，1940年4月，又提供二千万美元类似的贷款。另一方面，苏联已给蒋介石政府五倍于美国的援助，以贷款形式采购军需物资。在三国盟约以后的六个月里，美国一共提供九千五百万美元贷款。1941年5月6日，中国取得从美国获取租借物资的资格，但是石油继续源源不断地流向日本，罗斯福政府按照它自己认为合适的步调推行一项鼓励中国，限制日本，使美国置身于太平洋战争之外的政策。

1941年7月底，日本人出现在印度支那南部沿海的金兰湾。姑息政策未能制止日本前进，罗斯福提醒日本大使注意，美国政府由于允许继续向日本输出石油受到尖锐的批评，这种批评在对华友好人士和主张集体安全的人当中大为增长。在政府中，摩根索和现任国防部长的史汀生以及国防石油部门行政官伊克斯（H. Ickes），霍恩贝克等人敦促政府冻结日本财产，对石油实行彻底禁运。副国务卿萨·韦尔斯（S. Welles）代表国务院及急切希望避免和日本摊牌的军方领导人作最后的努力，终于成功地说服罗斯福同意授权颁

发许可证让日本购买某些品种的石油，尽管给日本造成严重压力，同时得到美国人民极大的赞许，但是，并不彻底。1941年整个秋天在华盛顿举行了日美高级会谈，使中国人及他们在美国的代言人对此感到忐忑不安。

在中国，毛泽东提醒其党内同志注意出现“远东慕尼黑”的可能性，和美国政府及白宫有直接接触的蒋介石也毫不隐瞒他自己的忧虑。在中国的美国人的警告说，蒋介石政权的士气下降，假如美国和日本达成新的谅解，正在中国增长的失败主义情绪将是不可抗拒的。此刻美国军界领导人正敦促政府暂时对日本采取妥协态度以为建设美国的防御力量争取急需的时间，将精力专注于大西洋彼岸生死攸关的重大问题。而蒋介石却在华盛顿发出的一片呼吁声中，要求美国放弃再次牺牲中国姑息日本的念头。于是丘吉尔发来电报：“蒋介石怎么样了？难道他还不够困苦吗？我们为中国担忧，他们一旦崩溃，我们共同的危险将大大增加……”（21）。当天下午赫尔答复了日本的建议，虽然他明知日本是不会接受这个答复的。同时，他也知道这是日本提出最后一次建议了。

日本在东南亚进行军事演习加重了英国的焦虑，它随后加入了轴心国，在这以前姑息日本一直是美国一项容易执行的政策。后来，甚至当日本可以考虑牺牲三国同盟条约时，美国承担了支援英国的义务，中国取得了同盟国地位，这才避免了美日两国间的妥协。回到姑息政策上去，意味着让中国及其在美国的朋友心中的希望落空；意味着出卖一个新近才贴上“民主”标记的国家，出卖反侵略同盟国中的一员；此外，还意味着罗斯福要冒被指控的风险，指控他只热衷于为英国火中取栗。有些人则认为这种形势可能导致中国对日单独媾和，给美国及英国在东亚的利益带来不祥的后果。但是，中国人及他们的朋友终于成功地达到目的。美国一旦停止向日本提供“战争物资”就不可能再去充当死亡的商人。一旦宣布和中国团结一致，就不能再回到对中国的危难冷眼旁观的被动地位。于是战争来临了。

#### （四）

战争来临，中国成为一个光荣的盟国，但只是一个二流盟国！尽管日本人袭击了珍珠港，罗斯福及其顾问们仍把注意力集中在欧洲的战斗上，他们坚持相信最大的危险来自德国，而英国是最重要的盟国。分派给中国的角色是牵制住日本，使其无暇旁顾直到盟国在欧洲完成主要的任务。假如说中国这块沼泽地1935年曾经是使日本人陷入泥坑的好地方，那么至少在1942年它还是同样有用的。罗斯福和丘吉尔及斯大林一样，不给蒋介石有参与战略或后勤决策的平等地位，只答应向中国提供其他地区不需要的物资，认为能找到办法越过日本占领区或喜马拉雅山运送这些物资。

中国把日本轰炸珍珠港当作救援到来的时刻而感到庆幸，但是美国的反应却使中国极度失望。到1942年1月，中国对美国的仇视态度如此严重，以至国务院提醒罗斯福有必要取消邀请蒋介石夫人访美的原定计划。蒋介石未得到他认为理所应得的兵力或物资供应，他由此要求美国提供五亿美元为维持中国的士气所必需的贷款。虽然摩根索对这笔贷款在财政上是否可行有严重保留，驻重庆大使馆也对它的用途持怀疑态度，但是政治上的考虑终于占上风，蒋介石得到了他所希望的贷款，而且不附带任何限制条件。不过这次贷款谈判对在两个盟国间建立互相信赖的基础并未起到作用。

1943年初，美国政府及国会都给予中国非援助性质的安慰。美国政府签署一项条约放弃了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并获参议院欣然默许。中国人抱怨说

没有从租借物资中得到公平合理的份额，国会不能或不愿加以纠正，于是代之以投票废除从美国驱逐中国移民的法案。以上两个姿态都不妨碍大西洋两岸战争的进行。中国人及其美国朋友对美国表示尊重中国的新姿态感到高兴——但是他们并不满足。

除因美国全神贯注于欧洲战场外，还有另一个重要障碍使蒋介石从美国得到大量援助的希望难以实现，即长期来人们确信蒋介石无意抗日而热衷于利用一切援助加强个人在中国内部权力斗争中的地位。尽管公众对中国人的“英勇斗争”所表现的热情有增无减，到1938年夏天，在中国的美国外交官及军事观察员确信蒋介石已停止对日本战斗，国民党政权正在“保全自己，不久可能会撤回它的精锐部队及装备以确保在国内政治斗争中的优势”（22）。

1940年，蒋介石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又明显地趋于紧张。在1941年1月，政府军和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之间发生一场重要的战斗。英美两国政府敦促国共和解均未见成效，虽然在日本战败前双方维持名义上的停火。1941年夏天，美国大使馆警告说，希望国共两党改善关系纯属幻想，未来的敌对行动是不可避免的。1941年秋天，由马格鲁德（J. Magruder）将军率领的美军代表团来华，他们也报告说，蒋介石要求按租借法案提供装备并非用于抗日，而是准备等其他国家把日本人逐出中国后，用来抵御叛乱保护他的政府。蒋介石要求美国派一名将军担任他的参谋长，并建议最好推荐过去没有到过中国的军人。美国军界对此作了最坏的猜测。

由于两国优先考虑的问题互相冲突，彼此互不信任，在这种气氛下，中美两国政府之间保持融洽的关系是不大可能的。选拔史迪威（J. Stilwell）将军出任蒋介石的参谋长后，任何改善关系的可能性都消失了。史迪威虽然是一位出色的军人，却不长于外交。过去在中国的经历使他对中国人民，即老百姓十分钦佩，对剥削他们的领导人则持藐视态度。蒋介石必然对史迪威不满，他们个人之间者，他给蒋介石取了个浑号叫“花生”，史迪威在日记中以粗俗的语言和打油诗描写他和蒋介石的冲突，此外，他也记叙了在宋子文家吃烤猪的愉快情景。

当史迪威及美国大使高斯（C. Gauss）抱怨蒋介石部队不愿与日军交战时，蒋介石就抱怨他从美国得到的援助太少了。当美国拒绝在中国加强抗战之前提供更多的援助时，中国人则坚持不得到更多援助就不能加强抗战。在整个战争期间，就这么无休止地轮番兜圈子。沮丧愤怒的情绪在增长，在中国的美人开始寻觅有志抗日的中国领导人。蒋介石越来越把怒火集中在史迪威身上，他有棱角的个性很容易被当作靶子——当重庆和华盛顿的诸神已预备好霹雷时，他显然是一枚避雷针。

国务院、国务院和财政部对蒋介石的同情日益减弱，反映了他们的大多数驻华代表对中国政府的强烈敌意，但是蒋介石在华盛顿仍不乏有势力的朋友。特别是罗斯福的密友霍普金斯（H. Hop-kins），他特别同情中国，毫不理会那些似乎总是给他的人道主义事业作梗的官员的共同意见。中国政府及其朋友通过霍普金斯与罗斯福建立了一条非正式的联系渠道，有时成功地克服了专家们对各种援华计划的反对意见。最著名的是陈纳德（C. Chennault）提出的以空军赢得战争的计划。他的部队素有飞虎队的美称。陈纳德的计划很有吸引力，因为实行这一计划可以把蒋介石的军队留作后备。罗斯福克服了他的参谋长马歇尔将军的反对，批准了陈纳德计划。结果是灾难性的。陈

纳德猛烈的空袭导致日本的进攻，他的防御不足的机场遭到蹂躏。由于蒋介石不愿给驻守机场的部队补充给养或派增援部队，加重了这场灾难。原因是，蒋介石怀疑驻军的将领对他不忠诚。

在中国的美国人憎恶中国政府抗战不力，还掺杂着对这个政权的国内政策的反感。国民党领导层极端保守，以日趋反动来应付战时的各种压力，在一些美国人看来，国民党并不比纳粹好。在重庆给国务院的报告中，充满了对国民党的盖世太保戴笠的蓝衣社镇压不同政见者和残害知识分子的绘声绘色的描述。华盛顿官方对臭名昭著的“CC派”头目陈氏兄弟的活动也了如指掌。二陈是蒋介石的心腹和顾问，他们代表政府的反动倾向，其党羽的贪污罪行甚至使长期来对贪官污吏已司空见惯的中国人感到震惊。

相反，美国外交官、军官及战地记者们对共产党控制区实现土地改革的报道印象深刻，事实证明共产党确在和日本人作战，同时，共产党在重庆的代表周恩来的魅力也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些美国人得知蒋介石的五十万精锐部队不参加共同的抗战大业，而用于封锁共产党，不禁万分惊骇。他们不仅希望这些政府军能被用于抗日，也希望国共两党之间的统一战线能够实现——他们希望看到把毛泽东的武装置于联合的指挥之下。在战争进行过程中，这些观察家感觉到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正在背离政府。情报部门的报告表明，共产党作为一股进步的、富有战斗精神的抗日力量越来越得到人民大众的拥护。然而担心也正在增长，担心国民党政府等不及打败日本就要恢复积极的反共运动以消灭共产党。对这种担心两个互相斗争的政党的形象开始从官方函件中泄漏出去，见诸公开的印刷品。美国报纸和流行杂志开始发表关于蒋介石政府面貌的不加恭维的报道，甚至像赛珍珠(Pearl Buck)这样的一些中国老朋友也对此公开表示关切。

美国政府决意防止中国爆发内战——至少避免在抗日战争结束前爆发。中国人被动地进行抗战比完全不抗战要好些。美国的外交人士幻想最好有一个改良的国民党与共产党协同抗日，并建立一个自由民主主义的政府。为达到这一目的，他们坚持内部斗争应采取和平解决办法，并不断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促进中国的经济和社会改革，认为这是保存这个政权的当务之急。此外，美国寻求多与中国共产党接触，并更多地了解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情况。

两年半的战时“合作”中所产生的沮丧和焦虑在1944年春到了严重关头，是年罗斯福请求副总统华莱士(H. Wallace)前往中国解决问题，蒋介石和罗斯福曾于1943年12月在开罗会晤，当时在尼罗河畔有过愉快的时刻，但是后来蒋介石又提出要一笔巨额贷款时，欢快的气氛顿时消失了。以罗斯福具有的魅力也无济于事，盟军在欧洲反攻之日已经在望，再给中国更多的援助势不可能，于是罗斯福转而采取喜用的临时办法，派出私人特使。华莱士六月抵达中国，正值日本人展开攻势，他看到蒋介石情绪低沉，局势令人丧气。蒋介石同意美国派军事观察团去毛泽东的总部所在地——延安，几周前已经有一批记者先行到达延安。针对华莱士不满中国的抗战不力和政府失去民心，蒋介石暗示，美国人，特别是史迪威对此负有责任，并指出美国人过于轻信共产党的宣传，以此作为对华莱士的反击。蒋介石使华莱士明确地意识到他希望摆脱史迪威，或是派一位总统的私人代表来中国就近约束史迪威，并为蒋安排可以越过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直接与总统对话的正式联系渠道。

罗斯福派出蒋介石所要求的私人代表赫尔利将军(P. Hurley)。但蒋介石

石手里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陈纳德计划的失败，加强了国防部内史迪威的支持者的地位，蒋介石在高层仅有的少数朋友的影响也被削弱了。企图玩花招转移目标不是时机，因为在 1944 年夏天，美国人还没有多少理由害怕共产党。确实，战地记者、军事观察员和外交官从共产党控制区发来的所有报告都表明毛泽东的政策远比国民党的政策接近于美国人认为对中国极为重要的纲领，它比国民党所能提供的任何纲领都重要。在国防部的敦促下，罗斯福要求中国对日本发动一次攻势，并坚持由史迪威指挥全部中国军队，罗斯福不再摇摆，他坚定地站到史迪威一边，他已对中国政府失去耐心，于是便向它挑战，史迪威无法掩饰自己的高兴，他亲自把罗斯福的信件递交蒋介石。史迪威本性太过于直率，使得中美双方政府都误认为两国政府关系紧张是由蒋介石与史迪威两人个性相悖造成的。蒋介石不能容忍这种侮辱，直接的后果是，他成功地要求美国政府把史迪威召回——这是“一个垂死的，反民主政权的胜利”（23）。但是，正如当代多数观察家所看到的，更值得注意的结果是，蒋介石要在中国一意孤行，而美国将寻找其他办法给日本以最后的打击。美国人希望中国成为主要战场的想法于 1944 年 10 月完全消失了。日本人投降前几个月的事态发展主要是为中国战后的权力角逐设置了舞台。

#### （五）

在罗斯福出任总统时，对国家施政优先考虑的问题并无争论。使人民吃饱，有工作，摆脱经济衰退，结束内战以来最严重的危机——再没有什么比以上任务更紧要了。中国在危难中，罗斯福和他的人民在感情上时常关怀着中国人民，但是，美国国内状况已完全吸引了他们的感情与精力。

与此类似，美国曾协助建立在 20 世纪 20 年代存在过的和平体系和国际社会意识，现在和平体系已经瓦解，国际社会的意识也不复存在。在 1931 年以后世界又回到了混乱状态，美国人对此感到负疚，但是这罪责无论如何也不能全部或大部分由美国承担。他们没有单方面恢复秩序的义务。他们对东亚建立美国统治下的和平，既没有这种愿望也不具备这种手段。中国从理论上讲，是侵略的受害者，他们对鼓吹集体安全的人十分关切，但在 1937 年以前，这些人尚处于极小的、不起作用的少数派地位，而当希特勒转移侵略的重要目标时，这些人也把他们对中国的关注转移到其他方面去了。

在整个 30 年代里，罗斯福同美国人民几乎一样不关心亚洲事态的发展。尽管他不时侈谈对中国有感情，他对中国的命运并不关心，认定美国在华利益微不足道，他不愿承认日本霸占中国会危及到美国。在华盛顿出现这样一种论点：认为中国的大片陆地对日本人的作用正像当年俄国大陆对拿破仑的作用一样。只要日本人在中国大陆上越陷越深，他们就不能再祸害其他人。这一论点还延伸到日本袭击珍珠港以后的战局。为保障美国的利益，给中国人足够的援助使他们能战斗下去是重要的，但是并不需要援助他们去取得胜利。假使他们不肯抗战的话，亚洲事务可以等大西洋彼岸生死攸关的重大问题解决以后再议。解放中国的战斗只不过是反轴心战争的一个侧面——并不是美国需要优先考虑的重要问题。

在中日战争的前 3 年，美国自愿成为日本战争机器的最重要的供应者。在日本袭击珍珠港前的 18 个月中，美国开始拧紧螺丝，对日本加强控制——并不是忽然关心起中国来了，而由于日本向南突进所造成的威胁，最终是由于它依附于罗马-柏林轴心。于是，中国被转变成一个“盟国”，但并非真正的盟国，而是一个象征性的盟国，正如它被转变成一个“民主国家”，却不

是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中国得到了作为一个盟国所享有的赞誉和一定程度的忠诚，但是，很少享受到盟国的实质性地位。战争的经历并没有带来什么变化，因为中国政府的作为不能改变美国对它的抗战决心以及潜在的生存能力作出的评价。在美国方面，美国人放弃了他们在“不平等条约”下取得的最后一部分特权（至少在理论上如此），而且在战后常常把中国当做一个大国来谈论。直到1944年，当罗斯福不能或不愿对蒋介石作实质性的承诺时，他几乎像东方人一样给蒋介石“面子”。

罗斯福把中国当作一个大国的设想最终在联合国组织中得到体现——部分是为了补偿中国在战时受到的怠慢。但是罗斯福及其顾问们的这一做法，也基于这样一种考虑，即认为中国感激美国，依赖美国是丘吉尔所怀疑的美国玩弄的“拉选票”把戏。如果罗斯福读过蒋介石的著作《中国之命运》或者对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有所了解，他就会明白，中国的两支主要力量对帝国主义的仇恨，都把美国包括在内。如果罗斯福回顾其政府的对华政策，他将会认识到美国人自命为中国的保护者是多么荒唐可笑。不管中国人也许会愿意给苏联点什么东西，罗斯福在雅尔塔遵循美国对谁控制“满洲”都无所谓的态度，事先未征得中国同意便出面处置中国的领土，这种做法自然很难说会使中国高兴。在罗斯福任职期间，再次说明美国的政策是为满足美国的利益制定的，并不特别地考虑到中国。中国从中受益这一事实既非美国政策本意，也是不可否认的。罗斯福的东亚政策没有什么可使美国人抱怨的——而中国人也没有理由为之感激。

#### 原书注释

总领事 Willys Peck, 于南京, 报告和宋(子文)会晤情况, 1931年12月8日, 893.00/11656, NA。

备忘录, 1931年9月24日, 793.94/1889NA。

会晤录, 1932年5月24日, Papers of Nelson T. Johnson, 国会图书馆。

引自 Peck, 1933年1月7日, 893.00/12284NA。

电话记录, 1933年1月13日, 793.94/6064NA。

引自 Dorothy Borg,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Far Eastern Crisis of 1933—1938*, Cambridge; 哈佛大学出版社, 1964, 569 (脚注 101)。

Johnson 致 Hornbeck, 1933年6月1日, Papers of Nelson T. Johnson, 国会图书馆。

William Phillips 的日记, 1935年6月24日, 哈佛大学。

Lamont 致 Nelson Johnson, 1936年5月19日, Papers of Nelson T. Johnson, 国会图书馆。

引自 William Phillips 日记, 1934年12月12日, 哈佛大学。

(11) Hornbeck 致 Johnson, 1937年3月13日, 711.93/350, NA。

(12) 引自 Borg,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Far Eastern Crisis*, 第315页。

(13) 引自王建明(译音)著《中国共产党史稿》, , 台北, 1965, 第33页。

(14) 引自 Jerome Chen 著《毛和中国革命》, 牛津大学出版社, 1967年版, 第230页。

(15) 引自 J.P. Moffat 日记, 1937年9月29日, 哈佛大学。

(16) Davis 致 Anthony Eden, 引自 J.P. Moffat 日记, 1937年11月2



日，哈佛。

(17) 胡适大使递交 Pittman, 1939 年 4 月 10 日, sEN76A-F9CFRNeuralityChina-Japan, Papers of the 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 NA。

(18) 未注明日期的备忘录[1939 年 7 月], Papers of Harriet Welling, 芝加哥大学。

(19) Chark Eichelberger 致 William Allen White, 1940 年 10 月 1 日, WithEnclosure, Papers of William Allen White 国会图书馆。

(20) Eichelberger 致 Mrs Lewis Mumford, 1940 年 10 月 22 日, WithEnclosure, Papers of the Committee to Defend America by Aiding the Allies, 普林斯顿大学。

(21) 引自 Herbert 著 Road to Pearl Harbor, New York, 1962 年版, 第 318 页。

(22) 总领事于汉口, 致国务卿, 1938 年 8 月 16 日, 793.94/13695, NA。

(23) 引自《纽约时报》, 1944 年 10 月 31 日。

译注

霍布斯 (Thomas Hobbes, 1588—1679)

英国哲学家, 机械唯物论者。他认为支配人的行动的根本力量是“自我保存”, 在没有建立国家以前, 处于“自然状态”的人类为保存自己, 相互间进行残酷的斗争, “人对人像狼一样”。为避免这种恶果, 达到更好地保存自我, 就要订立共同契约, 把自我保存的“自然权利”交给一个国家政权, 从而建立国家, 使社会得到安宁。

现购自运法案 (Bill of Cash and Carry)

现购自运法案是美国中立法案的一部分。从 1937 年到 1941 年间, 美国根据这一法案继续供给日本人大批军火, 并逐年增加, 直到爆发珍珠港事件为止。

租借法案 (Lend—Lease Pact)

1942 年 6 月 2 日在华盛顿正式签订中美租借协定, 规定将通过磋商陆续向蒋介石提供八亿七千万美元的租借物资。

“熏鲱鱼” (Red Herring)

此成语出自使用熏鲱鱼训练猎犬跟踪, 引喻转移人之注意力。

结伙选举 (Faggot Vote)

政党为使某人有投票资格而使其成为名义上的财产所有者之投票权。

## 第六章 共产主义在中国

### (一)

出于推动中国抗战的愿望以及制订战后计划的需要，美国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关切加强了。美国对这个问题的关心可以追溯到“五四”运动时期，和毛泽东同时对共产主义发生了兴趣。关于布尔什维克对中国影响的报告送到华盛顿以后，国务院特设立专案，对这一新现象的性质、程度及意义开始了经常性的调查研究。虽然美国此时正处于“红色恐怖”及“帕尔默袭击”\* (Palmer's Raid) 时期，美国人最初对中国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反应是冷静的，甚至是同情的。一般说，在中国的美国人，如外交官、陆海军军官及访问学者们，都承认那些正在阅读马克思译著，满口马克思主义词句的学生们具有高度爱国热情。他们看到中国知识分子正在苦苦求索，希望找到一个能“拯救”中国的办法。因此，他们在中国学生和教授们的书架上发现马克思著作和其他乌托邦哲学家的作品并列在一起并不感到惊奇。美国政府在收集有关的情况方面给予足够注意，但是在1920年到1921年间，美国首要问题是排除大恐慌，发生在中国的事件毕竟是太遥远了。

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美国的观察家们已经注意到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但是他们更多地关注那些苏联鼓动分子以及苏联以帝国主义的态度反对帝国主义，而不那么注意中国共产党人。1924年，美国公使曾对总统说，中国的动乱可能产生一个非西方化的政府，并认为“俄国政府的苏维埃形式可能适用于中国的村社”。但是，他也抱怀疑态度，认为“共产主义对中国人的生活、感情及社会体制都是完全陌生的，而且无产阶级专政和遍布全国的完全自治的（或无管理体制的）、蜂群般的家长制家族社会的民主性质是完全抵触的”。一年以后，休斯顿（美国驻广州副领事）指出，连俄国人也不再强调“纯粹共产主义的教条”，而是把新的重点放在列宁民族解放战争的概念上，放在反对帝国主义上。鉴于骚乱在中国蔓延，特别是在1925年的“五卅”事件以后，美国人如马克谟等均对布尔什维克的影响表示忧虑，不过确信共产主义不会在中国成功的想法十分强烈，所以在伴随北伐出现的危机期间，华盛顿官方一直保持冷静。柯立芝 (Coolidge) 政府认为民族主义运动的胜利将成为中国（也是世界的）抵御苏联帝国主义最好的保护措施。当美国人理解到蒋介石与共产党分裂的重要意义时，他们本能产生的信念加强了，即在中国最终会出现一个自由、民主和友好的政府。

自1927年开始了白色恐怖，共产党人转入隐蔽以后，美国人在搜集有关这个运动的准确情报方面遇到极大困难。在此后6年当中，送往华盛顿的报告反映出严重的混乱，观察家、官员和平民们都不能判断中国共产党到底是真共产主义者，还是一伙强盗；是受莫斯科领导的，还是独立的；是危险的，还是无足轻重的。直到1930年，中国政府也同样感到迷惑不解——至少在它提供给美国外交官的一份情报中暗示出这一点。华盛顿收到的情报分析当然也有十分精辟的，但是决策人由于缺乏时间允许历史学家具有的那种洞察力，不能轻而易举地把“糟粕与精华”区别开。另外，还由于对问题缺乏一致的看法，又有更重要的事务压在肩上，于是无知和漠不关心就合二而一了。

1930年，共产党进攻长沙迫使蒋介石不得不认真地看待红军。中国共产党一直坚持说自己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人们仍然怀疑，他们若非用

红旗及共产党标志向苏联要援助，就是用它们来美化掠夺。美国的外交官们通常提到“所谓的‘共产党’”活动时，共产党是加引号的。只要报告人漏掉了引号，在华盛顿审阅这些报告的人就会把引号加上去。只要中国共产党人不按苏联的模式行事，只要他们还是农村散漫的武装农民，而不是城市无产者，就令人感到疑惑不解。

但是，不论他们是什么人，在 1930 年最后的五个月期间，他们断续地和美国扬子江巡逻队的军舰展开了战斗。美国舰只并非来反对共产党的，而是来保护美国公民（多为传教士）的生命安全，由于中国政府无能力保护他们。当《纽约时报》报道美国正在考虑如何结束“扬子江上的红色袭击”时惊动了史汀生。他发急电给北平的美国公使馆，对战斗的频繁和严重性表示关切，他注意到“这些攻击一般都被归咎于‘共产党或者赤色’团伙。”史汀生不同意用这种贴标签的描述来解释所发生的一切事件，他要求对“中国开火的原因和目的提供新的、权威性的情报”。于是，在华盛顿的推动下，美国公使从一些消息来源，包括从美国海军方面搜集到新的情报，但总的来说，这些情报只起到增加混乱的作用。史汀生厌烦地答复说，他主要关心的是减少事故的发生。至于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了解尚有待时日。

尽管如此，公使馆的人员认识到已经应该对共产党的形势作认真的研究分析了，并将此问题列为公使的政治报告的一部分。约翰逊向国务院说，从 1925 年到 1928 年，在中国曾经存在一个受莫斯科煽动的、活跃的共产党，但是此后凡提到中国“赤色分子”或“共产党”时，“必须记住，在使用这类名词时很少按照它的本意，而是含糊地泛指在中国各地兴起的反对当局的不法分子。”约翰逊坚持认为，虽然在莫斯科和中国革命者之间可能有间接的联系，但是，如果“过分强调这些活动的重要性及其可能存在的和莫斯科的联系”将是个错误。他认为强盗土匪佩戴共产党标记的意图“主要是把它当做一种体面的标志，希望被划入比普通土匪更高一些类别——真是荒唐之极！”因此，他得出结论，“所谓的共产主义”并不是造成中国混乱的原因，不如说它是“某些基本条件”所导致的结果。

应该注意到，1945 年以前美国所了解的关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些基本因素早在 1930 年就出现了。认识混乱的根源并非出于对共产主义在中国兴起原因的不理解，也并非由于未认识到它是以农村为基础的。也不是后来所说的，对马列主义缺乏理解。在国务院内，关于中国共产主义的报告一般先送给东欧司的共产主义问题专家。使在中国的美国人感到迷惑的问题同样使华盛顿的共产主义专家们，以及全世界自称为马列主义者的人迷惑不解。共产主义者被认为是在共产国际指导下的，对工业化所产生的问题作出反应的无产者。一个不受莫斯科控制的，由农民组成，以武装起义反对土地占有权的共产主义运动能够存在吗？正当斯大林对托洛茨基展开大规模斗争之际，一个党的忠实信徒如果在这个问题上采取明确的立场，就有失鲁莽，太无心计了。美国人历来安于这种陈旧的看法，即共产党人就是住在城市里的东欧犹太人，持这种看法的美国人不难断定，毛的一伙人不可能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一旦中国政府承认土地改革的必要性，这帮人就会销声匿迹了。现在还有时间进行土地改革，解除在很大程度上把中国的群众聚集到毛泽东的旗帜下的农村痛苦。1930 年，美国再次凭直觉作出的以上反应从本质上看还是正确的。

在此后几年当中，蒋介石加强了反共运动，直至红军被迫从江西转移。

在此以前关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情报质量有所提高，虽然还有相当数量的无稽之谈使华盛顿感到混淆不清，有大量事实证明国务院的专家们无能，他们不善于去粗存精。对莫斯科的作用仍然弄不清楚，但是，中国农村与日俱增的骚乱不安以及农民越来越拥护共产党已是毫无疑问了。由于共产党部队的新兵员纪律性较强，也受到较好的训导，越来越多的迹象说明这一运动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信仰，虽然它明显地中国化了，而且融合在农民起义的形式之中。从江西归来的军事观察员们对共产党军队的勇敢，技术熟练和纪律性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一位中国学者，科学院的秘书长给公使馆提供了一份关于共产主义运动及蒋介石灭共政策的内在弱点的十分精辟的研究报告，其论点是采取单一的军事行动反共只有失败。在远东司尤感兴趣的一切中，他宣称，即使蒋介石部队打败了共产党，也不可能在光复的地区彻底肃清共产党人，因而他们有充分的机会重新制造骚乱，“换句话说，军事上的成功将加重人民的艰苦，只采取军事行动是不可能消灭共产党的。目前，中国一切事情都由军队支撑的人支配。如果这种状况长久存在，中国毫无疑问会变成共产党的天下。”

几个月后，美国公使实质上也作出同样的结论，他在给史汀生的机密报告中写道：“布尔什维克的阴影将笼罩中国许多地方，除非采取彻底改善民众的命运的农村经济计划，并要一个有效率的政府在中国内地产生出一种安全感。”

尽管意识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吸引力是有深厚基础的，约翰逊及美国官员们在毛的武装突破蒋介石的包围开始长征后，对这个运动的关切大为减弱。由于断定中国的共产主义“显然是发自佃农阶级的一场农民运动”，对中国政府给予农村建设的有限支持会在政府取得明显军事胜利后产生的危险有所缓解，约翰逊似乎感到满意了。1935年秋在国防部长去远东视察之前，赫尔向他介绍情况说，“共匪”或“赤党”比“真正共产主义者”更能准确地说明中国共产党。接着他重复了约翰逊的分析，指出国民党人不再单纯依仗武力，现在“致力于改善农民的经济条件，以消除‘赤色’分子赖以生长的不满因素。”

30年代中期，日本人的宣传和共产党的宣传混合在一起导致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性质产生新的误解。日本人始终担心俄国在远东扩大影响，开始不断以反共名义使他们本身的帝国主义行径合理化。1935年共产国际号召建立统一战线，在这一号召的鼓舞下，中国共产党呼吁成立抗日统一战线，加剧了日本人和共产党的对抗，假定美国不是反对日本侵略甚于反共的话，日本的种种论点也许会有更大的可信性。约翰逊写信给著名的美国报业发行人霍华德（R.Howard）说，“共产党”是一个新的僵化名词，日本人把他们反对的一切事务都贴上“共产党”标签：“玩弄这词倒是挺巧妙的，因为当今世界都恨共产党，在报纸读者头脑中，共产党是和反对上帝、反对私人财产以及反对有组织的政府相联系的。”约翰逊决定不上日本人的当，此后他就不那么认真地看待共产主义运动。

国民党政府，特别是在1936年12月西安事变之后，故意把美国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了解搞得更混乱。中国政府惟恐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会屈服于日本的宣传，遂设法缩小中国共产党的实力，制造毛及其武装已同意不称自己为共产主义者，并放弃阶级斗争的印象。虽然斯诺（E.Snow）和拉铁摩尔（O.Lattimore）等人（后来他们因有亲共产党嫌疑而受到迫害）指出，中

国共产党人是 有志献身的共产主义者，拉铁摩尔还说，如果认为他们已放弃革命就像“认为苏联还在回到资本主义”一样愚蠢，但是接近国民党的美国人把这个问题弄模糊了。

1937 年夏，战争来临时，共产党和国民党两方面的中国人联合起来抵抗来势汹汹的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这种广泛的爱国主义表现和放下派别之争共同对敌的愿望，美国人一般都感到高兴。海军情报部门报告说：“以蒋（介石）、白（崇禧）等将领为代表的中国法西斯分子正为共同的目标和共产党并肩抗日。”事实上，每一个观察家都注意到，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是异常温和的，但只有拉铁摩尔等少数人看出这种政策上的改变只是策略性的，并非永久性的。1938 年，约翰逊报告说：“重庆能干的中国及外国观察家们”一般认为共产党领导人是真诚地希望“和一切愿有助于抗日的人士合作，哪怕是以放弃基本原则为代价。”

但是一年以后，关于政府与共产党武装合作的报告就不大令人乐观了。显然共产党利用一切机会扩大影响，而政府则不遗余力地消除其影响。在国务院内压倒的看法是：鉴于国共双方都在对日作战，目前不大可能公开决裂，不过当战争结束后，看来双方就没有理由再保持进一步的合作，“而且很可能重新开始一场活跃的争夺中国政治领导权的斗争。”（11）几乎只有约翰逊一个人对国共继续合作的前景持乐观态度，但是 1941 年 1 月发生的皖南事变，甚至也动摇了他的信心。到 3 月份，他再次为爱国主义在中国消失而感到痛惜。约翰逊代表他的国家出使国民党中国，一连十一载已使他感到厌倦，他要求离职并获得新的任命。1941 年秋初，新的驻华大使，高斯（C.Gauss）发电报说：“国共两党关系没有变化，就是说，不能令人满意，但尚无特别关注或立即进行干预的必要。”（12）他发现中共驻重庆代表周恩来有些灰心。过了两个月，当日本把美国卷入太平洋战争之后，这两个互相争夺的政党都变成美国的“中国盟友”。

## （二）

在战争期间，关于中国共产党与苏联的关系，疑问依然存在，有一些观察家仍然拿不准他们是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但是有一点毫无疑问：他们将在未来的中国发挥重要的作用。他们在所控制的区域内实行的政策得到群众的极大拥护，与此同时，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则越来越对政府不满。由于共产党日孚众望以及在军事和政治策略上获得成功，他们的军队和控制地区都成倍地增长。在战后的中国，中国共产党是一支值得重视的力量。

1942 年末，高斯大使把共产党影响的扩大归咎于国民党的失败，但是他认为仍然可以通过实行社会改革削弱共产党的基础，或 149 是以武力消灭它，虽然他怀疑国民党的领导是否有能力实行改革，但是他相信他们还有这方面的积极性。几个月后，德鲁姆赖特（E.Drumright）——他比较同情蒋政权的外交官员中的一个——注意到蒋介石在中国人民中的威望和影响在继续下降，用乐观说法是达到了“落潮的最低点”。其他不那么同情蒋政权的人则给这个政权勾勒出一幅生动的图像，说它变本加厉地以无能、腐化和残暴来应付战时的压力。与此相对照，经常有报告谈到公众对共产党控制区政府的工作效率、忠诚及温和表示赞许——1944 年，当美国记者和官员亲自视察这些地区时，证实了以上的报告。虽然国务院对蒋介石可能通过改革挽回局势表示乐观，但是在中国的观察家们却越来越抱怀疑态度，不仅对改革的前景，也对政府强有力地镇压共产党的能力表示怀疑。假使 1944 年 10 月出

现的趋势继续发展下去，看来共产党可能在“短短几年内就会成为中国的统治力量”（13）。

在史迪威被召回后的一周，另一位美国观察家报告说，共产党已经强大到足以确保在“战后至少能控制中国的华北”，他描述共产党在战时取得的惊人发展，并预言它将继续壮大（14）。“只有在他能争取到相似于日本入侵中国那样规模的外国干涉时”，蒋介石才能够粉碎共产党。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中国的未来属于共产党而不属于蒋介石。掌握着这样一些情报，知道现在已无任何希望把中国战场变为一个重要的战争地带。美国政府必须考虑它的路线。

从最近的将来着眼，美国坚持它击败日本以前先避免内战的做法。从这一点出发，美国继续寻求一个强大的中国作为东亚的稳定力量——罗斯福的“四个警察”中的一员。这一观点至少从1899年起一直是美国人考虑的一个主题。中国要强大起来就必须团结，这意味着不只是推迟内战，而是阻止内战的发生，产生一个团结的，最好是民主的中国。在华盛顿得到的情报暗示国民党已注定要失败，但在1944年及战后的几年里，单就军力而言，国民党还占有优势。中共现在还不能控制中国，但是，基于它成功地获得群众的拥护似乎具有长远的优势。随着美国对华政策的发展，国共两党成立联合政府的想法清晰地呈现出来。国务院对国共两党互相敌视的历史并非一无所知。外交部有些人专门研究中国问题，差不多已长达25年之久。他们知道甚至连日本的进攻也未能有效地使这两个冤家和解。作为长期研究中国的人，他们对美国的政治理想在中国所能起的作用并不乐观，而且他们在战时对国民党丧失信心之前很久就对国民党持藐视态度。他们的任务是，通过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国来找出满足美国的利益的办法，而在眼前，他们所能看到的唯一希望是成立联合政府，美国将援助这个政府，包括向中央提供军事设备。无疑这把握本来就很小，而现在看来把握比当时一些人的所见更小了。

1944年秋，美国和中共建立友好关系的前景看起来相当不错——与华盛顿和蒋介石政府的关系迅速恶化形成鲜明对照。确实，中国共产党在早期一直反对作为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大国的美国，在30年代初期还曾宣称美国是蒋介石的后台。1935年，在莫斯科号召建立统一战线以后，中国共产党对美国的指责就停了，但党的领导人仍对美国极不信任。1941年12月7日以后，共产党转而对美国特别友好，不仅是表面上的，甚至也在他们的教育计划中反映出来了。在美国与中国政府争吵中，共产党坚持站在美国一边。当日本人提出警告，说中国有上美帝国主义的当的危险时，共产党曾为美国辩护，反对这种指控。1944年延安以极大热情和对罗斯福的过分赞美庆祝了7月4日——美国的独立日。罗斯福的政策被称颂为美国伟大的自由与民主传统的体现。

然而还存在着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关系问题。国务院及驻中国的军事情报观察员了解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民族主义力量，他们也了解中国共产党在不依赖苏联的情况下发展到了什么程度，以及毛最终有可能不受苏联的控制，独立地制定他自己的方针路线。另一方面，这些观察员也看到，把自己看作为马列主义者的中国共产党人是很偏袒苏联的，在受到压力时，预期他们会与苏联结盟，寻求苏联而不是美国的支持。几乎可以肯定，内战将会加强他们对俄国人的依赖感——这是为国共冲突寻求和平解决的又一个理由。确实，早在1943年6月，史迪威部下的一个外交官，戴维斯（J. Davies）曾

指出，蒋介石消灭共产党的企图有可能把美国卷入和苏联的冲突。为摸清苏联的意图，1944年8月，赫尔利在前往中国时，中途在莫斯科停留。

在和莫洛托夫会谈后，赫尔利断定苏联并不相信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表白，也不打算支持毛反对中国政府。因此，他对中国两派势力和平统一的可能性表示乐观。罗斯福让赫尔利在中国问题上自由行动，并在雅尔塔力图使俄国人先支援中国政府，而不是先参加对日作战。美国的政策，正如赫尔利的使命及在雅尔塔签订的远东协定即波茨坦协定所表明的那样，其指导方针是和平解决中国的内部争端，但解决的办法必须保证国民党继续统治中国。

罗斯福在雅尔塔的表现（协定原文附后）说明他继续对中国持藐视态度，他安排的战后解决东亚问题的方案没有中国代表参加，事先也没有征得中国政府同意。罗斯福首先关注的是在和日本最后一战中，如何减少美国人的伤亡。他用属于中国的领土及租借地为代价来换取斯大林的参加对日战争。特别是俄国人所要求，罗斯福也同意的：把沙皇帝国主义在中国攫取的，随后又失去或是卖给了日本的特权转让给苏联。同时罗斯福取得斯大林支持蒋介石政府的诺言。斯大林准备让中国共产党自己照料自己，至少暂时如此——6个月后，中国共产党得知此事，大为震惊。

当罗斯福试图以剥夺共产党最有希望的援助来源来加强国民党地位之际，赫尔利则为成立一个以蒋介石为首的联合政府而奔忙。在与蒋介石及毛泽东会谈后，他认为双方都愿接受民主，假使两党中的极端分子，以及美国帝国主义分子和美国官员中反对国民党的人士不持异议的话，是有可能就此达成协议的。确信共产党不会得到俄国人的支持以后，赫尔利认为美国继续援助国民党政府，同时有必要打消共产党争取美援的念头。在被孤立以后，共产党将被迫让步达成协议。

上任留下来的大使馆官员和担任美军司令部政治顾问的外交官员们，都不同意赫尔利对中国形势的估计，也不赞成他统一中国，使之对战争做出更多贡献的具体方法。他们在美国对华政策的目的方面看法是一致的，但职业外交官们认为国民党不肯作出让步是中国统一的主要障碍；认为赫尔利对中共的决心估计不足；如果不能得到美国的援助，共产党将转向苏联，取得苏联的援助，从而在中国问题上造成美苏关系紧张。赫尔利和他的工作人员之间的意见分歧，由于后者对大使缺乏信赖而激化。这种不信赖是赫尔利对中国的无知造成的，而他认为自己对形势的估计比在实地的全体观察人员更准确。这些观察员判断一致，他们对形势的估计正与赫尔利相反。1945年2月，赫尔利返回华盛顿后，大使馆官员们进而摊牌，向华盛顿发电报，提出他们的看法，并建议采取和赫尔利的主张相反的策略。他们特别提出，美国的支持使得蒋介石顽固不化，这种政策继续下去可能导致中国内战，共产党将转向苏联求援。他们从重庆发出的电报提出：根据美国企图利用共产党和日本作战的打算，美国应付诸行动，在对蒋介石作适当保证的同时，给共产党以必要的援助。这份电报由大使馆全体政治官员和在华美军的代理指挥官签署。趁赫尔利和史迪威的继任魏德迈将军（A. Wedemeyer）都在华盛顿，副国务卿格鲁（J. Grew）将这份电报递交罗斯福以强调局势紧急，并为重新审度对华政策作出安排。

赫尔利对此事十分恼火。在国务院及国防部进行讨论之后，罗斯福以支持赫尔利的意见结束了这场争论。美国对华政策将按照赫尔利的意见办：努

力维持和改造蒋介石政府，除非经蒋介石认可，不给共产党援助。持不同意见的外交官员都被调离中国。美国将继续为成立一个联合政府而努力，并寄希望于使蒋政权实现民主化。在中国的内部斗争中，罗斯福支持那一边是毫无疑问的——在 1945 年 4 月 2 日，赫尔利发表了一个毫不含糊的声明，大意是，美国政府只支持国民党政权，不承认也不援助任何其他政府或政治势力。

国民党情报部门的报告表明，共产党曾经希望通过租借法直接从美国得到援助。毛泽东和周恩来很清楚美国对中国的战局及蒋介石拒绝抗日很不满意，而共产党早已想利用美蒋这种紧张关系。1944 年夏，美国观察员小组抵达延安曾被视为美国与中共进行更广泛合作的序幕。共产党领导人显然知道史迪威被召回和高斯大使辞职是由于他们与蒋介石不和，而他俩相对来说得到大部分在华美国官员和新闻记者的赞赏已是众所周知。1945 年 1 月，毛和周要求和罗斯福会谈以讨论美国和中共进行军事合作的细节问题，并提出他们对中国内部问题的看法。但是这个要求被拒绝了。假如共产党仍对获得美援抱有希望的话，赫尔利的声明及随后发生的大使馆的清洗使这种梦想完全破灭了。

共产党压抑住怒火，直到罗斯福逝世以后，杜鲁门又显然无意批判赫尔利时——才爆发出来。于是，对美国的不满逐渐公开化，毛认为赫尔利所宣布的美国政策说明了“美国反动派的猖狂（15）”。罗斯福曾经被描绘为美国进步力量的领袖，共产党报纸对他的逝世表示哀悼。中共曾表示希望杜鲁门继承罗斯福的政策；但是，在 1945 年春夏两季发生的事件被理解为美国的政策已进入新的反共阶段。对中共来说，罗斯福的去世使人确信美国的政策已经改变的印象；罗斯福进步的对华政策已被赫尔利的反动政策所取代。罗斯福的去世使中共很快地改变了对美国的态度，莫斯科不久前已就此发出了信号。

在解释中共对美国的指责为什么突然急剧增加时，不能忽视斯大林对共产党与西方合作采取的新立场，以及他发出的信号的重要意义。如果没有苏联态度的改变，毛的愤怒很可能会继续埋藏在心里。从另一方面看，毛是被美国的政策激怒的，在这一点上他并不需要俄国人的怂恿。当罗斯福面临与中共合作或单独支持国民党两种选择，一旦选择后者，美国的政策就必然使毛别无其他选择地作好与斯大林一致行动的准备。苏联反对西方的运动只为中共批评美国提供了框架，而不是原因。

赫尔利在访华中途再度先去莫斯科了解苏联的意图。国务院的中国问题专家，特别是克拉布（O.E.Clubb）对蒋介石中国和苏联保持良好关系的前景持怀疑态度，但赫尔利是个永不气馁的乐观派。当赫尔利 4 月中旬会见斯大林时，虽然苏联和西方的磨擦已在东欧表面化了，赫尔利仍报告说，斯大林赞成美国的对华政策，斯大林并要他向国内报告：“他完全支持美国立即采取行动以把中国的武装力量联合起来，并完全承认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党政府”（16）。赫尔利的信心再次受到其他美国外交官的挑战，这次提出异议的是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的哈里曼（A.HarriMan）及凯南（G.Kennan）。他们两人都提出警告说，一旦苏联在东亚参战，便不能指望斯大林会支持美国的政策。他们认为当时机成熟时，斯大林将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破坏中国政府，扩充苏联对蒙古、“满洲”及中国华北的野心。但是，赫尔利固守自己的信念毫不动摇。到 5 月份，斯大林直率地宣称他认为蒋介石是唯一有资格统一



中国的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无人能与之相比。这就使哈里曼的看法开始向赫尔利靠拢，他断言斯大林满足于从雅尔塔得到的好处，罗斯福的安排也使蒋介石感到满意，考虑到苏联将参与促成一个在蒋介石领导下的统一的中国。

7月初，宋子文抵达莫斯科与苏联协商签订一项条约，中国将按此条约接受雅尔塔协定所提出的条件——国民党政府准备付出必需的代价以换取斯大林支持它反共。在宋子文动身去莫斯科以前，中国人曾试图让美国卷入他们与苏联达成的任何一项协议当中去。联系到“满洲”问题，蒋介石把中国在本世纪初企图用于反对俄国人的政策略加修改又提了出来。这个政策是：与其把旅顺港独家租给俄国人，不如把美国和大不列颠请进来钳制苏联的影响。但是，美国再次避免在中国和俄帝国主义之间插手。

斯大林明确地向宋子文声明，他只支持国民党政府并认为中国所有的军事力量都应由该政府掌握。但是，作为牺牲中共的报偿，他要求获得高于他和罗斯福在雅尔塔商定的代价。斯大林特别坚持要在事实上控制整个“满洲”，宋子文对斯大林提出新的条件毫无准备，而蒋介石仍然不够热心，于是斯大林后退了，同意只控制“满洲”的铁路，以及大连和旅顺港。宋子文不顾苏联的压力，固守立场，后因斯大林去出席波茨坦会议，中苏谈判暂时休会，宋则返回重庆向他的政府请示。虽然宋子文希望少付出一些代价，但是他对斯大林在中共问题上作出的保证以及对拟议中的友好条约所提供的条件均感满意。他请哈里曼将以上情况转告杜鲁门总统。

在波茨坦，蒋介石致电杜鲁门，企图进一步争取美国支持中国的立场。杜鲁门仅向蒋介石表示，他期望蒋对超出雅尔塔协定的要求不要让步，但是在波茨坦的美国代表团对苏联所提要求的顾虑增加了。国防部长史汀生，大使哈里曼以及文森特（J.C.Vincent）都敦促总统支持中国人。大家都认为苏联的要求不合理，不仅威胁中国而且危及美国的“传统”的政策。如果苏联成功地把“满洲”和中国华北变成它的势力范围，东亚的均势将逆转，而美国在华经济利益的前景也将大为缩小。最后，哈里曼终于得到指示，授权他抗议苏联对“满洲”的要求，并试图得到斯大林的书面诺言保证“门户开放”政策将在“满洲”得到遵守——美国的商业享受均等应在“满洲”得到保证。

虽然哈里曼的支持加强了宋子文的谈判地位，但是他的地位很快就因苏联介入抗日战争而被削弱了。1945年8月10日，斯大林警告宋子文说，日本近日内就要被迫投降，如进一步拖延达成协议，将导致共产党进入“满洲”。为得到向往中的苏联诺言——不干涉中国内政，只支持国民党政府——宋子文对超出雅尔塔协定的要求也作出了让步。当中苏友好条约签字并完成有关的换文后，蒋介石、蒋夫人及宋子文分别发表谈话，对国民党政府在这场交易中取得的结果表示满意。毫无疑问，中国人会喜欢更有利的条件，但是他们虽处于软弱的谈判地位却实现了他们的主要目标——取得了苏联支持蒋政权的保证，而在“满洲”及外蒙所丧失的则是这个政权从来不曾管辖过的东西。

但是，在1945年春及夏初这段时间里中共拒绝服从。在日本投降后，共产党声称其武装力量有权解放敌人占领的领土，拒绝接受蒋介石要他们原地待命的命令。当蒋介石于8月16日邀请毛泽东去重庆时，毛拒绝了，共产党继续谴责蒋介石及赫尔利。关于中共提出的有权受降的要求，美国的反应是通报请中共注意以下事实：要求在华日军只向蒋介石投降的一号命令是由大

不列颠、苏联及美国共同签署的。此外，美军开始解放华北的一些重要地点，以待留给中国政府，同时美国政府为蒋介石提供运输条件，否则政府军不可能抢先于中共部队到达前进入待解放的地区。

对毛泽东来说，美国的立场已昭然若揭，他感到无把握的是到底能从他的莫斯科同志那里得到多少援助。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所公布的条款已作了初步的回答。尽管在中共的报纸上故作镇静，装出一副泰然的样子，但党的领导却深为苏联的背叛所震动。中共指示党的干部告诉民众：苏联的政策符合党的长远利益，但是领导成员承认，他们觉得“苏联的政策不可理解”（17）。认为没有俄国人的直接援助。党尚未作好内战的准备。党的战略需要修改以避免在城市发生对抗。由于拿不准斯大林的意图，毛泽东只有“从希望出发”。毛泽东完全改变了主意，于8月28日飞往重庆和蒋介石谈判。

1945年8月末，战争也终于以日本的失败而告终。其余在东亚的中国进行力量角逐的竞争者们，都各有理由感到满足，只有中共是例外。东亚的力量均势比历史上任何时代都对俄国人有利。中国仍处于软弱和暂时分裂的状态。唯一能与俄国的新地位相抗衡的美国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一现实，以此作为苏联援助打败日本的代价。从美国方面来看，美国人和斯大林一样感到满足。他们消灭了日本的势力，在雅尔塔不仅赢得苏联参战，而且在援助和改造中国国民党政府上也取得苏联的支持。东亚获得稳定的前景比美国人记忆中的任何时候都好。至少赫尔利对在中国出现一个民主政府的可能性持乐观态度。蒋介石政府的愿望未能全部满足，但是日本侵略者被打败了，美苏双方的支持使蒋介石感到自己有把握应付来自中共的威胁。控制中国本土看来已不成问题，一旦能使共产党就范，把中国的统治扩大到“满洲”及边境地区也就相对地比较容易了。只有毛泽东一无所获。

### （三）

9月份，蒋介石和毛泽东的谈判似乎在顺利地进展，赫尔利的乐观无以复加。两位中国领袖的态度都不那么傲慢，呈现出有较大的妥协和解的愿望。战争一停，蒋介石就接到警告：他今后不可能无限制地获得美援，援助也不能是无条件的。毛泽东没有希望得到外界的支持，而蒋介石按理也明白，如果他顽固不驯，美援就会成泡影。9月中旬，赫尔利回美国，他希望在重返中国时，谈判已达成协议。但是，他和斯大林一样，都低估了毛泽东及其部下的决心，对蒋介石的判断的确实性也许也估计过高了。

中共的部队不受任何协议的约束，继续通过华北地区，并进入“满洲”扩大其影响。他们首先受到奉命只向蒋介石代表投降的日本人的阻挠，然后又碰到前来加快解除日本人武装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于是共产党避开大城市，因而农村成了他们的天地；有了农村，便可以使政府无法利用生死攸关的交通要道。蒋介石依然向前推进，确信他的军队能以战争取胜。蒋介石曾两度与斯大林合作，他毫不怀疑斯大林会为了本身的目的宁愿牺牲中共，如有必要，也确信自己能再次以谋略挫败斯大林。同样，尽管美国政府已对他提出警告，他明白美国不会轻易地抛弃他。美国采取行动支援他的军队增强了他的信心。

但是在华盛顿及莫斯科出现了疑虑不满的情绪。苏联产生疑虑的底细不详，但是它的政策开始摇摆不定。在1945年9月底及10月间，也许由于美国有意把苏联的势力从日本排除出去引起苏联的反应。俄国军队在“满洲”为中共部队提供方便，给国民党军队的行动设置了障碍。但是从1945年11

月到 1946 年 3 月苏联从东北撤退前夕，俄国人似乎尽到了他们对蒋介石承担的义务。在华盛顿则越来越担心，为加速日本投降及遣反日军所安排的军事行动有把美国卷入一场内战的危险。魏德迈将军警告说，如果不偶尔向与中共竞争的国民党提供一些援助，他将无法完成交给他的使命。当美国一些领导人正为如何能在支持蒋介石军队的情况下保持中立和试图调停绞尽脑汁时，国防部及海军部的部长帕特森(R. Patterson)和福雷斯特(Forrestal)分别施加压力，要求继续援蒋，他们对支持蒋介石反共的副作用完全不在乎。确实，要求实施反苏、反共政策的压力正在美国增长，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在欧洲的失败所致。

在美国政策讨论过程中，从中国发来的报告表明，国共两党的距离实际上比在 10 月 10 日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指出的更大，因此，避免内战的可能性较小。11 月 27 日，赫尔利忽然辞职，他的乐观主义完全破产了。为给中国带来和平，他作了巨大的努力，已经疲惫不堪，如今他放弃调和已证明不可调和的矛盾，站到一旁把失败的责任推给所有和他意见相左的人，留下一大堆不负责任的指责，胸怀野心的政客们不久就会对这些指责感到欣喜若狂。

杜鲁门毫不拖延，当天下午就召见马歇尔将军，要他作为总统私人代表前往中国。当时美国政府已决定让美国海军陆战队留在中国；继续向华北运送蒋介石军队；继续努力使国共双方在尚由日本人掌握的争议地区停火；同时继续努力促成在蒋介石领导下的政治解决。根据关于中国的军事情报美国政府得出两方面的估计，并据此确定自己的行动。第一，参谋长联席会议报告说，没有海军陆战队的帮助，不可能赶走日本人，如果在他们被遣返前就爆发内战，日本人就会在中国被竞争的双方或一方所利用。这不论哪种情况都是灾难性的，几乎可以肯定，把日本人卷入中国的内战必将使俄国人扩大对“满洲”的控制，并可能进而介入中国本土。第二，据参谋长联席会议报告，他们不相信蒋介石有以武力统一中国的能力。确实他无力控制“满洲”。在这两种估计和对策的背后蕴藏着忧虑不安，担心中国的现状将为苏联扩充其势力提供条件——出于传统的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原因，美国都反对造成这种局面。

马歇尔很快就看出美国政策内在的矛盾。美国的理想是要中国在一个自由民主的政府领导下实现和平统一。鉴于这两个为统治中国而进行角逐的党派本质以及它们现有的和潜在的军事力量，只有当国共两党之间达成妥协，前者的右翼极端分子与后者的左翼极端分子互相抵消，排除法西斯和共产主义，而选择民主政权时，美国的希望才能实现。因此马歇尔的主要努力将是继承赫尔利的企图在蒋介石和毛泽东之间进行调处。但是，当美国放弃它所宣称的一视同仁，给蒋介石一方提供军事援助时，马歇尔很想知道，他将如何按政府的期望去进行调处？在随后展开的讨论中，再度提出统一中国，以及如何在俄国人未站稳脚跟之前把在华北及“满洲”的日本人遣返回国的紧迫性。1945 年 9 月 9 日，马歇尔受命在共产党准备作出让步，但国民党却设置障碍时，他要警告蒋介石：美国将停止对他的援助去和华北的共产党打交道。换言之，美国政府正在考虑绕过它所承认的中国政府以确保华北处于中国人的掌握中——在抗日战争期间它一直拒绝采取这一步骤。如果共产党阻挠达成协议，美国政府将全力支持蒋介石并将他的军队运送到北方。

但是，两年后，杜鲁门及他的国务卿伯恩斯(Byrnes)都从他们最初指示的含义中后退了。马歇尔被告知，即使蒋介石确实讨厌，美国也不能抛弃

他和他的政府。鉴于中国目前的权力结构，那么做将造成中国的分裂，使苏联在“满洲”处于优越地位。马歇尔受权对蒋介石施加压力，但到最后，这种压力也不过是虚张声势；无论蒋介石作何反应，美国还得支持他。不过，杜鲁门要求马歇尔设法使这种支持对国共力量均势的影响降至最低限度。这是一项吃力不讨好的任务，但它也是获得美国所需要的那种政府的唯一希望，否则美国就得在经济和军事上陷得太深，以美国在华利益的重要性来说，从来不值得那么做。

在马歇尔到中国以后，俄国人履行了他们和蒋介石政府达成的协议，即使没有贯彻它的精神，也算从形式上贯彻了。即俄国人在把当地一切有工业价值的设备拆卸一空后，便把军队撤出“满洲”。俄国人剩下的日本库存武器证实对中共有很大价值，但是这也难以消除在东北的掠夺在中国同志心中造成的影响。俄国人的撤退使那些害怕他们会重新控制“满洲”，或是把这片领土保留给中共武装力量的人感到振奋。俄国人眼前的直接利益已经得到满足，他们留下的只是造成不和的燃料，斯大林显然期望以此制造出一个分裂而软弱的中国。

虽然中共从俄国人得到的有限的帮助使毛泽东比 1945 年夏以来较为乐观，但是他仍然没有得到苏联支持的保证。因此作为权宜之计，毛避免和国民党摊牌，以免导致美国向蒋介石提供实质性的大力援助。于是毛设法避免战斗，并强调指出美国在赫尔利指导下所遵循的并不是中立的立场。1945 年 12 月 3 日，共产党同意参加蒋介石计划在 1 月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毛泽东告诉党内的同志说，蒋介石提出让步并非一纸空文，同时，在赫尔利辞职后，美国的政策是可以接受的。在给党的干部的秘密指示中，中央委员会宣称，在中国实现和平不仅是中国人民的愿望，也是全世界人民的愿望。“首先是苏联及美国的民主派，后者最近认识到中国局势的严重性，并反对赫尔利的政策，该政策将在中国酿成内战”（18）。

但是国民党情报部门对毛泽东的新策略并不乐观。共产党的温和政策被看作是缓兵之计——是一场赌博，与美国共产党互相配合，中共可以破坏国民党和美国的关系造成美国政策的逆转。甚至在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之前，国民党就看出没有和共产党和解的希望。国民党仍相信能与苏联保持友好关系，它指责共产党企图破坏中苏关系并为执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制造困难。

但是尽管国民党或其成员采取不信任的态度，政治协商会议似乎进展顺利。同时，马歇尔在掌握军事形势方面也好像异乎寻常地交了好运。他通知周恩来，美国承担着把国军运往“满洲”的义务，周恩来回答说，中共方面可以接受。而在完成运送军队到“满洲”各城市的过程中事实上没有遭到任何反对。当中共提出拒绝国民党军队占领其控制区的据点，并以此作为停火先决条件时，马歇尔表示赞同，国民党政府默认了。于是在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后数日便实现了有效的停火。1946 年 1、2 月份，在国共之间达成的政治和军事安排，受到中国人民的热烈欢迎。在此期间，共产党报纸在批评美国“干涉”中国内政方面采取了克制态度。尽管在“满洲”有几天爆发了值得注意的军事行动；尽管有迹象表明国民党右翼可能不接受调解，马歇尔及美国政府在 2 月底及 3 月初这段期间一直是乐观的。现在就轮到让中国的两派力量看看和平妥协将会给他们带来什么好处了——马歇尔动身返美去安排有关经济援助的事务。由于美国财政部要平衡国家预算，同时对国民党财政的不信任广为流传，筹措专款并非易事，不过马歇尔返回中国时还是携带了“很

可观的一大笔款子”。

但是，经过差不多四分之一世纪的合作、背叛和互相利用，国共两党的领导人彼此太了解了——每一方都窥伺着对方，等待对方先发出推翻协议的信号。在这里互相了解只意味着互不信任，在这种气氛下，双方不久就找到破坏停火的充分理由。国民党顽固地要在东北把约束他们行动的一切限制扫除干净，因此，在那个地区实现有效的停火证明是不可能的。而且，对心存疑虑的共产党来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政治协商会议达成的协议的方式便是一个蓄意背信弃义的警报。另一方面，共产党在东北的活动也使希冀和平的人们得不到多少安慰。当俄国部队于四月初开始撤退时，中共进来填补了真空。到4月中旬，就在马歇尔回到中国的当天，共产党占领了长春，内战再度全面展开。

马歇尔企图挽回在他返美期间的失利，他劝说共产党撤离了长春。马歇尔得到蒋介石的承诺，作为中共撤退的条件，他的部队将不向长春推进。但是，蒋介石说话不算数，在5月底，国军便占领了这个城市，损害了马歇尔对共产党的立场。马歇尔绝望地——也是毫无成效地——力图使蒋介石明白，美国的停火建议及政治解决方案并非要削弱他的力量，而是为他及国民党“自由派”在统一的中国内保留重要的地位，美国军事情报部门暗示，如果蒋坚持用武力解决问题，他就不能保持这一地位。可是蒋介石部队正准备在东北对共产党进行大扫荡，他此刻正得意忘形，比平时更不顺从美国的说教或压力。

当国民党成功的攻势似乎已失去势头时，蒋介石同意停火15天，从6月7日生效，而最终维持到6月30日。蒋介石关于实现和平的条件是，要求中共从华北、东北各主要地点撤退。马歇尔说服共产党同意从某些地区撤出，相应地，国民党政府应按协议不去占领这些地区，并同意给三人停战小组中的美国成员以决定性投票权，但是共产党坚持，在恢复和平以后，蒋介石必须在确定文官政府的性质等问题上作出让步。共产党显然认为在1946年中期达成和平解决对他们有利，并准备作战术上的撤退。但是当马歇尔在6月30日停火的最后一天去见蒋介石时，发现蒋绝对不肯屈服，并坚信他有足够力量粉碎共产党——坚信进行军事解决的时机已经成熟了。不顾马歇尔和他说过的一番话，蒋介石作出全面内战的决定。他下此决心，一部分出于确信能指望美国源源不断地给予大量援助。在整个6月份，华盛顿采取的行动使马歇尔具有的少许影响丧失殆尽。国会提出了给中国政府增加军援和提供“建议”的议案。当这些议案尚待表决时，《真理报》宣布，一项秘密的中美租借协定正在谈判之中。6月24日，毛泽东几个月来第一次发表公开声明，谴责美国的政策。他指责说，尽管杜鲁门及伯恩斯许下诺言，尽管国际协定规定美国军队撤出中国，在日本投降后10个月美国还继续在中国驻军——美国这样来支持国民党内的反动派。他断言，美国组织、训练、和装备蒋介石军队的行为与帝国主义在殖民地建立附庸军毫无差别。他宣称美国的“现代帝国主义集团”已逆转了罗斯福的政策，他要求回答，这些人到底要什么——基地？殖民地？还是什么？美国人为什么要给国民党更多的军援。

6月27日，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通过了军事援华法案，第二天，副国务卿艾奇逊（D. Acheson）宣布美国已经和中国政府达成新的军事援华协定，向中国政府提供五千一百七十万美元的“补给”装备直到制定出新的计划为止——新计划包括在廉价出售近十亿美元的剩余战争物资，这些物资都被美

军散留在中国和一些邻近的太平洋岛屿上。1946年7月1日，全面内战重新开始，马歇尔说什么也不能再争取蒋介石接受新的停火了。

7月1日，毛泽东命令开展一场反美运动，毛这样做是由于他已认识到，马歇尔从一开始就明白他自己的使命：无论发生什么事，美国都不会抛弃国民党政府；即使内战的责任在于蒋介石，美国也会继续支持国民党。美援中有一部分原是为中共准备的，根据2月协议，这部分美援将用于把中共的武装并入国军，这些话再说也无用。在战争期间，共产党对虚报的诺言已领教够了——答应拨给的设备从未兑现；答应给予的支持随后就推翻。另一个实例是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UNRRA）1946年上半年在中国发放的一亿七千八百万美元物资，其中大部分来自美国。从理论上讲，救济总署不问政治只依据救济的原则进行工作，但是，共产党控制区约拥有全国三分之一的人口，而分配给它的救济物资却只占全部援助的百分之三。于是7月初，中共党内同志接到发动一场反美运动的指示，其中详细列举反美的理由及做法。

整个7月，沮丧的马歇尔在国务院的压力下，一直在各方面努力使蒋介石从他自己选择的自杀路线上及时醒悟过来。为了助自己一臂之力，马歇尔请求任命司徒雷登（J.L.Stuart）为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是一位备受尊敬的教会学校的教育家。7月底，马歇尔断言，只要美国继续援助国民党，向蒋介石的军队提供军援，就没有实现和平的希望，不论这种援助在早期看来如何有道理，显然都与他为结束内战所进行的努力相矛盾。马歇尔对苏联在东北及华北的意图不那么忧心忡忡了。留待他解决的问题是把毛泽东及其部下并入联合政府，减少中共对莫斯科的依赖。马歇尔视蒋介石的好战为主要障碍，经他提出，由华盛顿批准立即禁止向中国运送武器弹药。

蒋介石仍然相信美国政府会制服马歇尔，然而马歇尔已开始从中国撤退执行护航及类似任务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进一步使美国从蒋介石的军事行动中脱出身来。10月初，宋子文警告司徒雷登大使说，蒋介石虽曾答应马歇尔不进攻张家口，但是在达成另一次停火之前，国府准备占领这个城市。共产党则警告说，一旦张家口受到攻击，他们就认为谈判已经终止。马歇尔对蒋介石明显的口是心非，极为震怒，他断言蒋介石只是把他的和平努力当作掩护其继续展开军事行动的烟幕。马歇尔警告蒋介石，如不立即停火，他便要求政府把他召回，终止美国的调处工作。马歇尔得到了杜鲁门的支持，蒋介石便提出停火10日的建议，暂时停止以张家口为目标的军事行动，但共产党拒绝接受其条件。10月10日，国民党军攻占张家口，至此马歇尔及司徒雷登大使一致认为进一步调处已无希望。

11月，美国海军陆战队尚未完全撤离中国，12月，马歇尔尚未彻底放弃了他的努力。但1月份马歇尔返回华盛顿出任国务卿。就这一点来说，参与中国事务的事实已不再是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一个问题，美国陷入了一个更加阴暗的国内政治领域。

美国以和平统一结束中国内战的努力已告失败。美国进行这种努力的原因是：在1945年和1946年间，美国政府确信一个强大统一，而且几乎可以肯定会对美国友好的中国符合美国的利益，很久以前，美国官员们就曾作出这种论断。面临战后的形势，要建立一个强大统一的中国必须以和平手段解决长期存在的国共争端。如果发生内战，必将给长期受难的中国人民带来痛苦，不利于使中国成为东亚的稳定力量，而且还会加强国民党内的一部分的法西斯倾向和中共对苏联的依赖。以和平手段导致国共联合有可能通过合并

最终冲淡或消除极右及极左势力，产生一个自由民主的政权。但事情并没有发展成那样。也许根本就不可能产生那样的结果——不过，即使是事后分析仍然有待找出令人信服的可供选择的方案。

从美国政府甘愿承认失败这一非常重要的事实来看，显然是已没有更好的办法了。当杜鲁门政府于 1946 年底放弃调处的努力以后，大家都预料到共产党最终会取得胜利——只是国民党垮台的速度令人感到意外。虽然共产党在中国得胜被认为是不受欢迎的，虽然本届政府所采取的反对苏联帝国主义的立场比任何一届美国政府都强硬而且成功；但是一个共产党中国被认为是可以容忍的。凯南争辩说，一个共产党中国不会威胁到美国，因为中国不是一个工业国家，看来在一定时间内也不大可能成为工业国。他不相信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能在亚洲大陆以外的任何地方施展军事威力，而亚洲大陆从来不被认为在 1946 年也不被认为在战略上和经济上是一个对美国具有巨大战略或经济重要性的地区。1946 年 8 月，当政府准备就苏联对希腊和土耳其施加压力作出反应时，艾森豪威尔将军（K.Eisenhower）问杜鲁门是否理解这可能引起战争。于是杜鲁门从他的写字台上拿起一份中东地图，向聚集在那里的人讲解中东的战略重要性，以及美国应作何种准备，使这个地区不至落入苏联手。但是，没有任何记录提到美国领导人对亚洲大陆的重要性作过类似的讲话。

美国虽然愿运用它巨大的财富及力量保护西欧及中东免受苏联威胁——当然是美国利益所感受到的威胁——美国还是勉强地默认共产党征服中国。无论美国对东亚怀有何等野心——相当大的野心——杜鲁门政府像历届美国政府一样，不认为美国在华利益是至关重要的。在美国的“同情心”及“优先考虑事项”这两个秤盘上，中国在前一个秤盘上的份量要比后者重，它在“优先考虑事项”的秤盘上份量确实很轻。尽管不久“杜鲁门主义”指的是普遍性的情况，杜鲁门及其顾问们都有自知之明，他们很清楚美国力量是有限的，同时也意识到要挽回中国的局势大大超出了这一限度，是他们力所不及的，尤其是面临着苏联对大西洋彼岸的压力。在此后三年里，假如美国在远东利益的考虑支配着政策的话，几乎可以肯定杜鲁门政府会完全停止美国对中国内战的干预。毫无问题的，1949 年美国是有决心这么做的。

#### （四）

虽然司徒雷登大使仍留在中国，以便在需要美国尽力时，便可出面，同时，大使馆及国务院工作人员继续在探求实现美国在华目的的途径，但是政府 1947 年到 1949 年的主要任务是设法限制美国卷入中国事务而又不危及国会及公众对政府的支持，这种支持对保护和重建欧洲的政策是十分必要的。需要克服的主要障碍是美国人民对中国的巨大同情以及他们在战时产生的以蒋介石作为中国化身的观念。只要美国人民坚持自视为中国的维护者，坚持把蒋介石视为中国，就很难解释美国为什么忽然决定抛弃蒋介石。这一困难很大程度上与美国国内掀起的反共情绪结合在一起。美国政府在十分昂贵，但为了限制苏联，在必不可少的马歇尔计划和争取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支持的过程中，部分地助长了这种反共情绪：如果中国也遭受共产党的颠覆，那美国为什么置之不顾，不把蒋介石列入其援助计划？为什么美国要致力于“欧洲第一”的政策？虽然一些说话没顾忌的政治家偶尔提出这些问题，但是有许多美国人像杜鲁门总统和马歇尔将军一样有头脑并关心美国的利益，他们也对政府的对华政策路线感到忧虑。在国会里，要求恢复对蒋介石政府的援

助，广泛得到两党的一致支持，这种支持超出了地理及意识形态的界限，也超出党派的路线。杜鲁门政府一直未能使国会及美国公众相信它的政策是明智的。确实，在 1949 年 8 月以前在这方面也没有作认真的努力。

在 1948 年 11 月，杜鲁门意外地再度当选总统之后，另一个日趋严重的问题是，他和罗斯福的对华政策受到共和党的指责。虽然在两个政党内部都没有受极端分子的控制，但是某些攻击手法的卑劣和不负责任却说明共和党吸引了更多的极端分子。在 1947 年比较“好过”的日子里，当共和党的批评因预期要对 1949 年 1 月的政策承担责任而受到限制，像密执安州参议员范登堡(A. Vanden-berg)这样的共和党领袖人物还是有必要出来表示一下他们对民主党政府的独立性。范登堡虽是杜鲁门援外政策的坚定支持者，他对把蒋介石从美国慷慨援助的受惠者当中除名却经常提出异议。杜鲁门政府为得到范登堡及其在参院的追随者的支持，也几乎是经常地对进一步站在国民党一边介入中国内战的小规模行动予以默认。虽然这些行动毫无疑问会招致有希望成为胜利者的共产党的怨恨，但是相对来说从中国问题对美国无关重要的思想出发，杜鲁门政府可以容忍在中国的失败。这也使政府更加相信，如果国会与政府离心离德才是更为严重的危险。

凯南的政策计划官员断定国民党的软弱将促成共产党的胜利，“给国民党提供更多的美援挽救不了颓势，反倒会宠坏了国民党，促使局势恶化。”(19)但是，马歇尔却考虑最好继续给蒋介石小规模援助，既保持他掌权又不至于使美国陷入援助的无底洞。屈从于公众对中国的同情以及国会对政府的压力，马歇尔于 1947 年 5 月同意解除禁运，使国民党能再次获得美国的军援。甚至当禁运在理论上生效的中间阶段，美国海军陆战队撤离时还不得不“抛弃”了六千五百吨军火留给蒋介石部队。在 1947 年夏，和蒋介石的关系相对来说不错的魏德迈将军被派往中国考察中国的局势，以确定美国能否挽救蒋介石政权。

使马歇尔感到失望，魏德迈返美后建议给蒋介石大规模经济及军事援助，条件是蒋介石同意实行全面彻底的改革。杜鲁门及其顾问并不赞同魏德迈关于东亚对美国安全的重要性的估计。他们也不再相信蒋介石会实现他当政 20 年来一直不肯实行的改革，而且，他们认为通过改革挽救蒋介石政府的时机已不复存在。魏德迈劝说参谋长联席会议向中国派遣一个包括官兵约万人左右的美军顾问团，认为这也许足以扭转中国的形势，但马歇尔坚持认为，只有大规模的军事干涉——可以想像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方能挽回中国的形势。但是这样的任务最好留给中国的大兵去完成。他可以给蒋介石钱，但不给军事援助。最后，杜鲁门政府相信，如果把为美国的安全花的钱花在欧洲，将能得到更大的无穷尽的报偿。由于一些始终未充分披露的原因，美国人民并不知道这一非常明智的论断。政府决定扣压魏德迈的报告，使自己陷于以后必然会被指控为隐瞒事实的处境。

蒋介石既不能推动杜鲁门政府，便和他在美国的朋友们把力量集中在国会及反对党身上。此刻毛泽东，中国共产党以及越来越多的中国知识分子指出，由于美国对蒋介石的援助推迟了和平的实现，加重了中国人民的灾难。蒋介石则亲口告诉来访的美国议员，如果他被挫败，唯一原因就是美国在中国危难时刻拒绝给予支持。虽然情报部门的估计和魏德迈的调查结果说明蒋介石并不缺少装备，不如说是腐败、战术上的错误以及种种弊端使蒋介石逐渐丧失了他的统治地位。尽管如此，共和党的领袖如纽约州长杜威等人，力



图为美国未能实现在中国的目标这一问题上为自己和他们的党洗刷，反而要求给国民党更多的援助。1948年考虑到总统选举，美国政府企图堵住反对者的嘴，表示愿意接受甚至比国会能予通过的数额更大的援华方案——虽然在杜鲁门获胜以后，四亿美元的援华拨款并没有全部用掉。

司徒雷登大使比以往和蒋介石打过交道的大多数美国官员更同情蒋介石的困难处境，但是，司徒雷登对蒋介石坚信美国会再来援救他，甚为惊讶。蒋的这种想法出于“他有一种近乎神秘的信念，确信自己有力量让美援对世界范围的共产主义开火”（20）司徒雷登把蒋介石在整个1948年坚持不肯妥协的原因也归咎于他的这种信念，以及他确信杜威会当选，美国的政策将改变。但是蒋介石并没有过高估计自己的吸引力。在1949年2月，五十位参议员，其中二十五人是民主党人，联名建议给蒋介石提供十五亿美元贷款。经过几个月的辩论，政府虽然成功地使国会同意拨款七千五百万美元作为对“中国广泛地区”的援助，但它还是不敢把源源不断往中国运送设备的措施停下来，惟恐被指控对蒋介石的崩溃负有责任——虽然不得不承认，大部分物资非常可能都落到了共产党的手中。

几年后，艾奇逊写道，当他出任务务卿时，蒋介石政权已濒临崩溃的边缘：“我来的正是时候，他就倒在我身上了”（21）。蒋介石拒绝听取美国在军事方面的劝告，包括魏德迈的意见在内。他持续不断地拉长战线，想控制东北。当他的部队向北推进时，共产党转入农村，在背后把他们孤立据点之内，切断了退路。事实证明美国人把共产党的实力估计低了。国民党士气的迅速低落超出人们的意料，由于通货膨胀的破坏作用更加速了这一过程。1948年是灾难延续不断的一年，国民党军队在东北被消灭，成千上万的部队携带着他们的美国武器装备向共产党投诚，而共产党部队开始向华中挺进。于1949年1月结束的历时两个月的战役，国民党手中尚存的大批美国军事物资被共产党缴获，国民党军队伤亡约五十万之众。数日后，蒋介石再度“引退”，但事先采取了预防措施，把政府的黄金储备及一部分军队转移到台湾。试图在共产党未获全胜前达成和平协议的努力也告失败。在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宣告以北京为首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2月，一度是中国独裁者的蒋介石及国民党政府残部逃往台湾和他们有先见之明早已储存在那里的财宝团聚。中国的内战迅速地结束了，正好是美国政府早先警告这蒋介石的那种结局。美国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生命力及国民党的腐朽从根本上说是看准了的，但是后者的腐败程度是美国不曾想像到的，而共产党的胜利来得如此迅速，如此具有决定意义也出乎美国的预料。既已站在失败者一边，此时美国政府只好考虑用什么办法方能与胜利者的共产党和解。

#### （五）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第一年，当国民党与中共竞相争夺东北及华北的控制权时，共产党坚定地对美国援助国民党持批评态度，他们的批评在很大程度上出自莫斯科的“庸俗的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但总的来说，他们的主要目标是国民党政府，他们抱怨美国援助那个政府有大量的事实根据。自1946年7月1日，毛泽东命令展开反美运动以后，对美国的攻击就日趋于辱骂和不顾事实。在这一年内，有许多美国人残害中国平民的故事广为传播，对这些暴行的描写手法足以使报业大王赫斯特（Hearst）和《纽约每日新闻》望尘莫及。批评的重点是：美国人“占领”中国，美国想把中国变为“殖民地”以及蒋介石已蜕化为美帝国主义的“走狗”。

不论如何，当临近胜利时，毛泽东和周恩来十分清楚和美国和解的潜在价值，在苏联和美国进行的冷战中，他们毫无疑问会站在苏联一边。但是这种态度并不排除和美国人建立互惠的经济关系。毛和周作为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他们相信美国资本主义需要中国的市场以避免经济萧条。他们知道美国比苏联更有能力为他们提供重建中国和实现现代化所需的援助。同时，作为中国爱国者，他们不愿依赖俄国人。可以想像，能够利用互相协调的中美利益，使中国得到好处。

毛和周虽然影响很大，但是他们像杜鲁门和艾奇逊一样在行动上也受国内因素的牵制。普通共产党员及人民解放军的指挥员都强烈地敌视美国。尽管从美国的角度看，支持国民党是一件多么平常的事，但是，它却使许多中国人丧生，给中国造成深重的苦难。反对美国，反对帝国主义，曾经是革命宣传的主要内容，在内战期间通过它发动群众。当解放军在全中国推进时，毛和周不可能阻止一系列反对美国人的事件，这些做法不符合他们对反动的美国政府与爱好民主的美国人民加以区别对待的政策。此时如企图和美国达成谅解，会因为意识形态和爱国主义的缘故遭到激烈的反对。毛和周委婉地暗示，他们可以接受美国的建议，接受包括美国准备改正错误，给中国以平等对待的表示。他们不会乞求，而是等待长期以来压迫中国的西方甘冒风险地迈出第一步。在认真考虑和解之前，他们需要华盛顿作出慷慨的姿态。但是美国当时的政治形势恰好排除这种慷慨的表示。

1948年至1949年冬，当毛泽东胜利的形势已十分明朗时，杜鲁门政府寄希望于防止中国成为“苏联的附属国”，聊以自慰。俄国人对共产党取得胜利并没有起重要的作用。在共产党控制区没有俄国人，加上得知铁托于1948年和斯大林决裂，这两件事使美国在无能为力的情况下得到少许安慰。艾奇逊于1949年1月接替马歇尔出任国务卿，但他并不怎么不安。他是强烈的反共分子，急于遏制苏联在各地的影响，但又是一个大西洋主义者，在他看来西欧处于最高的优先地位。阻止共产党跨过太平洋固然令人满意，但是显然没有欧洲的恢复及创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重要。此外，凯南劝他放心说，不论蒋介石政权的崩溃如何“可悲”，但它不会是一场大灾难。中国由于缺乏资源，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不会变成一个强国。凯南还争辩说，中共如能成功地接管中国，他们对苏联的依赖就会减少。对艾奇逊来说，这很清楚，减少美国的损失，停止援助国民党的时刻来到了。

2月3日，国家安全委员会建议美国暂停对中国的航运，但是国会领袖们敦促总统不要采取正式的行动。他们并不坚持要继续给国民党援助，相反，表示愿非正式地予以拖延。他们最关注的不是蒋介石的前途，而是要安慰他们自己人，并保护国会不遭受选民们的指责。他们顾虑公开宣布停止援助会导致国民党政府立即垮台，果真如此，他们和总统都有责任。杜鲁门接受他们的劝告，没有按艾奇逊的办法做。

在此后的几个星期，艾奇逊极力主张美国政策的目标应该是防止“苏联出于战略目的控制中国”。任何威胁中共的企图只能迫使他们走上完全依赖苏联的道路上去。最明智的策略是和中共发展经济关系，集中力量设法把他们和俄国人分开。从战地来的报告进一步加强了出现一个独立的中共政权的希望。有根据表明俄国人与中国领导人之间关系紧张，中苏分裂不可避免的感觉在增长。至于什么时候分裂，可能会受美国行动的影响。3月份，艾奇逊授权司徒雷登大使与中共领导人接近。他告诉英国外交大臣贝文

(E. Bevin)，蒋介石政权已经“完结了”，6月份以后，美国就不再支持它，而美国“此后将对中国奉行一种比较现实的政策”（22）。

艾奇逊的观点得不到公众的支持，这也明显地反映在和贝文的谈话中。他承认公开地撤销对蒋介石的支持是有困难的，虽然他认为在美国国会中蒋介石的“极端支持者”如今“正在增进对现实的了解”。司徒雷登接到指示，要他把和共产党领导人的会谈报告只送呈“国务卿一人过目”。美国公众——以及美国总统——都还没有足够思想准备接受中国内战的结局。

在5月和6月份，司徒雷登多次和他以前的学生黄华会晤，黄华现任共产党的外事处负责人。黄华邀请司徒雷登访问他们的燕京大学，在那里他可望受到毛和周的欢迎。国务院内部对这个探讨和解条件的不寻常的机遇表示欣赏，克服了怕引起公众非难的顾虑，但是，总统却不赞同。“在任何情况下”司徒雷登不能访问北平。总统不希望承担给蒋介石如此致命打击的责任。艾奇逊克服了极大的困难才劝阻了杜鲁门没有改派司徒雷登去拜访国民党的总部。

6月底，毛泽东发表的一篇讲话使和解更加困难，他对美国进行谴责并宣布中国将向苏联一边倒。艾奇逊已经预料到这一着，而且曾试图使总统及国会做好准备。艾奇逊指出，鉴于在中国人与美国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在发展，今后中国人将更加强调他们和俄国人的亲缘关系。艾奇逊会有耐心。虽然他不为毛的讲话而不安，但是在大多数美国人看来，俄国人已在亚洲取得巨大的胜利。对那些坚定不移，决心要在欧洲及中东钳制苏联，把注意力集中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国人来说，好像是从背后遭到暗算。俄国人巨大力量中又平添了广阔的领土，亿元的人民，以及数不清的资源。正如1940年的三国公约曾经把亚洲事务与欧洲事务联结起来一样，1949年，由于了解到毛泽东和莫斯科的结合，在美国人的思想上也把这两个地区联系起来。1940年以对亚洲比较次要的关注和对欧洲的重大关注融合在一起，确定日本为敌人，因而对蒋介石的中国有利。如今又重复了这个过程，1949年以后，美国人反对苏联，也即是反对共产主义，又使亚洲与欧洲事务结合起来，以中国为敌人，于是再次对蒋介石有利。

1949年8月，不顾国防部长及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反对，杜鲁门政府作出为时已晚的努力，发表了著名的“中国白皮书”，使美国人民对国民党崩溃的结局有所准备。“中国白皮书”是包含许多解释及文献的巨册，旨在为政府辩护，驳斥那种指控政府“丢失了”中国的说法。艾奇逊不顾对毛的“一边倒”讲话的关切，不顾五角大楼的强烈反对以及在国会及他的顾问当中的保留态度，哪怕国民党还占据着广州，艾奇逊决心发表“白皮书”，其最好的解释就是他决心给国民党政府下最后一道催命符。他要求结束美国对中国内战的干预，以先发制人的办法对付蒋介石的美国朋友们的活动，同时，准备与中共政权和解。但是，蒋介石逃到台湾去了，使这一争端——以及他的事业——继续存在下去。

艾奇逊提出：中国内战的结局超出美国的控制能力，蒋介石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是咎由自取，对此学者们很少提出异议。但是，通过“白皮书”来说服公众的努力却失败了。共和党不会放弃对外交政策的争论，艾奇逊同时宣称：“共产党领导人已背弃中国传统，公开宣布依附于外国势力——俄国，而俄国……曾经千方百计地把控制扩展到远东”（23），这一宣布使政府削弱了自己的立场。其后多年，美国学者和政治家以及公众对为什么在亚洲抵

制苏联的活动不如欧洲重要仍然觉得不可理解。艾奇逊有答案，但是，他以为这个问题很奥妙，美国人民难以理解，这反映了艾奇逊的特点。他顾虑公众不能理解对美国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地区与有次要利害关系地区的区别，他不敢使加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计划受到危害。只要他能阻止美国大范围地卷入中国事务，他就可以默认杜鲁门不愿进一步疏远蒋介石的支持者的态度，许多支持者同样关心美国的利益。

1949年夏，当共产党在大陆上扫荡国民党的散兵游勇时，在华盛顿对如何处理台湾问题展开激烈地辩论。年初，杜鲁门及其国家安全委员会曾经断定，不使这个具有战略价值的岛屿落入共产党手中的最佳方案是扶植台湾独立运动，这个运动的成员虽然在种族上属于中国人，但长久以来已和大陆中国分离。美国不想明目张胆地进行干预，以免激怒国际社会或驱使中共更靠拢俄国人。艾奇逊向杜鲁门解释说，防止中共成为苏联势力的附庸，就必须把注意力集中于苏联在东北及新疆的活动，同时“小心地隐藏我们把这个岛屿从大陆分割出去的意图”（24）。想使台湾摆脱国民党的统治成为独立的政权已证明是一种妄想。几个月内就已看清楚，独立运动力量很弱，整个岛屿是由拥护蒋介石的人统治着。在把台湾从大陆分割出去的新探索中，最不可思议的是凯南的方案。他坚持认为，台湾的战略价值比参谋长联席会议所承认的还大，他决不能设想让共产党征服这个岛屿。美国必须采取行动。凯南主张美国出兵把蒋介石的军队赶出台湾及澎湖列岛，代之以成立美国的保护国——一个独立于大陆之外的政权。他提出要像“西奥多·罗斯福可能做到的那样”具有“决心、速度、无情和自信”（25）。

艾奇逊不为所动，为将国民党埋葬在升起它的旗帜的任何地方，他宁愿放弃固守这个岛屿的努力。如果让蒋介石的不知悔改的部下统治台湾，它注定要落入共产党手中。他们只会重复在内战中给他们带来失败的那些错误。美国插手台湾是徒劳的，而且对把毛泽东、斯大林两人拉开会起反作用。1949年8月，艾奇逊说服了参谋长联席会议接受他的政策。

但是，11月份，几位知名的共和党人，参议员诺兰（W. Knowland）和塔夫脱（R. Taft）会同前总统胡佛，要求美国政府保护台湾使得中国指责美国就要占领台湾提供口实。麦克阿瑟将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也呼吁采取行动制止共产党占领台湾。艾奇逊控制着局面，迫使参谋长联席会议退却。为使事态平静下来，杜鲁门总统于1950年1月5日发表声明，宣布美国决定不介入中国内战，对台湾没有任何企图，今后继续向蒋介石提供经济援助，但不提供军援或军事建议。一个星期后，艾奇逊在教育美国公众方面作出重要贡献，他提出了两个基本观点。第一，中国人与俄国人在东亚各有抱负，他们从历史上一直是互相敌视的，为满足美国在这地区的利益最好不去激怒中共，而是把他们的民族主义情绪转向反对苏联。第二，目前亚洲大陆上敌对的军事局势对美国的安全并无严重威胁，美国的“环形防御带”包括阿留申群岛、日本及菲律宾，既不包括台湾，也不包括大陆的任何部分。无论新闻界，还是美国公众，都毫无困难地理解了艾奇逊的观点，看来反应不错。美国政府及美国人民对共产党在中国取得胜利也许会感到不愉快，但是他们已有准备接受这一不可避免的现实，去学习如何与人民共和国相处。再见了，台湾！

从外交上承认北京政府还存在两个障碍。其一是，在政府机构内外有一部分对蒋介石政府从感情上怀有责任感的美国人。只要蒋介石的军队还在坚持，这些人就极力主张给蒋介石援助，尽管他们的成功机会减少。其中有些

人已看到蒋介石的末日不远了，但是，他们请求政府不要给蒋介石致命的打击。杜鲁门及其顾问们不愿冒额外的风险，被人指控是他们出卖了蒋介石，他们宁愿等共产党征服台湾，那时，国内反对承认中共的意见可望锐减。其二，毛泽东对与美国和解并非漠不关心，但事实上仍保持敌对、猜疑的态度，不愿意、或者是无法压制一般党员的强烈反美情绪。如果会出现明显的表示缓和的意向，那只能出自美国方面的主动。中国屈膝受辱的时间太长了，新中国不会乞求帝国主义的承认。

当共产党军队在 1949 年席卷中国，于 1950 年初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以后，他们对支持蒋介石的外国人予以敌视，尤以对美国人为甚。一位美国外交官在上海被警察殴打，还有其他人，包括美国驻沈阳的总领事沃德（A. Ward），沃德被软禁一年后正式投入监狱。面对中国人的狂暴行为，艾奇逊提出，美国的重大利益并未受到影响，没有充分根据采取可能使毛更靠拢斯大林的对策。他认为沃德案件属于特殊情况。1949 年 11 月，当沃德被交付审讯时，美国公众的愤怒濒于爆炸的边缘，艾奇逊则强调在共产党控制区的美国人无一被杀害的事实。他得到总统的支持，但中共及蒋介石的美国朋友们显然成为一种共生的关系，大家都在煽动相互间的仇恨，加重了全世界好心人的不幸。毛泽东手下的人搞的每一起凌辱事件都为那些要求美国加强反共立场的人提供了弹药。参议员诺兰、布里奇斯（S. Bridges）和惠里（K. Wherry）所发表的任何一个类似的声明，都给毛的反美运动提供口实并导致新的凌辱事件。这种循环还在很大程度上存在，光阴在流逝，承认人民共和国事仍拖延不决。

1950 年 1 月，美国及人民共和国双方由于对一个次要的问题处置不当使反对和解的人得到了好处。艾奇逊认为他已经给中国人一个清楚的信号，表明美国有意志在可行情况下尽快与中国建立正式关系。但是中国人多疑，不相信，而且对美国及其他尚未承认中国的国家施加压力，威胁要征用它们在北京的产业，包括有关政府的领事馆房产。艾奇逊制定了一个妥协方案，他通知北京当局说，房产的大部分面积可以征用，但得保留一幢美国计划用作办公处的房子。这一安排可给中国政府留个面子，又不致在美国国内引起喧闹。他警告说，如占用该建筑，美国不能接受，并将导致从中国撤出全部外交人员。显然任何一方都认为对方在进行恫吓。中国人占领了那座建筑物，美国人则束装回国。造成这种结果是不幸的，但艾奇逊并不认为这一行动是最后的结局。

艾奇逊并未放弃努力，他估计 1950 年初毛泽东和斯大林进行了旷日持久的谈判回到中国后，会有更好的机会与人民共和国达成和解。他确信斯大林会对中国人提出过分的要求，这将为美国提供一个楔子，可以插进去离间他们的关系。但是在 1950 年 2 月，毛和斯大林签署了同盟条约，过了几个月，艾奇逊断定莫斯科和北京之间不会过早地决裂，同时，在几年之内，中国人对美国持较缓和态度的可能性也很小。他不着急，国民党对大陆的抵抗很快就会被消灭。蒋介石逃往台湾只不过是暂时的麻烦，据中央情报局估计，共产党在年底就会攻克这个岛屿。总统也许在 11 月大选后就能采取行动，不承认中国暂时会使法国人高兴，他们正为中国支持越南的胡志明而头痛。一旦蒋介石被消灭，美国就没有进一步卷入中国内战的可能性了。艾奇逊可以等待，承认中国事也可以等待。到 1950 年 6 月 25 日，承认人民共和国问题尚悬而未决，在朝鲜爆发了内战，正如人们在布鲁克林常说的那样，一场新的

球赛开始了。

#### (六)

当杜鲁门及顾问们开会研究美国对朝鲜战争作何反应时，艾奇逊提出他最后的劝告：由杜鲁门派遣第七舰队去台湾海峡，以防止战争扩大到台湾。杜鲁门同意艾奇逊的劝告，终于命令舰队去防范来自大陆的袭击，同时也防止蒋介石企图对大陆进行任何军事行动。鉴于唯一可预料到的对台湾的军事行动来自大陆一方，美国对蒋介石的“束缚”是为了避免更深地陷入中国内战而作出的可悲的努力。政府决定向台湾海峡派遣舰队的主要原因或许是感觉到了要求保卫台湾的强大压力，这也是在政府意料之中的。不仅是一些知名的共和党人强调台湾的战略重要性，连艾奇逊自己的工作班子，包括腊斯克（D. Rusk）、杜鲁门的国防部长约翰逊（L. Johnson）及麦克阿瑟将军都敦促政府重新考虑这一问题。一旦美国决定保卫被置于“环形防御带”之外的南朝鲜，就很难解释为什么不应该保卫台湾。假如中共攻击台湾同时干涉美国保卫南朝鲜，政府就极易受到国内支持蒋介石的一派人的抨击。如果从另一方面考虑，既不使台湾陷入中共之手，又不使美国对蒋介石承担义务，派出舰队将是保护台湾代价最小的一个办法。这是政府企图维持的一种微妙的平衡。

另外，杜鲁门及其顾问本身对中国内战和刚开始的朝鲜战争之间的关系还拿不准。他们正致力于反对共产党在朝鲜的军事行动，同时又在谈用第七舰队制止战争扩大。早先他们把毛泽东策划对台湾采取行动看作是内战的结束，可现在却把同一个行动作为美国反对共产党在东亚扩张新战争的背景下加以考虑。像批评他们的人一样，杜鲁门及艾奇逊也似乎不承认以内战手段扩充共产党势力和以侵略行动扩充共产党势力二者是有区别的。对美国应在什么时候进行正当而又有利可图的干涉，他们心情是矛盾的。向台湾海峡派遣舰队的决定是在北朝鲜发起攻击后几小时作出的，此举似乎是留有充分余地，在未获得更多情报之前暂不对中国采取更具体的对策。为保留行动的自由和保持所期望的平衡，艾奇逊劝告杜鲁门拒绝蒋介石派部队参加朝鲜战争。但是杜鲁门明确地重新提出台湾的地位问题。美国不会再默许共产党征服这个岛屿，各种关于台湾独立的方案再度出笼，旨在建立一个独立的，最好是自由民主的没有蒋介石的台湾。

政府对中国内战新采取的有限干预并不难改变，但是发生了一连串事件使事态进一步发展。麦克阿瑟将军在日本五年曾教育日本人什么是民主，他自己却采取了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做法，就台湾对美国的重要性自作主张。他不经总统授权，便飞往台北与蒋介石会晤，并同意配合蒋介石进行军事活动。接着，又不通过五角大楼向台湾派出三个喷气战斗机中队。当台北政权加紧对中国大陆进行轰炸时，杜鲁门及艾奇逊谴责这一行动，相信麦克阿瑟应对此负责。麦克阿瑟的言论及行动，为毛泽东、周恩来对迫在眉睫的美国进攻人民共和国所表示的担心提供了根据，他们担心美国利用朝鲜危机使蒋介石重返大陆。确实，麦克阿瑟的想法与此相差不远，美国国内支持蒋介石的人也毫不克制地发表这种意见。

美军作为联合国部队赴朝支援正在崩溃的南朝鲜军队，在其他十几个联合国成员派出的部队帮助下，他们固守着釜山一线。9月份，麦克阿瑟在仁川发动一场辉煌的海陆军协同作战，到月底，联合国部队事实上已控制了南朝鲜。于是，关于是否应该越过边界线追击北朝鲜部队，众说纷纭，出现广

泛的意见分歧。在联合国和美国政府以及国务院内部都发生了争论。通常战争目标多随战争的胜利而扩大，五角大楼及国务院的远东司和联合国司都赞成继续向北朝鲜推进，以建立一个“统一的，独立而民主的政府”。为此目的诱使联合国发出一道含糊不清的命令，尽管其他一些国家都担心取得进一步胜利很可能引起中国或苏联的干预，会使风险极度增加。杜鲁门政府实质上持机会主义态度。麦克阿瑟受权在没有中国或苏联部队大规模集结情况下可越过三八线继续北上。

在国务院内，凯南及其在政策计划部门的继任尼采(P.Nitze)反对越过三八线，部分由于这种行动太冒险，但他们反对的主要理由是认为无此必要。特别是凯南，他认为存在着不必继续打下去而使局势恢复原状的机会，同时，他对在中国和苏联之间打进一个楔子的可能性十分感兴趣。苏联似乎并不赞同印度人所建议的，由联合国接纳北京以换取恢复原来的南北朝鲜边界。凯南和为数不少的观察家们都认为俄国人希望把中国置于孤立的从属地位，事实上不想让毛泽东的政府进入联合国。国务院未能默许“国际社会”给中国在联合国以席位的决定，凯南认为这基本上是由于“中国院外集团及其在国会中的朋友顽固而不负责任的干预”(26)造成的。

不顾中国人一，再警告——美国如越过三八线中国就要进行干涉——麦克阿瑟仍确信他们不敢，如果真进行干预，他的部队将迅速地消灭他们。十月中旬，神经紧张的总统飞往威克岛与他的将领们会谈，他们向他保证战争将在感恩节结束，士兵们可以回家过圣诞节。这个月尚未结束，中国便发起武装干涉，两个月后，联合国部队面对中国的猛攻开始退却。美国士兵在中国人手下死去。中国和美国成为仇敌，通往承认之路已断绝，而蒋介石则时来运转。

麦克阿瑟的乐观破灭了，他认为在这场新的战争中必须进攻中国的领土，但是华盛顿强加给他的种种限制使他恼火。杜鲁门及其顾问，包括参谋长联席会议，都承认打败在北朝鲜的中国人需要作极大的努力，仅限于美国在亚洲可以运用的资源力量是不够的。既不能排除苏联可能在一场更大的战斗中参加进来，也不能排除它乘美国陷足朝鲜之机在世界其他地方采取行动。艾奇逊在与杜鲁门和马歇尔将军(他已出任国防部长)，以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雷德利将军(O.Bradley)共同讨论以后，认为“克里姆林宫或许看到可从美国对中国的战争中捞到好处，因为这场战争可以在一个次要的战场上牵制消耗和遏制美军”(27)。麦克阿瑟由于不能说服其上级相信他对战争的打法，以及对亚洲的相对重要性所作的估计，也开始越过他的总司令向美国人民，特别是共和党反对派呼吁。

到杜鲁门鼓起勇气解除了这位一直颇孚众望的麦克阿瑟的指挥权的时候，已经给美国造成不可胜数的损失。美卷入了对中国的战争，麦克阿瑟言语上和战术上的失策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机会主义立场使政府对麦克阿瑟违抗上级采取容忍态度，而且在他有成绩的时期，一直顺从着他，以至付出丧失盟国信任的代价。在国内，美国公众为麦克阿瑟求速胜的妙策所吸引，拥戴这位老英雄，因而对杜鲁门的领导失去了信心。当对抗终于来到时，来自美国有派的谩骂十分激烈。在美国社会的阴曹地府里流淌着一股浊流，又推出了一位新的民族英雄麦卡锡(J.McCarthy)，他变成新美国的象征。

麦克阿瑟坚持认为不对中国领土进行大规模反击就不能完成的任务，马修·李奇微将军(M.Ridgeway)仅用几个月就完成了。军事形势便稳定下来。

双方于 1951 年 7 月开始和平谈判，经历约两年极不顺利的谈判和不断发生的小规模交火，终于达成停战协定。中国人撤离朝鲜，但是，人民共和国一直是美国的“敌人”。

朝鲜争端使美国更加强硬地反对北京政权，而且扩大了美国的亲蒋集团，这些人企图使蒋介石东山再起，最低限度也要利用蒋介石来达到美国的目的。蒋介石再度成为美国的盟友。美国要摆脱台湾从政治上已经不可能了。不论艾奇逊故意延宕，拖了多久，他还是被赶回到蒋介石的怀抱。对国民党政权的军事援助也恢复了，由于许多美国人的儿子、丈夫及兄弟死于朝鲜战场，批评政府早些时候拒绝援助蒋介石反共的呼声上升了。同时，一些卑鄙政客破口大骂，以道德败坏、卖国等令人厌恶的罪名指责他们认为应对“失去”中国负责任的人。国务院的中国问题专家，特别是克拉布(O.E.Clubb)、戴维斯(J.P.Davies)、谢伟思(J.S.Service)及文森特(J.C.Vincent)都在美国历史上一次最可耻、最具破坏性的事件中受到凌辱和迫害。朝鲜战争使大多数人确信国际共产主义是铁板一块，早先的那些论点，如中国的共产主义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如毛泽东不会充当斯大林的傀儡，如不管你喜不喜欢，中共最终将取得胜利，这一切在许多人看来似乎太天真了——而对约瑟夫·麦卡锡以及那些新出现的、玷污了美国的麦卡锡徒子徒孙来说，这些观点就是卖国的证据。后来，由克拉布及其同事们提出的基本正确的分析，重新得到肯定，在人类的历史记载中，他们比对那些他们施虐的人在历史上占有更高的地位，但是他们个人所遭受的伤害是无法弥补的——同样，美国也不可能从麦卡锡时代给国务院造成的损害中迅速地得到恢复。

于是朝鲜战争最后的结果是：美国重新卷入中国内战中战败的一方，并且使不承认北京政府的决定更强化了。恐怕若干年后，人们才敢公开重新提出这个问题。同样，美国在联合国带头谴责中国是侵略者，而且在以后许多年当中一直迫使仆从国投票反对北京在联合国的代表权。作为战时措施的贸易限制一直拖下去，因无人敢于提出解除贸易限制的建议，惟恐引起轩然大波。确实，美国曾经对各国施加压力，要它们参与对中国实行经济制裁，因为 50 年代美国的政策是孤立和最终推翻人民共和国。一个美国人民传统上以轻蔑、怜悯及同情态度对待的国家，现在成为他们最害怕的敌人之一。

#### (七)

远在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在中国的美国军官及外交官员就曾断言，蒋介石并不想抗日而是养精蓄锐，力图重新展开剿共运动。他们对国民党管理中国的能力信心不大，也不相信国民党能经得起考验，若不在驱逐日本之前则在其后内战必将爆发。他们觉得从长远看，共产党可能取胜，同时，也看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强烈民族主义倾向及意识形态上的特点，所以他们觉得没理由认定中共只是苏联势力的延伸。

对战争期间美国人在中国的经验进行充分研究后，确认早期作出的估计是正确的，使华盛顿内外更多的人对中国情况有了进一步了解。在美国政府内，罗斯福显然是最后一批理解中国现实情况的人之一——也是他最后放弃和蒋介石真诚合作的希望的人之一。罗斯福没有办法使蒋介石把部队用于抗日，他只满足于使中国人坚持到战争结束，不要在这以前全面崩溃——他努力防止爆发内战。他把这一任务委任给赫尔利，最终同意赫尔利的信念，即需要支持蒋介石及国民党，把他们作为美国期望在中国出现的统一民主政府的中心。赫尔利或罗斯福都不会赞同以回避蒋介石作为统一中国先决条件的



更富于活力的方案。

1945年2月在雅尔塔，罗斯福花代价赢得苏联的支持，支持他寻求以国民党为基础统一中国的政策——或许他和赫尔利、蒋介石和毛泽东都是这么想的。在战争结束后，杜鲁门政府把赫尔利的一套主张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但是，战后的中国局势由于苏美两国在世界其他地区的合作中断而即复杂化了。由于美苏的互不信任在加深，双方的野心发生冲突也趋于明显，美国越发决心遏制苏联在亚洲的势力，不让俄国人在日本扮演一个有影响的角色，并企图把俄国人对东北及华北的威胁降至最低限度，从美国的反应便可以知道苏联对东北的政策违反了斯大林的雅尔塔协定及其后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精神。当美国想帮助中国政府恢复对华北和东北的控制时，俄国人却发现可以利用中共来阻挠美国作这方面的努力。

在这种情况下，赫尔利辞职了，他只短暂地把美国的注意力吸引到中国身上。杜鲁门政府决心解决在解放和占领欧洲过程中出现的与苏联的分歧，极力避免在外围地区节外生枝发生纠葛，他把马歇尔派往中国，艾奇逊则在华盛顿作为后盾。美国的政策似将保持不变，马歇尔的使命只不过是赫尔利以蒋介石为中心和平统一中国政策的延伸。中国和日本的战争曾经使赫尔利的努力具有迫切性，而美苏关系的恶化又使马歇尔的使命具有了迫切性。尽管美国对蒋介石及国民党是有保留的，但是国际形势的新发展似乎没有为美国在中国搞纵横捭阖留下多少余地。

从1946年到1952年，7年当中支配美国对华政策的主要人物是马歇尔和艾奇逊，他们俩人是美国政府中最有能力的官员，在30年代后期都曾参与美国政府的决策。他们和罗斯福一样，都认为美国在欧洲的权益是主要的，亚洲则次之；他们确信从美国的安全考虑，发生在亚洲大陆上的事件没有发生在大西洋彼岸的事件意义重大。他们俩人都看到随着德国战败及苏联力量的增长，力量所在开始东移，但是他们认为，中心仍然在欧洲。当政的总统毫不犹豫地同意他们这种估计。

马歇尔及艾奇逊比赫尔利更深入地了解中国的情况，但是在1946年夏天以前，他们继续赫尔利的探索，企图在中国的两个竞争对手之间进行调停，而他们的政府却给其中的一方提供大量的援助。直到战争结束1年以后时，他们才醒悟，和平统一中国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中国也是难以想像的；由于蒋介石确定的是一条自我毁灭的路线，美国最好尽可能摆脱蒋介石的政府。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八个月的研究之后，马歇尔及艾奇逊得出结论：鉴于美国资源有限，把它们用于别处更有利可图。

这两个人在1947年曾是一个使美国踏上反对苏联道路的集团中的核心人物，他们不自觉地使这种反苏行动发展成为反对共产主义的十字军东征，但最后只好听任共产党在中国取得了胜利。他们明白，企图为蒋介石赢得中国已毫无希望，便指望中共的民族主义和中苏之间传统的不和，使毛政权的出现不会导致苏联势力的重大增长。进一步说，因为他们怕在欧洲蒙受灾难，就必须冒在中国蒙受灾难的危险——他们知道，美国在欧洲的重大利益已处于危险之中。

当朝鲜战争发生时，同一种模式的想法和行动在杜鲁门政府中占的优势。欧洲不打仗时，亚洲的冲突使那些不同意美国以大西洋为重点制订政策的人感到得意。后来美国公众失去了信心，说明马歇尔、艾奇逊及杜鲁门总统不仅未能使美国人民对美国力量的限度保持清醒，也未能使他们了解美国

有限的力量应优先使用在什么地方。

最后，尽管杜鲁门及其顾问寄希望于中共的民族主义，他们被迫作出结论：不论毛泽东是否有独立性，他都是强烈反美的。对毛的敌视态度必须给以报复。腊斯克公开宣称，中国已成为国际共产主义的工具，是一个“斯拉夫人的‘满洲国’”，要像反对苏联一样有力地反对中国。作为他们自己的工具的蒋介石及其残存的政权在危急的最后关头获得缓期执行死刑，继续维持着“中华民国”仍然存在的神话，暂时蜷伏在一个岛上，而所有中国人都称它为台湾，中国的一个省份。

#### 原书注释

JacobGouldSchurman 致 PresidentCalvinCoolidge ,1924 年 4 月 8 日 , SchurmanPapers。

Stimson 致公使馆，1930 年 9 月 30 日，893·00/11224A，NA。

Johnson 致 Stimson1930 年 10 月 12 日，893·00B/771，NA。

杨铨(即杨杏佛——译者 X YangChien 译音)的意见书,由 WillysPeck 递交国务院，1932 年 8 月 11 日，893.00/12140，NA。(译者按：杨杏佛的《中国共产党现况》一文的英文稿曾全文发表在 1931 年 7 月 19 日上海《字林西报》星期日增刊。)

Johson 致 Stimson，1933 年 2 月 13 日，893.00/12291，NA。

Hull 转交 GeorgeH.Dern，1935 年 9 月 19 日，033·1190Dern，George H./46，NA。

Johnson 致 Howard，1935 年 12 月 31 日，JohnsonPapers。

美国大使馆参赞致国务卿，内附 Lattimore 分析文章，1937 年 8 月 2 日，893·00/14179，NA。

海军情报部(OfficeofNavalIntelligence)报告，761·93/1623，NA。

Johnson 致 Hull，1938 年 11 月 29 日，893.00/14288，NA。

(11)EverettDrumwright，由 WillysPeck 编辑的电报摘要，1939 年 10 月 31 日 893·00/14480，NA。

(12)Gauss 致 Hull，1941 年 10 月 3 日，893.00/14800，NA。

(13)JohnS.Service，1944 年 10 月 9 日，国务院，UnitedStatesRelations WithChina，WithSpecialReferencetothePeriod1944 — 1949 年，WashingtonD.C.GovernmentPrintingOffice，1949，573，此后引用时略为 TheChinaWhitePaper(中国白皮书)。

(14)JohnPatonDavies,Jr.，1944 年 11 月 7 日，出处同上，566—567。

(15)毛泽东，《愚公移山》，《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伦敦，LawrenceandWishart 出版社，1956，第 317—318 页，另见国民党调查局 184 号报告，1945 年 4 月 28 日，调查局档案，中华民国；也见于 1945 年 5 月 2 日及 8 日《解放日报》(Chieh-FangJih-Pao)。

(16)PatrickJ.Hurley，1945 年 4 月 17 日，《中国白皮书》，第 96 页。(17)胡锡奎(HuHsi—Kuei 译音)，《时局变化和我们的方针》，对干部讲课的油印稿，1945 年 8 月 30 日。

(18)国民党调查局 229 号报告，1946 年 3 月 11 日，重印 1946 年 1 月文件(缺日期)，调查局档案，中华民国。

(19)GeorgeF.Kennan，Memoire(1925—1950)，NewYork：

BantamBooks1969, 394。

(20) LeightonStuart, FiftyYearsinChina, NewYork: RandomHouse, 1954, 第202页。

(21) DeanAcheson, PresentattheCreation, NewYofk: W.W.NortonSonCompany, 1969, 第257页。

(22) MemorandumofAcheson-BewinConversation, 1949年4月4日, FRUS1949, “FarEastandAustralasia”, 第1138—41页。

(23) Letteroftransmittal, Acheson致Truman, 1949年7月30日, 《中国白皮书》。

(24) Acheson致Truman, 1949年3月3日, Pse/Box205, PapersofHarryS.Truman, 杜鲁门图书馆。

(25) KennanMemorandumPPSS3 (EnclosureDatedJune23, 1949) 1949年7月6日 FRUS, 1949, LX, FarEast: China, 356—64。

(26) Kennan, Memoris, S20。

(27) Acheson, PresentattheCreation, 474。

译注[附]远东协定(即雅尔塔协定)

(1945年2月21日于雅尔塔签署)

苏、美、英三大国领袖同意,在德国投降及欧洲战争结束后的两个月或三个月内苏联将参加同盟国方面对日本作战,其条件为:

(一)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须予维持。

(二)由日本1904年背信弃义进攻所破坏的俄国以前权益须予恢复,即:

(甲)库页岛南部及邻近一切岛屿须交还苏联;

(乙)大连商港须国际化,苏联在该港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苏联之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也须予恢复;

(丙)对以大连为出路的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应设立一苏中合办的公司以共同经营之,达成谅解,苏联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而中国保留在“满洲”的全部主权。

(三)千岛群岛须交予苏联。

达成谅解,有关外蒙古及上述港口铁路的协定尚需征得蒋介石委员长的同意。根据斯大林元帅的提议,美国总统将采取步骤以取得该项同意。

三大国首脑同意,苏联的这些要求将在日本被击溃后,毫无问题地予以实现。

苏联方面表示准备和中国国民政府签订一项苏中友好同盟协定,以达到帮助中国用自己的武装自日本枷锁下解放出来之目的。

红色恐怖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及第三国际的建立对美国工人运动产生巨大影响,美国社会主义者宣传同盟及左翼社会党人也展开积极的斗争。美国统治阶级恐慌万状,在美国人民中竭力煽动恐共、反共情绪,并将无政府主义分子制造的一系列爆炸事件,统称为“红色恐怖”,归咎于共产党及工人运动,作为镇压工潮及革命运动的口实。1919年和1920年,美国一些州议会甚至通过法律,宣布悬挂红旗为非法。

帕尔默袭击

威尔逊政府对1919年的工人运动高潮如临大敌,采取一系列反民主措施

镇压罢工及革命运动。司法部长米切尔·帕尔默 (MitehellPalmer) 是这场大镇压的领导和组织者，帕尔默曾于 1920 年 1 月 20 日晚组织军、警、特务对全国的共产党总部进行大规模突然袭击，约有四千人被捕，其中许多是非共产党人及普通美国人民，即所谓“帕尔默袭击”。

## 第七章 政策的大偏差

### (一)

从 19 世纪开始，当美国人民逐渐从美洲大陆本身的问题中摆脱出来，通过对外扩张获得安全与富裕时，他们越来越关心外界的事务，关心世界力量的均势，以及从经济和政治上向海外扩张美国的势力。在美国人对外部世界的兴趣扩大以后，他们在注视欧洲的同时，也把视线移向了东亚，但是，对一个对着大西洋面朝东方的国家来说，亚洲始终是一个次要的地区。对亚洲感兴趣的美国人越来越多，他们对亚洲事务表示关切，但是经商的人发现无论是现实的还是潜在的欧洲市场都比亚洲更有前途。至于那些为美国的安全担忧的人更没有理由把注意力集中于亚洲。纵观美国的历史，经济和政治的中心总是放在欧洲。只有传教士们，那些着眼于传播基督教义的男男女女发现亚洲特别是中国更适合他们所从事的传教工作。

自从美国崛起成为一个世界大国，美国政府在亚洲所寻求的目标与欧洲的目标在实质上是相同的——尽可能建立起一个世界，使美国的利益及理想得以在其中繁荣兴旺。但是，由于亚洲从经济上、政治上对美国都是次要的，美国从来没有认真地在那个地区投入力量，对那里的不利情况也就更能予以容忍。曾经有一个时期，作为公众意见的一部分，人们批评美国政府不肯在亚洲运用与其所寻求的目标相称的军事力量，特别是在中国。但更重要的是，要知道美国在这个地区的目标很少被认为值得为之动干戈。如果靠言辞就能达到目的，那敢情好，但是美国政府及大多数美国人虽然对中国抱有期望，但总是略有所得就感到满足了。

(附表五) 美国对主要的欧洲、美洲和亚洲市场的出口。(1890—1940)

\*

\*按美国出口贸易总额的百分比。

关于美国对中国的反应，还有另一个因素。虽然中国和欧洲相比并不重要，但它也是比较软弱的，美国人很快地看到了这一点。从 19 世纪 40 年代条约制度之初开始，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人寻求并享受到其他国家从中国强取的帝国主义特权。或许在中国有利益的美国人不曾获得他们自认为是理所应得的政府支持，但是，美国的战舰却在中国领海上巡逻，美国部队却驻扎在中国土地上保护着传教士及商人们的“条约权利”。假如说美国在华利益不值得它采取抵制俄国或日本帝国主义所需要的那种大规模参与，那么在中国实行帝国主义也无需多少先决条件，只需进行小规模参与即可——美国政府在这方面从来没有畏缩不前。

另外，部分由于中国的软弱，为美国的妄自尊大提供了一个膨胀的机会。靠加入帝国主义行列是不可能达到这一步的。何况帝国主义角色也和美国的理想及自我形象相抵触。于是，政治家和报纸所唱的高调，在 20 世纪形成一种信念，认为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不同，——美国是独立的中国的“维护者”，它设法保护这个不幸的国家免遭欧洲及日本帝国主义之害。海·约翰及柔克义并不急于消除这种幻想，因为它给他们带来了光彩，也无需付出大的代价。塔夫脱及威尔逊事实上想使美国充当这样的角色，但是当与现实中的日本势力遭遇时，他们放弃了这种想法。对充当这样一种角色后来再也没有在政策上认真考虑过，但是这种神话还固执地继续存在。假如说没有哪一个政治家

能为这种幻想受谴责的话，那么对未能消除这种幻想，几乎所有人都不能逃避责任。

在美国能够宣称自己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以前的年代里，美国人以在中国充当特殊角色自居，滋长出一种民族自负心理。尽管欧洲对美国的安全与繁荣十分重要，许多美国人在参与欧洲事务时态度小心谨慎。他们与大概是十分精明狡猾的欧洲人打交道时觉得不是对手，典型地体现在美国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上，但是在与朴实的中国人共事时，那种自叹弗如的感觉就消失了。中国人和欧洲人不同，他们还是可以被拯救的。这种态度流传多广，难以确定，不过有些美国人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还有这种想法，这也是毋庸争辩的。他们乐于在中国承担起白种人内疚心理而产生的义务——这种自封的使命的狂妄自大和不可思议，由蒋介石的主要鼓吹者、参议员惠里（K. Wherry）集中地体现出来。惠里有一次对美国人说“在上帝的帮助下”，他们可以“把上海提起来，提高，再提高，直到它刚好同堪萨斯城一样”。

虽然有些美国人更愿意美国介入亚洲事务，还有一些人觉得与亚洲人合作比和欧洲人合作更有信心，但是这些想法都很少得到美国决策人物的赞同。这些决策人和政治家、官员、商人们，以及他们言听计从的知识分子们，都在实质上保护以大西洋为主的方针。由于知道美国在东亚并无重大利益，他们认为那些流行的看法都缺乏充分的根据，不足以支持在亚洲采取更积极主动的政策。结果，三个美国在东亚进行大规模参与的实例，作为大西洋及欧洲事务的副产品附带地发生了。美国最初通过获得菲律宾因而在西太平洋地区树立了自己的权威，菲律宾是美国为古巴岛与西班牙作战获得的战利品。太平洋战争及随后占领日本是美国反对纳粹侵略欧洲和日本政治家决定把他们国家与事业和希特勒结合在一起之后所导致的结果。最后，关于美国卷入亚洲而为年轻的美国人和亚洲人最熟悉的一次是美国企图在亚洲遏制共产主义，它从中共与斯大林及苏联帝国主义建立起联系时开始，美国人对此十分畏惧，决定加以反对。在后两次干预中，美国政府曾经容忍了它所讨厌的在中国发生的情况，直到中国的事态已涉及到了重大欧洲问题，美国才勉强地使用力量。

在海约翰提出“门户开放”以后的半个世纪里，美国在亚洲愿望的核心是有一个强大、独立的中国。大多数美国的政治家确认，如果要实现在中国扩展贸易与投资的愿望，必须除去帝国主义的枷锁，中国必须实行现代化。对一个落后的，被列强统治着的中国，美国是没有什么可指望的。与此相一致，一个有能力维护国家领土完整的，强大的现代中国，将为稳定亚洲力量均势提供最好的保证。中国的虚弱导致 20 世纪初期俄国的冒险主义和日本的冒险主义（尤以 20 世纪 30 年代为甚）——而且会继续在它的边境附近使一些大国陷入灾难。另外，为建立一个强大独立的中国而努力也符合美国的理想和原则，特别是符合它反对帝国主义的传统。于是这一目标牢固地扎根于美国的理想和利益之中，竟坚持了五十年之久。

美国政策上的偏差始于 1950 年，此时美国人民及其领导人由于对共产主义的恐惧而一叶障目，忘记他们历史上对中国的良好愿望是具有坚实的地缘政治学的、经济的和道德上的基础的。美国人一直以为中国会对美国持友好态度，因而被毛泽东中国的敌视态度弄得更为迷惑不解。这种敌视导致美国人放弃他们传统上对亚洲民族主义的支持，不仅对中国，而且无论什么地方，

只要那里的马克思主义领导人要明显扩大铁板一块的共产主义，则都是这样。杜鲁门及其顾问在美国人民的充分支持下决定，在亚洲也在欧洲采取遏制共产主义的政策——实际上它日益成为一项反华的政策，一个反对中国向强盛和现代化发展的前所未有的运动。这里不复存在美国是否要在中国及其敌人之间进行调解的问题，因为，美国本身已成为中国的主要敌人。

在杜鲁门决定让美国再次干预中国内战之后的十年里，反华态度及反华政策进一步发展及强化。艾森豪威尔政府容忍并怂恿麦卡锡分子蹂躏国务院，同时，国务卿杜勒斯（J.F. Dulles），一个陶醉自己言论的人，居然悟出共产主义者、中立主义者，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都属于道德败坏之列。1952年他在共和党竞选纲领中许诺，要结束对远东的忽视，并努力孤立、包围中国，使北京政府崩溃。他强调中国只有一个，就是台湾的蒋介石政权，说美国不会承认另外的中国，也不能容忍毛的政权在联合国取得席位。在许多国家接受美援或希望获得美援的时代，杜勒斯手中握有强有力的手段，用以换取外国对他的政策的支持。同样，他也不遗余力地从经济上孤立中国，尽管这方面的努力收效更差。

除在经济上、政治上采取行动反对中国以外，艾森豪威尔政府还通过迅速发展美国在东亚的军事基地和与亚洲的反共国家签订共同防御条约，继续并加强了对中国的军事包围。杜鲁门政府曾通过和日本、菲律宾、澳大利亚及新西兰签订条约形成一个联盟结构，艾森豪威尔政府则扩大了这一联盟，进而拉入南朝鲜、巴基斯坦及泰国，在英国、法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以外又签订了一个东南亚集体防御条约，最后也把蒋介石的台湾政权包括在内。正如斯大林单方面追求欧洲安全曾经强化了西方的抵抗，恰恰引起他惧怕的那种军事包围，而中国介入朝鲜战争则导致一种更咄咄逼人的，由美国制造的军事态势。但是，不论是军事基地，还是军事同盟，最使毛的中国严重关切的还是那些涉及到台湾的行动。

当美国派部队去朝鲜，并将第七舰队驶入台湾海峡，对北朝鲜进行反击时，中国对美国加紧参与中国内战表示了愤慨，事实上对美国干涉朝鲜却未予重视。此时，准备越过台湾海峡的三十万部队已北上转移至山东，于是当麦克阿瑟的部队向中国推进时，中国可以很方便地介入朝鲜战争。在中国介入以后，台湾对美国人便具有重要得多的地位，特别是对军界来说，他们有责任实践美国保卫日本及菲律宾的诺言。台湾岛的防卫设施建立起来了，大规模的援助源源不断地输入，美国的军事基地也发展扩大了。艾森豪威尔政府最先采取的步骤之一就是给蒋介石“松绑”。

尽管蒋介石寒伧的残兵败将即将袭击中国大陆这种假设是多么荒唐可笑，但是美国人就是要听这套宣传，他们对这种说法也很习惯了。不过蒋介石的残部并未长期处于寒伧状况，因为美国重新把他们装备起来，也因为美援所产生的一连串经济奇迹中又出现了一个奇迹。最后，既然土地并不属于蒋介石所有，而属于当地的台湾籍领导人物，所以蒋介石及其为数不多的亲信答应美国提出的彻底进行土地改革的要求。台籍领导人被迫离开他们的土地后，许多人成为企业家。他们表现出一种倾向，看来和他们早先的日本统治者的关系比既是解放者又是征服者的大陆中国人的关系更为亲近。国民党政府在美国政府的财政资助和一大群美国农业、商业和公共管理专家的指导下进行了重大经济改革。到60年代初期，台湾的生活水平据说已居亚洲第二位，仅次于日本。这种经济上繁荣是和政治上的镇压结合在一起的，防止了

台湾人感情冲动起来造反，反对大陆人。假如说蒋介石重返大陆的前景仍然十分渺茫的话，台湾及其小岛上防御工事已成为统一中国和结束内战的难以克服的障碍。此外，第七舰队的军事行动使蒋介石部队有可能向大陆发起袭击又不受人民共和国的报复。中央情报局经常参与制定这种袭击计划并为之提供方便。所以，毛和他的同志们无需再从意识形态方面找根据来仇视美国。

美国和蒋介石的联系，以及对国内战的干预，不仅是孤立人民共和国，几乎也同样地孤立了美国自己。不仅是一些和印度一样的主要中立国家，而且美国的几个欧洲盟友承认了北京政府，拒绝介入他们认为纯属中国内政的事务。美国国内麦卡锡主义的狂獗和杜勒斯的顽固反共，进一步破坏了世界各国对美国领导的尊重。在马歇尔计划使得欧洲各国在北大西洋条约组织的保护下得到复元以后，当苏联威胁的性质在斯大林死后（如果不在他去世前的话）发生变化已日趋明显的时候，欧洲对美援的依赖也减少了，他们不再甘心由美国来支配他们的政策。另外，面对美国在亚洲的竞争，他们不可能在亚洲进一步扩大本身的利益，于是欧洲各国逐渐退回到欧洲的堡垒中去，把亚洲事务留给了美国。许多欧洲人站在一旁对美国过分卷入亚洲表示遗憾，对美国对亚洲的无知表示遗憾——普遍地没有认识到中国和日本的形势发展正改变着世界上政治、军事及经济力量的布局。

随着欧洲已告复元，对苏联威胁的忧虑减少，美国对亚洲的参与则迅速地加深。在朝鲜战争之后，美国比 40 年代有更大的军事及经济实力可以任其支配，对欧洲的安全已不必担心，因此可以转而寻求次要的目标。美国巨大的实力的大部分可供在亚洲发挥有益的作用——或者是起有害作用。从 1950 年 6 月至 1954 年 5 月，美国给法国在印度支那提供的援助远远超过二十亿美元。1954 年，法国在奠边府打败胡志明的努力遭到惨败后，艾森豪威尔政府认为不能容忍反共事业的挫折，美国将填补这一缺口。在 1954 年及 1958 年，当北京两度以武装力量威胁金门、马祖这两个距大陆海岸几英里，由国民党占有的小岛时，美国给蒋介石提供了保卫这两个岛屿所需的后勤支援，并发出必要的威胁使毛泽东小心从事。

虽然杜勒斯用尽办法扰乱中华人民共和国，力图恢复蒋介石政府在大陆上的权力，但是艾森豪威尔政府不得不再给蒋介石套上他的“皮带”，转而寻求事实上的“两个中国”的政策。杜勒斯甚至在出任国务卿前就曾警告过蒋介石派来的抱有希望的使者：美国是不会出面打仗的。在此后几个月中，他怀疑是否能“驾驭”蒋介石，担心台北政府会把美国拖入战争。已退休的麦克阿瑟将军正怂恿蒋介石挑动中共进攻台湾，否则，蒋就不可避免地要冒在艾森豪威尔第二个任期内被抛弃的风险。如果杜勒斯知道此事，他也许会更加担心。后来杜勒斯终于利用蒋介石与美国结盟的愿望取得对蒋介石的一点控制。

艾奇逊及杜鲁门都曾拒绝美国和台湾的国民党政权结成盟国。蒋介石确信杜勒斯和艾森豪威尔有更好的反应，但是一年多的时间内，他也只好满足于美国人动听的言词。出于艾森豪威尔的预算考虑，美国不会给蒋介石增加援助。杜勒斯并不是“没有同情心的”，但是他着手建立起来的东南亚条约组织（SEATO），台湾被排除在外。也许以后它能够参加进来。

当杜勒斯在炮制显然是旨在“遏制”中国的东南亚条约组织时，毛泽东和周恩来在北京不安地注视着。他们知道蒋介石力争在华盛顿签订一项共同防御条约。9 月份，他们通过在海峡制造危机的办法作出反应。人民共和国



以海岸为基地的炮兵轰击了几英里以外，在国民党控制下的岛屿。毛和周显然想向美国表明这种轴心关系对美国人的潜在危险，以阻挠台北—华盛顿核心的巩固。如果是这个目的，中国显示其力量恰好产生了反作用——蒋介石获得了共同防御条约。

在条约谈判过程中，美国人表现出要使他们未来的盟友就范的决心。如果蒋介石坚持要维护他进攻人民共和国的权利，条约就作罢。罗伯逊（W. Robertson）——他也许是蒋介石在国务院中最强有力的支持者——告诉台湾驻美大使：“美国不能和任何国家谈判订立可能采取军事行动使美国加入战争的防御条约”。同样，美国也拒绝承担保卫由国民党部队驻守的沿海岛屿。尽管蒋介石极尽哄骗之能事，尽管他口头表示不会挑动中共进攻，但直到他同意在部署和动用武力上必须“经双方认可”以后，条约才可到手，可以想见这是为了杜绝国民党任意将美国拖入战争行动的可能性。蒋介石和他的谈判对手们都很不愉快，不过双方都接受了他们可能得到的东西。1955年3月，杜勒斯劝告蒋介石不要再向人民宣称返回大陆指日可待，同时拒绝了蒋介石提出的要美国在联合国对人民共和国代表权问题使用否决权，这两件事进一步激怒了蒋介石。

也许由于周恩来知道美国是有克制的，也许因为苏联不肯支持北京的策略，1955年4月，周提议和美国举行谈判。美国接受中国的建议，于8月在日内瓦开始了大使级会谈，此后会谈在华沙继续进行。在遣返双方平民的问题上迅速达成了协议，这些人都是在1950年中美成为敌对国家后滞留在对方国内而陷于困境的。在达成下一个重要协议之前，16年已经过去了。引起分裂的是台湾问题。中国准备放弃在台湾地区以武力反对美国（假定美国方面也采取对等的自制），但是它拒绝放弃以武力征服台湾，结束中国内战的权利。美国则坚持要中国明确地放弃以武力对付台湾，作为达成任何范围更广的协议的条件。虽然周恩来总理及陈毅副总理有力地暗示，他们不会使用武力，而且强调在增长中的和平解放台湾的可能性，但是僵局依然存在。

中国人民不久就了解到，虽然艾森豪威尔政府不大可能对共产党统治大陆提出挑战，但是它却图谋使北京接受台湾独立，为这一地区带来稳定。看来很清楚，除此以外，杜勒斯对与北京和解不感兴趣。杜勒斯拒绝与周恩来会晤克服这一障碍。他不接受北京提出的建立非正式接触的建议，阻挠中国邀请美国新闻记者访华，并拒绝讨论贸易限制问题。此外，美国继续加强台湾的防务，包括补充带有战术原子武器可以打到大陆的斗牛士导弹。1957年6月，杜勒斯尖锐地攻击人民共和国，重申美国对毛的政权采取最强烈的不妥协态度，并断言共产主义在中国也和其他地方一样，不过是一种短暂的局面。不顾杜勒斯的言论和美国的行动，中国人想把中美对话继续下去，但是美国却把美方与会代表调往一个遥远的住所从而终止了大使级会谈。

到1957年秋天，有迹象表明毛对周恩来采取的对美主动行动已不抱什么希望了，彼时，他正为苏联在空间竞赛中获得的成功而受到鼓舞，并宣布东风正在压倒西风。现在是苏联、中国，可对任何地方的帝国主义的敌人持强硬态度的时候了。但是在莫斯科，尽管尼基塔·赫鲁晓夫振振有词，其实他并未作好采取对抗的行动准备——至少肯定不会在亚洲。甚至在1958年夏天，中东危机期间，俄国人也没有乘机行动。早些时候，毛曾经警告过，不要盲目追随苏联。在1958年8月末，毛选择了自己的路线。人民共和国对沿海国民党控制的岛屿再度施加压力，恢复炮轰金门，假如说作出宽大的姿

态未能使美国人动心，那么大炮能达到目的吗？

答案是模棱两可的，不过有迹象说明，杜勒斯欣赏毛送过来的信息。这位美国国务卿警告说，美国将参与保卫沿海岛屿以制止任何攻克台湾的企图。周恩来重申解放这些岛屿是中国的权利，并要求注意国民党在美国支援下对大陆的袭击。但是，他补充说，美国人声称要和平解决问题，那么中国愿意举行谈判。约有一个月，双方似乎都朝和解伸出了手。9月底，杜勒斯公开批评蒋介石在沿海岛屿部署重兵的政策。他对国民党是否有能力重返大陆表示怀疑，并坚持表示美国没有支援蒋介石部队反攻大陆的义务，甚至在大陆上爆发反对共产党政权的起义时，美国也不干预。美国人站在蒋介石的奋斗目标的一边，就战争的危险发出一片喧嚷时，杜勒斯的反应则是强调美国的灵活性，并暗示美国愿寻求与人民共和国和解。他私下开始探索在不和台湾断交的情况下承认北京政权的可能性。10月份，他和蒋介石会晤，迫使这位国民党领袖宣布不需要使用武力来完成他在大陆上结束共产党统治的使命。

艾森豪威尔及杜勒斯都遭蒋介石及其美国朋友的辱骂，以前这些话是专骂民主党的。北京从两个不同层次作出反应。首先，重申中国愿以和平方式与美国解决台湾地区的争端。但是，毛的同事们日益怀疑杜勒斯的意图，日益相信杜勒斯正致力于把台湾从中国永远分割出去，制造两个中国的政策。这一点中国人是不会接受的，他们的立场僵硬起来了。从台湾及台湾海峡撤出美国军队成为中国与美国和解的条件。海峡的危机已经过去了，但是在艾森豪威尔政府任期的剩余时间里，双方都没有采取新的主动行动。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也无任何进展。

在5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楚地表现出和美国和平解决争端的兴趣。毛泽东、周恩来及其他中国人认识到，他们的某些目标，特别是结束中国内战问题，需要和美国达成协议。同样清楚的是，美国不会按中国所能接受的条件来考虑和解。杜勒斯要求中国人把内战看做已经过去的事。他主张现在可以有二个中国——一个由共产党统治的大中国，一个保留给蒋介石及其继承人的小中国。两个中国的解决方案不仅激怒北京也激怒了台北，而杜勒斯把这个难题留给了他的后任。但是有一点也须注意到，尽管杜勒斯有那么多荒谬的反共言论，艾森豪威尔政府却总是与人民共和国寻求联系。

在华盛顿，与中国问题有关的政府官员分为台湾专家及大陆事务专家。对后者来说，有更大、更多的人力、物力可供支配。同样，在香港这个美国可以利用的最近的观察哨，美国总领事馆迅速发展成一个庞大的机构，使驻台湾的美国大使馆相形见绌。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在眼前，美国利用一切手段观察它，美国的手段不比其他任何国家逊色。

## （二）

1961年，肯尼迪（J.F. Kennedy）执政，决心缓和冷战局势。但是，除与东欧“搭桥”取得一定成效外，新政府对中国采取的主动行动只是进一步孤立毛泽东的政权，并在中国南侧的印度支那加强美军的作用，肯尼迪时期并未缓和中美之间的敌视，而是以在亚洲大陆推行危险的冒险主义著称于世。肯尼迪及其助理恰好面临艾奇逊希望看到的那种局势。在中国与苏联之间已经出现不和。赫鲁晓夫非但不支持中国解放台湾，而且劝告中国人接受美国人显然准备提出的两个中国政策。中国人对此十分震怒，到1959年，他们对苏联领导人的敌对在西方观察家看来已十分明显。赫鲁晓夫对中国的批

评十分恼怒，从人民共和国撤回苏联专家组，让毛去实现他经常鼓吹的自力更生。对美国作出和解的表示，并没有给中国带来收获。在没有苏联支持的情况下采取与美国敌对的态度是有危险的——到1961年，中国已不再可能依靠它与苏联的联盟关系。美国能从中苏分裂中坐收渔利吗？答案是肯定的，但是和艾奇逊所设想的并不完全一样。

分裂的存在就说明，如果和一个共产党国家改善关系也许会造成和另一个的关系更加恶化。艾奇逊曾倾向于认为与苏联的冲突是不可调和的，从而寻求与中国和解，而肯尼迪及其大多数顾问则认为与俄国人搞缓和不仅需要也是可能的。向中国提出和平建议只能暂缓。鉴于苏联是世界上唯一能对美国造成直接威胁的国家，同时以为赫鲁晓夫与毛泽东不同，更易接近，美国政府没有多大的选择余地。美国注意到中苏之间的一个突出争论是，毛泽东不接受赫鲁晓夫关于与西方和解的必要性的论断，于是肯尼迪及其顾问都对缓和紧张的苏美关系感到乐观，而对任何改进中美关系的努力失去希望。

肯尼迪及其国务卿腊斯克断言，中国已成为两个主要的共产党国家当中最危险的一个——并非对美国的安全，而是对世界和平构成危险。可以想见中国人对原子战争的可怕并不在乎，依然保持强烈的革命性，因此，相信他们比苏联更有可能采取侵略行动。由于艾森豪威尔政府不能对付游击战争，中国人便过分自信，于是采取一种“间接侵略”的路线来发动、援助和指导“民族解放战争”。正如美国的坚定不移已使俄国人回到理智上来一样，所以也应该让中国人知道，这种新的侵略方式是不会成功的。美国政府致力于与苏联搞缓和时，必须在亚洲保持冷战的姿态，以“机动灵活”的军事反应来对付中国在东南亚的威胁。

另外，政府在印度支那作出坚定的反应，有利肯尼迪在为美国更重大的利益与苏联改善关系时，使公众对其抵抗共产党侵略的决心保持信任。美国在亚洲愈演愈烈的好战态度，将削弱那些由于政府甘愿与欧洲的共产党共处而激怒的反共专家们，同时，也警告赫鲁晓夫：肯尼迪是不怕恫吓的。最低限度，也可以使蒋介石的朋友们太太平平地安静下来，这时他们的反共的喇叭可能就吹不响了。对这一切肯尼迪只须付出不大的代价——加紧美国在越南的军事干预。

鲍尔斯（C. Bowles）、史蒂文森（A. Stevenson）及政府的一些青年中国问题专家对肯尼迪的打算表示怀疑。他们赞成结束反对人民共和国的僵硬态度——这种态度从中国参与朝鲜战争以来，已构成美国对华政策的特征。他们发现腊斯克愿意听取他们的意见，但在肯尼迪那里则无一点松动。艾森豪威尔曾威胁要再度从政，以反对任何使人民共和国取得联合国席位的努力，国会里反对承认人民共和国的情绪也十分激烈。毛及其代表不论在公开还是私下场合都在找麻烦。对肯尼迪来说，在成功希望很小的情况下，没有必要去刺激那帮畜牲或者“原始人”——这是艾奇逊给麦卡锡分子的“雅号”。他不允许国务院重新展开对中国政策的争论。

1961年8月，肯尼迪秘密地向蒋介石承诺，如果联合国投票接纳北京政府进入联合国，美国将行使否决权。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邦迪（McGeorge Bundy）试图劝阻他，但是肯尼迪认为，国内的压力要求他使用否决权。他考虑事先向蒋介石许愿，使蒋对他更亲善。但是，他也决定美国配合蒋介石的部队进行反对大陆的隐蔽活动，这一决定却不是在国内的压力下作出的。他回避了北京提出的进行部长级会谈的建议。

鲍尔斯及其他人试图使总统相信：毛的言论及发自北京的威胁不过是一种夸张——中国使用好战的语言是因为缺乏行动的手段。他们强调中国的行为表现是慎重的，防御性的。由于赫鲁晓夫造成一个接一个的危机，认为中国是温和的看法开始占上风。在 1962 年初，腊斯克反对支持蒋介石进行反对大陆的活动，认为在台湾对面的共产党军事设施是防御性的。在 1962 年最初的几个月，人民共和国好像异乎寻常的安静。

1962 年 10 月发生了两件事，又破坏了为缓和美国对毛泽东中国的看法所作的努力。第一个是古巴的导弹危机。在原子战争的边缘逡巡了一周之后，肯尼迪及腊斯克断定赫鲁晓夫的行动是在其克里姆林宫内的政敌与中国人共谋的压力下采取的。这种看法似乎来自苏联驻美国大使多勃雷宁（A.Dobrynin）。腊斯克及其顾问对他异常地信任。他们相信自己正对莫斯科的决策过程获得深入的了解，因而忧虑更大了。中国人对赫鲁晓夫在导弹危机中退缩破口大骂，使对中苏分裂的意义这一新看法显得更有道理。

第二件事是发生在导弹危机期间的中印边境冲突。有些人认为，由此证明，说中国不是扩张主义者的论点不攻自破。有些分析家，如腊斯克，注意到蒋介石也同样对这块有争议地区提出过领土要求。另外一些人和今日的学者们所持看法相同，认为是印度人挑起了战争。但是这种看法未起作用。对某些人来说，中国人愿意诉诸武力，而且轻而易举地击败印度人，似乎表明了他们的侵略性。中国人进攻印度，就是进攻了一个赢得美国自由主义者同情的国家，而美国社会中的这些自由主义者恰恰是最易接受一个处事审慎的中国形象的那部分人。尤其是，中国人使鲍尔斯及加尔布雷思（J.K.Galbraith）这两个对华新政策呼吁最得力的人闭上了嘴，因为他们都对印度有很深厚的感情。

当肯尼迪政府在和苏联缓和关系的进程上踌躇不前时，华盛顿对北京的口头攻击增加了。腊斯克断言，老挝的麻烦持续不断反映苏联已在印度支那丧失其影响。他认为俄国人有意尊重 1962 年签订的日内瓦协议，但是中国在河内的影响增加了，鼓励越南更加好战。同样，非洲的骚乱也被认为是中国人在那里展开攻势的结果。甚至当俄国人的表现令人不愉快时，美国分析家们也怀疑是中国人的辱骂使赫鲁晓夫作出了反应。肯尼迪时刻担心中国可能拥有核武器，担心中国可能发动侵略。1963 年 7 月，他召集国家安全委员会特别会议专门讨论他的担心。中央情报局认为，中国的政策反映出他们的谨慎以及明显地尊重美国的力量，但是，这并没有使肯尼迪得到多少安慰。他还在为中国宣布支持东南亚的革命运动而感到苦恼，而且决心接受这一挑战。在 8 月份，他公开讲出他的忧虑，提醒美国人说，一个七亿人口的大国，可能不久就能制造出核武器，“一个决心以战争为手段来达到最后成功的政府”造成了一种在他认为是“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比我们所面临的任何局面更加危险的形势”。

肯尼迪政府由于总统本人对中国的态度，以及他对所谓“中国院外集团”的惧怕，导致与人民共和国的接触比杜勒斯所允许的还要少。有报告说，肯尼迪打算在他的第二届任期内改变政策，但是，在他的意愿接受检验之前肯尼迪就被人暗杀了。他在世时，不允许有新的主动精神。他去世后，在约翰逊（L.B.Johnson）政府的初期，主管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希尔斯曼（R.Hilsman）提出一个新的立场，引起世界瞩目。在 1963 年 11 月，希尔斯曼透露，美国的政策不再建立在共产党在大陆的统治即将消逝的假定上。他

暗示，美国已准备和毛的中国共处，同时保持它对蒋介石的“台湾岛上的中国”的一切义务——是两个中国计划的变种。

由于北京及台北都不能接受这种安排，希尔斯曼的想法好像没有使什么美国人感到不安。对美国来说，这是一个理想的解决方案，既可承认人民共和国的现实存在，又不必抛弃台湾。蒋介石会大为震怒，可是约翰逊政府并不在乎，因为政府里没有几个蒋介石的朋友。约翰逊的主要力量总是来自他能动员的美国人民的支持；从公开对希尔斯曼讲话的反应看来，“两个中国”——最好是一个中国，一个台湾——的概念会被美国人民接受。真正的难题在于如何得到北京的默许。

于是用上了驯服苏联时所得的“经验”。首先要让中国人明白，美国坚决遏制中国的扩张，然后他们才会接受美国准备提出的公正解决方案。美国的对华政策拟采取双管齐下的方针：一方面缓和紧张局面，另一方面显示美国坚定地反对中国侵略的决心——不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侵略。中国会渐渐地被带回到国际大家庭中来，与邻居们欣然和平相处。这种政策后来被称为“遏制而不孤立”的政策。

遗憾的是，约翰逊政府继续贯彻肯尼迪以越南为界线的决定。腊斯克坚持要在那个小小国里接受毛主义的“民族解放战争”的挑战。希尔斯曼坚持说，由于越南正跨在从中国到印度的一条路线上，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出发，不能让中国人控制越南。可是希尔斯曼没有注意到，其实中国人已经找到更方便的去印度的通道。同样，腊斯克也没有注意到，中国和越南斗争的关系远不如它所宣称的那么重大；越南共产主义不再是中国势力的延伸，正如中国共产主义不是苏联势力的延伸一样。中国人没有什么理由跨越越南线，付出美国索取的代价，但是约翰逊政府却大大地低估了镇压胡志明的武装需要付出的代价。在胡志明的背后，中国人尽管提供了物质援助，只不过起啦啦队队长的作用。在60年代中期，美国巨大的资源越来越多地投入越南，给那个苦难国家的人民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但任何人都没有得到什么好处。约翰逊在东南亚的泥沼中，为自己确立了一个使冷战在亚洲大大升级的历史地位——和中国关系正常化的探索只得推迟。

中国人于1964年10月爆炸了他们的第一颗原子弹，约翰逊于11月的大选中挫败戈德华特(B. Goldwater)，于是对用核武器武装起来的中国的关注，便成为约翰逊及其顾问们设计东亚政策的基础。一位观察家评论说，中国的核能力“把一件令人敬畏的新式武器置于这样的政府手中，该政府对人类生命和公认的国际道德标准，甚至连共产党的道德都予以藐视”。一个按公认的行为准则生活的国际社会能最好地满足美国的利益，这个观点构成腊斯克信仰的核心。在1964年及196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唯一置身于这种国际秩序之外，并践踏它的准则的大国。俄国人甚至在最坏的情况下，也还要对联合国宪章说几句动听的空话。中国人主张另一种世界秩序，主张要有战斗性。腊斯克担心，它意味着混乱和战争，而在一个原子世界则意味着文明的毁灭。印度尼西亚人退出联合国，显然要和中国共命运，腊斯克为之震动。这是那些试图破坏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成果的努力的一次胜利。重要的是要向全世界指示毛是错误的，拒绝文明的行为不会有好结果。腊斯克和批评他的一样明白，越南并不是御敌的好地方，但似乎没有更好的地方可以利用。如果在对共产党最有利的条件下，把共产党的好斗性挫败于越南，这个经验教训就毋庸置疑了。

当美国使战争在越南升级时，中国领导人的忧虑加重了。像在 1950 年一样，他们不得不再次推测美国的意图。美国会以它在印度支那大大增强了的军事力量进攻人民共和国吗？美国对越南的军事行动会威胁中国的安全吗？一场激烈的辩论使得参谋长被清洗，那些不相信有这种危险的人占了上风。中美两国的喷气式飞机在邻近边境的地方发生冲突加剧了紧张局势，但是更加使毛烦恼的是国内发现的问题，曾经使革命走向胜利的价值观念受到侵蚀使他不安。已到该进行改造的时候了。

1966 年 7 月，当美国飞机轰炸越南北方，约四十万美国人在越南南方作战，约翰逊号召中美进行和解。中国人不予理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进行中。显然中国人已面向国内，毛正决心要把自己的社会弄得四分五裂，希望把它改造得更接近于他的乌托邦模式。中国的驻外大使除一人外全部被召回接受再教育。陈毅已失去对外交部的控制。甚至周恩来在保护中国的外交政策机构上也好像无能为力。北京在国外的影响急剧下降。

当中国正经受动乱的折磨时，约翰逊政府断定美国轰炸机此刻可以越来越接近中国边境对越南进行轰炸而不受报复。但是，腊斯克仍然为中国在意识形态上反对美国以及他本人的价值观念而感到不安。“文化大革命”以后会怎么样呢？假定“文化大革命”后产生一个更加团结强大并决心实践毛的革命高调的“拥有了原子武器的十亿中国人”会产生什么后果呢？这就是 1967 年 10 月腊斯克提出的引起了一时轰动的问题，当然，他还有其他担心的事。

多年以后，给腊斯克当副手的助理国务卿邦迪（W.P.Bundy）自问道：60 年代中期中国实际上也许并不像表面上那么咄咄逼人？“由于对花巨大代价坚持越南战争的重要性有不同的意见”，可否对中国重新进行评价呢？邦迪不知道。对腊斯克来说，评价中国的力量是次要的，而考虑“由核武器武装起来的十亿中国人”会使中国变成什么样子则更重要。使腊斯克为之不安的不是中国的实力，而是它要摧毁世界秩序的确切意图，而这个世界秩序正是腊斯克所致力于维护的。在中国成为一个大国以前，必须使中国人改变信仰，驯服他们，中国人的革命高调加上法国总统戴高乐对美国在核子世界中所承担的义务的可靠性的嘲笑，要求美国“在战争结束以前”继续呆在越南。

到 1968 年，腊斯克和约翰逊都看得很清楚，中国对苏联的敌视已至少不亚于对美国的敌视。但是美国领导人已在越南陷得太深，被战争弄得精疲力竭，无力向中国提出新的建议。5 月份，当“文化大革命”的凶猛势头似乎已经减弱时，美国曾作出一个温和的姿态，但是中国人宣称，他们不愿和约翰逊政府打交道。尽管苏联入侵捷克使中国领导人震动和愤怒，这一事件也未能打破僵局。但是，当红卫兵在中国已受到控制，同时美国力图从越南脱身的时候，一个和解的新时机就近在眼前了。

原书注释

引自 Eric Goldman, *The Crucial Decade—and After*, , 纽约, 第 116 页。

顾维钧—罗伯逊会谈记录, 1954, 11, 12, 顾维钧文件, 哥伦比亚大学。

引自 John Gittings, *The World and China, 1922—1972*, 纽约, 1974 年版, 第 236 页。

引自 Roderick MacFarquhar, *Sino—American Relations, 1949—*

1971, 1972 年版, 第 168 页。

引自 MacFarguhar 主编 Sino—American Relations, 第 200 页。

Richard P. Stebbing, The United States in World Affairs, 1965, 纽约  
1966 年版, 第 148 页。

William P. Bundy, 未发表的手稿, 第三十二章。

## 尾声 终于恢复邦交

### (一)

“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以激烈的派别斗争而闻名，其详情可能永远不会为外界知晓。中国领导人全神贯注于国内事务。红卫兵的海洋淹没了国家的外交政策机关，北京逐渐和世界脱离了接触。1968年8月，苏联进攻捷克，并以勃列日涅夫主义为之辩护，迫使中国人向外看，正视其边境上的危险。当中国的武装力量卷入了无穷无尽的、主要是非军事的国内勤务，苏联却在东亚及中亚增强了军事能力。警告十分清楚：中国可能是下一个目标吗？

正像以前常常发生的情况那样，每当有外来危险时，周恩来的声音就出现了。1968年11月，尼克松(R.Nixon)当选总统，周恩来建议和新政府举行会谈，并于2月份恢复华沙的会谈，这是在华盛顿白宫易主后几个星期，周和他的朋友以及受他庇护的人，控制着外交部，但是他们不能左右国家政策。在计划恢复华沙会晤的前两天，中国又把它取消了。也许人民解放军的领导人林彪及毛的夫人江青都反对作任何努力缓和和对美国的政策。

美国分析家们看出，中国在政策问题上关系很紧张。可能只有林彪一人是例外，其余中国领导人都似乎对寻求与苏联和解不感兴趣。北京争论的问题是：是在准备和苏联冲突之际，再次试图改善和美国的关系，还是继续同时和两个超级大国抗衡。周恩来及其支持者在这场争论中失败了。

1969年3月，中苏关系紧张，在乌苏里江珍宝岛上爆发了两次严重边界事件。冲突发生在中国和苏联的巡逻队之间，当他们开起火来就不是闹着玩了。中国已成为一个核大国，在一场核战中，中立国也避免不了放射性尘埃，前景是可怕的。

莫斯科要求通过谈判解决分歧，但中国人不让步。他们的唯一反应是开始大规模的军事集结，准备和苏联打仗。俄国人发出几次最后通牒中国都置之不理，于是苏联部队在直升机配合下于8月份进入新疆。出于担心俄国人对这个地区的核设施进行先发制人的攻击，中国同意与俄国人会谈。随后举行的谈判使紧张局势暂时缓和，但是并没有减少中国人对苏联的敌视，及抵抗其控制的决心。但尽管如此，对美国仍未提出新建议。

在美国，尼克松担任了总统，在许多人看来，他不过是以前那些疲惫而且受人指责的美国领导人的一个缩影。与人民共和国缓和紧张关系的可能性似乎还是那么遥远。虽然如此，他好像有时了解美国人民的情绪变化及对中国的和解态度。在台湾，蒋介石还健在，可是，他的美国朋友们却正在消失。一代选民的记忆中，没有蒋介石作为战时英雄的回忆，而是把他和台湾视为与北京达成和解的障碍，为避免将来再出现其他的越南，他们认为与中国和解是必不可少的。任何组织凡经证实与“中国院外集团”有关，人们的捐款、赞助便锐减。

在不危及美国安全的条件下，尼克松政府缓慢而小心谨慎地发出了愿与中国改善关系的信号。1969年7月，先后放松了自朝鲜战争以来一直存在的旅行及贸易限制。第七舰队停止在台湾海峡巡逻。北京没有什么反应。在华沙，美国驻波兰大使花了这个秋天的大部分时间小心翼翼地找机会同中国的代办接触。到12月建立起接触以后，美国代表建议恢复中美会谈。于是在圣诞节前，中国人回答说“行”。1970年初，大使级会谈重新开始。虽然美国



入侵柬埔寨激起毛泽东严厉的批评，导致中国撤回中方谈判代表，尼克松并未放弃努力。临近岁末时，他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宣称“我们必须和共产党中国建立关系。”尼克松的行动或声明虽不具有很大的重要性，但是由于出自一位共和党的总统，而他长期以来又是一个冷战政治家的典型，加上公众的反应也说明他采取的这些步骤是深得民心的，所以对关心中美关系及亚洲和平的人来说，20世纪70年代有了希望。这在很大程度上要看北京了，因为，现在时代不同了，任何一方都不能为国与国之间的接触定调子。

在中国，关于政策的辩论仍在进行，但是有清楚的迹象表明，中国的领导人赏识华盛顿的新试探。周恩来由于过去对美国作出友好姿态一无所获而陷于政治上的困境。为重建外交部，他兢兢业业地在奋斗着。在中国官方的新闻报道上，美国形象逐渐改变了。美国在太平洋的力量正在衰落——已不再是对中国的威胁，另一方面苏联的冒险主义引人注目。1970年底，毛被说服了，他相信美国可能成为对付苏联压力的一个有价值的筹码。毛于12月向尼克松发出一个明白无误的信号，表示愿意接受美国的倡议。他告诉斯诺，他很愿意和尼克松会谈——虽然他是右派，是垄断资本主义的代表——因为只有和尼克松这样的人打交道才能解决中美两国之间的问题。

1971年，伟大的突破来到了，这也许是尼克松笼罩着阴影的生涯中最明亮的一个光点。这位总统在2月份向国会发表的“世界情况”咨文中谈到和北京进行对话的重要性。他提出在联合国中应有人民共和国的席位，但是不牺牲台湾的地位。这当然存在着障碍，即另一代人或者会称之为不可逾越的“第二十二条军规”<sup>\*</sup>。看来尼克松提出的方案又是两个中国的又一变种，北京对此是一贯拒绝的。但是周恩来及几位美国问题专家另有一个很有趣的建议：“只有一个中国，但不是现在。”毛泽东及蒋介石都坚持只有一个中国。为什么不让美国认可一个中国的观点，同意达成默契，把台湾的前途留待中国人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在以后去和平解决。各方都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灵活性，并且赏识对方的灵活态度。3月，美国解除了去中国旅行的最后限制。显然这已足够使周恩来得到他所需要的支持。几周后，正在日本的美国家乒乓球队忽然接到去中国打球的邀请——这是第一个被人民共和国邀请去的美国家团体。乒乓球队去了中国，在北京受到周恩来本人的接待。周就美国家乒乓球队在中国出现，公开地表明他的看法——中美两国正处于建立新关系的前夕。他同意派一个中国乒乓球队去美国。尼克松以亲自作出响应宣布解除剩余的一大堆对中国的贸易限制，并示意他有兴趣访问中国。密电通过不同的渠道往返传递，友好的信号从每一个岗位上发出，7月的一天，全世界发现，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H.Kissinger)刚从北京返回。尼克松事先和朋友或敌人没有打招呼，于7月15日宣布，基辛格已和周恩来会晤，而且，美国总统已接受了在下一年内访华的邀请。政策大偏差的年代终于快到了头。

在8、9两月，美国支持联合国接纳北京的代表，另方面对台北力图保持其席位仅给予名义上的支持。美国关于接纳两个中国代表团的动议未能获得多数票。阿尔巴尼亚提出的以北京代表取代台北代表的建议顺利通过。这在美国所遭受的外交挫败中是痛苦最小的一次。华盛顿已向一个中国的政策迈进了一步。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飞往中国，这位搞反共迫害老手有幸在中国受到德高望重的毛泽东的私人会见。全世界目瞪口呆的电视观众看着尼克松坐在那里从头到尾看完一场枯燥的、充满共产主义宣传的芭蕾舞，然后

热烈地鼓掌。这可真是新的尼克松，新的中美关系。

在尼克松为期一周的中国之行结束时发表的中美联合公报中，各方都坦率地声明自己的立场。显而易见，与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使关系“正常化”的主要障碍并非美国在越南所起的作用，而是在台湾。中国人反复声明，他们反对任何形式的两个中国的观念，并坚持要求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军队。美国方面承认，海峡两岸的所有中国人都坚持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只有一个中国，而且美国不对这一立场持异议。在重申美国对和平解决台湾的问题的关切之后，美国确认最终将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并承诺“它将随着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在台湾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中国人私下警告说，在美国和蒋介石政权断交前，无论是贸易还是外交关系都不可能进一步发展。

根据 1954 年的条约，美国有防卫台湾及其附近通道的义务。美国在这个岛上的商业利益达几十亿美元。公众舆论抽样调查显示，美国朋友不情愿抛弃台湾人民，把他们的朋友及盟友丢给共产党。尽管如此，尼克松政府还是准备废止和台湾签订的共同防御条约，它确信在近期内，岛上的人民有能力保卫自己，而从远期看是可以找到和平解决办法的。中国期望尼克松迅速采取行动，1973 年同意两国分别在北京及华盛顿设立“联络处”——小型的大使馆，只是不用使馆名称。但是关系正常化进程由于水门事件危机及随之而来的在美国国内的政治斗争而受挫。尼克松总统为逃避对他的弹劾，绝望地进行战斗，但是被揭发出来的一桩桩事实都说他与违反宪法的行为及犯罪活动有牵连，在他的椭圆形办公室里发现了录音带之后，对他说谎一事已越来越没有什么可疑的了。于是尼克松总统越发依赖保守派议员的支持。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长期以来都支持蒋介石的“自由中国”——他们是共产党政权“红色中国”的死敌。此时这位总统不敢冒疏远他们的风险，只有暂不对共同防御条约采取进一步行动。承认人民共和国不如保尼克松的总统位置重要。

尼克松未能挽救他自己，于 1974 年 8 月被迫去职。福特 (G. Ford) 继任总统，他在阿格纽 (S. Agnew) 不光彩地辞职后，被尼克松提名为副总统还不到一年。福特比先前的尼克松更加依靠基辛格来掌管国家的外交政策，而基辛格是专心致志于实现和中国关系正常化的。不过，福特也和尼克松一样，需要党内右翼的支持。当他有意在 1976 年大选中竞选总统之后，这种支持对他就更为重要了。在总统提名时，福特遇到里根 (R. Reagan) 的挑战，长期以来，里根一直名列共和党保守派提名候选人的榜首，所以，福特在执行承认人民共和国的计划上表现犹豫。

在中国，周恩来煞费苦心所达成的外交政策上的一致意见开始分裂。他和美国接近取得的成就似乎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美国并没有放弃和台湾的共同防御条约，承认人民共和国一事比 1972 年时并无进展。此外，基辛格在与苏联和解方面作出有成效的努力，再加美国在东亚的军事力量逐渐削弱，都使致力于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中国政府感到不安。到 1974 年，北京在外交政策上的争论已不可能与夺取继承权的斗争分割开。毛泽东已病弱不堪，即使他有百折不挠的毅力也不能违抗常人的命运。周恩来身患晚期癌症，当周试图让邓小平出来任职掌握大权时，一个由毛夫人等领导的“激进”派对周恩来的内外政策展开了攻击。激进分子并不寻求与苏联和解——自从 1971 年林彪死后，任何中国领导人都对这种想法不感兴趣——但是，他们却

坚持说周夸大了苏联进攻中国的危险性，以此作为理由向美国提出不必要的建议。

从 1973 年到 1976 年，在美国和中国都因权力继承的危机而妨碍它们各自采取决定性的行动。到 1976 年底。这两个国家的新的领导模式已经明朗。在中国，周恩来已于 1976 年 1 月去世，激进派即所谓的“四人帮”成功地阻止了邓小平继承权力。但是，关于继承权的主要争议尚未解决。几个月来，在毛的生命如潮汐般退去时，激进派企图抢在毛去世前发动攻势清洗邓小平，以及追随周恩来的人。他们失败了。9 月份毛泽东去世后，把激进派从中国政治中消灭的障碍不存在了。激进派的领导人于 10 月份被清洗，为保证贯彻周恩来的政策的温和派掌权扫清了道路。这个政权继续保持反苏政策，一年来只有一些小的变化，但是很清楚，中国的政府是由矢志和西方，特别是和美国改善关系的人掌握着。

在美国，1976 年大选，一个相对来说鲜为人知的前佐治亚州州长，他坚持让人称呼他“吉米”的卡特当选为总统。人们对他的外交政策观点所知甚少，但是从他任命的人员来看，特别是任命奥克森伯格 (M. Oksenberg) 参加国家安全委员会，任命霍尔布鲁克 (R. Holbrooke) 任助理国务卿，主管太平洋及东亚事务，表明他有朝“关系正常化”迈进的意向。

一年过去了，另一年也很可能在中美关系毫无进展的情况下度过。总统手下的人意味深长地谈到，和苏联签订限制战略核武器 (SALT) 的协议更应该优先考虑。他们解释说，从策略上考虑，先要和巴拿马签订条约，将运河退归巴拿马管辖。1977 年中期，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民众反对“抛弃”台湾。看来似乎很清楚，卡特对这个问题并无紧迫感，对过去失去的那些机会也并不在意。不久白宫工作人员通知一些他们偏爱的记者——当然，是秘密地——总统准备在他第二届任期内采取必要的行动。美国人——还有中国人——以前都听到过这种说法。

但在北京，邓小平已东山再起。他的紧迫感远比卡特强。他对达成限制战略核武器协定不感兴趣。邓小平并没有任期四年的保证，他也没有这份福气，把问题推迟到再次当选之后。他已经七十多岁了，在国内受到威胁，国外则被苏联“霸权主义”所包围。一个亲苏的政权在阿富汗掌权，越南则威胁着柬埔寨的亲中国政府。苏联肆无忌惮地在非洲之角扩充它的势力。伊朗的动乱在升级。邓愿意使美国总统的日子好过一些。他愿意含蓄地保证人民共和国不以武力解放台湾。他将允许美国宣称两国间有这一谅解，而不表示异议。他将允许他们继续卖武器给台湾。显然在他看来台湾没有来自苏联的危险重要。

1978 年秋，卡特政府迅速作出反应。总统的大多数外交政策顾问早就认为承认人民共和国，废止同台湾的防御条约是明智的步骤。另一些人则认为这是个嘲弄苏联的机会，而跃跃欲试。美国公众赞许总统 12 月 15 日发表的声明，声明说，他准备承认北京的共产党政权，而不是台北的国民党政权，为中国的合法政府。对担心通货膨胀，经济萧条及贸易逆差的美国商人来说，传奇式中国市场的魅力又重放异彩。

有一些美国人对“抛弃”由蒋的儿子蒋经国掌权的台湾感到不快，但这一争论不同于第二届杜鲁门政府时期，它并没有发展成恶意的攻击。共和党的主流和民主党人一样欢迎这一新的和解，两党都争先恐后急于率代表团去北京。政府保证，美台关系一如既往，在非官方基础上，以“美台协会”取

代原来的大使馆，事实上仍保持政府之间的关系，解除了一些顾虑。中央情报局估计台湾有能力保卫自己，同时，了解到中国缺乏跨过海峡发动进攻的两栖作战能力，也使人放心。最后，邓小平飞往华盛顿，他表示台湾与大陆统一有可能以和平方式实现，又说服了一些持怀疑态度的人。邓旋风式的美国之行在公共关系上也获得巨大成功，包括白宫的盛大招待会，参观国家美术馆以及访问几个美国城市。在休斯敦，这位小个子的中国领导人戴上宽边高顶帽，摆好姿势，使摄影记者及旁观的人们都十分愉快。1979年3月1日，美国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外交上的承认——自从那个中国政府执政以来，差不多已有30年了——正式结束了美国政策上的大偏差。

## （二）

美国和中国建立新的关系对美国来说并非完全有利无弊的。在台湾发生了由政府授意的，短暂的反美骚乱。在日本，由于顾虑美国在重新发现中国的欢快之中会忘记日本对美国具有更大的重要性，由此引起的不安是有十足根据的。而当邓小平利用美国的讲坛谴责苏联“霸权主义”时——中国用于帝国主义的代号——只能引起苏联的愤怒。邓小平访美的余辉尚在，中国军队就向苏联的盟友越南进攻，作为对越南推翻柬埔寨波尔布特政权的报复行动，这个政权是与中共命运的。这场冲突毫无结果地结束了，苏联或美国都没有干预，但是它却使美国人为他们的新朋友可能给他们制造的困难而有所警惕。

显而易见，中国人转向美国是为了与苏联抗衡。美国人力图通过新的限制战略武器协定等措施加强美苏缓和关系的基础遭到了中国的反对。在美国以及华国锋1979年秋访问过的欧洲，中国人都企图掀起对俄国人的恐惧及不信任，加深苏联和西方的紧张关系。当莫斯科与华盛顿之间的障碍于1979年有所增加时，有些分析家提出，美国有无可能同时与中国和苏联两家改善关系。为与中国和解把苏美关系退回到缓和前的对抗状态，代价未免太高了。在80年代开始时，仍存在着一线希望，即美国外交家们将能实现同时和两个共产党巨人加强联系的微妙任务。

在美国对华关系中那些看上去是双边关系的问题，几乎无不产生国际影响。中国人正致力于“四个现代化”——使其农业、工业、军事及科学实现现代化。尽管中国的农业建设有巨大进步，其产量只能勉强跟上人口的增长。工业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失去了十年或更多时间。中国快要过时的军事技术在对越南的军事行动中已暴露于世。军事技术落后是军队支持邓小平而不支持激进派，以及支持邓向西方开放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美国援助中国发展，特别是向中国出售具有军事潜力的技术却激怒了苏联。另外，即使为了毫无疑问的和平目的购买物资，中国所需的外汇也是来之不易，因为中国对美国出口不享受最惠国待遇，对产自中国的一些产品实行高税率，使中国货在美国没有竞争力。1979年春，谈判一项中美商业条约（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贸易关系协定’），其中包括给予最惠国待遇的条款，但是，这项条约把苏美关系弄得更复杂了。1974年贸易法案的杰克逊—瓦尼克（Jackson—Vanik）修正案是针对苏联的，它提出拒绝给任何剥夺移民权利的共产党国家以最惠国地位。假如中国得到特别豁免的话，也就很难责怪苏联领导人因此发怒了。卡特政府还答应中国，它不会把这件事与美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的事务联系起来。

多年前，格里斯沃尔德（A.W.Griswold）对美国的远东政策进行过具有

经典意义的研究，他在结论中指出，在 1938 年，远东离美国，“相对来说”还像在帆船时代一样的遥远。在 1980 年，没有人会提出这种论点了。东亚已经成为美国现在，以及将来都离不开的一部分。美国因越南战争从亚洲大陆上的大规模干预中撤退出来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退到对亚洲漠不关心的程度则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军事力量及日本经济力量的崛起，伴随着欧洲力量的消蚀，使这些亚洲国家和欧洲各国具有同等重要性，而从美国可预见的将来看，其重要性仅次于苏联——这四个国家都在东亚相遇。

在未来年代里，美国和中国的关系，以及包括苏联在内的更大的战略三角关系，其前景如保尚难断定。在邓小平离开政治舞台以后，中国将发生什么情况还不清楚——虽然大多数分析家抱谨慎的乐观态度。没有迹象表明任何领导人对与苏联和解感兴趣，也没有根据说对现领导所强调的现代化有人反对。可获得的一切迹象都指出，中国将为实现周恩来的目标而奋斗——通过和美国的联系加速使共产党中国成为一个伟大强盛的国家。对美国人来说，被国内问题所困扰，已无能力去控制一大群昔日的附庸国，或新兴国家，80 年代大国权力格局的形成，也是可以使美国人乐观的少数理由当中的一个。记住中美两国的利益并不一致，记住日本及苏联对美国的安全及经济比中国更重要，能干的领导人便能增加可能性使我们的子孙后代得到我们这一代美国人所不曾知道的和平。

在一个载人宇宙飞行的时代，美国人利用较多的闲暇，又一次体会到他们先辈提出的原则的正确可靠。这个原则就是副总统蒙代尔（W.Mondale），1979 年 8 月 27 日在北京重新援引的罗斯福的话，当“某一国家稳定和繁荣起来，能在其国境内维持和平，并足以制止外来侵略时，对其他国家是有益的，而不是不利的。我们衷心希望中国进步，只要我们用的是力所能及的和平、合法手段，我们将尽自己的一份力量来促进这种进步。”

原书注释

出自 1970 年 12 月 10 日总统记者招待会。

引自《中美联合公报》（1972 年 2 月 28 日），北京外交出版社，1972 年 6 月。

Roosevelt, Letters, , 第 1405—1407 页。译注“第二十二条军规”（Catch22）美俚，指困难，尤指不允许人从困境或险境中逃避的规定。

